

CSSCI 扩展版来源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重庆市一级期刊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ISSN 2096-3378



03>

9 772096 337247

2024/2

#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本刊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2023年10月修订）反映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敬请作者在投稿前仔细阅读、对照处理，以使稿件经制度化流程得到更高效率的办理。

## 一、常设专题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一国两制”实践回顾与展望、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

## 二、选稿标准

秉持“以专业视角研究统一战线，以统一战线视角研究中国、探析世界”办刊理念，提倡宽视角、学理化、多学科、多方法、多层次研究统一战线。倾向选用从宏观和中观层次研究统一战线的稿件，坚持“以题审文、按质取文”。

## 三、具体要求

（一）导向。稿件须旗帜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用学术讲政治。注意防范具体表述、引用注释或参考文献、图表中的话语歧义与隐形意识形态风险。我刊在审编校全程中对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

（二）选题。立足宽广时空视野，及时回应党和国家战略关注，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角度新颖、力求前沿，坚持大统战视角，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对统一战线议题作出使读者有较大启发的研究，避免“就统战谈统战”。

（三）立论。立论基础坚实，问题提出部分应包含研究背景陈述、文献述评、创新点阐述等内容。要有精到的文献综述，开门见山地指出所研究问题、理论价值和政策依据、现实意义。重视援引前沿成果（含正文论述），且实际引用了大量的期刊前沿文献。参考文献一般不少于30条，其中引用近3年期刊论文不少于10条，同时注意回溯三年以上的代表性论文。

（四）论证。论证中注意材料支撑，使用丰富、可信、有说服力的论据，避免泛泛而谈。题目、摘要、关键词、图表应做到规范、简洁、清晰。

（五）文字。提倡简洁、清晰、准确、顺畅、朴素的文风。表述符合语法规则，主谓宾结构清晰，无病句，无文字差错，无逻辑错误。请逐一仔细核对原文，如发现问题较多、学术态度不端正的，特别是如在编校中发现文字硬伤、低级文字错漏情形，即使已经审理录用的稿件也将作退稿处理。

（六）注释与参考文献。注释使用尾注体例。引用各类文献时务必核实原文，确保准确性。参考文献体例详见《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https://mp.weixin.qq.com/s/kv8cyCnRcp7QbkyXlJeX0g>。

（七）篇幅。不少于12 000字，论述深入的优秀论文篇幅可达1 5000~20 000字左右。

（八）学术诚信。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文字重合率一般不高于15%。作者在投稿前应明确作者顺序（依据作者的实际贡献），投稿后不接受对作者署名及顺序、基金项目等基础信息的更改。

（九）审稿周期。审稿周期为一个月。来稿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本刊返修意见或有关回复的，作者可自行撤稿。审稿流程：一审→二审（含专家外审）→三审。

（十）其他约定。对契合办刊宗旨和用稿要求的稿件，优先录用、优先刊发，优稿优酬（税前）、特稿特酬（税前）。

（十一）投稿方式。采取邮箱投稿，投稿邮箱：[ysyxb@vip.163.com](mailto:ysyxb@vip.163.com)。

（十二）联系方式。电话：（023）62874725；微信公众号：[tyzxyj](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开放获取：<https://cpsy.net.cn/?Tongyi/Zhanxian/>。

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详版请见本刊微信公众号相关推送：<https://mp.weixin.qq.com/s/RXpUuqE7ivLXv5qv54MYEQ>。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2期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协办单位：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

编委：王浩 王英津 王浩宇 田飞龙  
吕鹏 刘福军 齐鹏飞 李俊  
李捷 杨恕 肖存良 汪仕凯  
汪曙申 宋俭 张建 张献生  
陈纪 陈兵 陈奕平 陈家刚  
相德宝 袁征 钱再见 徐理响  
郭永虎 黄天柱 蒋锐  
韩云波 薛庆超

(按姓氏笔画排列)

社长：夏晓华

主编：王鸿

执行主编：林华山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2期（总第44期）  
双月刊 2017年创刊 第8卷

## 统一战线学研究前沿专题

### 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

- 0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  
道理学理哲理 / 侯勇 柯增金
- 16 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  
——兼论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完善 / 程同顺 王利平
- 30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 哈战荣 郑佳
- 43 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 步蓬勃

###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重大论断研究

- 58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内在逻辑、历史演变与当代意蕴  
/ 刘宗灵 严静
- 69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 魏崇辉 王悦
- 82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  
/ 谭敏 吴阳松

- ◎ CSSCI (2023—2024) 扩展版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入库期刊
  - ◎ 重庆市一级期刊
  -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引文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 ◎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 ◎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
  - ◎ 中文电子期刊服务
  -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
  - ◎ 龙源期刊网数据库
  - ◎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 ◎ 博看期刊数据库
-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95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3088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 / 李家新 刘甜甜 刘子云
- 110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 / 杨敬之

### 统一战线领域风险治理专题

- 122 台湾地区2024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 钟厚涛
- 135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 / 杨昆福

### 国际热点事件的统战观察专题

- 154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80年（1943—2023年） / 李捷 杨喻博
- 175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 陈静 周文星

- 封二 《统一战线学研究》征稿启事暨投稿须知
- 封三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Bimonthly)

2024 No.2(Sum No.44) Vol.8

---

- 01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 on Doing Well in the Party'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New Era which Contains the Philosophy of Reason Hou Yong&Ke Zengjin
- 16 The Connotation Attribute,Practice Form and Operation Logic of Collaborative Supervision On the Perfection of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ary Supervision System Cheng Tongshun&Wang Liping
- 30 The Origin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a Zhanrong&Zheng Jia
- 43 The United Front as the Capacity of a Political Party: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Gramsci's United Front Thought Bu Pengbo
- 58 The 'Greatest Politics'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ernal Logic,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 Liu Zongling&Yan Jing
- 69 As A Symbolic Concept of the 'Greatest Politics': Basic Propositio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United Front Presentation Wei Chonghui&Wang Yue
- 82 Taking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s the Greatest Politics: Theoretical Pedigre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an Min&Wu Yangsong
- 95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Helps Enhancing the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3088 College Students in Nine Citie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i Jiaxin&Liu Tiantian&Liu Ziyun
- 110 The Legal Meaning and Practical Path of Embedd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to the Constitutional Education of Young People–An Interview Study Based on Constitutional Education and Law Popularization Practice Yang Jingzhi
- 122 The Deep Impact of Taiwan's 2024 Election on the Island 's Internal Political Situation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Zhong Houtao
- 135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New Trends and Restrictive Factors of Taiwan Unified Political Parties'Election for Public Offices–Based on the Election Analysis since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Yang Kunfu
- 154 Strategic Tools and Means of Controlling China:80 Years of U.S.Interference in Xinjiang Affairs ( 1943—2023 ) Li Jie&Yang Yubo
- 175 The Congres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U.S.China Policy–A Case Study of the U.S.–China Special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Chen Jing&Zhou Wenxing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 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侯勇 柯增金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篇章。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从道理来看，这一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二个必须”。这“十二个必须”围绕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本质要求、工作原则、任务重点、科学方法、领导力量等方面展开，从价值论上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从本体论上回答了“新时代需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从学理来看，这一重要思想坚持“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中国统战实际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和经验的继承与升华、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从哲理来看，“六个必须坚持”是贯穿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1

**作者简介：**侯勇，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柯增金，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创新”（2021SJZDA06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论”（22FKSB028）

**引用格式：**侯勇，柯增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1-15.

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守正创新理论品格、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系统观念的科学思维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关键词：**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工作；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共产党；道理学理哲理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 (2024) 02-0001-15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将统一战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sup>[2]</sup>（以下简称“这一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sup>[3]</sup>，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sup>[4]</sup>从深层逻辑来看，“理”始终是贯穿于这一重要思想的主线，深入挖掘蕴含其中的科学道理、厚实学理和深刻哲理，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的本质规定，是研究好、阐释好、宣传好这一重要思想的基本要求，也是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应然之举。

##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新时代’‘统一战线’”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类别设定为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剔除新闻报道、会议综述等非学术论文，截至 2024 年 1 月，笔者共检索到目标文献 278 篇。利用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分析可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新时代”“人民政协”“习近平”“多党合作”“党的领导”“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统战工作格局”等为研究热点。从代表性文献来看，杨卫敏将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置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和治国理政全局进行分析<sup>[5]</sup>，成为本主题的早期代表文献。邸乘光从“为何还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系统分析了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所要回答的科学命题<sup>[6]</sup>；孙信采用“指导思想—目标—地位—特征—方针—保障”的框架进行分析<sup>[7]</sup>。这一重要思想正式提出以后，学界多从形成背景、生成逻辑、理论体系、原创贡献、辩证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未形成代表性文献，且整体性、系统性的基础阐释研究还有待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发展、理论体系、学理依据和理论特质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形成发展研究。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期间，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表述不尽一致。党的十九大以后，其规范表述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sup>[8]</sup>。2022 年 7 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sup>[2]</sup>，这一最新表述更加精准、全面地反映其历史方位、理论背景和战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略布局。此后, 学术界和实务界均规范、准确地使用这一概念。二是**理论体系研究**。有的研究按照性质、功能、价值、方针、制度的框架分析新时代党的统战理论内容体系<sup>[9]</sup>。有的研究将其概括为“六论”, 即本质论、战略论、策略论、重点论、方法论、国际论<sup>[10]</sup>, 后续研究进一步将其丰富发展为“八论”<sup>[11]</sup>。2024年1月, 《求是》杂志第2期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该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重要部分, 文章用“十二个必须”作出概括<sup>[12]</sup>, 是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总纲”。三是**学理逻辑研究**。有的研究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对话渠道、智慧资源、启悟力量<sup>[13]</sup>。有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浸润<sup>[14]</sup>、党领导统一战线实践的历史根基<sup>[15]</sup>等维度分析其理论逻辑。四是**理论品格研究**。有的研究从当前与长远、务实与务虚、历史与逻辑、系统与要素、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等分析其理论特质<sup>[16]</sup>。有的研究认为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世界观<sup>[17]</sup>, 追求人类解放的价值观,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矛盾分析的方法论<sup>[18]</sup>。

综合来看, 这一重要思想虽是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 但其形成和发展却贯穿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需要从新时代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全局中分析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和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sup>[19]</sup>。这一重要思想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是21世纪全球文明观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 从“世界”视域分析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因此, 本文在借鉴前期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聚焦于“十二个必须”分析其核心要义与科学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与借鉴等方面分析其理论来源与学理逻辑; 从“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其哲学思维。本研究旨在推进这一重要思想的学术化表达、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构建, 阐释好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

##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蕴含的科学道理

道理是事物的根据、理由, 侧重于“是什么”, 解决“知其然”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囊括的“十二个必须”围绕着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地位作用、本质要求、工作原则、任务重点、科学方法、领导力量等方面展开, 从本体论上回答了新时代应该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从价值论上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需要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从方法论上回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 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

### (一) 地位作用: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价值论前提。**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 统一战线均发挥着“重要法宝”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党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克敌制胜, 建立新中国, 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党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执政兴国;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共产党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限度地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团结力量；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sup>[20]</sup>，也是“强国统一战线”，党运用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助力强国建设，共襄民族复兴大业<sup>[21]</sup>。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统一战线始终发挥“重要法宝”作用，“坚持统一战线”也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sup>[22]</sup>。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法宝”，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强大法宝”。这体现出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更加重要、战略作用更加突出，体现了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sup>[23]</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sup>[12]</sup>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统一战线不可替代的强大功能和重要作用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体现出更深的思维方法、更高的战略定位和更强的治理功能。新时代新征程上，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必将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展现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体现更广泛的优越性、产生更强劲的推动力。

### （二）本质要求：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

**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论基础和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sup>[12]</sup>“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sup>[2]</sup>实践证明，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好统一战线，坚持依靠大团结大联合，凝聚人心力量，战胜强大敌人、建立人民政权，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在党百余年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使命任务和团结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本质始终没有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凝聚起前进路上的磅礴力量，结出累累“团结硕果”，成就了不朽的团结伟业。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团结奋斗”为主题词，“团结”一词贯穿全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一<sup>[24]</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sup>[1]</sup>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sup>[25]</sup>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是路径，“团结奋斗”是关键。“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sup>[1]</sup>新时代新征程上，只有继续坚持“大团结大联合”本质，统一战线才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更大的“重要法宝”作用、汇聚更强的团结伟力。

### （三）工作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

**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论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sup>[26]</sup>。进入新时代，一致性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的同时，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社会阶层、所有制形式更加多元多样。统一战线要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就必须把一切能够联合的方面都联合起来，把各方面社会成员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围绕同一目标共同奋斗，发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sup>[12]</sup>，从团结出发，走向新的团结，构筑起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sup>[27]</sup>。坚持一致性是巩固共同思想基础的首要政治任务，用中国梦“求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求同”、用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求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就是要通过商量出办法、出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共识、出感情、出团结”<sup>[26]</sup><sup>73</sup>。我们要充分发扬民主, 尊重多样性。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 其中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争取一致性的同时, 必须要尊重多样性, 只有做到坚持多样性, 才能实现真正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处理好战略性与策略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关系, 努力减少分歧、增进共识, 做到“求同求异”和“求同尊异”, 追求一致性而不强求同一性、尊重差异性而不扩大分歧, 找到全体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中华民族的最大同心圆, 实现最广泛的大团结大联合。

#### （四）任务重点：积极促进“五大关系”和谐

**积极促进“五大关系”和谐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布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sup>[28]</sup>。2021年1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从“五大关系”出发规定了统一战线的12类工作范围<sup>[29]</sup>。这一重要思想围绕着“五大关系”和谐展开工作布局, 明确了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任务重点。

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4年2月7日, 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的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定制度自信, 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sup>[30]</sup>。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政治创造, 开创了合作型政党制度新模式, 实现了由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 突破西方政党话语垄断, 为世界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注入新的内涵<sup>[31]</sup>。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这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 中国共产党积极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sup>[32]</sup>,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宗教工作是关系党的前途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 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sup>[12]</sup>。这一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怎样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 是做好新时代宗教工作的方向指南。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分布广、作用大、影响广泛, 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把他们组织起来, 加强引导、发挥作用。”<sup>[12]</sup>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时代所需, 要用好“导、育、建、聚”四字诀<sup>[33]</sup>, 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新力量。

必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两个健康”重要论述是在深刻分析了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环境深刻变化背景下的战略选择, 既是重大经济问题, 也是重大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反复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弘扬企业家精神, 提出“民营企业 and 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的重要论断<sup>[34]</sup>, 运用统一战线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必须发挥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争取人心的作用。做好港澳统战工作, 就是要充分发挥爱国力量, 增强政治认同, 切实维护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在对台领域, 要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坚决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强化“九二

共识”政治基础，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条例》提出做好海外侨务工作，要坚持广泛联谊、凝聚侨心、发挥侨力，广泛团结海外侨胞，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29]</sup>。必须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党外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条例》明确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是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sup>[29]</sup>。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外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培养体系、规划选拔等方面作出重要部署，提出“要加强培养、提高素质，科学使用、发挥作用”<sup>[12]</sup>。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党外代表人士政治引领，“首要任务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牢政治方向，筑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政治基础”<sup>[30]</sup>。这为新时代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 （五）科学方法：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

**必须把握做好统战工作的规律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论基础。**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深刻认识和把握规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也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经验。“着力提高统一战线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sup>[29]</sup>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深刻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的科学规律，尊重统一战线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就必须掌握实践工作和学科发展的规律、讲究科学方式方法，实现统一战线学从科学到学科的守正创新发展<sup>[35]</sup>。这一重要思想科学揭示了统一战线的本质规律，既是对统战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认识，又是对统战工作的规律性把握。这一重要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提出当前统战工作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即“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潜绩和显绩、原则性和灵活性、团结和斗争”<sup>[2]</sup>。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着力提高统战工作的艺术性，“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sup>[2]</sup>。“联谊交友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战工作的重要方式。”<sup>[28] 358</sup>这一重要思想确立了“待之以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助之以实”的中国共产党“交友原则”<sup>[12]</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sup>[28] 358</sup>坚持与党外人士交朋友，是巩固人心、壮大力量的重要人才保障，深交一批关键时刻起作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挚友、诤友，是党和人民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保证。

#### （六）领导力量：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

**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根本保障和政治原则。**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靠党而兴，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统一战线工作部署的部分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标题，此部分内容囊括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之中。这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中心任务。统一战线要在治国理政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更加突出的治理功能，必然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sup>[12]</sup>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不同力量组成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党的领导是坚强核心，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障。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统一战线始终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党的领导。”<sup>[2]</sup>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统一战线全过程各领域，建立起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统战工作责任制，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党的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统战工作科学化、制度化水平, 进一步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发展, 为将统一战线学纳入党史党建学科奠定坚实基础、提供理论根据; 为新时代形成更加强大的统战工作合力、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提供领导力量。

综合来看, 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个必须”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前三个“必须”从认识论和价值论层面, 明确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本质要求和工作原则。第四至第十个“必须”, 从方法论层面围绕新时代统一战线如何处理“五大关系”、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发展进行工作部署, 明确任务重点。第十一个“必须”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围绕着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规律, 明确了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第十二个“必须”从方法论层面, 明确了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 是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的根本保障。“十二个必须”内容丰富、相互贯通、逻辑严密, 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统战篇”。

###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蕴含的厚实学理

学理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以及内在演进路径的分析, 侧重于“为什么”, 解决“更知其所以然”的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理论,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理念, 产生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伟大统战实践, 借鉴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统一战线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作为基本的战略策略和革命行动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理论聚焦于实现“真正的共同体”这一最高目标, 对无产阶级如何保持自身的团结统一、如何最大限度争取同盟军, 和谁同盟、由谁领导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实践。一是无产阶级要保持自身的团结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无产阶级首先要实现本国内无产阶级的联合统一, “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先进战士, 必须加强自身的组织”“团结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同样坚定的顽强的工作”<sup>[36]</sup>。马克思强调, 还要加强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 “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 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 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 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sup>[37]</sup>。马克思恩格斯呼吁“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 成立共产国际, 推动国际工人组织联合起来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二是无产阶级“和谁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发现, 仅仅依靠无产阶级自身团结还不够, 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可靠同盟军, 把一切有利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首先必须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 其次必须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等)或同他们的大多数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sup>[38]</sup>; 还需要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 形成反封建反帝的统战“联盟”。三是“同盟”的领导力问题。这是关系统一战线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历来

十分重视革命的领导权，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sup>[39]</sup>。无产阶级必须在其内部建立起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以作为“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在“联盟”过程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坚持本阶级立场、维护本阶级利益。**四是“同盟”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指出共产党人—要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奋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统一战线理论始终服务于这一神圣使命，提出无产阶级“同盟”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将“联盟”的对象扩大到世界范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发展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领导权理论，提出必须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唯物史观，在统战工作中彰显人民立场，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是“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统战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思想源泉。**中华文明自古就形成了“协同内外”“六合同风”的政治秩序。在中华民族建设美好家园的长期奋斗中，各民族相互团结，共同抵御入侵、反抗分裂、维护统一，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大一统”思想。在“多元—体”政治格局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各族人民的力量，团结—心共筑中国梦。**“和而不同”思想为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及“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工作原则提供思想基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华民族历来推崇“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用“仁”来处理“同”和“异”，以“和为贵”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天人合—”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合”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价值标识，为“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本质和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战工作原则提供思想基础。**“天下为公”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思想根基。**“天下大同”描绘了中国古人对社会的最高理想。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格局胸怀。“人心所归，惟道与义。”统一战线靠道义凝聚人心，以正确的义利观推动“两个健康”高质量发展。“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德为政的“仁政”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以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胸襟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同心共圆中国梦。五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让个人与家国休戚与共，将每一个华夏儿女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独有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23年6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sup>[40]</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核心价值理念，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和精神力量。

## （三）对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与升华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运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从“克敌制胜”到“执政兴国”再到“实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经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到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为这一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正式提出并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团结功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大革命时期**，早期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联合”思想，“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同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随着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陷入低谷，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征，充分团结农民阶级，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方针，形成了工农联盟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sup>[41]</sup>，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首次提出中国革命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明确了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sup>[42]</sup>，但国民党公然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工农兵学商”等被压迫阶级，组成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坚持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道路，确立了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统一战线在增强民族大团结、推动经济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sup>[43]</sup>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把“八字方针”发展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sup>[43] 187</sup>，党的统一战线得到新发展。江泽民把团结视为国运昌隆、民族振兴的保证，将统一战线与新世纪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联系起来，提出了“三个绝不能”<sup>[44]</sup>，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得到巩固和加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统战工作，正确认识和把握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新发展新变化，推动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实现新突破、取得新成就<sup>[45]</sup>。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党运用统一战线充分调动各族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为香港、澳门回归和长期繁荣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可见，在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发挥着改变政治力量的作用、成为凝聚政治力量的制度结构，是国家政治的强大支撑、推动力量和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好统一战线重要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焦中心任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为这一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制度保障。

#### （四）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充分吸收与合理借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体现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积极吸收借鉴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

**这一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统一战线是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这

一重要思想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让文化共识和政治共识成为统一战线的新目标，坚决摒弃霸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构建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面对世界之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sup>[46]</sup>，为破解世纪难题、化解人类风险挑战提供中国智慧，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引领。“三大全球倡议”蕴含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紧扣人类社会进步的三大主题，其中蕴含的新发展观、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推动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广泛凝聚世界共识、汇聚全人类力量。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增添更多正能量。“三大全球倡议”蕴含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世界观、发展观、安全观和文明观的重要体现。这一重要思想坚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人类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赋予统一战线更加丰富的治理功能。作为政党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用“执政一参政”模式，有效化解了长期困扰人类的政党政治运行的结构性稳定问题，也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这一重要思想也更加注意调动思想文化的团结功能，揭示统一战线包含的社会治理功能、民主治理功能和全球治理功能。

这一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在世界文明发展中追求和谐、崇尚共赢的美好愿景价值。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新时代新征程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始终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人类美好未来发挥更大作用。

#### 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蕴含的精深哲理

哲理是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抽象性的理论概括，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形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金钥匙，就需要把握贯穿其中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系统观念的科学思维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sup>[47]</sup>。这是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哲学魅力的“金钥匙”，是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 （一）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sup>[48]</sup>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sup>[28]</sup>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sup>[48] 421</sup>这一重要思想坚持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凝聚群众力量，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最终目的来看，统一战线是要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价值旨归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进程中, 党始终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不断加强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 让党心民心紧紧贴在一起。从党的初心使命到最高纲领, 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人民至上是贯穿始终的主线。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心就是力量”“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强调党的执政成效“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党的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发展和壮大。新征程上, 党的统一战线要更好地凝聚人心、发挥好重要法宝作用, 就必须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高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 （二）坚持自信自立的精神特质

自信才能自立, 自立才能自强。自信自立是这一重要思想的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必须长期坚持。”<sup>[48] 32</sup> 在“十二个必须”中, 统一战线的地位价值论居于首位。这反映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党的统一战线路线的坚定自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群众基础更加牢固、政治优势更加突出, 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提升。这一重要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谱写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新篇章。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百余年来带领人民进行大团结大联合的伟大实践的自信。这一重要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 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为什么行”的深刻道理, 构筑起了坚持自信自立的统一战线强大理论支撑。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坚定“四个自信”, 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 更好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效能。

## （三）坚持守正创新理论品格

守正创新是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品格。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 也创新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这一重要思想进一步揭示了“大团结大联合”的统一战线本质, 明确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统战工作原则, 提出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的根本保障是坚持党的领导, 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统一战线创新发展。这一重要思想坚持用“大统战工作格局”创新统一战线的实践定位, 用“三个更加重要”明确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 将爱国统一战线纳入国家基本制度体系之中。在政党关系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提出“新型政党制度”, 突破了西方政治谱系中执政党和在野党对立竞争关系, 强调双方始终是休戚与共的政治共同体, 系统完善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机制。在民族关系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赋予党的治国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新的时代内涵。在宗教关系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牢牢掌握宗教工作主动权, 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开创宗教工作新局面。在阶层关系方面, 积极吸纳党外优秀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两个毫不动摇”和“亲清”政商关系论述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理论。在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 这一重要思想着眼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 最大限度争取人心。这一重要思想始终坚持守正为本、创新为要, 在守正创新中

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四）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是这一重要思想的实践要求和现实基点。随着改革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发展中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sup>[28]</sup><sup>352</sup>新时代以来，面对结构分化、思想多元、价值多样、国外意识形态渗透愈演愈烈、国际秩序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统一战线面临着诸多内部挑战和外部压力。统一战线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要求更加迫切，凝聚人心、凝聚力量的任务也更加艰巨繁重。在国际领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滋生，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世界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并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型国际关系，坚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维护统战领域和谐稳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世界眼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内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比越来越高。2015 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的 12 类对象之一<sup>[49]</sup>。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新空间，网络统战成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域。这一重要思想强调要积极做好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数字统战、智慧统战、“互联网+统战”等网络统战工作得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善于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增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性有效性，推进各领域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 （五）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思维

坚持系统观念是这一重要思想的工作格局和科学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sup>[50]</sup>“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是党的二十大对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系统观念、善用系统思维，站在治国理政全局高度，在把握“时”和“势”中审视全局，统筹“两个大局”，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角度思考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谋划统一战线工作大局，全面统筹、协调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大统战工作目标”“大统战工作内容”“大统战发展理念”“大统战方略方位”。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这一重要思想跳出“就统战而谈统战”的局限，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对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进行顶层设计，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出发，从统战工作历史方位作战略考量、谋篇布局，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在科学把握“三大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完备的、科学的统战理论体系。从内容体系来看，这一重要思想以“12 类范围”为统战工作对象，以“五大关系”和谐为统战工作内容，涉及海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以“全员性”视野协同建设大统战工作队伍。这一重要思想具有“点多、线长、面广、立体”的系统性特征，构筑了由统战主线、地位作用、本质要求、工作方针、任务重点、领导力量等组成的多层次、系统全面、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整体推进。

#### （六）坚持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坚持胸怀天下彰显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全人类前途命运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解决人类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智慧。2023年9月,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呼吁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sup>[51]</sup>。这一重要思想启发构建“五位一体”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政治领域构建“持久和平”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安全领域构建“普遍安全”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经济领域构建“共同繁荣”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文化领域构建“开放包容”的国际统一战线, 在生态领域构建“清洁美丽”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合作路线, 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建设, 使之成为新时代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纽带。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sup>[28] 105</sup> 这一重要思想以正确义利观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为指引, 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发展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思想始终坚持胸怀天下, 以宽广的胸襟和视野不断拓展世界眼光, 促进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立起全方位、多领域的国际统一战线, 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新航向。

## 五、结语

道理学理哲理是内嵌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的理论精髓。道理是基石, 是支撑起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框架; 学理是道理在学术理论上的抽象和逻辑建构, 是支撑起这一重要思想的学科体系; 哲理则是道理和学理的哲学凝练和思想升华, 是这一重要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者层层递进、螺旋上升, 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sup>[52]</sup>。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凝聚人心的统一战线, 是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汇聚力量的统一战线, 是在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贡献智慧的统一战线, 也是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中发挥价值引领的统一战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思想, 科学把握蕴含其中的深刻道理、透彻学理和深邃哲理, 就要深刻理解“十二个必须”的本体论实质、实践论布局、价值论意蕴, 深刻理解“四大理论来源”的学理依据, 掌握蕴含其中的统战观。新时代新征程上,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统战工作根本指针,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 促进统一战线学科体系与学科建设纵深发展, 不断推动党的统战工作开创新的伟大局面。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2]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2-07-31 (1).
- [3] 《求是》杂志编辑部. 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J]. 求是, 2024 (2): 8-15.
-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58.

- [5] 杨卫敏. 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论纲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5): 3-19.
- [6] 邸乘光. 新时代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科学指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1): 5-21.
- [7] 孙信. 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探析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6): 89-95.
- [8] 林华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4): 5-18+65.
- [9] 包心鉴. 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9 (1): 3-11.
- [10] 莫岳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12): 45-53.
- [11] 吴丽萍, 王蔚. 习近平对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发展 [J]. 理论视野, 2019 (8): 43-50.
- [12]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13] 丁凌, 方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 [J]. 理论学刊, 2019 (2): 103-110.
- [14] 商莹, 蒋满娟. 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 [J]. 社会科学家, 2020 (5): 135-138.
- [15] 朱小宝.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来源与逻辑体系 [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6): 5-10.
- [16] 周述杰, 朱小宝.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重要思想的辩证思维向度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20 (4): 14-24.
- [17] 何虎生.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研究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1 (7): 115-123+164.
- [18] 史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文化底蕴和实践要求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50-55.
- [19] 中共中央统战部. 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 [J]. 求是, 2024 (2): 23-28.
- [20] 林华山. 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图景——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1): 19-26.
- [21] 肖存良. 服务强国建设: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内涵、特征与机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4): 1-11.
- [2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23] 钱再见, 高晓霞. 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 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战略定位与路径选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4): 1-9.
- [24] 团结——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九 [N]. 人民日报, 2022-12-29 (6).
- [25]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12 月 29 日) [N]. 人民日报, 2023-12-30 (2).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1.

侯勇, 柯增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15.

- [27] 张献生. 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学” [J]. 政治学研究, 2023 (5): 3-16+207.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64.
- [29]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N]. 人民日报, 2021-01-06 (1).
- [30]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4-02-08 (1).
-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2021年6月) [N]. 人民日报, 2021-06-26 (2).
- [32] 习近平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8-30 (1).
- [33] 张进财. 做好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时代所需 [N]. 人民政协报, 2023-06-28 (8).
- [34]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11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18-11-02 (2).
- [35] 钱再见. 从科学到学科: 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J]. 江苏社会科学, 2023 (4): 45-53+242.
- [36] 列宁全集: 第1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6.
-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15-316.
- [38] 列宁全集: 第3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62-363.
-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52.
- [40]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1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367-368.
-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2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65.
- [43]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03.
- [44] 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143.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 下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619-1620.
- [46]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2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16.
- [47] 韩庆祥. “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道理学理哲理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2 (11): 57-63.
- [48]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82.
- [49]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N]. 人民日报, 2015-09-23 (5).
- [5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17.
- [5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 (2023年9月) [N]. 人民日报, 2023-09-27 (6).
- [52] 肖贵清. 深刻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3 (9): 42-52+155.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

## ——兼论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完善

程同顺 王利平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依托和保障。随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一核多元系统的确立，协同监督成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促进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协同监督是一个具有多重内涵属性的概念，首先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协同监督关注行动主体和交易成本；其次作为关系结构，协同监督既反映了党、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性，又代表着跨组织关系的形成；最后作为控权模式，协同监督区别于集中式控权和分立式控权，是一种以分散为表、集中为里的新型控权模式。协同监督不仅是顶层设计的要求，还具有丰富的实践案例。“1+N”大监督模式和“室组地”协同模式分别是内外协同监督和内部协同监督的主要实践形式。二者虽然具体内容不同，但在运作逻辑上有共同点：以权威为主导克服协同阻力，通过制度供给提供协同监督启动和运行的保障条件，以选择性激励推动协同监督可持续。协同监督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2

**作者简介：**程同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利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天津市社科规划重点委托项目“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天津实践与创新”（TJWT21-07）；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科学研究类项目重点项目“全过程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以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活动为中心”（ZB22BZ0110）

**引用格式：**程同顺，王利平．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兼论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完善[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16-29．

**关键词:** 协同监督; 自我革命; 两个答案; “1+N”大监督模式; “室组地”协同模式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016-14

## 一、问题的提出

自我革命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是党的最大优势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24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对“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自我革命的三个关键问题作了系统回答, 并提出要“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 “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 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 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sup>[1]</sup>。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开展自我革命的依托和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后,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逐渐成熟, 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并存的一核多元系统。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 要“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sup>[2]</sup>。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要“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sup>[3]</sup>。协同监督成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促进自我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了形成监督合力, 深化自我革命, 各地纷纷探索协同监督的实践方式。例如, 上海市纪委监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扎实推进日常监督工作的意见》; 云南省纪委监委发布《云南省纪委监委实行“2+1+1”监督执纪监察联动工作办法(试行)》; 青岛市发布了《关于加强协同监督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工作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等等。学界对此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比如, 有学者立足监督体系的构成逻辑, 以监察体制改革为中心探讨监督体系的贯通协调问题<sup>[4]</sup>; 有学者以系统论为视角, 对协同监督的内涵进行界定<sup>[5]</sup>; 有学者着眼于协同监督的现实困境提出破解路径<sup>[6]</sup>; 还有学者通过调研和案例, 提出“联动赋能”和“系统赋能”两种协同监督的机制设计<sup>[7]</sup>。然而, 相对于丰富的协同监督实践经验, 有关理论研究仍较少。鉴于协同监督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 学界有必要对其本质属性进行充分探讨, 以明确在不同情境下使用“协同监督”的确切指向。本文认为协同监督具有行动、结构和模式三重属性, 其中作为集体行动的协同监督是其他面相协同监督的前提。本文立足现实材料, 进一步总结协同监督的两种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 由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 多角度分析中国权力监督领域呈现的新变化。

## 二、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 行动、结构和模式

深刻理解协同监督的本质属性是促成协同监督的前提。有学者将协同监督定义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为目标导向, 通过各监督主体间有机联系、协作、配合及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适应、协调, 来实现对公职人员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能力的有效监督”<sup>[5]</sup>。

该定义揭示了协同监督的基本特征：（1）监督主体的多样性；（2）目标的一致性；（3）主体间需要联系、协作和配合；（4）需要领导者；（5）和外部环境的互动性。这些特征使协同监督区别于以往的监督方式，但特征只是本质的外在表现，关于协同监督的本质属性还有待进一步阐明。本文认为协同监督是以权威为主导、以制度供给为依托，为获得更大监督效能这一公共收益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下文从三个维度理解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作为集体行动的协同监督、作为关系结构的协同监督和作为控权模式的协同监督。

### （一）作为集体行动的协同监督：参与主体与交易成本

协同监督强调各监督主体从各自为战到相互贯通、相互协调，这首先表现为集体监督行为的达成过程。“集体行动是指一群人为了大致相同的目标而做出的协同性行动”<sup>[8]</sup>，协同监督行为中的参与主体主要是拥有正式权力的公共机关及其执行者，是“由制度加以界定的职位、权威及聚合规则的行动者”<sup>[9]</sup>，这种集体行动又被称为制度性集体行动。作为集体行动，协同监督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行动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如果收益大于成本，集体行动更易发生；如果成本大于收益，则集体行动的阻力较大。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收益可分为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集体性收益是参与行动的各方的共享收益。例如，水污染防治合作有利于解决各自领域中的水污染问题，并带来社会经济效益。在协同监督中，协调合作能够提升监督效能，保障公权力被合理合法行使，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选择性收益是部分具体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可能获得的收益，例如晋升机会、社会资本、奖励等。在协同监督中，不同行动者面对的选择性收益不同，这影响着其参与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制度性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是多方面的，且不可避免，具体可分为信息成本、协调成本、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sup>[10]</sup>，协同监督亦不同程度受制于这四种成本。风险的存在会进一步影响行动者对成本的评估。风险即不确定性，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面临着非协调风险、背叛风险和不公平分配风险。非协调风险是指合作参与者行为难以取得一致的风险；背叛风险是指合作中出现行动者不履行承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不公平分配风险是指合作收益被不公平分配的风险。总体来讲，制度性集体行动中存在的成本和风险与四种因素有关：一是集体行动的领域、议题特征，又称交易物属性；二是行动者本身的经济社会特征；三是相关行动者既有的社会资本和信任程度；四是政治规则和制度约束。例如，当任务复杂程度高、行动规模大时，集体行动的各种成本都会相应提高，并且面临更高的非协调风险；而分配机制、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等制度的完善程度则会极大影响背叛风险和不公平分配风险的大小；行动者之间原有的合作经历以及良好的互动网络则既能降低行动成本，又能减少合作风险。

协同监督按照协同的主体对象分为不同类型。内部协同监督是指参与协同的主体都是专职监督机关，例如“四项监督”的贯通协同。内外协同监督是指协同的主体既包括纪委监委等专职监督机关，又包括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群众监督等其他主体。横向协同监督是指同一部门跨越行政区域进行监督合作。纵向协同监督是指不同层级的监督主体协调互动。不同类型的协同监督主体特征、信任基础和制度约束等都不一样，因而面临的收益、成本和风险也不相同。按照成本-收益的分析逻辑，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增加收益是推进协同监督的基本思路。



## （二）作为关系结构的协同监督

结构塑造行为，行为也会冲击结构。各监督主体从各自为战到相互贯通、相互协调，必然会带来关系结构的变化。协同监督各主体间的关系结构有两大变化：其一，党、国家、社会关系的统一性凸显。中国的权力监督体系由党的监督、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三大子系统构成，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接触、互动模式反映了党、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范畴，对立抑或统一是二者关系的两种基本观点。中国学者主张“将政党带进来”<sup>[11]</sup>，突破了国家—社会二元分析范式，同时为二者的统一带来了中介变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大致经历了党—国家—社会关系三位一体时期（1949年—1978年）、党—国家—社会关系调试时期（1978年—2012年）、党—国家—社会关系有机整合时期（2012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一方面，国家政治生活得到恢复，社会活力逐渐显现，党、国家和社会的边界日益清晰和规范；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有弱化倾向，腐败、权力寻租、“悬浮型政权”<sup>[12]</sup>等问题相继产生，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亟需新的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入开展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进行了深度统合，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了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通过党组织嵌入、政治吸纳和功能转变等方式提升了党和社会之间的黏合度，由此真正实现了党、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统一。协同监督正是在该背景下对权力监督体系作出的改进和完善，不同监督主体之间的协同体现了党、国家和社会的统一性关系。

其二，组织（科层）壁垒打破，以协调为导向的跨组织关系形成。协同监督建立之前，监督行为主要表现为组织内行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等在各自轨道内运行。协同监督要求不同监督机制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和互动，这必然需要打破组织边界，形成跨组织关系。一方面，跨组织关系基于责任共担。现代政治是责任政治，需要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国家治理是‘共同的事务’，不同主体要根据自身的条件与社会的要求行动起来，明确不同主体在转型过程中担负的职责与发挥的功能，实现不同主体的功能互补与对公共事务的‘共治’。”<sup>[13]</sup>权力监督主要锚定腐败治理，是党、国家和社会共同承担的责任。党对腐败问题负有直接政治责任，国家对此负有法律和行政责任，社会承担道德责任。责任共担性要求不同部门和组织协同起来，充分发挥自身功能，共同参与到腐败问题的治理当中，从而形成跨组织关系。另一方面，跨组织关系也基于资源依赖性。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如果一个组织非常需要某种资源，而这种资源在这个组织中又非常稀缺，并且不存在可替代的资源来源，那么这个组织将会依赖掌握这种资源的其他组织，从而产生跨组织关系<sup>[14]</sup>。不同组织拥有不同资源禀赋，例如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借助其他组织的资源，实现优势资源共享和稀缺资源互补，可以完成单个组织难以完成的目标。在协同监督中，党内监督是权力监管的核心机制，行政监督根据其职能规定可以获取多种信息资源，能够协助纪检监察机关进行精准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等其他监督形式同样在资源能力上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协同监督跨组织关系形成的理性逻辑。

## （三）作为控权模式的协同监督

控权是政治生活的永恒主题，为了保证权力行使符合政权目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与地区都有

与整体制度相适应的控权模式。根据控权机构的设置情况及各机构间的相互关系，控权模式可分为集中式控权和分散式控权。集中式控权是指，设置一个或一类专职监督机关专门进行权力约束。这种控权模式“具有事权集中、监督体系统一的优势”<sup>[15]</sup>。例如中国香港的廉政公署，它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的独立执法机构，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拥有独立调查权。但这种控权模式更适用于微小政治实体，在复杂国家形态中有膨胀为“超级机构”而失控的风险。分散式控权是指，将控权机构分开设立，分散在不同系统中。例如西方“分权制衡”体制下的控权模式，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依照不同程序规则运行，权能互有交织，实践中辅以多党竞争、公开选举、司法独立等制度，形成了相互制约的交互式控权结构。”<sup>[16]</sup>通过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达到控权目的，没有一项权力高于另外两权，三权之外也不存在全面覆盖的独立监督机制。这种模式虽然能防止一权独大和权力失衡，却会降低权力运行效率。

中国的控权机制虽然和西方的控权机制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但从控权机构的设置情况及相互关系看，中国的控权模式在监察体制改革以前，也应属于分散式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权力监督机制建设持续深化并长期呈现分散式格局——在各权力系统内由专门机关负责本系统内的行权监督。”<sup>[16]</sup>在党的系统，纪检机关作为专职监督机构发挥党内监督主要作用。在国家系统，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一府两院”进行工作监督；隶属于行政机关的监察部专职负责行政监督；隶属于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专职负责法律监督，重点履行职务犯罪侦查和职务犯罪预防权。此外，社会系统中的民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在控权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得到了正式制度的认可和保障。这种分散式控权模式试图通过发挥不同系统监督主体的作用使全部公权力都受到约束，但在实际运行中往往因为职责边界不清而造成相互推诿或监督漏洞等问题，各系统监督机制并没有形成很好的监督合力，监督效力大打折扣。

原有控权模式困境的症结在于：一是三套专职监督机构功能重叠；二是各监督机制之间协同性不强。“因此，需要通过部分监督机制的职权转隶和机构整合来重新理顺监督体系。在改革的具体举措上，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sup>[4]</sup>国家监察机关吸纳了政、法系统的权力监督机构，独立、专门承担国家系统的监察工作，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并和党的纪检机关合署办公，从而使得原来党、政、法三套专职监督系统走向统一，分散的监督机制和监督资源得到整合，形成“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从此，纪检监察机关成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责任主体”，“其他监督主体变成配合者与协助者”<sup>[17]</sup>，监督体系的协同性建设获得了制度基础和路径支撑，成为改革的重点。

这种改革全面实现后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控权模式——协同监督。在协同监督模式中，不同系统的监督力量仍然存在，但各监督机制之间既不各自为战，也不相互制约，而是以集合效能为目标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形成监督合力。这结合了集中式控权和分散式控权的双重优势，是一种分散为表、集中为里的新型控权模式。在这里，行动、结构和模式呈现层层推进的关系。协同监督一旦启动，首先意味着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发起，进而形成跨组织和跨域关系。至于能否构成协同监督的控权模式，则取决于协同监督的行为能否在时间上持续，在空间上蔓延，以致总体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形态。可见，作为关系结构和控权模式的协同监督都需要以协同监督的集体行动达成为前提。

### 三、协同监督的两种核心实践形式

各地开展协同监督的实践非常丰富。根据公开可查的资料, 内外协同监督主要以“1+N”大监督模式为主; 内部协同监督则以“室组地”协同模式为主。“1+N”大监督模式以党内监督(即“1”)为主导, 将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不同种类的监督(即“N”)贯通协调起来, 形成监督合力。“室组地”协同模式发生在纪检监察系统内部, “室”指上级纪委监委的监督检查室和审查调查室等科室, “组”指派驻纪检监察组, “地”则指地方纪委监委, 三者协同互动促进内部监督上下贯通、左右衔接。下文将结合具体案例阐释这两种协同监督实践形式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方式。

#### (一) “1+N”大监督模式——以青岛为案例的分析

基于资料的可获得性和案例的代表性, 本文选取了青岛的监督改革作为“1+N”大监督模式的典型案例。为了统筹不同的监督力量, 提升监督效能, 青岛市于2019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协同监督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及《实施细则》, 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 人大监督、政务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相互协作的协同新机制, 加强对政治、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民生民意等重点领域的监督治理。

党内监督属于党的监督, 依据党规党纪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展监督, 监督形式包括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简称“四项监督”)。党内监督基于党的领导地位, 拥有强势且丰富的监督力量和监督资源。人大监督和政务监督属于国家监督。人大监督依据宪法和法律, 运用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预算决算、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备案审查、述职评议、个案监督、专题询问等方式和手段, 对各国家机关开展工作监督和法律监督。政务监督是行政系统依据其层级关系和业务关系开展的内部监管, 审计监督、统计监督、政务公开、网络问政是其重要监督方式。政协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都属于社会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是政协机关和政协委员对党委、政府决策部署和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协商式监督。监督方式主要是召开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会、协商座谈会。政协民主监督是政府和群众发生联系的重要桥梁。新闻舆论监督是各种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报道和话题引导对政治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建议和意见表达。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新闻舆论监督势能逐渐强大。社会公众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揭发、申诉、控告等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展监督,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是其他监督合法性和合理性来源的底层逻辑。这三类六种监督在方法和对象上能够互补, 如若贯通协调产生巨大协同效应, 能使监督工作更加精准和高效。

领导小组是青岛协同监督得以运转的核心机制。青岛成立了协同监督工作领导小组, 由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办公厅的主任和市纪委、市委宣传部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 各单位处室负责人为成员, 由此形成协同监督的高位推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纪委党风室, 负责统筹调度、沟通信息、线索处置、督查督办、分析研判等工

作。各监督主体亦成立工作专班，以压实监督责任。具体工作内容有四个方面。

第一，建立信息共享平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开通协同监督工作平台账户，制定信息共享、问题会商、线索处置“三张清单”，督促各监督主体每个月将开展监督、线索处置等情况在平台共享，同时建立专班微信群，实时沟通相关情况。第二，建立常态化督情会商制度。协同监督工作领导小组每两周组织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例会内容包括通报工作进展、总结经验做法、研究部署阶段性重点工作。在市委办公厅、市纪委机关的牵头组织下，各监督主体积极参与，及时协调解决监督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第三，建立线索移送和跟踪反馈制度。《办法》要求各监督主体把问题线索是否移送纳入线索处置工作程序，确定专门部门，安排专人专责做好相关问题线索移送工作。同时，要求建立工作台账，对受理的各类问题线索及时登记、统一编号，以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对受理的各类问题线索，按照“谁接收、谁反馈，谁承办、谁反馈”的原则，建立办理反馈制度。对移送、转办、交办的问题或线索，原则上10个工作日内向线索移送方反馈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第四，建立追责问责机制。《办法》明确了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责任和协同任务，对于不按规定回应反馈、整改落实和履职不力的相关部门，应当由具有问责权限的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严肃问责，典型问题公开通报曝光。

综上，青岛“1+N”大监督模式可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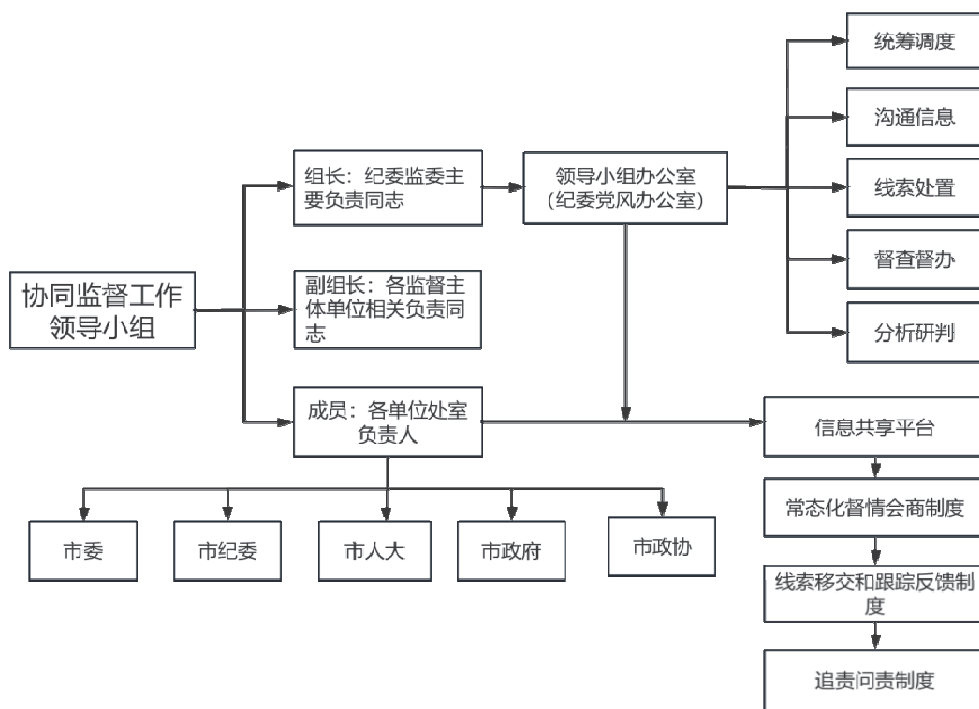


图1 青岛“1+N”大监督模式

(来源：作者自制)

## （二）“室组地”协同模式——以佛山为案例的分析

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和巡视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支柱作用，促进这“四项监督”的贯通协调是内部协同监督的主要内容，“室组地”协同是承接这一内容的主要机制。2021年，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构建“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工作规则》等党的法规条例相继对联动的具体责任和内容作了进一步规定。在顶层设计和内部需求下，“室组地”联动监督和“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逐渐在全国铺开。例如，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出台了《黑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室组地”联合办案工作办法（试行）》，湖南郴州市纪委监委印发了《关于深化“室组地”联合办案机制的实施办法》，广东省佛山市制定了《佛山市纪委监委“室组地”联合办案工作意见（试行）》，等等。此外，以“室组地”联动为基础，各地结合实际又形成了“室组地巡”“室组地企”“组组”“组地”等多种协同形式。“室组地”协同逐渐成为促进内部监督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主要载体和路径。下文将以佛山为案例展示“室组地”协同模式的内容和运作方式。

2021年，佛山市发布《佛山市纪委监委“室组地”联合办案工作意见（试行）》，以建立健全纪委监委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地方纪委监委协同监督工作制度。佛山市纪委监委原有28个派驻本级党和国家机关及所管辖的国有金融企业的纪检监察组，其中有些纪检监察组只有2~4人，监督力量分散、措施手段有限。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跨行业、跨区域、跨层级违纪违法案件越来越多，单纯依靠某一监督主体会面临协调难、取证难、认定难等问题，不利于监督工作的开展和监督实效的取得。为了构建“室组地”协同模式，佛山市纪委监委首先建立了联动监督指挥中心和联合办案指挥中心，在市纪委常委会的统一领导下负责统筹协调“室组地”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工作。其次，佛山市的28个纪检监察组被划分为5个联组，分别挂钩联系5个区，由市纪委监委内设的第一至第五监督检查室对口联系和指导，联组的组长则由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担任，这是“室组地”协同的“联组”模式。在实践探索中，佛山市还形成了“专项监督组”“专案组”“大联组”“派驻监督上下联动”等旨在促进“室组地”协同监督的工作模式。

佛山“室组地”协同模式的具体内容如下：

1. 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启动。佛山市纪委监委十分重视处理协同和独立的关系，强调不能为了协同而协同，要根据事项和案件特点及广度深度决定是否启动协同机制。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启动方式有两种，一是由联动监督指挥中心和联合办案指挥中心研究决定；二是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室、组、地在独立处理任务过程中研判需要联动和联合时，可以提请启动。“对于跨层级、跨地域或具有行业性、领域性特点，以及案情复杂、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事项原则上开展联动监督或联合办案；对于发生在各部门各辖区内，组、地可以自行办理的事项原则上仍以自行查办为主。”<sup>[18]</sup>

2. 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推进。“室组地”协同监督推进中的关键环节是问题初核、指定管辖和衔接司法。在问题初核中，原则上纪检监察组自行开展问题线索的初步核实，如需其他部门的支持，可以提请对口联系的监督检查室统筹协调，以获得其他纪检监察组或区纪委监委的协助。若初核过程中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或其他需要移交的案件线索，报对口联系的监督检查室按规定程序移

交办理。最后，案件审理完毕并履行相关程序后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衔接。此外，为了给室、组精准监督提供信息支撑，佛山市纪委监委还利用市党风廉政建设大数据平台，按规定向室、组开放信息查询权限。

3. 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考核评估。首先，佛山市纪委监委制定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估的考核指标体系，对“室组地”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评估。其次，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谈话了解、工作回访等方式，定期、不定期对室、组、地三方进行动态考核和评估。最后，根据考核评估结果，对联动监督、联合办案的有功人员，按相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调动室、组、地的工作积极性，确保“室组地”协同监督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4. 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人才保障。为了优化干部队伍，增强联动监督和联合办案的本领，佛山市纪委监委从“做好入库”和“管好库存”两个方面强化协同监督的队伍建设。一方面，把好人才选育关，注重引进党建、财会、审计、法律、信息技术等多样化人才充实到派驻和基层纪检监察机构，建立人才库，从政治素养、专业技能、工作实绩、性格特征等方面对人才库干部进行“精准画像”。另一方面，通过轮岗、挂职、结对帮带、实战、授课、交流、案例分析、专题研讨等方式加强人员培训，不断提升干部专业化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综上，佛山“室组地”协同模式可用图 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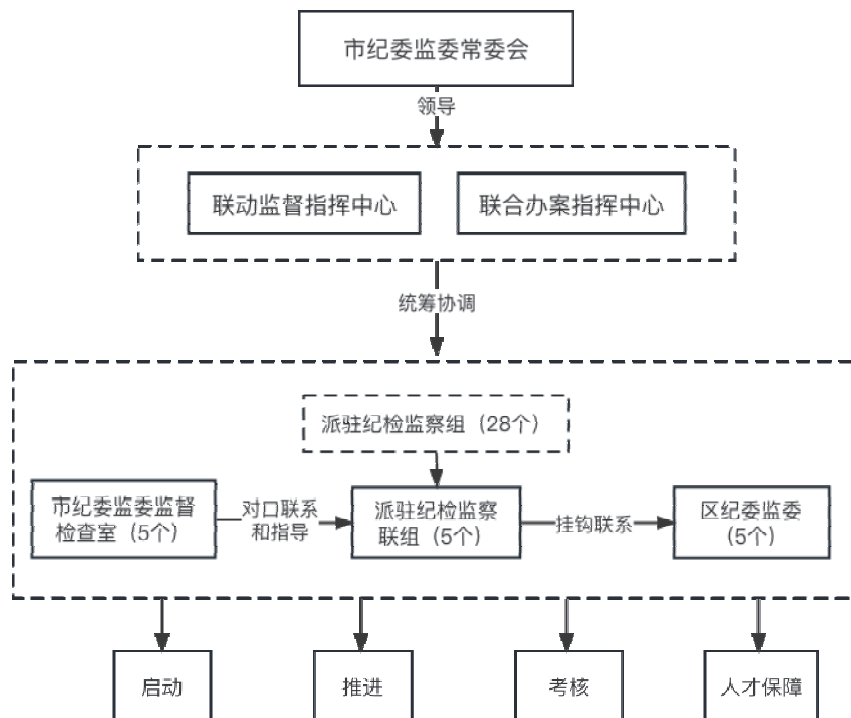


图 2 佛山“室组地”协同模式

(来源：作者自制)

## 四、协同监督的基本运作逻辑

上述两种实践形式分别是内外协同监督和内部协同监督的典型代表。虽然二者的经济社会条件、参与主体、资源禀赋等不尽相同, 但运作逻辑有共同点: 首先, 都以权威主导方式克服协同监督的初始阻力; 其次, 均通过供给制度保障协同监督的运行; 最后, 均通过选择性激励来推动协同监督的可持续运作。这亦可视作当前我国协同监督运作的基本逻辑。

### (一) 权威主导克服协同监督阻力

协同监督主要是具有监督权的公共部门之间的协作行为, 属于制度性集体行动, 存在信息成本、协调成本、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四大阻碍集体行动达成的成本要素。这些成本要素又和行动者特征、合作形式有关。协同监督中的行动者具有两大特征。一是行动者多, 行动者数量决定集体行动的规模, 规模越大, 则相应的行动成本越大。如果监督成本和协调成本过大, 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对行动者难以实行强约束, 那么行动者可能采取选择性执行或者消极执行策略。二是协同监督中行动者的作用对象是同样具有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包括处于权力核心的“一把手”, 对他们的监督需要更为强大的势能。制度性集体行动的合作形式既有较为松散的嵌入型网络关系和契约制, 也有具有更大约束力的科层制下的授权机制和政府强制机制。显然, 协同监督只有采取权威性更强的合作机制, 才能有效克服行动阻力。上述两种协同监督的实践形式都采取了权威主导的合作机制, 青岛的“1+N”大监督模式根据市委要求成立了以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在佛山的“室组地”协同模式中, “室组地”联动监督中心和“室组地”联合办案中心均由市纪委监委常委会领导, 各联组的组长则由市纪委的领导班子成员担任。

第一, 权威主导能够为行动者赋能。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党委“一把手”。作为党的专职监督机关, 纪检需要同时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 这就使得纪检对“一把手”的监督以及进行同级监督时作用偏软。协同监督通过构建新的监督机制嵌入了上级党委和纪委的双重权威, 对参与这一协作机制的行动者进行了上位赋能, 有利于破除监督对象的权力威慑, 实现有效监督。

第二, 权威主导能够统一行动目标。按照职能分工的国家机关和部门并非单一目标实体, 而是综合多重目标的复合结构或系统。例如, 人大的主要目标是制定和完善国家法律, 其次才是通过其工作机制行使监督权; 政协的本质是党坚持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是其三大职能。即使作为党和国家专职监督机构的纪委监委, 各部门之间也会因具体监督事项和侧重点的不同而有相异的目标。嵌入权威的协同监督将不同的监督主体纳入统一的工作机制, 在权威的领导和指挥下, 确定共同的行动目标, 通过日常联系机制即时纠正可能的目标偏移, 打破成员间碎片化决策的困境。即使在较为松散的合作机制中, 权威主持的工作例会也能在成员间起到动员作用, 有利于形成协同共识。

第三, 权威主导能够强化协同意愿。责任和利益是公权力者行使职能、完成任务的双驱力, 责任给予其外部压力, 利益构成其内在动力。对于监督主体而言, 协同并不具有强制性, 协同责任意识不强。同时, 协同监督产生的收益更多是集体性的, 行动者可获得的选择性收益不突出, 因此有

些行动者参与协同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上述两种协同监督的实践形式将相关监督主体纳入权威主导的新结构中，拉近了行动者与权威之间的距离，改变了行动者和权威之间原来的弱责任-弱激励关系。一方面，行动者产生了更大的政治压力，有利于强化其协同责任；另一方面，同一结构网络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行动者更有可能获得晋升、奖励等政治激励，从而提升协同意愿。

第四，权威主导能够整合监督资源。科层制治理和运动式治理是中国政府运作的双重逻辑，科层制以专业分工和部门层级为基础，按照正式的规则，强调技术性和规范化。然而，科层制的等级和分工也容易造成治理碎片化，不利于形成整体性优势。运动式治理以权威为依托，以中心任务为导向，通过动员式方式，能够打破组织边界，迅速整合资源，是科层制治理的一种补充。上述两种协同监督实践形式以制度吸纳运动，综合了科层和运动的双重特征，在保持原有监督结构的基础上，以权威为主导构建了领导小组或联组。这些领导小组或联组在权威授权下可就重点监督事项或者复杂的重大案件进行跨部门信息共享和人才的跨部门流动、优化配置，整合了监督资源。

## （二）制度供给保障协同监督条件

制度既是集体行动的产物，也是集体行动的基础和条件。“集体行动依赖于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的相互联结，他们的合作绝不是自然的合作，因此，必须要有一套协作的机制或‘游戏规则作为中介’。”<sup>[19]</sup>协同监督作为一种面向公权力的集体行动，其发起和运行阻力更大，更需要以制度为依托。根据制度内容的详略程度和作用对象的涉及范围，制度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制度是关于目标、方向、任务、原则的总体性要求，一般涉及国家全域。中观制度是连接目标和行动的较为具体的规定，是地方或相关部门为了使宏观制度落地的指导性方案。微观制度是关于如何行动的操作说明，内容更加具体，涉及范围更小。不同层次的制度发挥的作用不同，但对于集体行动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协同监督的促成中，制度发挥的具体作用如下。

第一，能够启动协同监督。监督的主体和对象都是公权力者。一方面，法无授权即禁止，监督主体不能随意更改自己的权限，联合监督和联动办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监督方式和监督范围，理应获得正式授权。另一方面，协同监督要求各监督主体在同一目标下，共享信息、相互合作、协调步调，这必然会增加具体行动者的工作负担，提高他们的行动成本。根据自利原则，各监督主体不太可能自发形成协同行为。于是，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以党代会报告的形式提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党代会报告是党的纲领性文件，这些要求为纪委监委和各地相关部门协同监督赋予了正当性和推动力，由此开启了协同监督的构建过程。

第二，能够为行动者提供规范。规范是制度供给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主要功能。“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都是自利理性的个人在没有制度约束下发生的集体非理性行为。通过制度供给，确定行动者需要遵循的行为规则，明确“该做”“不该做”的界限，提供“如何做”的策略集合，“制度赋予社会关系以秩序，减少行为中的机动性和可变性，并限制了片面追求私利或欲望的可能性”<sup>[20]</sup>。2019 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纪检监察机关（机构）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中开展协作配合的指导意见（试行）》，从协作配合的事项范围、商请方式、责任划分、工作要求和争议解决等方面，对专职监督机关的内部协作作出规定。上述两种协同监督实践形式在上级文件的指导下也出台



了相应的工作办法。青岛制定了《关于加强协同监督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工作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佛山发布了《佛山市纪委监委“室组地”联合办案工作意见(试行)》, 有利于协同监督的顺利推进。

第三, 能够增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协调和合作需要以信任为基础。制度性集体行动所面临的信息、协调、执行和监督四大成本归根结底都与信任相关, 信任程度越高, 则成本越低, 越有利于开展协同行为。制度供给可以为各行动者提供可信承诺, 形成相对稳定可靠的行动环境。“制度能够产生出某种结果的可预期性和规则性, 从而有利于制度之下的所有参与者; 制度也能够澄清决策的可能范围, 使得一些社会行动者不至于被纠缠不清地直接卷入任何特定组织的运作过程。”<sup>[21]</sup> 协同监督已基本形成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由宏观到微观的制度供给立体结构, 因而各监督主体愿意自觉参与到协同行动中。这既是基于对合作者的信任, 也是基于对协同行动能够产生良好结果的信心。

### (三) 选择性激励推动协同监督可持续

权威和制度用外在约束的形式将不同监督主体置于协调与合作中, 但这种集体行动可持续性不强。一方面, 协同监督的成果作为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即使不参与行动仍可分享收益, 即产生“搭便车”行为。协同监督的参与主体众多, “搭便车”行为也更易发生。另一方面, 成本-收益依然是行动者的主要行动逻辑, 当参与行动的成本大于可获得的收益时, 即使有外在压力, 个人也可能会想办法“避责”。这在协同监督中可能表现为不主动作为、应付了事等。因此, 协同监督如果要持续推进, 必须提升行动者的内在动力, 考核激励就发挥着这一作用, 奥尔森称之为“选择性激励”<sup>[22]</sup>。选择性激励通过区分行动者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以及对集体行动达成的贡献大小, 给予不同的奖励(正向激励)或惩罚(反向激励), 使得不同行动的人获得不同的收益, 鼓励积极行动者持续行动, 引导消极行动者参与行动。激励内容多样, 可分为经济激励、政治激励、社会激励、精神激励等。经济激励主要是金钱上的奖励, 政治激励可以是职位上的晋升、提供培训交流机会, 社会激励包括声望、尊敬和友谊等, 精神激励指的是由关心、肯定、表扬等带来的精神满足。青岛的问责追责制度和佛山的考核评估制度都在发挥选择性激励的作用。

在协同监督中应用选择性激励需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 评估体系需要可操作、可评估。评估体系给出衡量与提升激励策略效果的标准, 是开展考核评估的前提。模糊笼统的评估体系很难进行差异化评价, 既不能突出优秀者, 也不能反映表现欠佳者, 由此可能弱化激励效果。因此, 评估体系要避免使用“优秀/不优秀”“称职/不称职”等绝对化评语或者过于抽象的描述性语言。可以抽取核心指标量化, 例如采用李克特量表精细化打分, 或设置 1—10 的阶梯分值, 使评估者作出更精细的衡量, 将被评估者的表现差异更直观地反映出来。第二, 运用多种方式准确考核。激励的前提是对行动者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 评估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在评价主体上, 要综合采用上级评价、同级评价和下级评价, 根据监督事项的特征确定不同评价在总体评价中所占比例; 在评估方法上, 通过汇报、调研、谈话、互评等多种方式评估各监督主体的表现情况; 在评估时间上, 可以在年中或年尾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 以激发评估在日常工作中的“鲶鱼效应”。第三, 正确处理奖励和问责之间的关系。奖励和问责都是激励的内容, 奖励通过增加收益来进行正向引导; 问责通过给予处分进行反向施压。如果问责强度太大, 增加了行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那么即使存在正向

激励，行动者也可能不敢为、不愿为。如果没有问责或问责流于形式，为了争夺奖励，就可能违反规矩、纪律和法律，出现所谓“灯下黑”行为。因此，使用选择性激励需要平衡奖励和问责的力度，发挥二者的双向激励作用。

## 五、结语

协同监督是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贯通协调的理论回应，是当前完善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这种立足于本土的实然研究，既有助于在实践上为形成监督合力、提升监督效能建言献策，又体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本文认为，研究协同监督首先要明确协同监督的内涵和本质属性。该概念既表示各监督主体为提高监督能力而进行协调合作行为，也反映由这些集体行动带来跨域跨组织关系变化，随着相关工作的深入推进，其还可能获得控权范式意义。现有协同监督的实践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内外协同监督的“1+N”大监督模式和内部协同监督的“室组地”协同模式。本文选取了两个典型案例以进一步分析协同监督基本模式的具体机制和运作逻辑，发现权威、制度和激励是构建和维护协同监督的三大关键要素。权威凭借其强大的势能和支配力起到为行动者赋能、动员共识、强化合作意愿、整合资源等作用，能够克服协同监督的诸多阻力；制度以其正式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启动协同监督，并为行动者提供规范，有助于行动者之间增加信任，为协同监督提供更多保障；选择性激励以行动者的表现为评价标准改变行动者的损益状况，为协同监督的运行提供持续动力。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协同监督还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例如主动参与不够充分，信息共享不够深入，配合衔接不够顺畅等。总体上协同监督的构建还处于初级阶段，协同水平仍有待提升，协同规模还需继续扩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权威主导的协同方式带有强制性色彩，协同成本较高，即使有制度和激励作为补充措施，也有较强的非可持续性风险。另一方面，协同监督本身是一个宏大主题，内外协同监督和内部协同监督分别都存在多种情形，各参与主体具有的基础条件也各不相同，协同监督要在整体上形成一种控权模式仍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会议 李希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4-01-09 (1).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3.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6.
- [4] 秦小建. 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的逻辑与路径 [J]. 法商研究, 2022 (2): 90-102.
- [5] 陈希, 李靖. 权力协同监督: 理论内涵、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 [J]. 行政论坛, 2018 (4): 31-37.
- [6] 赵园园, 张明军. 协同监督的现实困境及拓展路径 [J]. 行政论坛, 2020 (4): 13-18.
- [7] 李辉. 从机制设计到能力提升: 基于地方纪检监察“协同监督”的案例研究 [J]. 政治学研究, 2023 (3):

程同顺, 王利平. 协同监督的内涵属性、实践形式和运作逻辑——兼论党的自我革命监督体系的完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6-29.

128-141+172.

- [8] 郑旭涛. 集体行动: 概念比较中的理解 [J]. 探索, 2020 (4): 64-75.
- [9] 姜流, 杨龙. 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研究 [J]. 内蒙古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 96-104.
- [10] 锁利铭, 阚艳秋, 涂易梅. 从“府际合作”走向“制度性集体行动”: 协作性区域治理的研究述评 [J].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18 (3): 83-96.
- [11]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 [J]. 探索与争鸣, 2019 (8): 85-100+198.
- [12] 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 [J]. 社会学研究, 2006 (3): 1-38+243.
- [13] 张贤明, 张力伟. 论责任政治 [J]. 政治学研究, 2018 (2): 89-97+127.
- [14] 王恒, 赵峥, 康凌翔. 组织间关系研究进展及我国跨组织合作有效生成机制构建 [J]. 商业研究, 2013 (11): 99-107.
- [15] 张郁.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行政监督的发展趋向 [J].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2 (6): 152-162+168.
- [16] 程衍. 论监察权监督属性与行权逻辑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0 (3): 121-133+159-160.
- [17] 张桂林.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原理探析 [J]. 政治学研究, 2020 (4): 2-14+125.
- [18]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探索“室组地”联动监督联合办案有效路径 [EB/OL]. (2021-07-22) [2023-12-24]. [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107/t20210722\\_246546.html](https://www.ccdi.gov.cn/yaowen/202107/t20210722_246546.html).
- [19] 费埃德伯格. 权力与规则 [M]. 张月, 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136.
- [20] 马奇, 奥尔森. 新制度主义详述 [J]. 允和, 译. 国外理论动态, 2010 (7): 41-49.
- [21] 彼得斯. 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 [M]. 何俊志, 任军锋, 朱德米, 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77.
- [22]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M]. 陈郁, 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71.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哈战荣 郑佳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涵括出场语境、理论特质、实践场域及价值靶向四个层面, 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飞跃演变, 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于出场语境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时代回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相互拱卫,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跨越与演变的恢宏历史进程。于理论特质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培塑文化主体性中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 在推进“两个结合”中擘画文化建设宏伟蓝图, 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彰显复合特质。于实践场域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深刻阐释文化建设的时代命题。于价值靶向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重塑“全人类共同价值”, 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旨归, 彰显其深远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探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贡献, 是领会其理论精髓、核心要义,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宏伟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原创性贡献; “两个结合”; 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030-13

---

DOI: 10.13946/j.cnki.jcqiis.2024.02.003

**作者简介:** 哈战荣,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郑佳,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行建设救国公债史料整理与研究”(22BDJ042)

**引用格式:** 哈战荣, 郑佳.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30-42.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sup>[1]</sup>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提出一系列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梁八柱”。这一文化思想形成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内涵丰富、学理性深刻，理论内蕴极具原创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赓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理论指导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界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原创性贡献、实践方略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发展的系统论述的集中呈现，它既是当下文化发展的实践成果的体现，也是理论的全面概括与总结”<sup>[2]</sup>。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就在于着重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基础之上的创新、在创新过程中的推进、在推进过程中的发展”<sup>[3]</sup>。有学者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概括为“人民性”“整体性”“独创性”及“世界性”<sup>[4]</sup>。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创造性地提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和目标<sup>[5]</sup>。有研究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路是：“坚定文化自信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灵魂，坚持‘两个结合’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追求。”<sup>[6]</sup>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sup>[7]</sup>，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达到新高度的系统化理论结晶，表明我们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信达到了全新向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的多维层面都提出了极具原创性的新论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篇章，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 一、出场语境：“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时代回应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相互拱卫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化观历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过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全新延伸与发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嬗变的接续传承与延展，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纵深跨越与演进。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出场语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

###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表达

文化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辐射力和引领力，一个民族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硬实力，同样需要文化软实力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诞生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话语表达，满足新的文化使命和首要政治任务要求，建构起新时代中国文化理论

论话语和叙事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推动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最新理论结晶，也是推动社会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科学理论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中国共产党最新的文化思想成果。”<sup>[8]</sup>

其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建构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彰显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话语表达。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凸显其强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底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基调。中华文化的基因使得中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可能变成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中国绝不会以西方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式延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因此，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建构的是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范畴新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同时进一步挺立民族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中华文明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凸显文化话语和叙事体系高度文化自信的基本定调。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焕发荣光，创造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旧邦新命”，是新时代赋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文化使命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sup>[9]</sup>这里所说的文化自信源于对中华文明高度历史自信 and 理论自信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话语和叙事体系，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传承与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世界的从容与开创未来的自信。

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话语表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首次提出和登场，不仅直面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亟需解决的多维度多层次重大问题，同时注重对文化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构建与提升。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sup>[10]</sup>我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同频共振、同向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国家整体发展中日益重要的角色给予肯定，从“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梦的宣传和阐释”“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和“提高国际话语权”等多个维度，为文化软实力研究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sup>[11]</sup>。文化软实力内在表现为深化国内文化体制改革，切实将文化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外在体现为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的提升和增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力、展现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内外协同发展主张突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机与活力、科学性与真理性。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嬗变的赓续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sup>[12]</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第二个结合”侧重强调历史文化的主体性，“其作为独立因素起作用，强调的是文化作为更为基本、更为深层、更为持久力

量的作用。中国近代从器物变革到制度变革,再到思想文化革命,是实践探索历程,也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规律”<sup>[13]</sup>。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战略性思维,将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二者内在价值理念的彼此契合,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文化遗产的鲜明特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相异,但彼此高度契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观念相融;修齐治平、兴亡有责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理念相通;使致中和、允执厥中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唯物辩证观点相合。“两个结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完美结合,体现了二者外在实践路径的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产生“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和合之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突显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道路之宽、主体范围之广、实践路径之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二者经由结合的方式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是由方法论上升到实践论的历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方法论指导,为实现文化强国建设拓宽发展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新的内在统一。文化遗产是文化创新的必要前提和理论来源,文化创新是文化遗产的必然结果和发展要求。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文化遗产和文化创新有机统一并作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强劲的理论光芒,必将照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

### (三) 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跨越演进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不同背景下,围绕不同的社会矛盾和时代主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价值,时空场域变化是一个重要视角。”<sup>[14]</sup>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走过百年恢宏历史。这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百年历程。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sup>[15]</sup>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作为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反映了中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与革命诉求,“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理论”<sup>[16]</sup>。它主要包括反映与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理论实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等内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建设的深刻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他们将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内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要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这三个方面确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工作的核心任务，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不断发展明确了思路方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以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建设理念、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化发展战略，促进了文化观念的创新和文化工作的飞跃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重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演进的新飞跃，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贡献了新时代原创元素。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理论基础之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结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国度、跨越时空带来的文化思想精髓与新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交织碰撞，激发出强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文化观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场和观点出发，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文化视角，揭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国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多维角度全面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同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之中，展现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两个结合”的接续继承与创新发展中实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新飞跃，突显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强大理论指导作用。

## 二、理论特质：“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性自信与“两个结合”的世界性关照相互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sup>[9] 76</sup>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培塑文化主体性中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在推进“两个结合”中擘画文化建设宏伟蓝图，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彰显复合特质。

### （一）在培塑文化主体性中准确把握文化建设基本规律

习近平文化思想涵盖文化建设发展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推动文化繁荣和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各个环节，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和理论内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主题，贯通融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新时代文化建设对内聚焦新的文化使命、对外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重大意义和时代价值。这一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目标、总



任务以及重大使命、主要观点、基本内容、现实作用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据国内外发展格局的深刻演变, 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路径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出理论指导和实践解读, 联通历史、现在和未来, 贯穿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等各领域, 构成逻辑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

“九个坚持”“五个方面”“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构成了这一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其中, “七个着力”体现了这一文化思想的实践路径和工作部署等方向问题, 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九个坚持”概括宣传思想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揭示了这一文化思想是做好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 “五个方面”是对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部署, 组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略; “十四个强调”是对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方针政策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构成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骨架支柱”。这些重大方面和重要内容内在统一、相互联通, 凝结着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宝贵经验和重大成就, 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系统全面的科学体系。总之, 习近平文化思想从主要观点、基本内容、重大使命、现实作用、目标任务等方面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时代性阐释。

## (二) 在推进“两个结合”中擘画文化建设宏伟蓝图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提出的, 但其也是内涵丰富的学理化成果, 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的理论来源, 也有契合现实需要的理论内涵和外延做支撑。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 论述深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推进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方面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其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做出科学阐释和系统回答, 精细擘画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六个必须坚持”等理论概述,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哲理。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具体实践; 运用“十四个强调”和“七个着力”的观点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工作做出整体部署, 包括横向系统布局和纵向分项部署; 既有对文化建设全局的顶层设计, 又有对文化建设的精细安排, 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整体与局部、系统与要素辩证统一的丰富哲理。

其二,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开放式的思想体系, 既包括学理化理论成果, 又内蕴随着实践深入推进不断丰富发展的学理化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文化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及新的文化使命等命题, 为更好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精髓提供了丰富的学理内容和基础。这些重要论断把我们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向新高度, 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 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 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不断在实践中实现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其三,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的系列成果, 为科学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学理支撑, 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路线图”和“任务书”。“两个结合”创造出的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锻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随着实践认识不断深入而创新发展的光辉典范。这一系列科学的学理化成果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 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定位、发展道路、实践目标，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四梁八柱”。这些理论成果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遵循，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特质。

### （三）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彰显复合特质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如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导，即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其一，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巩固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不是文化符号外在的表露，而是文化精气神内在的气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7]</sup>“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其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通过“两个结合”的方法途径得以体现。只有“自觉地以‘两个结合’来考察中国文化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实践及其文化形态的价值”<sup>[18]</sup>。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现代式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赋予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由“结合”的方式产生积极反应，形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注入马克思主义，形成创新性的理论优势。

其二，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一方面要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形成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文化思想大格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开阔的全球视野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思维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播撒“文明新形态”种子，收获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硕果实。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文化主体性，要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以守正不移的姿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以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思想特质，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行动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 三、实践场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相携相生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9]</sup>习近平文化思想根植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展现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光辉典范，内涵丰富，论述深刻。于中国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首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全新的文化使命，构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图景和多维层次结构的文化发展战略，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赓续发展。于时代

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生成有机统一新的文化生命体,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文明底蕴,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向。于世界而言, 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两个大局的历史高度, 深入思考未来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以世界性的战略眼光提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 拓宽了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

### （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文化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sup>[20]</sup>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的两个大局中孕育而生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形势新目标新要求，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纲领；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价值指引，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阐释，是强大的理论武器与科学的行动指南有机结合的统一体。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历经百年演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聚焦新的文化使命，紧扣文化建设时代主题，阐释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理论内涵。

新的文化使命三部分理论是一个多维层次的构成和辩证统一的关系，推动文化繁荣是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动文化繁荣的目标追求和价值旨归。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使命和追求，也是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sup>[21]</sup>。从推动文化繁荣的社会视域到建设文化强国的国家视域，再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人类视域，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具有原创多维意蕴的内涵丰富、覆盖面广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高度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理论自信则来源于对顶层设计的自信心和从容感。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新论断新战略深刻诠释了其富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的原创性理论特质。因此，新的文化使命不仅要求我们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赓续传统，更要坚定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使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同频共振。

### （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文明美好发展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2] 48</sup> 回顾党的百年文化观历史演进，中国共产党始终以积极的行动促进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以包容并蓄的博大胸怀看待世界文明的变迁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锻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道路，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涵世界情怀的生动诠释。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伟大成就，为推动当代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的新思维新论断新方法。“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成功走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承载的历史使命与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追求在不断拓展，一方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另一方面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sup>[22]</sup>。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文明形态，体现的是“人民至上”文化观，与西方“精英至上”文化观相异。这种文化观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融通。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属性，也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倡导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目标导向是全人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宽广伟岸的世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演进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发展提供了范式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拓宽了世界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尤其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范式参考。这是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它不仅是中国独特的实践经验总结，还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给予发展中国家文化道路的选择与思想启迪。中国在“两个结合”中实现了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这也启示广大后发国家面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主体建构问题，既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思想，也要回归本民族文化基因，吸收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寻找本民族的文化发展立足点。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观和价值理念，拓宽了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文明的路径。以人民为中心，寻求文化发展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丰富人民性的充分体现。这启示广大后发国家，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基于此，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突破和超越，同时为世界带来崭新的由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 （三）孕育新的有机统一文化生命体的文化表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明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表现为一种新的文明观，与西方二元对立、零和博弈及霸权竞争的政治图景不同，中国所倡导的是胸怀天下、美美与共、自利利他的新形态文化观。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背景下生成的，它既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实践，又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对现代化的价值转变，具有面向时代、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精神特质。新时代孕育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规律性认识的深刻反映，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代特征的正确把握。

文化表征是指文化再次呈现于人类社会中的方式，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表征将通过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表现出来。其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实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演进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和平型发展和文明型发展的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所走的依靠对外殖民扩张、血腥掠夺的道路。其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路径来看，习近平文

化思想立足于“两个大局”加速演进与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 在不断创新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同时, 坚持彻底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 在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 深刻阐述人类文明发展需要遵循的共商、共建、共享根本原则, 批判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及普世价值等。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创造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文化表征的理论贡献,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这突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兼具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的理论体系, 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有着原创性贡献的时代强音。

#### 四、价值靶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重塑“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交相辉映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 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 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sup>[15] 120</sup>由此可见,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理论中,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构成文化进步的核心及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始终坚持人民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创作者和享受者, 强调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两者相互统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建设要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思想理念, 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十分关切全人类的价值追求, 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推动世界文明大繁荣大发展, 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用中国经验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实践, 以文明交流互鉴替代文明隔阂阻碍, 与世界一同书写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华美篇章。

##### (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回答文化建设的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 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sup>[23]</sup>习近平文化思想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人民性特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解答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一方面, 人民是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创作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 强调文艺创作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通过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群众观, 带领中国人民投身文化建设伟大实践,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为解答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进行文艺创作、文化发展。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在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的同时, 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 因此文艺创作的定位导向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群众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 文艺创作的灵感和现实主体来源于人民, 正所谓文艺创作素材取之于人民日常生活, 来源于人民生活实践。

人民是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十四个强调”之一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建设的基本主线是文化建设为了谁、谁参与、谁从文化建设中分享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要求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必然要求, 也

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是确保文化建设成果为人民共享的价值准则，人民观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即人民性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蕴含人民观的基本体现，也是践行文化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必然结果。总之，将人民观理念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正确处理党性和人民性关系、文艺创作和人民参与关系、文化成果和人民共享关系的价值准则，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贡献所在。

## （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文化建设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sup>[24]</sup>马克思既重视物质武器的不可替代性，也重视精神武器的重要作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统一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统一于革命的目标，那就是人的解放。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基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

其一，文化建设发展的先进方向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人的主体性角度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文化进步的核心价值追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方面，阐述文化建设的方向和人的发展方向的一致性。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这是从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主体性的角度出发，阐述文化建设与人的自身发展存在高度粘合性。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体存在方式的发展是一致的，即文化建设发展的先进方向与人的发展具有一致性。文艺创作的导向必然和人的自身发展步调一致，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和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彼此契合。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不仅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追求和前进方向，且作为一条红线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另一方面，文化建设经历了由自在自发到自由自觉的转化过程，这也是人的本质存在从自在自发不断走向自由自觉的状态体现。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建设最终目标同频共振，两者目标导向一致，共同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赓续奋斗。

其三，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文化建设的价值追求，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必须坚持”立场观点方法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是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人民立场体现，更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追求的生动诠释。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强调文艺工作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阐释文明交流的规律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统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国内发展格局及“合作共赢、和平发展”的国际发展格局背景下，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直面时代之问、人类之问、世界之问所提出的全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为推动世界

现代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引。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着力解决国内文化建设的现实问题,同时放眼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进程,紧紧把握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规律性认识,以开放包容的胸襟格局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全球性的视野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这充分诠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的理念,将本土文明的再造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景密切关联”<sup>[25]</sup>。

其一,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体现出这一文化思想开放性的特征。尽管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语言不尽相同,但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目标追求一致。中国共产党以宽广的胸怀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不同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促进现代社会文明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现代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其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体现出这一文化思想不断发展的状态。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的中国方案。一方面,全球文明倡议以“一带一路”等人文交流平台为桥梁纽带,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动,为各国开展跨文化交流提供平台载体,在“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化氛围中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推动中华文明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外传播新时代中国声音、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开放性特征和与时俱进的全球性视野,具有时代价值和世界性意义。

其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充分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利益表达和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人类代言,反映的是最为广泛的爱好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世界人民的心声,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异的是西方倡导的“普世价值”。西方“普世价值”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以文化殖民为目的,破坏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阻碍了各国开展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基于此,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世界现代文明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努力寻求具有普遍性的共同价值、重构文明秩序的重大意义。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特原创性贡献所在。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一向强调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文化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而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主要涵括出场语境、理论特质、实践场域及价值靶向四个层面,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观的飞跃演变,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时代价值和理论意义。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人民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继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篇章。

#### 参考文献:

- [1] 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论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

- 神 [N]. 人民日报, 2023-10-12 (1).
- [2] 张颐武. 筑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根基 [N]. 学习时报, 2023-10-13 (2-3).
- [3] 付文军.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J]. 宁夏社会科学, 2023 (6): 5-11.
- [4] 项久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4 (1): 4-11.
- [5] 陈家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论创新和重大贡献 [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4 (1): 30-38.
- [6] 杨晓慧.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理路 [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 2023 (12): 14-23.
- [7]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8] 冯刚, 王莹.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特质与内在逻辑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101-111.
- [9]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36.
- [10]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5-27.
- [11] 张国祚. 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兼析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5): 188-203.
- [12]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685.
- [13] 李毅.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的思想标识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3 (5): 13-15.
- [14] 齐卫平.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意义: 理论含量与实践遵循 [J]. 思想理论教育, 2024 (1): 11-17.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36.
- [16] 袁贵仁, 杨耕.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219.
- [17]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4-11.
- [18] 俞思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内涵与价值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1): 5-12.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2.
-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544.
- [21] 陈金龙.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8): 16-21.
- [22] 蒋英州, 王创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主要内涵与使命追求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2): 1-13.
- [23]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103.
-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10.
- [25] 张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背景、科学体系与时代价值 [J]. 求索, 2023 (6): 22-2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 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 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步蓬勃

（大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摘要：**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统一战线作为政党能力的重要内容。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理论观点，贯穿于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之中。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葛兰西，在《里昂提纲》中同样存在把统一战线视为政党能力的论述。葛兰西的相关论述为我们加深理解“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命题提供了有益参考。在葛兰西看来，统一战线内贯于“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能力”、“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之中。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构件又将政党能力联结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其自身就是既具体又综合的政党能力。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本质规定，而且是党的现实存在方式；不仅是党锻造自身的实践方式，而且是检验群众性政党的价值尺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在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上的辩证统一。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强大法宝，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具备的重要能力。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对于建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新范式、推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凝聚民族复兴磅礴伟力、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葛兰西；政党能力；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人心和力量；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043-15

---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2.004

**作者简介：**步蓬勃，大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引用格式：**步蓬勃. 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43-57.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sup>，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政党建设、现代国家建设以及民族复兴存在联系。”<sup>[2]</sup>研究与阐释统一战线与政党能力的内在关联，对于新时代政党建设、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具有重要理论参考意义。作为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葛兰西，在《里昂提纲》中同样存在把统一战线视为政党能力的论述。葛兰西的相关论述为我们加深理解“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命题提供了有益参考。

## 一、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立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史一以贯之地重视统一战线，历来把统一战线作为政党能力的重要方面，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统一战线在广义上指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为了一定的政治目标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在狭义上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身团结的战略与策略。统一战线概念由恩格斯首次提出并由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sup>[3]</sup>他进而谈到统一战线与政党能力的紧密联系：“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sup>[3] 605</sup>“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sup>[3] 613</sup>他通过“武器”与“战士”的关系生动阐明了统一战线与政党能力的内在关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全局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总结百年统战的历史性贡献和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系统升华了统一战线作为政党能力的理论和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sup>[4]</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sup>[5]</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6]</sup>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统一战线升华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7]</sup>。

习近平总书记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和新使命，在总结百年大党奋斗历程和统战经验基础上，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统一战线上升至中国共产党本身具备的重要能力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必须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十二个必须”。其中，“人心和力量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真正有力量是从内而发，建立在主体间性平等的基础上，不是靠外在强制。作为历史主客体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激发群众主体的内在本质力量，处理好政党自身与人民群众的内在本质力量问题，昭示着政党能力。力量本身表现为能力，而能力又是力量的外在

化, 力量与能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心和力量”论断, 涉及执政党自身能力锻造的问题。能力问题既是逻辑与历史统一问题, 又是执政党自身本质问题。能力, 简言之就是能动的力量。作为现象, 它是主体作用于客体并使之发生质与量的改变; 作为本质, 它是主体内在本质力量的外在化。力量是主体自身的能动性和否定性, 能力则是扬弃力量虚无化主体的辩证否定性即建构性和生成性的否定性, 是主体间互为中介建构自身的能动过程。所以, 运用统一战线法宝作用解决人心和力量的问题, 就是中国共产党建构自身能力的问题; 激发人民群众的能动力量, 就是激发政党自身的能动力量。因此, 坚持统一战线, 既是增强政党能力的需要, 也是“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sup>[8]</sup>的需要。

党的相关重要文献自觉将统一战线视为政党能力。比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sup>[4]</sup>。其中, 党的执政能力包括“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本文简称“党的四大能力”)<sup>[4]</sup>。“群众组织力”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以统一战线为中介的党的执政能力; “社会号召力”体现在统一战线工作中; 统一战线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场域贯穿于“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引领力”之中。这充分体现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创新——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这一理论创新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条件的清醒认识, 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统战工作的思想方法、理论观点, 是结合新时代统战实践需要而进行的理论创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sup>[9]</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理论观点, 为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sup>[10]</sup>, 为进一步构建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提供了有力说明和思想资源。

葛兰西在《里昂提纲》中也存在把统一战线视为政党能力的相关论述。本文以葛兰西关于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思想为研究对象, 以期加深对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的研究。葛兰西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而且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 不仅是活动家, 而且是理论家。有的著作认为, 葛兰西的有些思想“今天仍然以自己的榜样、见解和科学理论著作为工人阶级、被剥削阶级群众、全体意大利人民指出了社会上、精神上恢复虽有困难但是正确的道路”<sup>[11]</sup>。关于葛兰西的思想, 人们比较熟悉他的市民社会、文化霸权、有机知识分子等理论。关于他的政党思想, 有的学者关注到政党的战略与策略和联系群众的重要性, 指出“在葛兰西看来一个政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群众观, 坚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sup>[12]</sup>, 但未具体指向统一战线, 也未谈及政党能力。有的学者认为葛兰西“极为重视统一战线组织的策略, 认为意大利共产党没有取得对无产阶级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决定性影响, ‘党就必须继续利用统一战线策略’”<sup>[13]</sup>, 但未详细展开论述, 也未从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层面加以研究。笔者在《论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能力建设的有机构成》一文中, 从政党能力的有机构成维度指出统一战线的内在联结作用<sup>[14]</sup>。本文将从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维度进一步论释葛兰西的统一战线思想。

## 二、葛兰西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形成

葛兰西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 是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 其形

成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

### （一）学习接受期

1913年葛兰西加入意大利社会党，从此踏上寻求社会解放的道路，开始关注“关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新领导者的任务问题”<sup>[15]</sup>。一战爆发，意大利社会党的中立政策令葛兰西的阶级意识更加清晰：“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必须作为新的领导阶级，领导起解决整个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的斗争。”<sup>[15] 24</sup>1915年意大利社会党在是否参战问题上越发表现出软弱与妥协，葛兰西认识到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意识到获得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党认同的重要性。1917年葛兰西领导都灵工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争夺工人合作社领导权的斗争并获胜，开始思考“争取工人和农民、北方和南方的统一和团结，争取他们之间建立革命的同盟”<sup>[15] 38</sup>的问题。团结、同盟、联合的策略与政党能力问题开始进入葛兰西的理论视野。

### （二）反思探索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葛兰西撰写《反〈资本论〉的革命》一文高度肯定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流露出创建意大利无产阶级政党的意愿。此时意大利国内的革命形势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意大利社会党在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之时，表现出领导能力的极度不足，甚至在机会主义的攻击下几近分裂。葛兰西指出：“如果社会党要不被那些几乎就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所制服和压倒的话，它就必须更新自己。”<sup>[16]</sup>无产阶级政党的结构性更新即重构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力量，成为葛兰西新的政治目标。1920年葛兰西带领分裂后的第三派“共产主义教育小组”开展工人运动并取得胜利。他认为“向意大利无产阶级提供一个能够组织工人国家并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共产党”<sup>[16] 174</sup>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1年1月21日，葛兰西正式创建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葛兰西从无产阶级事业的接受学习者转向独立探索者。意大利共产党建立初期，正面临法西斯主义发展壮大。葛兰西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认为仅靠共产党的力量远远不足以应对，必须依靠党与群众的联合力量。“无产阶级结成统一的战线，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攻！恢复工人阶级的统一！同社会党人取得协议，共同行动！”<sup>[15] 175</sup>共产国际的口号回应了葛兰西的政治思考，“统一战线”开始进入葛兰西理论与实践的视野。1922年5月葛兰西赴莫斯科专门研究全世界工人团结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斗争经验，对帝国主义发展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 （三）现实助产期

1922年10月29日法西斯夺得意大利政权，此时“统一战线”的结成显得更为迫切，葛兰西主张应立即同社会党内的“第三国际派”进行有条件的联合。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的“统一战线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实际运用的一般方法上都是非常正确的”<sup>[16] 197</sup>，但要结合意大利的实际，“找到能够使它具体化的党和人”<sup>[16] 197</sup>。“组成有思想中心的统一的共产党”<sup>[16] 197</sup>成为葛兰西新的思考点。面对法西斯的步步紧逼，葛兰西不得不就“统一战线”的具体开展做出快速回应。1924年2月，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正面宣传“统一战线”，注重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工人和农民的团结、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团结、意大利全体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团结”<sup>[15] 100</sup>。科摩湖会议确立了“统一战线”目标——“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阵线，建立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的联盟”<sup>[15] 108</sup>。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发动第二次政变。而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极左派（意大利“左派”共产主义者）

则认为当前的敌人是意大利社会党（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传统政党），当前党的任务是“开展宗派主义斗争”。其结果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党的组织工作陷于崩溃，党的政治探求方法（辩证法）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也被破坏了。在此背景下，葛兰西认为解决党组织的完整性和党组织的活动尤其是党联系群众的问题刻不容缓。

#### （四）思想生产期

为了摆脱意大利共产党内外交困的窘境，锻造意大利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可能力量，指明意大利共产党发展方向和道路，葛兰西开始思考党的能动性、独立性、战略性、策略性等问题，概括来说就是能否将意大利共产党锻造成历史主体—客体的党，本质上是意大利共产党能否将自身锻造成历史主体—客体的党的问题。葛兰西从建立意大利共产党到锻造意大利共产党，目的在于使意大利共产党成为独立政党。作为主体的党必须以自身为中介，将自身作为对象和客体，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扬弃，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我本质的提升，这是主体自我规定的过程。自我规定不是单纯的主观抽象，而是在现实中实现主观的客观化，在思想与行动的统一中将自身凝聚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中心”，即综合为有能力可担当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具体化的党”。“具体化的党”即体现主客体统一的总体性的党，既将自身设定为被改造的对象（客体化）又实现自我改造（主体化）的党，不断自我更新，在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辩证运动中实现质的飞跃。

自我锻造的过程就是主体的建构过程，就是不断超越自身主动寻求本质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为政党自身具有的本质力量和能动力量的外化与否定，这就是政党能力的能动性。政党能力或党的能动性不仅仅是抽象的，它还是面对现实力量的力量，也就是它必须有足够的勇气面对它的对手。这种能动的否定力量要么表现为与对手生死斗争的生命冒险，要么表现为将外在力量转化为内在力量的斗争策略。前一种否定是毁灭对手的同时也毁灭自身的绝对否定，后一种否定是将自己的对手以及广大群众转化为自己的同盟或自身的一部分的辩证否定。绝对否定会导致本来力量弱小的意大利共产党不存在，而辩证否定则可以在壮大自己的同时扩大战胜对手的可能力量。辩证否定在特征上表现为统一性和完整性，在现实性上就要寻求转化对手、联系群众、结成同盟；在方法论上体现为战略与策略，运用战略与策略则是政党能力。作为真正的政党能力必然体现在与对手打交道和联系群众的现实活动之中，在铸造新世界中展现自身目的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体现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同时规避否定力量的盲目性。在理论层面，政党能力获得了辩证法的合理阐释；在现实层面，如何展现政党能力以及能否实现由外到内的转化则成为葛兰西思考的重中之重。

#### （五）思想深化期

1926年1月20日，意大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法国里昂召开，大会通过了《意大利的形势和意共的任务》（简称《里昂提纲》）。《里昂提纲》基于意大利经济状况、政治状况、阶级状况以及未来革命的可能问题，回答了政党能力、革命前景以及革命动力等问题。《里昂提纲》指出，当前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将意大利共产党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和革命政党”<sup>[16] 274</sup>。这支“布尔什维克党”要打造成功，必须具有这样的能力：“（1）党的意识形态；（2）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程度；（3）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能力；（4）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sup>[16] 274</sup>（本文简称党的四种能力）。其中，“党的战略和策略”具体化为“统一战线的策略”，可以推论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就是党的“统一战线”的能力，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思想由此提出。葛兰

西提出的政党能力构件中，有的地方使用“力”，有的地方使用“能力”，且为并列关系。力与能力是有区别的，葛兰西为什么要这样表述呢？实际上，力可以理解为力量和能力，力量是主体最内在的原动力和驱动力，能力则是外在的、后天的技能和知识。两者有区别有联系：力量是发挥后天习得和领悟内容作用的内驱力；能力是内在本质的外化和表现，既是现象的也是本质的。葛兰西这样使用，意在说明力是最根本的东西，它必须体现在作用力中，而作用的好坏则指向能力。力是政党的内在本质，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必然陷入抽象，真正的现实的政党必然在自否定（力）的运动中展现为主体间性的活动，表现为现实能力彰显自身本质，需要辩证理解。

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政党和团体的政治活动（策略），是同共产党如何去领导群众和如何去赢得大多数人的问题有密切联系的”<sup>[16] 290</sup>。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是意大利共产党“如何去领导群众和如何去赢得大多数人”的“战略和策略”性活动。其展开形式是“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开展目的是赢得大多数人，“考虑到群众中的这种倾向，并有能力促进它，发展其中的积极因素，……达到不断增长的动员和力量上的有机团结”<sup>[16] 290</sup>。赢得群众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在于赢得群众，这一双向活动的中介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既连接党与群众的两端，又将两端紧密联系为一个总体。这一总体的能动性就是政党能力问题，关系到能否深入群众中去和赢得群众目的的达成。“在意大利，只要党仍然远没有赢得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居民的大多数的决定性影响，党就必须继续利用统一战线策略。”<sup>[16] 291</sup>统一战线既表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赢得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能力，又作为“战略和策略”成为赢得革命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及“战略和策略”方面已显性地表现出来，在其他两个能力中也隐性地存在着。统一战线始终作为能力构件内贯于政党的四种能力之中。

### 三、葛兰西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构件

葛兰西从政党能力有机构成提出统一战线思想，不仅具有斗争策略的维度，而且具有党的本质规定维度。作为党的斗争策略，统一战线能够反映党是否与时俱进，是否敢于面对挑战、勇于斗争，是否将人类事业不断推向深入。作为党的本质规定，统一战线能够反映党是否具有群众性，是否谋划人类未来解放，是否具有实现人类幸福的可能。统一战线虽然是在意大利面临革命困境的情况下（作为策略）提出的，但这恰恰体现了政党的内在本质及其本质外化的能动性，也恰恰检验并区分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本质不同。

#### （一）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统一战线

“意识形态的一致是党的力量和政治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sup>[16] 274</sup>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显性表达了对直接目标的理解能力、形势分析能力以及政治方向把握能力，即一个政党区别于另一个政党，首先是在思想、纲领、目标上具有本质区别，这是一个政党不可或缺的政治构件和思想构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学说”<sup>[16] 275</sup>武装头脑，才能“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sup>[16] 274</sup>地形成本阶级意识的“思想中心”。另一方面，“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隐性表达了客体方面的要求，即党的意识形态不但武装全党，而且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和力量，更好地体现党的意识形态的领导能力，体现党“作为工人阶级领袖的职能”<sup>[16] 274</sup>。这一

隐性层面更为重要，但易被忽视。

《里昂提纲》提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是为了应对意大利混乱的工人阶级运动局面。当时，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存在各种思想倾向，除了以格拉齐亚德伊为代表的右翼倾向，以博尔迪加为代表的极左倾向，还有最高纲领派的中间倾向。他们不是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不是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怀疑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的能力；不是受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就是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渗透，严重歪曲党的性质、职能、策略等。因此，葛兰西认为必须在拨乱反正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自身。

葛兰西认为加强意大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建设，一方面要在思想上达到党内高度统一，另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在思想观念上改造和引导群众。意大利共产党希望通过密切联系和争取群众，扩大规模和影响，对抗来自内外的风险和挑战，将自身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党，一个属于“世界的党”，一个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政治使命的“布尔什维克党”。葛兰西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放在首位，是对复杂历史境遇（西欧革命失败、法西斯上台、工人阶级政党的混乱、意大利共产党革命前景等）的回应。他提出：“提高党的思想意识水平……保证所有党员对革命运动的直接目标有彻底的理解、具有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定能力及具有相应的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sup>[16] 275</sup>，“在任何时候争取群众同党结合在一起”<sup>[16] 275</sup>。提振信心、增强自信是意识形态领导能力提出的现实需要，不仅是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而且是组织问题和实践问题；不仅是政党自身问题，而且是党群关系问题，包括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内贯其中，作为隐性力量起着重要作用。

## （二）作为“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的统一战线

“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的程度决定政党是否统一、独立、革命。如何塑造独立的政党领导群众实现人的解放？重视党组织的中介作用和间接塑造，构成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思的重要维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专门阐释了党的组织对于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作用。党的组织不应仅作为外在形式的统一整体，而应将其作为党的阶级意识的统一整体和武装全党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总体。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总体性阶级意识，才能由此联系而成革命的总体性力量。党的组织因此成为非无产阶级意识上升为无产阶级意识、非无产阶级政党上升为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上升为人类解放政党的重要中介，更确切地说它是构成无产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纽带。无产阶级政党要成为革命的政党必须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即用“总体性辩证法”武装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组织的中介作用才能达到统一，而且是一个不断发挥中介作用的历史过程。这样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不断地获得自身发展的力量并成为独立的、革命的政党，才具有推动历史发展的可能。政党“成熟还是不成熟的问题只能这样来判断，即看一种关于应做什么的见解在行动的阶级和领导它的党的意识中是以抽象和直接的形式存在呢，还是以具体和有中介的形式存在”<sup>[17]</sup>。

党的组织形式一方面表现为党的自我组织的结构性和规范性，即我们通常理解的党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党组织群众的能力，即统一战线。党的自我组织，即以党的组织机构为中介塑造自身，增强党的内聚力。党通过多种形式组织群众，既突显自身的本质规定又突显自身的内聚力量，将外在力量不断转化为内在力量，形成党的内聚能力。因此，“组织”既可作“名词”解，又可作

“动词”解。葛兰西同样重视党的组织的中介作用，并将其发展成为政党能力。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力，必须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投射到外部世界，根据自身的目的铸造新世界，使外部世界越来越具有人的终极目的性。因此，阐释政党能力，不能抽象化，而要具体化，这是葛兰西的工作。

政党能力不是直接获得，而是要通过物质性活动间接获得，也就是在实践中获得。要“保证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给无产阶级一个形象、人格和一种严格的革命意识；以及防止来自一些阶级和分子的任何渗透或促使分裂的影响”<sup>[16] 279</sup>，没有组织的内聚力“就会分散成不起作用的一盘散沙”<sup>[16] 345</sup>。意大利共产党成员构成复杂，大部分来自工人、农民，如何组织他们成为革命力量是个难题。党的量需要扩大，但党的质的提升是关键问题。这既需要党的组织在党的整体量的规定性上发挥作用，也需要党的组织在党的总体质的规定性上发挥重要作用。“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在党的生活的所有时刻必须是一个集中的组织。”<sup>[16] 281</sup>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体现党的统一性，并且将之形成铁的纪律，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宗派主义斗争的旋涡，党的领导不致陷入崩溃。只有“保证他们的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会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的无影无踪”<sup>[18]</sup>。因此，统一战线作为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体现着党的内聚能力，成为党的集中领导和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保证。

### （三）作为“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能力”的统一战线

无产阶级政党是群众性政党，联系群众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存在方式。党的意识形态、组织力量、内聚能力都体现在联系群众这一活动中。意大利无产阶级政党构成的复杂性现实决定意大利共产党必须具备联系群众的活动能力，这样才能将意大利共产党打造成革命的、世界性的政党。

联系群众，既符合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sup>[19]</sup>，也符合马克思人的本质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0]</sup>。葛兰西认为“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综合”<sup>[18] 39</sup>，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在社会关系（类）即在人与人的联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本质规定，因此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强大意大利共产党。如果单纯依靠理论宣传来联系群众，并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培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一方面会使党的自身建设陷入理论的抽象化，另一方面会陷入自身存在虚无化的危险。因此，葛兰西强调的是“活动”，即在自身本质力量的现实化行动中，紧紧依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壮大自身并使自身成为更加强大的历史创造者和改造世界的新主体。因此，联系群众本身是自觉、能动、历史的活动，更是一种实践能力。

在联系群众的实践活动中，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改造人的思想的惰性，尤其是改造人的传统利益观念；另一方面是用新的经济观念——共产主义经济观念——改造他们的头脑，在“自愿合作”（非盲目）的原则基础上，更多地争取广大工人农民群众积极投身政治生活，让他们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由此引导他们自觉形成价值上的认同，融入无产阶级阵营并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员。这需要每个党员具有高度责任感，具有一整套观念体系，使阶级意识“以‘民众’信仰的形式发挥强大的威力”<sup>[16] 488</sup>。拥有这种能力的人，就是能够使阶级意识具体化的人，而“能够使它具体化的人”就是葛兰西所指的“有机知识分子”。整个活动过程可以理解为夺取“文化领导权”、建立“市民社会”的过程。党群关系考验一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和活动能力，葛兰西认为“统一民心的过程便不再是机械的和偶然的，而变成自觉的和必须的了”<sup>[16] 503</sup>。



#### （四）作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的统一战线

如何联系群众或以何种方式联系群众而使凝聚民心成为必然呢？这就需要党具备战略决策能力和策略运用能力。“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也就是把革命胜利所需的一切力量组织和统一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周围的能力；也就是利用客观环境和这些环境造成的不但是劳动居民中的，也是工人阶级敌人中的力量对比的转变，以便切实把这些力量引向革命的能力。”<sup>[16] 285</sup>“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斗争经验给了葛兰西极大的鼓舞，他认为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是力量联合的重要方式。根据意大利共产党自身的特点，在如何构筑反法西斯联盟问题上，葛兰西不断探索统一战线的组织问题，坚持“在特定的条件下，运用灵活的政策”<sup>[16] 292</sup>。他继续发挥工农委员会的基层组织作用，把工人组织起来，同时争取农民投入到政治斗争中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联盟。他还通过中间解决的办法争取资产阶级阵营特殊的中间群体，“集合更广泛的力量作为党的后盾”<sup>[16] 292</sup>。如果这些策略能够实现，“就会加速革命进程和开始更广泛的斗争”<sup>[16] 292</sup>。他认为：“在意大利，只要党仍然远没有赢得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居民的大多数的决定性影响，党就必须继续利用统一战线策略”<sup>[16] 291</sup>，否则“党就可能使自己严重地偏离作为革命领袖的任务”<sup>[16] 293</sup>，不但丧失革命，而且丧失自身。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就具体体现为“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党的全部活动的综合准则”<sup>[16] 290</sup>。从逻辑层面来讲，如果政党能力是抽象，那么统一战线则是具体，它是政党能力由可能性走向现实性的具体体现和综合表现。从战略高度来讲，统一战线的设计可以组织和统一一切可能力量，使其团结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周围，成为革命成功的重要力量保障。从策略方面来讲，统一战线是达成这一设计的具体行动方案，这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始终体现政党群众性的重要方面。统一战线战略和策略实施得如何，直接体现党的思想的真理性、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以及党员自身的能力水平。反过来看，它考验党能否以自身形象吸引广大群众，检验党的意识形态能否被广大群众所接受。统一战线战略与策略实施得好，政党与群众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更容易达成共识，进而增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和党组织的内聚力。

### 四、葛兰西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思想总体

统一战线内贯于政党能力始终，又将能力构件联结为整体，使党自我生成为谋求人类解放、实现人的类本质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真正的、独立的、能动的政党，自我生成的辩证运动过程必然表现为具体而总体的特征。

#### （一）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总体性特征

在共时性意义上，统一战线将党的四种能力勾连为一个整体，即党的四种能力不是毫不相干、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结、有机构成的。“其中的每一个条件同其他条件都是紧密联系的，在逻辑上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事实上，每一个条件都表明和包含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相互有内在的联系，而且交叠在一起。”<sup>[16] 274</sup>在历时性意义上，统一战线在运动中始终保持党的四种能力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并且在运动中不断推进党自身本质力量的提升。从四种能力的出场顺序来看，作为党的战略与策略能力的统一战线最后出场；从每个政党能力构件来看，统一战线都内贯其中。在辩证法的意义上，统一战线综合党的能力构件而成为新型的政党能力，显示出政党自我规定

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 （二）辩证环节具体联系的总体性特征

葛兰西的思路很清晰、逻辑很严谨：党的第一种能力即意识形态领导力，一方面在于“提高党的思想意识水平”<sup>[16] 275</sup>，形成“具有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定能力及具有相应的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sup>[16] 275</sup>，以此反对社会民主党（右派）、最高纲领派（中派）和以博尔迪加为首的极左派，并防止他们继续坠落。另一方面，必须“以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群众性政党”为宗旨与上述宗派进行斗争，“以便能够改变形势，不脱离群众，并继续获得新的影响地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群众性政党，本质决定党的意识形态领导不能脱离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sup>[19] 9</sup>意识形态作为党的“思想中心”说服广大群众，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党的组织能力。党的第二种能力即组织能力，其基本任务在于通过组织的中介作用将意大利共产党打造成独立的党，“保证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给无产阶级一个形象、人格和一种严格的革命意识；以及防止来自一些阶级和分子的任何渗透或促使分裂的影响”。首要的组织基础就建立在“生产、因而是劳动场所（基层组织）”<sup>[16] 279</sup>上，“以便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sup>[16] 279</sup>。所以，党的第三种能力即联系群众的活动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求“每个党员必须是一个政治上的积极分子，他有能力传播党的影响，把党的指示化为日常的行动并能领导一部分工人群众”<sup>[16] 284</sup>，而且“必须用心”去工作。如何“把革命胜利所需的一切力量组织和统一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工人阶级周围”<sup>[16] 285</sup>？这就是党的第四种能力即战略和策略的能力，即具体化为“统一战线”的能力。

### （三）从两极到中介的总体性特征

党的四种能力通过统一战线具体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统一战线是党的四种能力的综合。当然，统一战线也有其自身的本质规定，即作为组织群众和联系群众的活动彰显群众性政党的本质。无产阶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的实践中介将党和群众连接为一个整体，并在整体运动中内在地保持自身革命的总体性和群众性政党的本质规定。葛兰西既在辩证逻辑的理论建构中通过统一战线的中介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综合为群众性政党，又要在现实层面让意大利共产党将这一本质体现出来，从抽象到具体地展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本质及其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意大利共产党据此获得群众的价值认同，使群众自觉投身解放事业，同时锻造意大利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即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性，独立地应对党内复杂状况、国内复杂的阶级关系以及西欧革命失败的负面影响。

### （四）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总体性特征

统一战线是葛兰西审时度势在特殊时期谋求党的自身发展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其内在的核心则是党的能力。作为形式与内容统一的统一战线，既是在困难时期对党的本质的强化与深化，更是政党能力建设的具体化——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在葛兰西看来，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是意大利共产党谋求自身存在、发展可能和实现突围的能动力量。首先，这种能动性不是盲目的冲动，而体现为一种规范性，即意大利共产党将自身规定为思想统一、组织有序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其次，这种能动性体现为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是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最后，这种能动性是一种超越的力量。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理性的、辩证的、历史的活动。党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

步蓬勃。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43-57.

动（统一战线）中不断获得自身新的规定，不断突破自身，向更高的目标——人类解放——迈进，体现了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如果不从党自身的本质活动去理解统一战线，那么统一战线不过是政党的暂时性策略和权宜之计，只是政党的外在形式。统一战线不是简单的名词，其本质是动词，即主体（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引导、统一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如果不从内在机理或有机构成去理解统一战线和政党能力，很容易造成四种能力构件的简单并列或交叠，就会遮蔽统一战线内贯其中、联结每一能力构件并使其成为整体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如果从葛兰西“实践哲学”所坚持的“绝对历史主义”来看，统一战线就有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现实意义。

总体上，统一战线是意大利共产党（个别）解决自身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战略策略（特殊），获得群众支持保持群众性政党（普遍）这一本质规定的方式。也可以理解为，统一战线使意大利共产党进一步摆脱自身本质的抽象，在革命实践、突破困境、赢得群众的现实化进程中不断综合并将自身规定为具体而全新的政党。统一战线综合政党能力、表现政党能力，又保持党的群众性本质。其自身的辩证运动不但体现无产阶级政党行动的方法，而且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存在方式，更构成检验是否为群众性政党的尺度，体现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统一战线体现政党能力——活动的执行力和行动的规范力。如果忽视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党的性质就会陷入空洞的抽象，人类解放事业就会陷入浪漫的空想，党的自身锻造就无从谈起。虽然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是葛兰西应对现实特殊状况所采取的灵活的、具体的策略，但统一战线与党的性质始终保持着同一，即在特殊化过程中既实现自身又保持自身的本质规定。因而，统一战线必然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时代的需要而展现特有的样态，但无论怎样与时俱进、丰富形式，其内在本质不会变，始终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和解放群众。在时代变化中，统一战线会以不同方式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时代挑战、化解时代问题、谋求自身发展、引领社会进步的能力。

## 五、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启示

时代赋予统一战线不同的内涵与价值。对于意大利共产党而言，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是葛兰西结合本国实际对意大利共产党自身发展作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遗憾的是，里昂会议后不久，葛兰西就被法西斯抓捕入狱，未能直接介入意大利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和革命实践，也未能检验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结果，是新时代新征程的理论创新，是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要求。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运用好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发挥好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一）在政治和理论高度上建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新范式

有学者认为：“统一战线有两种范式，一种是经典‘敌我友’范式，一种是新型‘共同体’范式。”<sup>[21]</sup> 本文认为当前有条件建构第三种即“政党能力”范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理论著作中已有关于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相关论述，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阐释，将其从理论观点转

变为理论体系。

第一，从党和国家的最大政治高度理解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是向前推进，越需要凝聚最广泛的力量”<sup>[22]</sup>。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需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以团结凝聚力量，以奋斗铸就伟业”<sup>[23]</sup>，“充分调动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力量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参与，形成互联、互补、互动”<sup>[24]</sup>。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sup>[23]</sup>，“我们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sup>[25]</sup>。“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sup>[26]</sup>将统一战线提升至政党能力的政治高度，既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又锻造政党能力，形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良好局面。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视角建构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构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言语方式和理解范式，可以更大程度地提升对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学术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sup>[27]</sup>，要“加深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建设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sup>[28]</sup>。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智慧结晶。“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sup>[10]</sup><sup>4</sup>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推进党的统一战线创新发展。

## （二）在理论与实践统一中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

爱国，是言与情的相融，也是知与行的统一。爱国是基于正常理智做出的冷静而深沉的行动以及热烈而滚烫的表达，“既表现为个人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等的强烈归属感，也表现出为祖国繁荣、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行动担当，具有穿越时空的强大凝聚力和整合力”<sup>[29]</sup>。要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性质，实现统一战线工作守正创新。

第一，从理论上明确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的科学性与真理性。要增强全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认识、思想认识和理论认识，“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sup>[30]</sup>。要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切实加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在实践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时代统战工作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sup>[1]</sup><sup>5</sup>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是实践的结果、时代的要求、执政规律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统一战线工作描绘了新蓝图、规划了新目标、指明了新路径。在实践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的历史任务。

第三，在辩证中创新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要讲究工作艺术，因为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群众工作，所以要有特殊的方式和方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走好群众路线，团结就是力量，“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sup>[31]</sup>。所以，“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sup>[32]</sup>，首先要“增强开展统一战线工

步蓬勃。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43-57.

作的责任担当”，“把更多的人团结在党的周围”<sup>[33]</sup>；另外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广泛凝聚共识”<sup>[34]</sup>。

### （三）在完善党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中凝聚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要确保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第一，通过统一战线“联系群众的活动能力”提升党的“群众组织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sup>[16]</sup>。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群众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在本质的最好说明。“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sup>[35]</sup>共产党人最大的“初心”是以人民为中心，而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第二，通过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大众化和亲民化内聚党的“思想引领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也是群众性工程，既需要党的全面领导，也需要统一战线的整体推进。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将党、国家、社会、个人联系为一个整体，既讲好中国故事，又凝聚中国力量。统一战线作为充分调动一切可能力量的行动与方法，不是人为化和外在化的强制推行，而是群众性政党的本质特征、内在要求和能力体现。

第三，通过统一战线的“战略与策略”形成广泛的“社会号召力”，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sup>[36]</sup>这就要求“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sup>[7] 39</sup>。

第四，通过统一战线的“意识形态的领导力”和“政治领导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升应对外部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共产党处理复杂局面、应对各种挑战、战胜多重风险，需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通过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sup>[5]</sup>

## 六、结语

本文以葛兰西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思想为个案进行论释：首先，作为“党的意识形态”领导能力的统一战线，突出统一战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不可或缺的政治构件、思想构件和能力构件，是形成“思想中心”的重要保证。其次，作为“党的组织形式和内聚力”的统一战线，突出

统一战线作为中介作用间接塑造独立政党，是完成自身的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的重要保障。再次，作为“党在联系群众方面的活动能力”的统一战线，突出统一战线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本质属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存在的根本保证。最后，作为“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能力”统一战线，突出统一战线是政党的战略决策能力和策略运用能力，是突破困境、自我发展的重要保证。统一战线不仅是政党能力的重要构件，而且贯穿政党能力始终，将政党能力构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统一战线是政党能力的综合，其本身就是政党能力，不仅是政党的本质规定，而且是政党的现实存在方式；不仅是政党锻造自身的实践方式，而且是检验群众性政党的价值尺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的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的政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显著政治优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是多维向度的，主要包括和体现在讲政治优势、群众路线优势、严明组织纪律优势、优良作风优势、自我革命优势、军政军民团结优势等方面<sup>[37]</sup>。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发挥党的政治优势，需要全面增强党的统一战线能力。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政治上的优势，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把我们党建设好”<sup>[38]</sup>，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好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2] 路琰. 政党-国家-民族: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题演进与逻辑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43-50.
- [3]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605.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3 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
- [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70.
- [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7 月 1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6.
- [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9.
- [8]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N]. 人民日报, 2022-10-01 (1).
- [9] 蒋成会, 汪守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实践价值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0 (4): 27-31.
- [10]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知, 2023 (11): 4-6.
- [11] 陆人. 意大利共产党简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3: 81.
- [12] 张明, 马天一. 葛兰西政党理论对我国党的建设的启示 [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97-102.
- [13] 卜建华. 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兼评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建设的启示 [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 (7): 66-73.

步蓬勃. 作为政党能力的统一战线: 葛兰西统一战线思想的论释与启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43-57.

- [14] 王庭霞, 步蓬勃. 论葛兰西无产阶级政党能力建设的有机构成——基于《里昂提纲》的文本解析 [J]. 大连大学学报, 2018 (4): 102-107.
- [15] 隆巴尔多-拉第斯, 卡尔朋. 葛兰西的生平 [M]. 黄荫兴, 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18.
- [16] 葛兰西文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105.
- [17]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98.
- [18]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 [M]. 葆煦,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126.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0.
-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5.
- [21] 路璐, 李小宁.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统一战线的两种范式及其历史性变革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13.
- [22] 习近平. 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12.
- [23]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3年12月29日) [N]. 人民日报, 2023-12-30 (1).
- [24] 丁仲礼. 认识新型政党制度的时代价值 保证多党合作事业行稳致远 [J]. 人民政协报, 2019-09-19 (1).
- [25] 习近平.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J]. 中国民政, 2021 (16): 4-8.
- [26] 习近平. 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95.
- [27]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工作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85.
- [28]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研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加深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继续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J]. 党建研究, 2021 (2): 4.
- [29] 吴艳东, 吕翠萍. 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精神的基本内涵与弘扬路径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2): 47-59.
- [30] 习近平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J]. 党史文汇, 2023 (7): 1.
- [31] 福建博士风采: 第1卷 [M].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海峡书局, 2003: 2.
- [32] 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363.
- [33] 习近平. 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67.
- [34]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J]. 中国民政, 2022 (6): 4-7.
- [35]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J]. 奋斗, 2024 (4): 4-12.
- [36]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N]. 人民日报, 2014-01-01 (2).
- [37] 于安龙. 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多维向度与辩证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 38-50.
- [38] 习近平.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 [J]. 求知, 2019 (11): 6-8.

责任编辑: 龚静阳



本刊微信公众号

#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 内在逻辑、历史演变与当代意蕴

刘宗灵 严静

（电子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话语自觉。“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建构理论体系、制定中心任务、开展奋斗实践的一个言语物质和表达形式，经历了革命时期的孕育与萌芽、建设时期的创生与运用、改革时期的聚焦与激活和新时代的守正与创新四个阶段，是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观念上与时俱进的反映，是政治资源、经济要素、文化基因与话语体系交融的结果。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意志的科学认识，体现了以现代化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的话语建设格局。研究阐释好“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重大论断所蕴藏的最大政治优势、根本政治立场、中心政治主题、重大政治问题和伟大政治使命，是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5

**作者简介：**刘宗灵，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严静，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精神’的纪念、诠释及其价值意义研究”（21JHQ022）；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般项目“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的逻辑理路与机制保障研究”（SCJJ23MGC36）

**引用格式：**刘宗灵，严静.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内在逻辑、历史演变与当代意蕴[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58-68.



问、时代之间的重要内容, 对全党工作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赓续推进具有根本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中国式现代化; “最大的政治”; 话语; 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058-11

在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研判国情世情党情的基础上, 系统分析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趋势, 郑重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sup>[1]</sup>的重大论断, 这体现了百年大党高度的政治自觉、理论自觉与话语自觉。“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中心任务、重大任务、主要任务的高度话语凝练和概括, 内蕴党的政治优势、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使命。目前, 学界的相关研究尚较为单薄, 仅有的若干成果集中于分析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系统中的某一具体理论话语, 更多着眼于对“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论断的局部话语阐释, 较少对“最大的政治”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建构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本文在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 通过考察“最大的政治”话语生成的历史脉络及其在时代流转中的创新发展, 揭示“最大的政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内涵和演进特点, 并且重点阐释新时代“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话语意蕴。这项研究有助于将理论化、概念化、抽象化的政治话语表达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导原则,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理论参考。

## 一、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在逻辑

任何政治概念或话语的孕育、生成和确立都不是凭空而起的, 而是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土壤, 是在历史文化、政治实践、生产生活、社会形态等各类因素相互交织、浸染、影响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出现和广泛运用有其特定的发生环境, 具有深厚的理论根源和鲜明的价值意蕴。

### (一)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概念分析

概念明确是能够进行逻辑分析和推理的前提和基础。界定“最大的政治”, 首先要明确“何为政治”。关于“政治”概念的界定问题, 学术界众说纷纭, 其中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其一, 从汉语词源学维度分析, 中国古代“政”和“治”多分开使用, “政”主要指伦理、秩序、法令和权力, “治”主要指统治、管理或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种状态。“政治”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的一些典籍中, 如《尚书》之《周书·毕命》记载“道洽政治, 泽润生民”<sup>[2]</sup>。其二, 从西方政治学维度分析, 它侧重于从活动的视角来理解政治, 认为政治是一种国家活动, 是一种管理活动, 是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的决策性活动<sup>[3]</sup>。其三, 从马克思主义维度分析, 其一般把政治关系界定为“社会的、公共的关系”<sup>[4]</sup>, 认为政治关系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 界定“最大的政治”中的“政治”一词的内涵, 不能局限于抽象独立的社会政治现象或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 而应在社会关系中来理解和把握政治。“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

期建构理论体系、制定中心任务、开展奋斗实践的一个言语物质和表达形式，是党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中抽离出来的，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密切相关的最关键、最重要、最紧要的事物。具体来说，“最大的政治”就是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党和国家的最高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务，也是贯穿党和国家发展始终的核心议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时代性的特点。“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提出与内涵演化，“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影响相关”<sup>[5]</sup>，是社会实践发展和主要矛盾转化的结果，是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工作重心阶段性变化的结果，是党的思想认识深化和理论水平提高的结果，体现了党对自身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的深刻把握。

### （二）“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为何，有何理论依据，这也是需要阐释的基本问题。从现有资料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直接明确使用“最大的政治”这一提法，但与之相似的话语表达有“首要任务”“主要任务”“政治任务”等。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理论要素，体现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就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任务”这一话语在其书稿中属于高频词汇，有“战斗任务”“历史任务”“紧要任务”“重大的任务”“革命的任务”“当代的任务”“社会的任务”等提法。值得注意的是，“政治任务”这一话语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并未被明确提出，它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次出现于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一文。此后，列宁多次运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谈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俄国工人政党的当前政治任务”“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切实的实际的政治任务”“最迫切的政治任务”等问题。列宁对“如何确定政治任务”的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提出应“把争取当前政治要求的斗争当做首要的政治任务”<sup>[6]</sup>，“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sup>[6] 679</sup>，“根据对这一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来确定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政治任务”<sup>[7]</sup>，实现“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sup>[8]</sup>等思想。这些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和使用“政治任务”这一话语提供了重要参考，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生成和内涵演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三）“最大的政治”话语的价值逻辑

“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一种价值判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事业提供了价值指引。其一，“最大的政治”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话语。“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sup>[9]</sup>，是立党兴党强党的关键所在。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性，决定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价值导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或确定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底层逻辑。“最大的政治”话语内蕴为民情怀，其实现也必须依靠人民力量，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二，“最大的政治”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0]</sup>无论在哪一历史阶段，“最大的政治”话语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逻辑依归，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波折而屹立不倒，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核心支撑。其三，“最大的政治”是为世界谋大同的话语。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最大

的政治”话语不仅仅聚焦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也十分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最大的政治”话语坚守“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历史底蕴, 赓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文明传承, 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文化精神, 为破解人类共同挑战开拓了新思路、新方案, 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 二、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历史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 回应时代的呼唤, 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sup>[11]</sup> “最大的政治”话语是中国共产党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符号, 其内涵随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更新。在不同历史阶段,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目标、对象、范围、原则和方法等均有不同的指向和内涵, 其发展演变表征了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历史性变化对“最大的政治”话语与时俱进的要求。

###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孕育与萌芽

“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孕育与萌芽, 首先在于内在核心符号的形成, 在于党对“政治任务”的认知高度、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 “政治任务”一词最早出现于1927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此前, 党一直使用“任务”“中心任务”等与之相似的话语。此后, 党开始大量使用“政治任务”话语, 并不断对该话语进行修饰和限定, 以反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出的对党的发展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决策。1932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上海三次暴动宣传大纲”暨“红五月口号”错误的声明》中提出了反对进攻苏联、反对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等许多“最中心的政治任务”, 着重强调其彻底实现, 必须以组织和扩大罢工斗争为出发点, 以无产阶级的领导为根本保证<sup>[12]</sup>。1940年, 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团结自己, 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 团结知识分子, 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sup>[13]</sup>, 这不仅是“极大的政治任务”, 也是组织任务。1941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则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中, 对“最高的政治任务”与“具体的宣传任务”进行了区分, 认为关于敌人的宣传方针, 要充分考虑敌人士兵的觉悟程度, “不要提出过高的口号”<sup>[14]</sup>, 宣传要具体化、通俗化、接地气。1947年, 中共中央高度认同《中原局关于进入大别山后地方工作的指示》,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为“把消灭土顽, 看成最严重的政治任务”<sup>[15]</sup>。由此可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任务”的话语表达具有多维性, “最中心的政治任务”“极大的政治任务”“最高的政治任务”“最严重的政治任务”等话语的接连使用, 既体现了革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和阶段任务, 也彰显了党在这一时期对“政治任务”的系列认识具有思想与行动上的自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任务”话语的科学认知和规范使用, 以及多层次、多层面、多层次的诠释, 表明党把“政治任务”与中国国情、具体实践、发展要求相结合的酝酿与孕育, 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生成。一方面, “政治任务”以话语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充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 另一方面, “政治任务”系列话语的多元化诠释, 也充实了党的政治话语体系, 对“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提出具有引领意义。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创生与运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发展生产和恢复经济，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三大运动”，推进“一化三改”的实施，成功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时期，党更加频繁地使用“政治任务”话语，且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不止于政治、宣传和军事领域，也常见于经济、教育、文化领域。这类表述有“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sup>[16]</sup>，“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sup>[17]</sup>，“大量培养与提拔工农干部，和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sup>[18]</sup>，“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全国普遍的长期的经常的政治任务”<sup>[19]</sup>，“全力保证实现钢产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sup>[20]</sup>等。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党中央首次提出了“最大的政治”话语，指出“如果脱离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脱离了当前最大的政治”<sup>[21]</sup>。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基于国内形势的评估和判断，和由于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要求突破体制的束缚而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而谋划的战略任务，也是20世纪60年代影响比较深远的重要事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了错误。“最大的政治”话语与当时在《后十条》指导和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紧密衔接与意蕴趋同，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埋下了伏笔。正如薄一波所概括的“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sup>[22]</sup>。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提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初衷是好的，但由于复杂历史因素而未能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未能全面遵循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由此进入沉寂期。相比较而言，“最大的政治”与“政治任务”的系列话语，有一定关系但也有所不同。“最大的政治”是“政治任务”系列话语的衍生物，是从“政治任务”系列话语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摆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更为重要、更为紧迫、更为严肃的话语主张，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历史性影响。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聚焦与激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急需跟上世界潮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全面推动民族复兴，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由此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最大的政治”话语在新时期获得了重新启用，有了新的思想内涵。1979、1980年，邓小平多次使用“最大的政治”提法，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实现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意义转向和聚焦激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sup>[23]</sup>，“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sup>[23] 194</sup>，“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sup>[23] 234</sup>，“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政治路线是“当前最大的政治”<sup>[23] 248-249</sup>等重要论述的提出，表明“最大的政治”话语具有新的特质和时代意蕴。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最大的政治”是将生产力发展置于首要位置的话语。二是坚持群众路线，“最大的政治”话语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三是现代化作为贯穿“最大的政治”系列话语的一条红线，是重要路径，是核心目标，也是根本指向。江泽民坚持、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最大的政治”的相关重要思想，从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一视角切入，认为“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实现中

国的现代化, 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sup>[9] 514</sup>。这体现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认识的深化, 对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位、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关键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确保了改革开放在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中不迷失、不偏航、不走样。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实现了基础意义上的概念重构, 是重新界定话语的内涵、逻辑和价值取向, 重新建构话语符号的所指和所能的重要成果, 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面貌和格局的焕然一新。该时期“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显著特征在于将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置于首要位置, 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反映了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现状和趋势走向的精准判断, 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 为“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内涵深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蓝本。

####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最大政治”话语的守正与创新

进入新时代,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 提出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sup>[24]</sup>、“民心是最大的政治”<sup>[25]</sup>、“民生是最大的政治”<sup>[26]</sup>等具体论述, 并明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sup>[1]</sup>的重大论断, 推动了“最大的政治”话语内涵的守正创新。一是坚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促进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一文中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 是最大的政治”, 统战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sup>[27]</sup>。这一论述将“最大的政治”与“人心”“统战工作”二者联系起来, 既强调了将“人心”界定为“最大的政治”的极端重要性, 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 也明确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路径和方法, 即做好统战工作。二是围绕“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sup>[28]</sup>; 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 就要得罪 14 亿人民”<sup>[29]</sup>。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曾对此进行深入阐释, 鲜明而直接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最大的政治”<sup>[30]</sup>。这些论述彰显了党的人民立场和人民至上的重要理念,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成为党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中心考量要素和基本原则。三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视和解决民生问题是凝聚党心民心的基础, 只有在发展民生中赢得民心、在凝聚民心中改善民生, 才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巩固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 “最大的政治”话语更加关注“人民群众”这一整体概念, 注重将民本思想融入话语内涵, 在价值表达、政治表达和大众表达三个层面实现了话语表达方式的多元拓展和创新, 并发展为激发全党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柱。

任何一个话语符号的生成、形塑和发展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价值指向。“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建构和意涵演化过程, 直观呈现了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变化, 引领和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各个概念、范畴、词汇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充分展现大党大国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的话语表达系统。这个系统及其内蕴的话语要素并非脱离现实空间而主观猜想、测度、臆造的抽象总结, 而是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状况在观念上与时俱进的反映, 是政治资源、经济要素、文化基因与话语体系交融的结果。

### 三、新时代“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话语意蕴

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是对“最大的政治”话语意义的本质回归。从“中国的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符号转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以及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意志的科学认识。研究阐释好“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是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要内容，对全党工作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赓续推进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指导意义。

#### （一）最大政治优势：深刻理解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和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sup>[24]</sup><sup>22</sup>；如果动摇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中国就要倒退分裂和混乱，就不能实现现代化”<sup>[23]</sup><sup>267-268</sup>。其一，“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sup>[31]</sup>，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和根本性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既指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开创、坚持、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又体现在“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上，这是区别于其他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标识。其二，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和发展内涵。一方面，基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立国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依循“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国家建构-现代化”的独特发展路径<sup>[32]</sup>；另一方面，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纲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内涵作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在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动的有机结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sup>[33]</sup>。其三，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和取得历史性成就。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各项战略策略的有效实施和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 （二）根本政治立场：深切认知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是推动历史进步、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既属于社会范畴，也属于政治范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政治立场、基本原则和重要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sup>[34]</sup>。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过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也是提升人口素质、增进民生福祉的过程，必须一个人也不能少、一个家庭也不能掉队、一个民族也不能落后，实现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其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党坚持人民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

者和享有者。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既需要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 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把“蛋糕”做大, 也需要把“蛋糕”分好, 使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注重发展的普惠性和分配的公平性,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最后,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实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全方位、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要, 反映了人民群众不但要求更好的物质生活, 也期待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也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准确把握、妥善处理人民群众不同层次和类型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推动“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 (三) 中心政治主题: 深入领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

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全面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对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美好现实至关重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sup>[35]</sup>,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只有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全面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才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顺利推进。按照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新形势下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创新科技资源,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代表了一种新型、高质生产力的跃升, 是破解经济转型转轨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sup>[36]</sup>。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的经济和社会工程, 既需要坚持以智能数字为介质, 用好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虚拟现实等新型生产工具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又需要释放人才活力, 打造一支善于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创新能力强的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 还需要加强制度创新, 着力打通在体制机制方面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一方面, 要全面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发挥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推动要素资源自主有序流动; 另一方面, 要全面促进国际大循环, 优化对外开放, 在实现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扩大出口供给、发展服务贸易、加大对外投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作出更大努力。三是坚持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发展和安全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 不可偏废。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 需要一以贯之地坚持和贯彻下去。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总基调, 在不断创新、开拓进取的同时, 时刻保持清醒和谨慎态度, 以极富前瞻性和预见性的战略能力统筹应对国家安全风险中深层次、多维度、复杂化的结构性风险, 保证中国式现代化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 (四) 重大政治问题: 深度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sup>[37]</sup>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保护生态环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特征和生态导向。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有助于加强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第一,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点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sup>[37] 225</sup>, 具有统一性。树立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这一思想成

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政治意识，构建以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目标责任、制度保障、生态安全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体系，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第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互促、共生关系，高度契合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积极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赓续坚持和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力支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公益性的宏大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强化生态环保的政治保障力，加强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压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严惩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从而实现青山常在、清水长流、空气常新。总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自然界作为有机的系统整体的精准认识，赓续与拓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真实图景的系统辩证思想，形成和确立了丰富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sup>[38]</sup>。

#### （五）伟大政治使命：深透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更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理念，立足于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精神格局，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天然地包含追求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因子。从理论逻辑看，它继承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汲取中国传统“和”文化的精髓，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sup>[39]</sup>。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发展潮流和国家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实现经济的历史飞跃“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sup>[40]</sup>，始终一贯坚持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推进、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都是中国坚持与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有力实践证明。其二，中国式现代化肩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政治使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立场，开启了一条建构性的、和平的、开放的、渐进的政治发展道路<sup>[41]</sup>。中国式现代化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对外殖民掠夺、对内残酷剥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超越，开辟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启示。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营造了良好环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间正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妥善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和风险挑战，有效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困局难



题, 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 四、结语

“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符号, 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的话语凝练与形象表达。“最大的政治”这一多义性话语的内涵演进过程,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 体现了以现代化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的话语建设格局。民生、党建、统战、生态环保等领域衍生的一系列服务于这一话语格局的具体政治话语, 不断增添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新议题和新表述, 使“最大的政治”话语逐渐规范和成熟。中国共产党对“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历时阐释, 表明“最大的政治”是紧密联系国家发展实际、顺应时代要求的话语, 是党在不同形势下的一种理论探索和现实追求, 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生动诠释。“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广泛使用,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奋斗轨迹和工作重心, 勾勒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的多元历史面相, 是政治认同、价值认同和话语认同的具体体现。科学把握“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 需要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角度体会其多维性和全面性, 把握其中蕴含的原则和方法论要求,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指导。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2] 冀昀. 尚书 [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250.
- [3] 戴维·伊斯顿. 政治体系: 政治学状况研究 [M]. 马清槐,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120-14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173.
- [5] 杨彬彬, 马玉婕.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演进、特点与价值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6): 65-73+158.
- [6] 列宁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89.
- [7] 列宁选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38.
- [8] 列宁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01.
- [9] 江泽民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48.
- [1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3.
- [1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6年5月17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14.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9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54.
- [13]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27.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18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71.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24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34.

- [16] 刘少奇选集：下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2.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 3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32.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 4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84.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 6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287.
- [20] 社论. 立即行动起来，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 [N] . 人民日报，1958-09-01（1）.
-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49—1965）：第 19 册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85.
- [22]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171-1172.
- [2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3.
- [2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10 月 16 日）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 [2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15.
- [26]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打好“三大攻坚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N] . 人民日报，2018-04-29（1）.
- [2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56.
- [28]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84.
-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 [G] .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07.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G]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43.
- [31]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J] . 求是，2023（11）：4-7.
- [32] 胡柳娟. 坚持党的领导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J] . 理论视野，2023（9）：77-82.
- [33] 刘舒杨，王浦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J] .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8.
- [3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编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4.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
- [36] 蒲清平，黄媛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与时代价值 [J] .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11.
- [37]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8.
- [38] 李勇强.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及其方法论 [J] .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16.
- [39] 李包庚，王祯.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出场逻辑与时代价值 [J] .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29-35+197.
- [4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1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570.
- [41] 罗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命题 [J] . 理论探索，2018（2）：39-44.

责任编辑：林华山



#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魏崇辉<sup>1</sup> 王悦<sup>2</sup>

(1.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40;

2.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237)

**摘要：**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是成长、成熟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既往研究主要分为三种：基于党和国家阶段性任务的“最大的政治”研究、以“最大的政治”为线索的相关命题研究、统一战线的“最大的政治”功能研究。以“最大的政治”概念为方法，以“基本命题→全面展开→统战呈现”为思路深入研究党的工作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命题分别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最大的政治”概念与命题借助于“最大+”系列概念得以表现。“最大的政治”概念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基本遵循，即“最大的政治”聚焦“最大的梦想”，寻找“最大公约数”，依靠“最大底气”，旨在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优势”概念构成“最大+”系列概念的中轴，是“最大的政治”的根本保障。“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的论述，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贯穿于统战工作中的基本命题，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绳，以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检验依据。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6

**作者简介：**魏崇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悦，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课题（A类）重点项目（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课题基金项目）“‘中国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新时代新形态研究”（23JDTC A058）

**引用格式：**魏崇辉，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69-81.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政治”；标识性概念；基本命题；全面展开；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069-13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sup>[1]</sup>。在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sup>[2]</sup>。这些重要论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中要求的综合研判，在深刻洞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确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反复强调，这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同时要求我们从学理上阐明“最大的政治”概念在表述党和国家工作任务中的话语逻辑。“最大的政治”是新时代党的工作的标识性概念，成长、成熟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对相关标识性概念的澄清、对逻辑理路的辨识”<sup>[3]</sup>，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式与方法。为此，本文拟对“最大的政治”的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进行系统考察。

##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系统梳理“最大的政治”的学术研究进路是研究“最大的政治”这一概念嬗变逻辑的前提。“学术阐发是对政治建构的呈现，政治建构为学术阐发提供空间。”<sup>[4]</sup>关于“最大的政治”的学术阐发始于对邓小平“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积极响应。目前收录于中国知网关于“最大的政治”<sup>①</sup>的较早文献是赵履宽 1979 年发表于《教学与研究》上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一点体会》<sup>[5]</sup>一文，该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政治意蕴。随后“最大的政治”相关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新时代以来出现了研究热潮。

### （一）学界关于“最大的政治”研究现状

学界对“最大的政治”的研究历时较长，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关涉的议题较为宽泛，主要聚焦于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类对展现阶段性特征的“最大的政治”开展内涵解读。这一类型的相关研究主要以邓小平“最大的政治”论断为对象。一种思路是就邓小平“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论断进行具体分析，将“最大的政治”视为“四个现代化”的修饰词，重点论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表明“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政治意义”<sup>[6]</sup>。另一种思路是通过分析邓小平“最大的政治”思想，得出“政治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在不同时期被赋予极不相同的内涵”<sup>[7]</sup>的基本结论，落脚于“最大的政治”在不同时期会表现为不同的内容或在同一时期展现为多种样态。基于此，学界进行了全面贯彻

---

①“最大的政治”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学术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研究中，“最大的政治”在很多时候简洁地表述为“最大政治”。为了概念聚焦，本文将它们作为同一概念，统称为“最大的政治”。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69-81.

党的基本路线<sup>[8]</sup>、青年农民<sup>[9]</sup>、市场经济建设<sup>[10]</sup>、民生问题<sup>[11]</sup>等是“最大的政治”的相关研究。

第二类对“最大的政治”引出的相关命题展开研究。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最大的政治”重要论述出发,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等命题展开。

一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学界主要围绕“民心”何以成为“最大的政治”展开研究, 落脚于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这一价值观念的运用和落实<sup>[12]</sup>, 认为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实践遵循”<sup>[13]</sup>。同时, 这一命题不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群众观<sup>[14]</sup>, 也实现了新时代党的政治观、人民观、权力观、民主观的统一<sup>[15]</sup>, 更蕴含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与信心之源<sup>[16]</sup>, 强调“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sup>[17]</sup>。

二是“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命题。学界的讨论重心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及其路径上, 指出“民生改善没有终点”<sup>[18]</sup>, 要“科学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四个坚持’要义”<sup>[19]</sup>。

三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学界的研究聚焦于“大统战”领域。这一研究进路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战工作“人心力量论”的逻辑<sup>[20]</sup>, 指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 必须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作用<sup>[21]</sup>, “做好凝聚人心这篇最大的政治文章”<sup>[22]</sup>, 努力形成大团结大联合的生动局面。

四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命题。学界将“最大的政治”视为一种从政治上看待问题的要求, 认为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sup>[23]</sup>, 把握“改革、开放、创新”<sup>[24]</sup>这“三大法宝”, “以‘最大的政治’的清醒和坚定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笃定前行”<sup>[25]</sup>。

第三类围绕“最大的政治”这一核心概念展开研究。该类型的兴起时间较晚, 相关研究较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进路有两种。其一, 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 将“最大的政治”视为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sup>[26]</sup>。学界通过梳理“最大的政治”这一论断自1932年以来的历史演进, 分析不同时期“最大的政治”概念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社会主要矛盾、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深度变化的反映。其二, 聚焦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学界从政治高度审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 指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最大政治”论具有增强政治认同、整合社会力量、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政治意义<sup>[27]</sup>, 即用“最大的政治”话语论述统一战线的政治功能。

概言之, 既往研究主要分为三种: 基于党和国家阶段性任务的“最大的政治”研究、以“最大的政治”为线索的相关命题研究、统一战线的“最大的政治”功能研究。既有相关研究切中了“最大的政治”相关论断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概念是命题的基础, 但以“最大的政治”标识性概念为方法研究新时代党的工作仍有较大空间。

## (二) 以“最大的政治”为方法研究新时代党的工作

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sup>[28]</sup>是进行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尝试。“最大的政治”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创造与演替透显着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与发展。“最大的政治”这一标识性概念为研究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新视角,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使用边界, 强化使用的准确性, 规避用而不知或使用泛化的情形。

第一，“最大的政治”话语体系蕴含内在逻辑。概念是命题的基础，命题是概念的表达。我们需要辨明展示“最大的政治”概念的命题及其背后的逻辑。“最大的政治”在新时代的使用是以命题形式出现的，主要有“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等表述。本文尝试从统领、立场、目的三重维度解读“最大的政治”。

“最大的政治”概念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等论断的基础概念。“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命题是“最大的政治”概念的具体表达。“最大的政治”概念与命题借助于“最大+”系列概念得以表现。下文将运用“标识性概念→基本命题→系列概念→集中呈现”逻辑探索新时代党的工作的新理路。其中，“党的工作”自然包括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最大的政治”充分呈现于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当前，学界对统一战线的研究不仅注重探讨底层逻辑<sup>[29]</sup>、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sup>[30]</sup>，还更加系统地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了本质论、战略论、策略论、重点论、方法论和国际统一战线论<sup>[31]</sup>的深挖，分析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性质、功能、价值、方针和制度<sup>[32]</sup>的定位，阐发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理念、任务、路径创新<sup>[33]</sup>的发展。学界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已经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sup>[34]</sup>。

但是，对标识性概念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拓展。根据已发布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概念首次使用是在 2014 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之后这一概念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论述中。我们既需要深入研究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在新时代的基本命题、全面展开，还需要探讨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集中呈现。

## 二、“最大的政治”概念的基本命题：作为标识性概念在新时代的结构布局

“最大的政治”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认为，1932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最中心的政治任务”、1940 年毛泽东表达的“极大的政治任务”和 1950 年、1956 年邓小平强调的“主要政治任务”“重要政治任务”<sup>[26]</sup>，实现了对“最大的政治”概念的初步酝酿。1978 年 9 月，邓小平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指出，社会主义“它的优越性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sup>[35]</sup>，“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sup>[35] 380</sup>。这是“最大的政治”概念的首先明确提出。此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最大的政治”的认识不断深化，邓小平接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sup>[36]</sup>，“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sup>[36] 194</sup>以及“是中国最大的政治”<sup>[36] 234</sup>，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总路线是“当前最大的政治”<sup>[36] 249</sup>等。“最大的政治”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表示一件事情、一项工作或一个任务的全局性、重要性和长期性。结构上，“最大的政治”的分布极为广泛。学理上，不可或缺的考察维度是其对党的工作统领、立场、目标的彰显。“最大的政治”在新时代的使用是以命题形式出现的。

### （一）“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的历史，“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37]</sup>。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38]</sup>。“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统领。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最大的政治”概念的用法。

首先, 创造性提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命题。2023年12月, 党中央系统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sup>[1]</sup>,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由蓝图向现实的转化。

其次, 明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命题在爱国统一战线中的地位。2023年年底,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确定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新时代最大的政治”<sup>[2]</sup>。“最大的政治”反映到新时代的工作目标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契合“我们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团结凝聚力量, 以奋斗铸就伟业”<sup>[2]</sup>的要求, 明确强调“最大的政治”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目标。

最后, 擘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支撑要件。比如, 202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他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 政法战线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以政法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sup>[39]</sup>。

## (二)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立场

如上文所指, 基于已发布的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可见,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出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考量, 首次使用了“最大的政治”概念。

首先,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最初指向做好人的工作, 维护民族团结。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开始使用“最大的政治”概念时, 就强调“将心比心、以心换心”<sup>[40]</sup>。同年年底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爱国统一战线再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一命题, 要求“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sup>[41]</sup>。“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指向筑牢民族团结的人心防线。

其次,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要求做好人的工作, 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2018年5月,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中, 站在“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 再次使用“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sup>[42]</sup>, 为建设美丽中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通过突出生态环境在“人心”这一“最大的政治”中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做好党的工作。

最后,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成为党和国家部署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话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 都使用了“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 用“最大的政治”这一标识性概念要求党必须与人民心连心。2022年10月16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章节明确“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内容, 以“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指明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38]</sup>, 发挥着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的政治功能。

### （三）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到“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目标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具象化，“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内含着“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的要义。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到“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的话语演变，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目标。

首先，“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的出场是为巩固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2016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使用“最大的政治”这一概念，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sup>[43]</sup>命题。“最大的政治”不仅强调打牢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这一落脚点，更强调观察社情民意这一着力点。

其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进一步具象化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实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关键在于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提出，“民生是最大的政治”<sup>[44]</sup>。这一重要论述将“民心”的关注点具体落实到“民生”上。

再次，“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要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2018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sup>[45]</sup>，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凝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共识。2019 年 7 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sup>[46]</sup>该命题的再次使用更加突出了初心、使命的意义。

最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命题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本质要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经常性出现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之中，其内涵随着实践发展逐渐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始终贯穿其中。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必须“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sup>[47]</sup>。《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并将其具体解释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sup>[48]</sup>。

## 三、“最大的政治”概念的全面展开：“最大+”系列概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标识性概念及其基本命题需要系列概念全面展开。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提出一系列根植于党的工作的政治话语与政治概念，“最大+”是常用的一种构建党的标识性概念的形式。与“最大的政治”相关的“最大+”概念主要包括：“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最大共识”“最大的梦想”“最大底气”“最大依靠”“最大优势”等标识性概念。为了更好地凝练出聚焦新时代党的工作的“最大的政治”这一概念的主要意涵和内在指向，本文尝试从“最大+”系列概念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四个概念，即“最大的梦想”“最大公约数”“最大底气”“最大优势”。其中，前三项概念大致对应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最大的政治”所阐述的三个命题，分别具体描述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最大优势”概念构成“最大的梦想”“最大公约数”“最大底气”系列概念的中轴，是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的根本保障。

### （一）实现“最大的梦想”以彰显“最大的政治”的统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国家亦有自己的梦。2014 年 3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五



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49]</sup> 习近平总书记用“最大的梦想”概念概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容。

“最大的梦想”最初表达为“最伟大的梦想”, 即“中国梦”。2012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sup>[50]</sup>, 就是“中国梦”。这意味着实现中国梦就是“最大的梦想”概念的基本内容。“最大的梦想”既包含每个中国人的个人梦想, 又包含中国各个民族的梦想; 既有复兴中华民族历史地位的雄心, 又有屹立于现代民族之林的壮志。

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命运、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以中国道路实现自己的梦想。新时代, 中国人民“最大的梦想”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必须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以实现“最大的梦想”。具体而言, 第一, 走中国道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增强“四个自信”,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二, 弘扬中国精神要求各民族“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sup>[51]</sup>; 第三, 凝聚中国力量就是凝聚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强调以“中国梦”将14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来; 另一方面, 指出“要不断巩固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sup>[52]</sup>。实现“最大的梦想”, 需要使世界范围的中华儿女聚合起推动民族复兴的人民力量。当前, “‘中国梦’即中国人的现代化之梦”<sup>[53]</sup>, 实现“最大的梦想”需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 (二) 找到“最大公约数”以践行“最大的政治”的立场

“最大的梦想”要起到凝聚人、动员人的作用, 必须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是人民民主的真谛”<sup>[54]</sup>,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强调了“最大公约数”的概念。对于如何找到这一“最大公约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协商, 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广泛接受批评和监督”<sup>[54]</sup>, 形成最大共识。

首先, “最大公约数”立足国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巩固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政治底线, 要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 “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sup>[55]</sup>。这表明, 党和国家对“最大公约数”的认识主要是从巩固党的领导、巩固爱国统一战线的角度出发的, 其工作主线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巩固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 “最大公约数”面向国际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6年8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必须“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sup>[56]</sup>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造福中国人民和沿线各国人民。“最大公约数”概念从立足国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向外拓展, 面向国际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 “最大公约数”融贯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实践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38]</sup>作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之一。寻找“最大公约数”是争取“人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的方法, 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主线。我们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 就是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轴、把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作为尺度, “努力寻求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sup>[57]</sup>, 并在国际上“形成共建美

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sup>[58]</sup>的过程。

### （三）夯实“最大底气”以达成“最大的政治”的目标

习近平主席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提到：“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sup>[59]</sup>“最大底气”概念表明中国所取得的奇迹，是由紧紧团结在一起的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也将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凝聚为决定国家的终极力量：人民”<sup>[60]</sup>。

一方面，“最大底气”是着眼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提出的概念。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sup>[61]</sup>，表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基，也是中国共产党兴盛之基。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要求是“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sup>[61]</sup>。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这个“最大底气”体现为“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动员、全民参与”<sup>[62]</sup>，如果离开了这个“最大底气”，“即使是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如果执政党背离了人民，也会损害现代化成果”<sup>[63]</sup>。实践中，“最大底气”要解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依据这一基本判断，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凝聚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另一方面，“最大底气”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炼的概念。毛泽东在建党初期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sup>[64]</sup>。中国共产党围绕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大团结大联合，凝结了以“最大底气”为表征的根本立场和核心价值，形成了以“最大底气”为价值的统一战线这一强大法宝。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坚信“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sup>[48]</sup>。要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我们必须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实现人民的联合与团结。

### （四）发挥“最大优势”以保障“最大的政治”的运行

“最大优势”概念构成“最大的梦想”“最大公约数”“最大底气”系列概念的中轴，是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的根本保障。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sup>[38]</sup>，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要在中国把 14 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sup>[36] 341</sup>，是不可能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锚定了“最大的梦想”，明确了中国梦是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统一体；其次，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寻找“最大公约数”，促使人们抛开个人歧见，构建政治共识；再次，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人民，需要紧紧依靠人民来回应历史的呼唤、满足现实的诉求、实现未来的向往；最后，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政治”的领导主体与实践主体。概言之，作为“最大优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大的政治”的根本保障。

## 四、统战工作中的“最大的政治”概念：基本命题与全面展开的集中呈现

统一战线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最大的政治”概念、基本命题及其全面展开在新时代统一战线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69-81.

工作中同样有集中呈现。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最大的政治”同样聚焦“最大的梦想”，寻找“最大公约数”，依靠“最大底气”。以概念为方法来看，统合“最大的梦想”“最大公约数”“最大底气”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民”，是“最广大人民”。团结最广大人民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可以说，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最大的政治”更加突出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并以画出“最大同心圆”作为检验这一命题的标尺。“最大的政治”在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集中呈现交融之间贯穿于统战工作全过程。“标识性概念→基本命题→全面展开→统战呈现”思路，是进一步深入推动党的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有益尝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月16日发表于《求是》上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现代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一文中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sup>[65]</sup>“最大的政治”框定了统一战线工作之重要性，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锚定了原则与方向。统一战线是事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最大的政治”。

### （一）“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绳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毛泽东指出：“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sup>[64] 308-309</sup>一项工作的本质要求反映了它与其他工作的根本区别所在。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明确的规定性，即“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sup>[65]</sup>。这一本质规定性直接反映在“最大的政治”概念上。

首先，“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sup>[66]</sup>昭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同“最大的政治”概念连用，使“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论述，成为标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关键命题。

其次，“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具体表现为统战工作中两对动态关系的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由人心、力量构成的关系问题，是党必须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sup>[66] 556</sup>。在统战语境中，“最大的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更加强调解决好人心向背和力量强弱问题，强调在凝聚人心和汇聚力量上共同发力。

最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落脚于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在2022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最大的政治”<sup>[65]</sup>，从统一战线工作的本质要求角度为如何解决好人心和力量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引。一方面，他强调把握坚持求同存异这个关键，发扬“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他要求党委、统战部门和有关方面各司其责，明确指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总方向。这是因为现阶段我们党历史方位、使命任务的重大变化，引发了统一战线工作开展的重大变化，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广泛、磅礴的力量支持。

### （二）画出“最大同心圆”：检验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依据

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如何尊重包容差异、充分发扬民主的问题时，提出“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sup>[66] 562</sup>。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中，以“同心圆”指称统一战线中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明

确了“同心圆”的圆心与半径，即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底线与原则，表明“同心圆”有大小之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要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一方面，画出“最大同心圆”标识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座谈，在提到“人心向背、力量对比”这个“最大的政治”时，强调指出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就是要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画出最大的同心圆”<sup>[67]</sup>。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党的十九大、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等场合的多次讲话中提及“最大的同心圆”概念，并且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sup>[68]</sup>的前提下，发挥统一战线功能要取得的重大成果。

另一方面，“最大同心圆”言说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想画出“最大同心圆”，必须对爱国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sup>[37]</sup>加以坚持。“最大同心圆”要求把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画”进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在政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sup>[48]</sup>。这是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最大同心圆”概念对我们党的成就和经验加以总结。基于这一历史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发扬‘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sup>[65]</sup>，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回应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

## 五、结语

政治的概念“应该反映政治现象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反映政治现象的某种实际形态、活动方式、制度形态或者过程内容”<sup>[69]</sup>。对“最大的政治”概念的把握，应该揭示其关涉的本质。根据上文对“最大的政治”的概念考察，我们可以厘清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话语的独特内涵。

首先，“最大的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具有“事关重大”“关键一招”“国之大事”“根本性的大问题”的深刻意蕴。综观我国的政治话语，“政治”一词常通过与其他概念的组合而生成新的用法，如“讲政治”“从政治上看问题”“政治性”“政治信号”“政治任务”等，均是为了强调党和国家某项特定任务的迫切性、重要性和长期性。

其次，“最大的政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最大的政治”在新时代的使用是以命题形式出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中介作为连接逻辑起点（最大可能）和逻辑终点（最大结果）的中间枢纽，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中介、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的组织中介、以高质量发展为任务的主体中介、以国家制度体系为架构的基础中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导向的目标中介、以面临的内外环境为形势的条件中介<sup>[70]</sup>。“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分别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论述，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命题。这一系列命题明确了“最大的政治”的概念，构成了我国新时代党的工作的政策话语体系。

最后，“最大的政治”不是“唯一的政治”。政治“反映了社会经济生活中各个集团、各个阶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69-81.

级的根本利益和利害冲突”<sup>[71]</sup>。“最大的政治”概念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项工作的基本遵循, 即“最大的政治”聚焦“最大的梦想”, 寻找“最大公约数”, 依靠“最大底气”, 旨在画出“最大同心圆”。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2]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3年12月29日) [N]. 人民日报, 2023-12-30 (2).
- [3]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23-34.
- [4] 魏崇辉, 王悦.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65-78.
- [5] 赵履宽.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新时期最大的政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一点体会 [J]. 教学与研究, 1979 (2): 50-52.
- [6] 阎治才. 对“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解读 [J]. 政治学研究, 2008 (5): 38-43.
- [7] 匡和平. 论邓小平当前最大的政治的思想 [J]. 教学与研究, 2001 (1): 52-56.
- [8] 陈登才. 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是最大的政治 [J]. 瞭望新闻周刊, 1996 (18): 2.
- [9] 党国英. 青年农民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 [J]. 中国国情国力, 2001 (5): 4-6.
- [10] 陈红太. 市场经济建设仍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1 (4): 36-39.
- [11] 吕青. 建党九十年的经验总结: 民生问题是最大的政治 [J]. 青海社会科学, 2011 (3): 58-62.
- [12] 郭鹏. 确立“民心是最大政治”的价值观念——从县委班子着眼 [J]. 理论视野, 2017 (5): 33-35.
- [13] 贺新元, 左钰洁. 关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论断的理论思考 [J]. 新视野, 2023 (3): 13-19.
- [14] 王培洲.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内在逻辑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2): 9-15.
- [15] 胡伟.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关于民主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8 (8): 30-35+107.
- [16] 张巧当.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J]. 红旗文稿, 2016 (16): 32-33.
- [17] 仲音.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N]. 人民日报, 2022-07-14 (4).
- [18] 李斌.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N]. 人民日报, 2022-03-07 (5).
- [19] 陈怀平. 科学把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四个坚持”要义 [EB/OL] (2023-09-21) [2024-01-29]. [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9/t20230921\\_5686997.shtml](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309/t20230921_5686997.shtml).
- [20] 吉秀华. 习近平关于统战工作“人心力量论”的多重逻辑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9 (3): 3-10.
- [21] 同言. 人心和力量: 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根本——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 [J]. 求是, 2015 (13): 22-24.
- [22] 刘学军. 做好凝聚人心这篇最大的政治文章 [N]. 人民政协报, 2019-09-26 (7).
- [23] 本报评论员.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N]. 经济日报, 2023-12-19 (1).
- [24] 郑永年. 准确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N]. 中国经济时报, 2024-01-22 (1).
- [25] 本报评论部. 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N]. 人民日报, 2023-12-27 (5).

- [26] 杨彬彬, 马玉婕.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演进、特点与价值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6): 65-73+158.
- [27] 李俊. 新时代统一战线“最大政治”功能的思考 [J]. 科学社会主义, 2019 (5): 92-99.
- [28] 王悦. 以标识性概念为方法: 新时代中国叙事体系传播逻辑 [J]. 中国出版, 2023 (18): 53-57.
- [29] 奚洁人. 党的统一战线底层逻辑的四大理论维度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6): 125-132.
- [30] 钱再见. “人心”与“力量”: 统一战线的政治使命与治理功能——兼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着力点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5): 68-76.
- [31] 莫岳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12): 45-53.
- [32] 包心鉴. 开创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局面的根本纲领——论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19 (1): 3-11.
- [33] 冯霞, 张多. 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J]. 理论探索, 2018 (5): 69-73.
- [34] 杨卫敏. 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论纲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 (5): 3-19.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531.
- [36] 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3.
- [37]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 [N]. 人民日报, 2021-07-02 (2).
- [38]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39]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忠诚履职担当作为 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N]. 人民日报, 2024-01-15 (1).
-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53.
- [41]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31日) [N]. 人民日报, 2015-01-01 (2).
- [42]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8.
- [43] 习近平.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1月12日) [N]. 人民日报, 2016-05-03 (2).
- [44] 习近平在湖北考察时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 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发展新篇章 [N]. 人民日报, 2018-04-29 (1).
- [45] 习近平.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J]. 求是, 2019 (14): 4-9.
- [46] 杜尚泽, 张晓松.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N]. 人民日报, 2019-07-18 (1).
- [47] 习近平. 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9月17日) [N]. 人民日报, 2020-09-20 (2).
- [48]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N]. 人民日报, 2021-11-17 (1).
- [49] 习近平. 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巴黎) [N]. 人民日报, 2014-03-29 (2).
- [50] 张烁.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

魏崇辉, 王悦.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 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69-81.

- 前进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参加参观活动 [N]. 人民日报, 2012-11-30 (1).
- [51] 习近平.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3 年 3 月 17 日) [N]. 人民日报, 2013-03-18 (1).
- [52] 习近平. 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23 年 3 月 13 日) [N]. 人民日报, 2023-03-14 (2).
- [53] 程美东, 张学成. 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3 (2): 58-65.
- [5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9 月 21 日) [N]. 人民日报, 2014-09-22 (2).
- [55]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俞正声出席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05-21 (1).
- [56] 习近平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总结经验坚定信心扎实推进 让“一带一路”建设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张高丽主持 [N]. 人民日报, 2016-08-18 (1).
- [57]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6 年 12 月 30 日) [N]. 人民日报, 2016-12-31 (2).
- [58] 习近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2021 年 10 月 25 日) [N]. 人民日报, 2021-10-26 (2).
- [59]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九年新年贺词 [N]. 人民日报, 2019-01-01 (1).
- [60] 林尚立. 人民共和与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 [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 (4): 1-6.
- [61] 习近平.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J]. 求是, 2019 (13): 4-13.
- [62] 习近平. 坚持人民至上 [J]. 求是, 2022 (20): 4-8.
- [63] 习近平. 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 [J]. 求是, 2021 (9): 4-18.
- [64]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3.
- [65]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6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556.
- [67]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 致以新春的祝福 俞正声、张高丽出席 [N]. 人民日报, 2016-01-31 (1).
- [68] 习近平. 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019 年 9 月 20 日) [N]. 人民日报, 2019-09-21 (2).
- [69] 王浦劬. 政治学基础 [M]. 第 4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0.
- [70] 丁志刚, 张书华. 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38-53.
- [71] 王沪宁, 林尚立, 孙关宏. 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5.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

谭敏<sup>1</sup> 吴阳松<sup>2</sup>

(1.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62;

2.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最大的政治”凸显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揭示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多次把中心任务或重要目标界定为“最大的政治”，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目的。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是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开拓新境界、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进入新常态、“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呈现新形势作出的战略选择。在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具有统领意义。深厚的人民立场、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目标导向、强调中国特色的行动旨趣、贡献中国方案的方向指引，共同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的思想聚焦，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最新话语内涵。新时代新征程保持“最大的政治”的清醒和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多措并举：坚持政党引领，以“最大优势”助推“最大的政治”；坚持主体激活，以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凝聚广泛力量；把握关键抓手，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用好文化赋能，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内涵；做到链接内外，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7

**作者简介：**谭敏，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阳松，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全媒体时代党的话语能力建设研究”（23BDJ040）；2023—2024年度上海学校共青团工作研究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青年化’阐释研究”

**引用格式：**谭敏，吴阳松．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82-94．



谭敏, 吴阳松.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82-94.

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发展。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最大的政治; 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2024)02-0082-13

2023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sup>[1]</sup>。随后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sup>[2]</sup>把中国式现代化视作“最大的政治”,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的认识实现了新跃升, 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历史自觉和实践自觉。

从现有研究来看, 学界关于“最大的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论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匡和平认为, 邓小平把经济建设以及现代化建设视作“当前最大的政治”, 体现了其“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的思想原则<sup>[3]</sup>。阎治才认为, 邓小平关于“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 明确重申了经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sup>[4]</sup>。二是关注新时代以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论断。王培洲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论断, 既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密切联系群众, 又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所共筑的紧密共同体关系<sup>[5]</sup>。三是聚焦新时代新征程“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张占斌认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洞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前提下, 作出了“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sup>[6]</sup>。目前, 从整体上梳理“最大的政治”的演进、特点与价值的成果仍十分稀少<sup>[7]</sup>。

学界关于“最大的政治”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既有成果对该重大论断的梳理、讨论仍需深化, 对该论断内涵变化的原因剖析仍存探察空间。从成果形态上看, 有关“最大的政治”论断的研究成果多散见于报纸、网页, 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特点, 研究的专业性、系统性、整体性有待加强。鉴于此, 本文以“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为统领, 全面挖掘和梳理“最大的政治”话语的历史嬗变, 廓清“最大的政治”的理论谱系, 探讨“最大的政治”的推进路径。揭示新时代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内在逻辑, 厘清该论断的基本内涵与思想旨趣, 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理论参考意义。

## 一、“最大的政治”的论断嬗变及特征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多次把中心任务或重要目标界定为“最大的政治”, 以此达到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的目的。挖掘与梳理党中央关于“最大的政治”的论断嬗变, 廓清“最大的政治”的理论谱系并剖析其演变的基本特征, 有利于党在新时代新征程明确前进方向, 更好地引领国家走向富强、民族走向复兴。

### (一) 话语肇始: “最大的政治”的历史考据

笔者系统爬梳党的文献后发现, 中国共产党曾多次采用与“最大的政治”相似的话语表达来揭示党和国家当前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最大的政治”作为一个话语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

有不同的话语内涵与意义指向，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政纲草案》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在不断的展开农民口号，以提高平民民主革命使之进于下一阶段，同时又适应于这一阶段的总的政治的任务。”<sup>[8]</sup>这一引述表明了“总的政治的任务”的统领地位。1932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上海三次暴动宣传大纲”暨“红五月口号”错误的声明》中提及：“领导与扩大罢工，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因为只有努力完成这一工作，才能实际完成目前许多最中心的政治任务。”<sup>[9]</sup>“最中心的政治任务”凝练概括了党当时面临的重要工作，强调了亟须完成的政治任务。1940年2月，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sup>[10]</sup>“极大的政治任务”阐明了团结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佐证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具有流变的话语形式和话语内涵。“总的政治的任务”“最中心的政治任务”“极大的政治任务”，这些话语概念尽管在表述上具有差异，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凸显党和国家当前工作的重要性。“总的”“中心”“极大”等语词彰显了任务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政治”这一语词则表现了任务的严肃性和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暂未形成清晰的话语内涵与固定的话语形式，其最基本的功能在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要议题，或是强调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事件。

## （二）理论脉络：“最大的政治”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的话语内涵逐渐清晰，呈现频率逐渐上升。“最大的政治”话语内涵的创新发展体现了党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入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强调“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最大的政治”。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sup>[11]</sup>同年10月4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sup>[11] 194</sup>同年11月26日，他又在会见外宾时强调：“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sup>[11] 234</sup>在邓小平的论述中，“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目标和价值旨向具有同一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维度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国防等各个领域的现代化，而经济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四个现代化”的聚焦点就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进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论断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sup>[11] 195</sup>的思想，彰显了其将政治与经济结合在一起考察的社会主义政治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014年12月，他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sup>[12]</sup>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深化强调了这一概念。“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sup>[13]</sup>“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sup>[14]</sup>这些论述阐明了人民群众

在政治实践中的真正分量,“人心向背”决定了政党的前途命运与兴衰存亡。党的二十大以后,我国迈向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作出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对当前的经济工作提出了总要求,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总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政治”成为固定的话语表达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政治观。“最大的政治”话语内涵的创新发展从根本上体现了党在不同时期思想认识的发展变化,为党和国家的工作方向及发展目标提供了战略指南。新时代新征程,“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同步交织,发挥“最大的政治”的统领意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既契合理论创新的需要,又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 (三) 发展特征:“最大的政治”的系统集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sup>[14]</sup><sup>17</sup>梳理“最大的政治”的话语肇始和理论脉络是把握其发展特征的前提基础。

“最大的政治”的论断嬗变体现了重点论与两点论辩证统一的特征。一方面,“最大的政治”流变的话语内涵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15]</sup>邓小平紧扣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把“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作“最大的政治”。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实状况,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致力于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二十大后,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sup>[16]</sup>,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最大的政治”集中体现了党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工作方法。邓小平以经济建设推动解决政治问题,进一步辨析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起点。

“最大的政治”的论断演变彰显了价值性与目的性相统一的特征。“最大的政治”话语内涵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演变,从“经济建设”到“人心”再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些话语概念不仅指明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更蕴含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立场坚守和价值追求。“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sup>[14]</sup><sup>550</sup>,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最大的政治”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归根结底讲,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根本评价标准是人的现代化。

“最大的政治”的论断流变展现了延续性和发展性相统一的特征。从“最大的政治”内在逻辑主线来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贯穿在“最大的政治”话语演变全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经济建设这个“最大的政治”为统领,成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突出人心作为“最大的政治”的作用,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政治”。可见,“最大的政治”的内涵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发展性,不能割裂、孤立地看待这一话语概念。

## 二、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的提出理由

新的历史条件催化新的思想理论。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开拓新境界、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进入新常态、“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呈现新形势的时代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赋予“最大的政治”新内涵。

### （一）理论维度：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14]</sup><sup>18</sup> 中心任务的提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价值。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所形成的思想结晶，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统领意义。

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体现理论创新的高度和深度，是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 2023 年 2 月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sup>[17]</sup>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开拓了新境界，成为指导全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成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基本方略。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和人类亟须解决的复杂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宣告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和引领性。聚焦“最大的政治”的统领意义，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作用。

### （二）实践维度：推动中心工作的内在要求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就是当前时期的主要任务和重要目标。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sup>[1]</sup>。在前进道路上，经济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实现发挥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政治与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经济对政治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的引导和协调又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共同繁荣的关键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sup>[18]</sup>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是确保国家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首先，将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是党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探索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台阶。事实证明，只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能乘风破浪、不断前行。其次，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时代发

谭敏, 吴阳松.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82-94.

展大势。当前,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 新的发展环境、新的使命任务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新发展理念, 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科学运转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更加不确定的世界中把握主动, 努力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最后,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进入新时代, 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式现代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机制, 创新驱动、市场规模驱动和制度驱动三种动力机制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发展动力和方向指南。

### (三) 现实维度: 统筹“两个大局”的客观要求

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同步交织、共同激荡的宏阔背景下, 党中央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 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澎湃动力和坚定信心。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百年前, 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sup>[13] 488</sup>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衰败凋零”之际挺身而出,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尤其是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 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还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此后, 我国开启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正逐渐变为美好现实。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客观要求。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sup>[19]</sup> 中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发展面临多重挑战、交织着多重危机: 一是世界格局与局势处于动荡变化中, 国际秩序失灵失效的问题层出不穷; 二是世界经济复苏艰难,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国与国之间的发展鸿沟不断拉大; 三是冷战思维仍然阴魂不散, 局部的冲突和动荡频发。“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sup>[20]</sup> 但是, 无论世界局势在未来如何演变, 中国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是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答案与中国方案。只有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有效破解外部环境给我国现代化事业带来的现实挑战, 才能为世界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 三、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的思想聚焦

新时代新征程, 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作“最大的政治”, 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统领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最新话语内涵——深厚的人民立场、追

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目标导向、强调中国特色的行动旨趣、贡献中国方案的方向指引，共同标注了“最大的政治”的思想旨趣。

### （一）价值定位：彰显人民立场

早在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便把人心定位为“最大的政治”，该论断的背后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追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际便将“人民”二字深嵌于党自身血脉之中，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根本立场。“话语刻写着主体的集体行动，是实践的鲜活反映。”<sup>[21]</sup>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彰显了最新话语内涵：人民立场不仅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始终，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贯彻的价值追求。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最大的政治”，坚守人民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在治国理政的探索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明确要将中国发展道路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本国人民手中，即独立自主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次，中国共产党把人民立场贯彻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各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把全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有机结合在一起，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解决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最后，人民立场为“最大的政治”提供了价值旨归。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发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统领意义，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民立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追求，只有坚持人民立场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更好地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总而言之，人民立场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前提和要求便是坚守人民立场，思人民之所思，忧人民之所忧。

### （二）目标导向：追求伟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sup>[13]</sup><sup>14</sup>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其目标追求必然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化’三个维度有机结合的现代化。”<sup>[22]</sup>以“最大的政治”的清醒和坚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基础上，推进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制度保证更加完善。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作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该重大论断从话语上肯定中国式现代化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事实上说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前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最大的政治”的目标追求在于激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活力，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 (三) 行动旨趣: 强调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sup>[14]</sup><sup>18</sup>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突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与优势。

国情规定了我国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特色。其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实现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 让 14 亿多人民整体迈入现代化。其二,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其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 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sup>[14]</sup><sup>19</sup>,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其四,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应把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其五,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sup>[23]</sup>,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中国特色, “如何定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和经验, 事关人类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未来走向”<sup>[24]</sup>。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把自身最鲜明的特色转化为最独特的优势,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规律的新认识。

### (四) 方向指引: 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特殊价值也有世界普遍意义。“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目标, 多元化的现代化路径才符合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规律。”<sup>[25]</sup>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证明了通往现代化道路是多样的, 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切自身的发展, 还积极推动世界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 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sup>[26]</sup> 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不仅要发挥国内统领作用, 还要发挥世界引领作用, 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树立世界眼光, 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 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sup>[27]</sup> 当今世界, “四大赤字”问题不断冲击全球治理秩序, 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层出不穷, 但人类相互联系、彼此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应坚持胸怀天下,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化解国内国外的风险挑战, 彰显大党大国的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 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 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 四、新时代新征程“最大的政治”的推进路径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是指导党和国家进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政治宣言书

和实践动员令。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应多措并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善用“最大优势”；要发挥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的强大合力，画出最大同心圆；要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激活最大引擎；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发展，为世界贡献中国力量。

### （一）政党引领：以“最大优势”助推“最大的政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sup>[26]</sup>党的领导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优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根底政治保证。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视作“最大的政治”，不断推进“最大的政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最大优势”助推“最大的政治”。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化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助推“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sup>[17]</sup>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铸魂塑形，在性质和方向上对“最大的政治”作出根本规定。党的根本属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双重属性和前进方向。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谋篇布局，在目标和任务上为“最大的政治”进行了系统谋划。新中国成立后，党逐步确立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阶段目标，锚定目标接续奋斗。最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在动力和保障上助力“最大的政治”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其能调配各方力量，协调各方关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合力。事实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仅是推进“最大的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最大的政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

### （二）主体激活：以群众路线与统一战线凝聚广泛力量

统一战线是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强大法宝，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曾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sup>[28]</sup>形象描绘了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必须发挥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毛泽东强调：“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sup>[29]</sup>组织群众、凝聚力量是统一战线与群众路线的关键作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凝聚的相同价值旨向，不断巩固和发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了新的胜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和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经之途。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奋斗、共享成果。纵观国内外“两个大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面临西方霸权主义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等现实挑战。这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强大优势，以群众路线扩



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群众基础, 以统一战线不断整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二者同向同行, 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不断激活推进“最大的政治”的主体力量。

### (三) 关键抓手: 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归根到底是要使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既要推动生产力的大力发展, 又要促进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为基点, 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另一方面要以共同富裕为基本原则, 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完善。

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在于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从生产力方面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sup>[30]</sup> 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跃迁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新时代新征程提出、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 有助于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新优势, 有助于积蓄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而有助于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sup>[31]</sup>。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随着科技创新的提质增速和高端产业的勃兴融合呈现的高级形态, 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必然选择和应对日趋激烈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sup>[32]</sup>。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 科技创新之于一国实现现代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中, 必须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推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从生产关系方面看,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不仅要求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更要求生产关系不断变革完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就是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 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要求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内在性超越。共同富裕不仅要做到让每个人都能享有物质发展成果, 更要做到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总而言之,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的关键环节。

### (四) 文化赋能: 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sup>[16]</sup> 不仅如此,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是中华文明的内核传承与现代表达”<sup>[33]</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无疑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反映, 标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密切勾连,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发展的愿景展现<sup>[34]</sup>。在文化层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 要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文化内涵, 促进中华文明复兴。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历史充分证明, 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崛起, 都以文化的创新和文明的进步为先导。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成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保持“最大的政治”的清醒, 坚定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离不开文化认同和文明复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文化条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认同和理解, 让中国的发展优势

转化为话语优势。从二者的内在关系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场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成果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内涵，标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特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化层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助力，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明底蕴，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融通、彼此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不断前行发展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基础。

### （五）链接内外：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世界发展

在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35]</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中国大地上内生性演化而来的现代化模式，但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现代性危机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将为世界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促进世界文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耀世而出，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为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可能。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的发展。这一重要特征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标注了独特的内涵，“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即新在它的批判性、超越性、前瞻性和生成性，新在它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动向、人的解放的新途径和人类发展的新前景”<sup>[36]</sup>。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视野局限，重塑了世界文明的格局和走向，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弱肉强食、零和博弈不再是人类文明的必经之途。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作用和意义更加凸显，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还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五、结语

“最大的政治”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原创性话语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流变的话语内涵，“也包含着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的创新与形塑”<sup>[37]</sup>。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开拓新境界、经济建设中心工作进入新常态、“两个大局”交织激荡呈现新形势的考量，明确作出“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重大论断。该重大论断的思想旨趣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的显著特征和独特优势，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有效路径。概言之，“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智慧的集中体现，有利于党在带领人民群众完成中心任务时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从世界意义来看，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有利于破解时代难题，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为世界发展、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 参考文献：

- [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谭敏, 吴阳松.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理论谱系与实践进路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82-94.

- 会议 [N]. 人民日报, 2023-12-13 (1).
- [2]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12 月 29 日) [N]. 人民日报, 2023-12-30 (2).
- [3] 匡和平. 论邓小平“当前最大的政治”的思想 [J]. 教学与研究, 2001 (1): 52-56.
- [4] 阎治才. 对“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的解读 [J]. 政治学研究, 2008 (5): 38-43.
- [5] 王培洲.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内在逻辑 [J]. 社会主义研究, 2021 (2): 9-15.
- [6] 张占斌. 坚持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24 (1): 13-18.
- [7] 杨彬彬, 马玉婕. “最大的政治”论断的演进、特点与价值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9 (6): 65-73.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3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443.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1949): 第 9 册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254.
- [10]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727.
- [11] 邓小平文选: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163.
- [12]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2014 年 12 月 31 日) [N]. 人民日报, 2015-01-01 (2).
- [13]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84.
- [14]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32.
- [1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54.
- [16]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6 月 2 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17]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N]. 人民日报, 2023-02-08 (1).
- [18] 习近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 [J]. 东南学术, 2001 (4): 26-38.
- [19]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王沪宁陪同考察 [N]. 人民日报, 2022-04-26 (1).
- [20]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2023 年 3 月 15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2.
- [21] 樊士博, 齐卫平.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时代理由与话语建构 [J]. 青海社会科学, 2023 (2): 5-12.
- [22] 郑吉峰.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现状与展望 [J]. 探索, 2023 (2): 14-27.
- [2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40.
- [24] 胡博成.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向度及方法论意蕴研究——基于“要资本, 不要资本主义”的视角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1): 27-37.
- [25] 刘燕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J]. 重庆社会科学, 2024 (1): 33-46.
- [26]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J]. 求是, 2022 (21): 4-35.
- [27]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 年 12 月 26 日)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8.

- [28]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62.
- [29]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928.
- [3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31] 张林, 蒲清平.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理论创新与价值意蕴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37-148.
- [32] 徐政, 郑霖豪, 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 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12-22.
- [33] 樊士博, 白金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52-64.
- [34] 魏崇辉. 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基本定位、方法遵循、根本依托 [J]. 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6): 23-34.
- [35]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64.
- [36] 黄建军.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0): 85-104.
- [37] 韩云波.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国社科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J]. 科技与出版, 2023 (12): 11-25.

责任编辑: 林华山



#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3088 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

李家新 刘甜甜 刘子云

(广州大学 教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3088 位大学生的调查样本, 对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及其与相关教育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发现, 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教育的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也与性别、民族、生源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就读专业和年级, 以及与不同民族的群际接触经历等因素相关, 但相对于教育经验丰富度, 教育参与投入度更可能有利于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提升。同时, 相关思政课程以及研讨会、青年交流活动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对中华民族认同也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高校需重视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资源整合与系统设计, 通过协同育人提升教育的系统性、吸引力和实效性; 重视研讨会、青年交流活动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在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强调在实践经验和切身体验中塑造认同; 重视大学生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群际接触与互动, 开发基于日常情境的生活教育和隐性课程资源。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认同; 认同教育; 教育效果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095-15

---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2.008

**作者简介:** 李家新,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刘甜甜,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子云,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文化融合视角下内地高校港澳台生国家认同教育体系构建研究”(CIA200271)

**引用格式:** 李家新, 刘甜甜, 刘子云.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3088 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95-109.

##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中华民族认同是当前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准确把握党的民族工作新的阶段性特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sup>[1]</sup>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育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6 月召开的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sup>[2]</sup>他在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也要求“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sup>[3]</sup>，为新时代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指明了方向。

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sup>[4]</sup>，与中华民族认同相关的理论研究逐渐丰富。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认同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认同意识，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集中体现于对国家、族际和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等方面的认同。作为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认同理论上应包含三个核心元素，即辨识归属要素、同一延续要素和行为期许要素<sup>[5]</sup>，它们分别对应共同体成员在认知、价值、行为层面对于共同体的指认归属、共同信仰和实践模式。同时，中华民族认同除了具有体现各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外，还涉及内部各民族、地区间的关系，即共同体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历史生活<sup>[6]</sup>，需要以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导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由“多元”走向“一体”<sup>[7]</sup>。在具体实践路径上，中华民族认同的培育需借助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sup>[8]</sup>、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sup>[9]</sup>等方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和心理归属感。

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工作中，与中华民族认同培育相关的内容主要涉及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共同体属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文化特质等<sup>[10]</sup>。不少高校重视将中华民族认同教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将上述内容引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等，尤其是强调课程体系建设在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sup>[11]</sup>。同时，由于近年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不断完善、思政育人手段不断创新，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逐渐向多样化、体系化方向发展，包括在语言、艺术等人文社科类课程中融入相关元素、开设专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和特色选修课程，结合高校及所在地的特色和资源禀赋组织参观、交流、讲座、研讨活动等<sup>[12]</sup>。相关教育活动也不仅局限于民族地区高校或少数民族学生，而是面向全体大学生的中华民族情感与认同<sup>[13]</sup>。在教育内容和形式广泛拓展的同时，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质量与效果问题正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

但是，当前的研究以描述性为主，主要通过调查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状况、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对相关教育活动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间接反映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效果，且多数聚焦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等个别群体。比如，有的调查指出，大学生在中华民族认同行为的发展上弱于认知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相关教育存在“重认知轻行为”、“活动课程地位未被完全重视”、隐性课程“去生活化”，理论性、宣教性教育内容过多，实践性、活动性教育内容较少等因素<sup>[14]</sup>。在课

程开发方面, 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一定程度上存在目标相对模糊、途径相对简单和内容稀少、制度薄弱等问题<sup>[15]</sup>。总体看来, 对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教育参与的直接关系仍有待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sup>[16]</sup>。对高校而言, 日渐多样的教育形式是否能够真正有效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以何种方式参与会有相对更好的教育效果, 亟待相关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 以为教育实践与改革提供参考。

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高等教育大省, 广东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方面开展了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自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教育合作发展, 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后, 通过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推进区域社会文化整合, 以更好地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一国家战略, 更成为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使命<sup>[17]</sup>。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校为例, 对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教育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不同于一般的知识教育, 其主要着眼于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知、情感及行为发展, 因此在效果上可能主要依赖于学生参与相关教育活动的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其中, 教育参与投入度是指学生在教育活动中投入时间精力的程度, 反映了学生教育参与的深度与主动性, 其在学生参与理论中被认为是影响教育质量的核心因素, 常被用来评价学生在学习性发展等方面的教育效果<sup>[18]</sup>。教育经验丰富度则是指高校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学习体验以丰富其教育经历的程度。相对而言, 这一指标主要反映高校在教育资源、教育支持和教育质量管理方面的投入与能力, 在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调查 (CCSS) 等高校学情调查中常被视为重要的维度与指标, 与教育质量、教育效果的关系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证实<sup>[19]</sup>。

本文主要使用最小二乘法 (OLS) 对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情况和相关教育参与投入度、教育经验丰富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一方法主要用于线性回归的参数估计, 原理是通过最小化误差的平方和寻找数据的最佳函数匹配。通过最小二乘法估计, 能够较为直观地发现各类影响因素与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能够在控制其他各类变量的情况下, 分析教育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对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影响。同时, 为解决遗漏变量和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借鉴郭冬梅等学者的思路<sup>[20]</sup>, 即社群内其他成员的平均行为作为个人行为的工具变量 (IV) 进行估计。本文将与个体同所学校、同个年级、同类专业 (同为人文社科、理工农医专业) 的同学参与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活动的频率、种类均值作为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经验丰富度的工具变量, 理由是高校开展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一般较少聚焦于单个学生。无论学生必须参与 (如必修课) 还是自愿参与 (如交流会、研讨会) 的教育活动, 多数以院系、专业、年级、宿舍等为单位进行组织, 即周边同学参与相关教育活动越频繁、多样, 个体的教育参与很可能也越频繁、多样, 这意味着工具变量与所替换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其次, 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同学参与相关教育活动的情况, 与个体自身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直接相关, 与个人及家庭背景等其他控制变量也不相关, 有可能仅通过影响个体参与相关教育活动的情况来对其中中华民族认同产生影响, 这意味着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性。

## 二、数据的描述统计

### （一）问卷、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的问卷及数据来源于一项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及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现状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大学生的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对中华民族的认知与认同情况、参与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情况等。为确保样本在民族、生源地、院校、年级等方面的合理分布，尤其是提升少数民族学生在样本中的比例，并减少测量方法所导致的共同方法变异，课题组使用分层随机抽样与目的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抽样，委托高校学生工作部门以定向发放回收的方式收集问卷，并向调查对象强调数据的重要性，承诺调查不记名且严格保密。调查问卷最终回收 3 096 份，剔除无效、信息不全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3 088 份，有效率为 99.7%。样本涵盖汉族、壮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苗族、瑶族等多个民族，生源地覆盖我国大多数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侨生）。整体而言，该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本文的因变量是大学生是中华民族认同，在参考 Phinney 的 MEIM 民族认同量表<sup>[21]</sup>、Mark Cleveland 等人的中华民族认同量表<sup>[22]</sup>，以及国内有关学者对中华民族认同核心概念及基本要素界定的基础上，编制了由 10 个题项组成的测量量表（克隆巴赫  $\alpha$  信度系数为 0.903）。测量量表中包含对中华民族内在意涵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中华民族认同所蕴含的辨识归属、同一延续和行为期许要素的认同程度，如“全国各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中华民族文化”（辨识归属）、“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会削弱少数民族文化”（同一延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所有中国公民的义务”（行为期许）等，以李克特 5 点量表计分。由于各题项的测量内容与标准不一，不宜使用简单相加或取平均值的方式计分。为反映各题项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求出一个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的因子值，并将其转化为 0~100 间的指数<sup>[23]</sup>，即中华民族认同分数（值越大表示意识越强）。转换后，样本的分数均值为 91.64，标准差为 12.21。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大学生参与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活动的投入度与经验丰富度，分别用参与相关教育活动的频率和种类进行测量，前者为标准分数，值越大代表相对而言越经常参与，即投入度越高；后者由 9 个题项组成（量表克隆巴赫  $\alpha$  信度系数为 0.750），调查学生是否参与过相关思政课程、中华文化课程、教育基地参观、青年交流等教育活动，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出的因子代表学生参与相关教育的种类，值越大表示参与种类相对越多，即丰富度越高。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性别、民族、生源类型、生源地<sup>①</sup>、入学前在内地时间<sup>②</sup>）、现阶段特征（就读学校类型、专业、年级、经济状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家庭背景（父母学历、职业）等，这些因素常被认为可能与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有关<sup>[24]</sup>。

① 生源地中的边疆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云南；内地东部地区包括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内地中西部地区是指上述地区之外的其他内地省份。

② 部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及港澳台侨学生在进入大学前可能有长期的内地学习、生活经历，如就读于“内高班”等，鉴于这一因素可能会影响其中华民族认同，故加以测量。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数/平均值	占比/标准差
因变量	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91.64	12.21
解释变量	教育参与投入度		0	1
	教育经验丰富度		0	0.78
个体信息变量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	882	28.56%
		女	2 206	71.44%
	民族	汉族	2 065	66.87%
		少数民族	1 023	33.13%
	生源类型	农村	1 736	56.22%
		城市	1 352	43.78%
	生源地	边疆地区	402	13.02%
		内地东部	2 064	66.84%
		内地中西部	268	8.68%
		我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354	11.46%
入学前在内地时间 (0-3)		2.37	1.14	
个体信息变量 (现阶段特征)	生活费 (1-10)		3.28	1.4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 (1-5)		4.26	0.73
	就读学校	高职	173	5.60%
		本科 (非侨校)	2491	80.67%
		本科 (侨校)	424	13.73%
	就读专业	人文社科	2 466	79.86%
		理工农医	622	20.14%
	就读年级	大一	1 065	34.49%
		大二	1 171	37.92%
		大三	599	19.40%
大四		185	5.99%	
硕博研究生及其他		68	2.20%	
家庭背景变量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573	18.55%
		初中	1 103	35.72%
		高中/中专/职高	772	25.00%
		大学本/专科	612	19.82%
		研究生及以上	28	0.91%
	母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951	30.80%
		初中	1 030	33.35%
		高中/中专/职高	592	19.17%
		大学本/专科	503	16.29%
		研究生及以上	12	0.39%
	父亲职业	体制外工作	2 643	85.59%
		体制内工作	445	14.41%
	母亲职业	体制外工作	2 672	86.53%
		体制内工作	416	13.47%

### 三、计量检验

#### (一) 基准回归 (OLS) 结果：教育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均与中华民族认同显著正相关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表 2)， 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变量， 教育参与投入度 (模型 1:  $\beta_1=1.603^{***}$ ；模型 2:  $\beta_1=1.321^{***}$ ；模型 5:  $\beta_1=1.090^{***}$ ) 和经验丰富度 (模型 3:  $\beta_2=1.677^{***}$ ；模型 4:  $\beta_2=1.529^{***}$ ；模型 5:  $\beta_2=1.186^{***}$ ) 都在 1% 显著性水平下与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提升大学生参与相关教育的投入度和丰富度对改善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其他变量方面， 相较于生源地为内地东部的学生、汉族学生， 来自内地中西部和边疆地区的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更强， 这可能是因为后者相对而言是现阶段相关教育工作的重点对象； 港澳台侨生则相对较弱， 其原因可能是这一群体在进入大学前的成长环境中较为缺少相关的教育体验。男生、大三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显著更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水平等也与中华民族认同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但生源类型 (城乡)、生活费、家庭背景即父母的学历与职业等因素， 在控制其他条件后多对中华民族认同没有显著影响。

表 2 基准回归 (OLS) 估计结果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1)	(2)	(3)	(4)	(5)
$X_1$ :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1.603 <sup>***</sup> (0.218)	1.321 <sup>***</sup> (0.215)			1.090 <sup>***</sup> (0.221)
$X_2$ : 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			1.677 <sup>***</sup> (0.279)	1.529 <sup>***</sup> (0.273)	1.186 <sup>***</sup> (0.281)
性别 (男性=1)		1.321 <sup>**</sup> (0.510)		1.216 <sup>**</sup> (0.512)	1.176 <sup>**</sup> (0.510)
民族 (少数民族=1)		1.030 <sup>*</sup> (0.538)		1.218 <sup>**</sup> (0.538)	1.104 <sup>**</sup> (0.537)
生源类型 (城市=1)		0.526 (0.561)		0.552 (0.561)	0.542 (0.559)
生源地 (相对于内地东部)					
内地中西部		1.841 <sup>**</sup> (0.785)		1.876 <sup>**</sup> (0.786)	1.781 <sup>**</sup> (0.783)
边疆地区		1.753 <sup>**</sup> (0.785)		2.059 <sup>***</sup> (0.782)	1.695 <sup>**</sup> (0.783)
港澳台地区/海外		-3.240 <sup>**</sup> (1.499)		-3.047 <sup>**</sup> (1.500)	-3.307 <sup>**</sup> (1.495)
入学前在内地时间		0.470 <sup>**</sup> (0.193)		0.559 <sup>***</sup> (0.193)	0.511 <sup>***</sup> (0.193)
生活费		-0.239 (0.178)		-0.279 (0.179)	-0.248 (0.17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		2.731 <sup>***</sup> (0.304)		2.850 <sup>***</sup> (0.303)	2.726 <sup>***</sup> (0.303)
就读学校 (相对于高职)					
本科 (非侨校)		-0.017 (1.045)		0.424 (1.045)	0.156 (1.043)
本科 (侨校)		-1.917		-1.447	-1.587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1)	(2)	(3)	(4)	(5)
		(1.628)		(1.632)	(1.626)
就读专业 (理工农医=1)		1.151* (0.617)		1.016 (0.618)	1.080* (0.616)
就读年级 (相对于大一)					
大二		0.103 (0.506)		0.085 (0.507)	0.138 (0.505)
大三		1.796*** (0.615)		1.721*** (0.616)	1.863*** (0.614)
大四		0.507 (0.949)		0.268 (0.948)	0.547 (0.946)
硕博研究生/其他		-0.758 (1.507)		-0.865 (1.509)	-0.789 (1.503)
父亲学历 (相对于小学及以下)					
初中		0.248 (0.626)		0.276 (0.627)	0.326 (0.624)
高中/中专/职高		0.165 (0.726)		0.157 (0.727)	0.213 (0.724)
大学本/专科		0.730 (0.919)		0.644 (0.920)	0.742 (0.917)
研究生及以上		-2.708 (2.603)		-3.244 (2.607)	-3.089 (2.598)
母亲学历 (相对于小学及以下)					
初中		-0.671 (0.558)		-0.716 (0.559)	-0.726 (0.557)
高中/中专/职高		0.056 (0.728)		-0.045 (0.729)	-0.042 (0.726)
大学本/专科		-0.882 (0.945)		-0.846 (0.945)	-0.999 (0.942)
研究生及以上		-2.098 (3.776)		-2.099 (3.780)	-1.982 (3.766)
父亲职业 (体制内工作=1)		0.610 (0.745)		0.748 (0.746)	0.681 (0.743)
母亲职业 (体制内工作=1)		0.546 (0.798)		0.446 (0.799)	0.506 (0.796)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 <sup>2</sup>	0.02***	0.09***	0.01***	0.09***	0.09***

注：\*p<0.1, \*\*p<0.05, \*\*\*p<0.01, 下同

本文使用 Hausman's single-factor test 检验共同方法变异 (CMV) 问题。结果显示：6 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超过 1，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为 19.62%，小于临界值 40%，这表明不存在严重的 CMV 问题。使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 5 个模型中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所有 VIF 均小于 3，容忍度均大于 0.1，这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 工具变量估计 (IV-2SLS) 结果：仅教育参与投入度和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为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基于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IV-2SLS) 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表 3）：在依次控制各变量的情况下，教育参与投入度与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的正相关关系均在 5%或 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回归系数大于 OLS 估计结果（模型 2： $\beta_1=4.083^{**}$ ；模型 3： $\beta_1=3.953^*$ ），这表明 OLS 估计可能因内生性问题低估了教育参与投入度的影响。而无论控制何种变量，教育经验丰富度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相关关系都变得不再显著，且回归系数小于 OLS 估计结果（模型 5： $\beta_2=1.322$ ；模型 6： $\beta_2=0.167$ ），这表明 OLS 估计可能因内生性问题高估了教育经验丰富度的影响。这意味着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可能更多与其参与相关教育活动的投入程度高低有关，而非教育资源的多寡。

表 3 工具变量（IV-2SLS）估计结果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1)	(2)	(3)	(4)	(5)	(6)
$X_1$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4.104** (1.865)	4.083** (1.861)	3.953* (2.157)			YES
$X_2$ ：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			YES	1.420 (2.848)	1.322 (2.805)	0.167 (3.381)
个体信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背景变量		YES	YES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	*	*	0.973	0.936	0.744
Cragg-Donald Wald F	48.19	48.12	37.78	32.89	33.71	24.5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65.16	65.17	50.74	40.25	41.90	31.00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2$	0.04***	0.04***	0.04***	0.08***	0.09***	0.09***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所有模型中 Cragg-Donald Wald F 和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 10%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因此可认为工具变量在 10%显著性水平下不是弱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 4）显示：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与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教育经验丰富度呈正相关，表明工具变量符合与解释变量显著相关的基本条件。

表 4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
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0.882*** (0.127)	
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0.803*** (0.138)
个体信息变量	YES	YES
家庭背景变量	YES	YES
N	3088	3088
$R^2$	0.05***	0.04***

### (三) 进一步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 1. 控制渠道变量：正（负）向群际接触与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负）相关

理论上，尽管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的教育参与不会直接影响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但其很可能会通过提升周边同学的民族交往观念和行为，改善个体所处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环境，进而对个体的中华民族认同产生影响<sup>[25]</sup>。这意味着，本文的工具变量存在通过解释变量外的其他途径来影响因变量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引起对工具变量外生性的疑虑，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通过加入潜在渠道变量的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控制，将个体的群际（与不同民族间）接触经历作为反映个体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环境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正向群际接触经历（是否有过群际交友或相互学习经历）和负向群际接触经历（是否有过感受到群际异质性的经历、是否有过被动或主动的群际冲突经历）。

估计结果显示（表 5），在 OLS 估计中，正向群际接触经历变量多在 1%或 5%显著性水平下与个体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负向群际接触经历变量则均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且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的回归系数较未控制上述变量时有所降低（模型 1： $\beta_1=0.918^{***}$ ；模型 5： $\beta_2=1.341^{***}$ ）。这表明，增进不同民族学生间的相互了解，消除彼此间的误会，弥合因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心理芥蒂，对于提升中华民族认同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 IV-2SLS 估计中，依次加入正向、负向和全部群际接触经历控制变量，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仍在 5%或 10%显著性水平下对其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回归系数较未控制上述变量时有所降低（模型 2： $\beta_1=4.041^{**}$ ；模型 3： $\beta_1=4.246^{**}$ ；模型 4： $\beta_1=4.165^*$ ）；而教育经验丰富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与前文估计结果一致。

表 5 加入群际接触经历变量后（OLS、IV-2SLS）估计结果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OLS	IV	IV	IV	OLS	IV	IV	IV
		(1)	(2)	(3)	(4)	(5)	(6)	(7)	(8)
X <sub>1</sub>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0.918 <sup>***</sup> (0.196)	4.041 <sup>**</sup> (1.896)	4.246 <sup>**</sup> (1.937)	4.165 <sup>*</sup> (2.248)				YES
X <sub>2</sub> ：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					YES	1.341 <sup>***</sup> (0.268)	0.930 (2.793)	1.792 (2.577)	1.032 (3.019)
个体信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背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群际接触经历变量 (正向)	群际交友经历 (朋友)	1.137 <sup>**</sup> (0.574)	YES		YES	0.938 (0.574)	YES		YES
	群际交友经历 (男女朋友)	2.071 <sup>***</sup> (0.566)	YES		YES	1.909 <sup>***</sup> (0.566)	YES		YES
	群际学习经历	0.601 <sup>***</sup> (0.216)	YES		YES	0.674 <sup>***</sup> (0.213)	YES		YES
群际接触经历变量 (负向)	群际异质性经历	-0.387 <sup>**</sup> (0.186)		YES	YES	-0.547 <sup>***</sup> (0.185)		YES	YES
	群际冲突性经历 (被动)	-3.140 <sup>***</sup> (0.456)		YES	YES	-3.115 <sup>***</sup> (0.455)		YES	YES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OLS	IV	IV	IV	OLS	IV	IV	IV
	(1)	(2)	(3)	(4)	(5)	(6)	(7)	(8)
群际冲突性经历（主动）	-2.692*** (0.515)		YES	YES	-2.737*** (0.515)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	*	*	*	-	0.887	0.923	0.973
Cragg-Donald Wald F	-	47.92	42.96	34.13	-	33.68	34.06	26.1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	67.66	60.48	48.32	-	41.90	41.62	31.62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 <sup>2</sup>	0.14***	0.05***	0.07***	0.08***	0.15***	0.10***	0.14***	0.15***

2. 替换因变量：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代表中华民族认同，结论仍然成立

由于中华民族具有的多元一体性质，中华民族认同不仅体现在人们对于共同体的归属意识与价值信念中，也反映在对于共同体内部族际关系与族际互动的观念上<sup>[26]</sup>。对各族群众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情感纽带<sup>[27]</sup>，也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有学者指出，通过考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情况，能较直观地反映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情况<sup>[28]</sup>。基于此，本文使用大学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作为反映中华民族认同的替代变量进行估计，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该变量由 5 个题项组成的量表进行测量，题目涉及大学生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意愿和态度，如是否愿意“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共同策划或参与活动”“和不同民族的人成为亲密朋友”“和不同民族的人结婚”等（量表克隆巴赫 α 信度系数为 0.901）。为方便比较，总分同样被转换为 0~100 之间的分数，转换后的分数均值为 86.29，标准差为 16.67。

替换因变量后估计结果显示（表 6），在 OLS 估计中，个体参与相关教育的投入度和教育经验丰富度都在 1%显著性水平上与大学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使用 IV-2SLS 估计并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仍在 5%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大学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而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再显著，与替换因变量前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 6 替换因变量后（OLS、IV-2SLS）估计结果

	因变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分数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OLS	IV	IV	IV	OLS	IV	IV	IV
	(1)	(1)	(2)	(3)	(4)	(5)	(6)	(6)
X <sub>1</sub> :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1.559*** (0.293)	6.222** (2.523)	6.241** (2.533)	6.174** (2.943)				YES
X <sub>2</sub> : 个体教育经验丰富度				YES	2.089*** (0.372)	2.564 (3.943)	2.404 (3.913)	1.219 (4.732)
个体信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背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内生性检验 P 值	-	**	**	*	-	0.889	0.929	0.910

	因变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分数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 教育参与投入度均值				IV：同校、同级、同类专业学生 教育经验丰富度均值			
	OLS	IV	IV	IV	OLS	IV	IV	IV
	(1)	(1)	(2)	(3)	(4)	(5)	(6)	(6)
Cragg-Donald Wald F	-	48.19	48.12	37.78	-	32.89	33.71	24.52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	65.16	65.17	50.74	-	40.25	41.90	31.00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 <sup>2</sup>	0.09***	0.01***	0.01***	0.02***	0.09***	0.09***	0.09***	0.10***

### 3. 更换因果推断方法：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估计，结论仍然成立

为进一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以便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进行比较。该方法通过构建一个除解释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均接近一致的参照对象来作为个体在“反事实”情况下的替代者，形成对照组与处理组进行差异比较，从而尽量消除由未观察因素导致的显性偏差和自选择内生性偏差，得出解释变量的实际影响。本文将个体参与相关教育活动投入度、经验丰富度是否高于均值作为解释变量，并使用最近距离匹配、卡尺匹配、倾向值匹配和核匹配法进行匹配（通过 Logit 模型估计倾向值得分）。结果显示（表 7），教育参与投入度仍在 1%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处理组（投入度高）较控制组（投入度低）的分数平均高 3.815~3.957 分；而教育经验丰富度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不显著，平均处理效应（ATT）也相对较小（0.743~1.041）。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协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间已无显著差异，变量选择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表明估计结果具有可信度。该结果与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近似，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 7 教育参与投入度、教育经验丰富度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处理效应（ATT）

	教育参与投入度 (Treat=投入度高)					教育经验丰富度 (Treat=丰富度高)				
	ATT	标准误	P			ATT	标准误	P		
匹配前	4.915	0.456	***			2.044	0.449	***		
最近距离匹配	3.957	0.740	***			0.770	0.724	0.287		
卡尺匹配	3.955	0.718	***			0.743	0.858	0.386		
倾向值匹配	3.955	0.675	***			0.743	0.679	0.274		
核匹配	3.815	0.491	***			1.041	0.481	**		
平衡性检验	Ps R <sup>2</sup>	LR $\chi^2$	MeanBias	MedBias	B	Ps R <sup>2</sup>	LR $\chi^2$	MeanBias	MedBias	B
匹配前	0.086	341.03***	9.0	4.8	72.6*	0.057	235.55***	8.2	5.7	57.4*
匹配后	0.010	29.76	3.5	3.0	23.8	0.004	13.76	2.4	2.5	15.1

注：标准误运用 bootstrap 反复抽样 50 次得到

### （四）机制分析：思政课程和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更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认同

本文通过加入渠道变量的方式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结果显示（表 8），在

剔除教育经验丰富度变量的情况下，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回归系数在依次加入教育类型渠道变量后均有所降低。各渠道变量中，相关思想政治课程的回归系数（模型 2： $\gamma=4.523^{***}$ ）远大于其他教育活动，这表明思政类课程在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时事政策课程（模型 3： $\gamma=1.401^{***}$ ）、中国历史课程（模型 5： $\gamma=0.957^{**}$ ）对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也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参与研讨会（模型 8： $\gamma=1.936^{***}$ ）、青年交流活动（模型 9： $\gamma=1.555^{***}$ ）、主题班会（模型 7： $\gamma=1.371^{***}$ ）等实践性、互动性教育类型对因变量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回归系数几乎仅低于思想政治课程；而中华文化课程（模型 4： $\gamma=0.594$ ）、参观活动（模型 6： $\gamma=0.711$ ）对因变量的影响则较小且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相对于宣讲、参观等被动接受式的教育类型，研讨、交流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提升而言可能扮演着更为积极的角色。

表 8 机制分析

		因变量：中华民族认同分数								
		(1)	(2)	(3)	(4)	(5)	(6)	(7)	(8)	(9)
$X_1$ ：个体教育参与投入度		1.321 <sup>***</sup> (0.215)	1.093 <sup>***</sup> (0.216)	1.193 <sup>***</sup> (0.219)	1.263 <sup>***</sup> (0.219)	1.227 <sup>***</sup> (0.219)	1.267 <sup>***</sup> (0.218)	1.176 <sup>***</sup> (0.220)	1.202 <sup>***</sup> (0.217)	1.189 <sup>***</sup> (0.218)
个体信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家庭背景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渠道变量	相关思政课程 (=1)		4.523 <sup>***</sup> (0.642)							
	时事政策课程 (=1)			1.401 <sup>***</sup> (0.454)						
	中华文化课程 (=1)				0.594 (0.441)					
	中国历史课程 (=1)					0.957 <sup>**</sup> (0.438)				
	参观活动 (=1)						0.711 (0.460)			
	主题班会 (=1)							1.371 <sup>***</sup> (0.449)		
	研讨会 (=1)								1.936 <sup>***</sup> (0.486)	
	青年交流活动 (=1)									1.555 <sup>***</sup> (0.451)
N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3088
R <sup>2</sup>		0.09 <sup>***</sup>	0.10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0.09 <sup>***</sup>



##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1. 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与相关教育的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呈显著正相关, 也与性别、民族、生源地、入学前在内地的时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就读专业和年级, 以及与不同民族的群际接触经历等因素相关。大学生参与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在 OLS 估计中均与其中中华民族认同呈显著正相关, 这意味着改善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参与投入度和经验丰富度, 对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均具有积极意义。此外, 性别、民族、生源地、入学前在内地时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就读专业和年级, 以及与不同民族的群际接触经历可能与中华民族认同有一定关系, 但生源类型(城乡)、家庭背景(父母学历与职业)及经济状况等因素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关系未得到验证。

2. 相对于教育经验丰富度, 教育参与投入度可能有利于提升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在使用 IV-2SLS 估计控制内生性问题后, 教育参与投入度与中华民族认同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显著, 但教育经验丰富度对后者不再具有显著影响。控制重要渠道变量(群际接触经历)、使用间接指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作为替代因变量、更换因果推断方法(PSM)进行估计, 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这意味着相对于教育经验丰富度, 高校应更加重视大学生参与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投入度, 其可能更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

3. 思政课程和研讨会、青年交流活动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对大学生中华民族认同具有较大的正向影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 相关思想政治课程影响中华民族认同的回归系数最大。参与研讨会、青年交流活动、主题班会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对因变量也具有较大且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参观类教育类型对因变量的影响则较小且不显著。这意味着高校既应重视与中华民族认同相关的思想政治课程建设, 也需要高度关注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在提升学生中华民族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

### (二) 政策建议

1. 重视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的资源整合与系统设计, 通过协同育人提升教育的系统性、吸引力和实效性。随着高校对学生中华民族认同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升, 相关的教育内容、手段日渐丰富, 同时出现了教育资源和育人功能的分散化、割裂化、碎片化问题, 影响预期效果的实现<sup>[29]</sup>。高校不仅需要关注相关教育资源的开发与教育手段的拓展, 更应强调系统规划、顶层设计和协同育人工作机制的建立, 通过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教与育的良性互动, 提升教育活动的吸引力, 使学生更积极、更主动地参与其中, 获得更具系统性与实效性的教育体验。

2. 重视研讨会、青年交流活动等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在高校中华民族认同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强调在实践经验和切身体验中塑造认同。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强调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均衡发展, 相关教育活动不仅应重视知识性、宣教性的理论课程, 同样应关注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通过实践经验和切身体验, 学生往往更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也更容易在情感、文化和行为层面体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意涵。高校需要在坚持思政课程和学科课程育人的同时, 强化实践性、互动性活动课程在相关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 吸引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投入。

3. 重视大学生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群际接触与互动, 开发基于日常情境的生活教育和隐性课程资

源。中华民族认同不仅体现在对共同体的归属意识，也反映在对共同体内部群际关系的态度上。增进不同民族、群体间的沟通与相互了解，弥合因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造成的心理芥蒂，对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应在关注学生群际接触实际状况的基础上，开发基于日常情境的生活教育和隐性课程资源。比如，构建嵌入式的居住与生活格局，使学生体验多民族的生活场景，在生活体验中学习如何善待他者<sup>[30]</sup>；将中华民族认同的培育渗透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提升学生参与相关教育的投入度。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3-10-29 (1).
-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3年6月2日) [J]. 求是, 2023 (17): 4-11.
- [3]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蔡奇出席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1).
- [4] 徐菲.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哲学基础与实践路向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11): 12-25.
- [5] 青觉, 徐欣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 [J]. 民族研究, 2018 (6): 1-14+123.
- [6] 纳日碧力戈, 凯沙尔·夏木西. 试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交互性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 33-37.
- [7] 何玉芳, 张晓.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坐标、场域与进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81-92.
- [8] 樊士博, 白金艳.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与话语构建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1): 52-64.
- [9] 刘子云, 潘贝.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研究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与本土建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3 (5): 45-53.
- [10] 施娜, 王晓宇, 吴明海. 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意识三态观”的分析框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3 (3): 20-28.
- [11] 张良, 杨安然, 王晓慧.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课程建设逻辑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3 (4): 21-28.
- [12] 朱尉, 汪喆.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6): 108-125.
- [13] 孙琳. 以情感认同铸牢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依据、机理与路径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2): 147-151.
- [14] 苏德, 张良. 民族院校课程体系对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行状况的影响研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1 (4): 22-30.
- [15] 孔凡哲, 成润. 民族院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

李家新,刘甜甜,刘子云. 何种教育参与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3088位大学生的实证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95-109.

- 社会科学版), 2023(1): 160-168.
- [16] 郝亚明,秦玉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热点分析与路径演化——基于Citespace的知识图谱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2): 19-29.
- [17] 李家新,谢爱磊,范冬清. 区域化发展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合作:基础、困境与展望[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1): 84-90.
- [18] 克里斯汀·仁,李康. 学生发展理论在学生事务管理中的应用——美国学生发展理论简介[J]. 高等教育研究, 2008(3): 19-27.
- [19] 李文平,沈红. 学习性投入能带来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值吗?——来自“2016全国本科生能力测评”的证据[J]. 复旦教育论坛, 2020(4): 64-71.
- [20] 郭冬梅,胡毅,林建浩. 我国正规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J]. 统计研究, 2014(8): 19-23.
- [21] Phinney, J. S. 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A New Scale for Use with Diverse Groups [J].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1992(2): 156-176.
- [22] Mark Cleveland, Boris Bartikowski. Cultural and Identity Antecedents of Market Mavenism: Comparing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2: 354-363.
- [23] 王鹏,吴愈晓. 社会经济地位、性别不平等与性别角色观念[J]. 社会学评论, 2019(2): 55-70.
- [24] 李从浩,汪伟平. 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五个认同”的因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29所高校调查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1): 46-54.
- [25] 张宇峰,方晨光. 新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状与培育路径[J]. 当代青年研究, 2019(3): 57-64.
- [26] 龙金菊,高鹏怀. 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12): 9-15.
- [27] 纳日碧力戈,萨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维进路[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4): 149-155.
- [28] 郝亚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9(3): 9-13.
- [29] 张利国. 协同理论视域下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若干思考[J]. 民族学刊, 2020(2): 63-70+133-135.
- [30] 青觉.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轨迹与深化逻辑——兼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基本路向[J]. 民族教育研究, 2019(5): 45-53.

责任编辑:刘伊菡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

## ——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

杨敬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法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宪法确立了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双重意义的民族观。宪法教育能够让青少年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统一于标志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宪法认同。宪法守护民族精神。针对青少年开展宪法教育,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塑青少年的价值观, 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思想基础。宪法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宪法教育能够让青少年深刻理解宪法中民族规范的内涵, 将人生目标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根本目标。“价值—原则—制度—条款”的四层递进式宪法教育结构, 为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提供基本框架。当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实践, 已在宪法课程、普法宣讲以及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尚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青少年宪法教育在讲授内容上涉民族的主题提炼不到位, 且侧重于知识性宣讲; 在讲授方式方法上有待创新, 实效性需要加强; 在实践形式上缺少体系化等。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 须依托宪法教育的“四层结构”, 立足我国丰富生动的法治实践, 着重宣讲宪法价值和精神。在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09

**作者简介:** 杨敬之,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入规的规范配置研究”(23BMZ002)

**引用格式:** 杨敬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10-121.

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主线的新征程上, 要深挖相关主题元素, 汇编宪法故事, 探索体系化实践教学, 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宪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宪法规范; 青少年宪法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110-1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彰显国家价值观。“中华民族”入宪, 使得这一“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sup>[1]</sup> 具有了丰富的宪法规范意涵。宪法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法律基础,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的文章中强调, 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抓住青少年、网民等重点群体, 抓宪法纪念、宪法宣誓、宪法教材建设等重点载体, 抓学校、社区、媒体等重点阵地, 持续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sup>[2]</sup>。青少年宪法教育是宪法宣传教育的重要方面, 是强化青少年宪法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和共同体意识的基础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 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sup>[3]</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具体指出, 要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 纳入干部教育、党员教育、国民教育体系, 搞好社会宣传教育<sup>[4]</sup>。我们应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探索学科融合机制, 融入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借助宪法教育常态化机制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前, 法学界以多重视角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研究。就宪法学而言, 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从法理上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学者提出,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这“三对辩证关系”<sup>[5]</sup>; 有研究立足人民性, 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理基础<sup>[6]</sup>。二是从宪法规范上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论证。有研究提出, 现行宪法正式确立中华民族的法权地位,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法制保障<sup>[7]</sup>; 有学者针对宪法中的民族团结条款展开研究, 提出通过法律法规使其具体化<sup>[8]</sup>。然而, 既有研究鲜少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学理和实践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揭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逻辑基础上, 解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内在结构, 回顾其实践样态, 运用访谈的研究方法, 提出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考路径。

## 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逻辑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宪法调整的一项主要内容。在现代民族国家中, 公民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最终体现为宪法认同。宪法确立的兼具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双重意义的民族观, 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 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宪法规定的精神文明建设条款守护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宪法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 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根本法保障。可见, 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 （一）宪法确立的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创造了独特的中华文明体系，维系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形态的大一统”<sup>[9]</sup>，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sup>[10]</sup>，那么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共同体则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我国宪制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的底层逻辑，也是我们理解宪法中“中华民族”条款的历史规定性。宪法中的“中华民族”条款宣示着国家在民族面相上秉承大一统的传统，并以此作为国家统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宪法序言开篇即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一段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肯定了国家统合中的文化要素，也强调了这一文化力量源于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发展成“自觉的民族实体”<sup>[11]</sup>。宪法序言在第二段到第五段，对近代已降的革命历史进行了叙事，对其理解不能脱离第一段。正如彭真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上说明起草该段的原意时所说：“我们的事业是从祖先来的。”<sup>[12]</sup>“大一统”便是祖先传给我们的家业。宪法“记载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光辉历史，宣示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sup>[13]</sup>。宪法所确立的国家统合和社会整合双重意义的民族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 （二）宪法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宪法中的“中华民族”条款宣示着国家的文化自信，并立足于此对社会进行整合。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社会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当不同主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出现了两个难题：一是该“利益”是否法律化，二是对法律化的“利益”如何进行取舍和价值衡量。这两个问题并非先后排序，而往往交融混体。我国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定，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规范依据。国家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三组，分别面向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层面，是国家之德、社会之德和公民之德的有机统一。然而，“价值在人类史上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形态的普遍性”，“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基体来获得自由、平等和人权”<sup>[14]</sup>。诠释我国宪法倡导的核心价值，不能脱离中华文明体系这一基体。正如有研究所指出，从中国宪法出发可发现，中华文明秩序主要体现为同心圆结构，而西方文明秩序则体现为三角架结构<sup>[15]</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sup>[16]</sup>。这一现代转型的基因密码正潜隐在宪法序言第一段中。“宪法序言第一段历史、文化和中国各族人民三个条款，具有重大现实政治含义，它打开了文明复兴的通道。”<sup>[17]</sup>宪法中的“中华民族”条款，激活了八二宪法在序言中新增第一段的深远意蕴，弥补了八二宪法未能将其作为统摄性概念的遗憾。

### （三）宪法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根本法保障

我国宪法第 4 条是对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规定。2018 年修宪时，为了与序言第 11 段对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修改相一致，第 4 条第 1 款修改为“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2018 年修宪共有 3 处增加了“和谐”二字。除上述两处外，另有一处在序言第 7 段最后一句话中，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宪法确认的国家目标的一个重要维度，蕴含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谐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团结和谐, 则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 反之, 则国家衰败、社会动荡、人民遭殃”, 并且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sup>[18]</sup>。民族团结和谐, 则国泰民安。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统一领导下,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行使自治权, 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自主管理本地方本民族的内部事务。这一制度安排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 建设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和谐关系有存异求同的规范意旨, 即各民族间增进合作、深化了解, 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同样坚持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正如有研究指出: “尊重民族差异而不强化差异, 保持民族特性而不强化特性, 要顺应时代潮流培育并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19]</sup> 宪法保障各族群众的根本利益,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概言之, 宪法宣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正当性和理论正当性, 同时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教育核心的宪法教育, 重点是解决认同问题, 使广大青少年认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深刻理解我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逻辑, 树立正确的民族观, 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统一于标志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宪法。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内在结构

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不仅是必要的, 也是可行的。青少年宪法教育唯有以宪法学科为母体, 才能获得滋养孕育。但如何用青少年可理解的语言将抽象、专业的宪法知识进行转化, 是开展宪法教育需要直面的首要问题。“四层结构”的宪法教育体系是面向青少年开展宪法教育的理论依据。该体系呈现“价值—原则—制度—条款”的递进逻辑, 既是开展青少年宪法教育的知识基体, 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基本框架。不同层次的宪法教育可因循上述结构, 循序渐进地开展。

### (一) 阐释宪法价值, 指明思想方向

宪法凝聚了全社会的共同价值, 宪法价值是理解抽象的宪法原则以及具体的制度和条款的基础。对宪法价值的阐释, 是揭示原则的形成机理, 挖掘隐藏在制度和条款背后的深层意识的过程。青少年宪法教育就如在青少年心中种下一颗价值的种子。对青少年而言, 宪法教育侧重于培养公民意识, “不以宪法专业知识的传播为主要目的, 其指向的是公民伦理与公民意识的建构”<sup>[20]</sup>。最初的公民概念是古希腊城邦基于处理公共事务的需要而产生的, 强调城邦共同体的成员为共同体贡献力量, 个人命运与共同体命运休戚相关。青少年宪法教育旨在引导其领会自己的多重身份, 在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和伙伴关系之外, 还与民族国家这个共同体构成另一层关系, 即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在这层关系中,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 公民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要履行义务, 使国家得以存续和发展。而国家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并最终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宪法教育揭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 使个人体悟到需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个人价值。

## （二）释明宪法原则，坚守思想阵地

为彰显价值，宪法往往确立一系列原则，对最基本的宪法关系即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理解，应建立在宪法原则上。但宪法原则是抽象的，基本原则尤为抽象，比如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等。不仅如此，不同的基本原则之间还可能产生张力。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主制度，是对集体价值的肯认，而落实基本人权原则的制度则旨在保护个体价值。当集体利益和个人的自由权利相冲突时，该如何衡量取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法是处理重大价值分歧的共同基础，是关于价值分歧的价值共识<sup>[21]</sup>。当具体制度和条款在原则层面存在冲突时，需要宪法价值的统合。这也是宪法作为根本法、最高法的体现。由于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现代信息技术迅捷、集中地将各种相抵牾的社会现象和截然对立的言论呈现出来，就给予其判断力提出了挑战。青少年宪法教育由学校里的宪法课程教育和社会上的宪法普及教育承担，应积极促进青少年理解宪法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法地位，正确看待价值分歧，理解不同宪法原则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

## （三）解析宪法制度，稳固思想支撑

制度是对原则的落实和体现，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我们理解其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体系框架。以人民主权原则为例，根据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宪法第二条第二款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围绕根本政治制度而确立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对上述制度的理解，应溯源于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即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人民主权具有阶级性，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是被排除在外的。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制宪者认为阶级身份必然优先于族群身份，阶级认同必然优先于族群认同……不同的族群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一起，在于他们有共同的或相似的阶级身份。”<sup>[22]</sup>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正确理解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底色，也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享有的自治权与西方国家民族或地方自决权的本质区别。面对国际社会持续存在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方自决”情绪，我国青少年只有深刻理解了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才能更清晰地认识我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对相关事件和言论进行正确评判，并从意识层面产生行为自觉。

## （四）释义宪法条款，厘清思想脉络

宪法规范是一套科学体系，只有借助严谨的分析工具和方法，才能揭示其科学性。同时，宪法规范又蕴含着价值。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始终是宪法学的核心命题。学习宪法规范，离不开对具体条款的释义，这是宪法学的专业“自留地”。宪法学作为法学院学生的十门专业必修课之一，承担着开展专业化宪法教育的教学任务。法科生对宪法的认识便不应仅仅停留在宪法原则和制度层面，而应经由条款深入到精深的宪法规范世界，探求宪法精义。同时，宪法知识是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核的内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以及日益专业化的立法和行政执法队伍亦应学习宪法规范体系，并在专业层面上促进宪法实施。关涉民族关系的法律实践，无论立法、执法还是司法案件，都离不开对宪法条款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宪法规范的科学指引。比如我国宪法第 59 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其中规定“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56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全国人大代表，即便人口特别少的少数民族，也有 1 名全国人大代表。根据代表法，人大代表行使代表职权，受选民监督。这一规定以代表和选举制度落实民族政策，使民族国家形态得到我国政体的保障，这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议会制的一个显著体现。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实践进展

在2020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普法工作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明确规定了相关工作要求:“以宪法教育为核心,以权利义务教育为本位。法治教育要以宪法教育和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教育为重点,覆盖各教育阶段,形成层次递进、结构合理、螺旋上升的法治教育体系。要将宪法教育贯穿始终,培养和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意识;将权利义务教育贯穿始终,使青少年牢固树立有权利就有义务、有权力就有责任的观念。”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在提高青少年宪法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同时,充分借助宪法教育常态化机制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在实践中取得了积极进展,为今后的路径优化积累了有益经验。

#### (一)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宪法教学中的嵌入

学校是宪法宣传教育的重点阵地。在教学中,不同教育阶段已优化教材体例,设置了相应的宪法课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搭建了框架。

一是嵌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宪法教育。2016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的《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新编的《道德与法治》教材,于2017年9月开始在全国中小学投入使用,专门的宪法教育内容集中在六年级(上册)和八年级(下册)。例如,六年级(上册)第4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通过诠释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理,使学生形成权利观念的同时,树立责任意识。《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第三学段(5—6年级)的目标中指出,树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责任意识。相关课程通过诠释宪法的理念价值,融入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我很注重按照教材,对照新课标里的具体目标,结合历史故事、新闻事件来讲。会讲长征途中彝海结盟的故事,也会讲一些案例,比如有人在网上发布错误言论破坏民族团结,因违反法律法规被行政拘留。学生们更喜欢听这样具体的故事和案例。”(X市X区X小学道法课教师,GHH20240218)

二是嵌入高中阶段的宪法教育。高中思想政治课涉及的宪法内容,主要体现在通用教材《思想政治》第1到3册。十年级(必修2)第1课是“生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讲授该课,需围绕宪法上的国体条款。国体条款宣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经由人民主权、人权保障等基本原则,依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具体制度和条款得以落实。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课中,讲解“各民族一律平等”时,需结合宪法确立的平等原则,启发学生思考宪法为什么会规定“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等内容。

三是嵌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宪法教育。面向大学生的宪法教育,无论是面向非法学专业学生的法学概论课(内含宪法内容),还是作为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宪法学课,都在国家制度部分着重讲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阐明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核心理念。同时,应结合宪法序言关于国家根本目标的规定,阐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理论体系。“我会播放一些经典的影视剧片段以及一些短视频,结合宪法上的民族规范条款展开讲解。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就很适合课上播放，第70集《青藏铁路》用几分钟时间讲述了‘天路建设’的伟大工程。我还会引导学生们展开小组讨论，促使学生们主动学习。”（X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师，AQ20240218）

###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宪法宣讲中的嵌入

社会普法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用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民众喜乐的方式、讲法治中国的故事，就是最得当的普法方式，十分适合现在我国的宪法教育和普及工作。”<sup>[23]</sup>当前，宪法宣传普及及实践中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是在普法方式上，发挥民族文艺的作用。比如，云南省的法治文艺宣传队通过法治小品、歌舞、二人转、快板、山歌等形式，将法治宣传与民族文艺结合起来，让民众在欢声笑语中知法守法，效果良好。该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把法律法规融入记录彝族历史社会变迁的“梅噶”传唱，使法治的基因深深扎根于民族传承。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打造了全国首部法治乌兰牧骑系列普法动漫剧《小司来了》，塑造了以“小司”为主角的蒙古族家庭，以案说法，用幽默轻松的形式讲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故事。

二是在普法内容上，汇集民族主题和元素。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发《用法治保障各族群众安居乐业——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观察》，积极营造各族群众学法守法的良好氛围。内蒙古自治区部署“民族法治宣传周”，集中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族法律规范。贵州省三穗县打造法治教育实践基地，通过植入蜡染、鼓楼、芦笙堂等苗侗民族特色文化元素和夏同稣、杨至成等地方历史名人故事，让参观者在学习法律的同时体验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激励青少年坚定信念。这些做法是将民族元素融入法治教育的有益方式。

三是在普法力量上，借助民族语言和资源。在专门面向青少年的社会普法中，法官、检察官等法律实务工作者承担着重要职责，开发了丰富的普法项目。贵州省剑河县检察院成立了“仰阿莎”苗汉双语法治宣传队，深入苗乡侗寨开展法治宣传，效果良好。在青少年宪法普及教育中，教育部组织的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系列活动很有影响力。少数民族学生穿着民族服装，讲述身边的宪法故事，感染力强；比赛本身便是很好的普及宪法素材。

###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中小学一体化教育中的嵌入

探索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体系建设，是提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贯性、实效性的有益举措。首先，一体化建设体现为师资队伍协同发展。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于师资培养的有效举措可供借鉴。同时，中小学法治教育教师的培养机制逐渐形成，网络法治教育培训也有序开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师资专门培训和协同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再者，一体化建设体现为课程的科学设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门化课程是提炼范畴体系、夯实理论支撑、总结生动实践的重要依托。在民族高校中，从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角度探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专门化课程，将是非常有益的实践<sup>[24]</sup>。民族高校和一些院校已陆续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一线教学实践中的优质素材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并促进概论教材不断完善。同时，一些地方借助大中小学较为成熟的法治课程和普法宣讲，打造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的纵向衔接，设置专门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学模块，已经形成体系。最后，一体化建设体现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的提升优化。在“大中小”一体化教育上，应“根据各学段学生学情特点进行系统规制，在内容衔接与主题升华中有效增进教育实

效”<sup>[25]</sup>。比如,安徽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内容融入思政课程,在全省中小学开展“建设伟大祖国、建设美丽家乡”主题征文以及主题演讲比赛等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主题教育;在全省中小学中遴选多所学校,开展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试点工作,并在民族学校开展多重主题教育活动,对构建大中小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一体化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

####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在这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sup>[26]</sup>。通过青少年宪法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应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法故事,创新讲授模式和教学方法,注重与校园文化、青少年社会实践等内容相结合。而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青少年宪法教育中,涉民族主题的讲授内容凝练不到位、不突出,讲授模式和方法有待创新,实践教学缺少体系化等。这些问题需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探索 and 解决。

##### (一) 讲好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故事

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充分培育青少年基于身心体验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宪法教育正是厚植这一主体性的重要依托。正如有研究指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应被视为外在于大学生个体的自在对象,应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大学生自身成长历程相融合<sup>[27]</sup>。

第一,立足中国历史和社会讲好宪法故事。如何在青少年中讲好中国宪法故事,是宪法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宪法宣传教育应贴近日常生活,表达上追求生动性、新颖性,努力提高中国宪法故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sup>[28]</sup>。故事中有法理,借由宪法教育的四层结构“价值—原则—制度—条款”,可对案例故事进行生动演绎和解构。“老师课上讲的故事很有趣,我很爱听,也能启发我思考。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硝烟后被贬新疆,仍然为国家安全纳言献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诗,我早就会背了,但在宪法课上听完老师讲林则徐禁烟和当前我国禁毒的故事,让我对这句诗有了更深的理解。”(X大学法学本科生访谈,AY20240118)

第二,结合宪法规范和原理讲好宪法故事。比如,国歌中便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自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有过多个版本的“国歌”。“当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第一首民国国歌的时候,‘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已由革命派的意向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向。”<sup>[29]</sup>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便与国家荣辱与共。事实上,“中华民族”在被明确写入宪法前,是以歌词的形式存在于我国国歌中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唤醒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吹响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2004年修宪时,规定国家标志的第四章新增一款国歌条款,明确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更加宣示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与中国建设现代国家密不可分。国歌教育作为宪法教育的一部分,在增强广大青少年的国家观念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讲好国歌故事,阐释国歌宪法条款的民族精神,揭示人民主权原则,理解奏唱国歌的礼仪制度,便是一堂生动的宪法课。“最开始接触宪法,感觉和高中政治差不多,一些内容在高中都学过。但是当老师聚焦一个主题,用宪法理论和知识深入展开的时候,觉得很新奇,是以前没听过的内容,也从来没用这样的角度思考过这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X大学法学辅修

专业本科生访谈，HRK20240117）。

## （二）创新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教育方法

探索讲授模式，改革创新教学方法，有利于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实效性。据笔者在北京市的中学开展宪法讲座的实践经验，“启发式教学+视听资料+讨论互动”的教学模式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让数字技术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第一，强化案例教学方法。比如，汇编铸牢青少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案例，形成体系化的案例教学内容。在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中，个别涉民族因素的规范性文件审查事例，便可成为教学案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sup>[30]</sup>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宪法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sup>[31]</sup>。《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2020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有的规定，经本地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有条件的民族学校部分课程可以用汉语言文字授课。我们审查认为，上述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第五款关于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规定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不一致，已要求制定机关作出修改。”<sup>[32]</sup>

第二，注重情境化教学。针对青少年尤其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情特点，宪法宣教实践显示，情境化教学是一种有效方式。情境化教学强调教师以生动的事例、模拟场景、诵读等方式引入具体情境，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其理解教学内容。为帮助小学生“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民族团结意识”，教师可从每年春季召开的全国两会讲起，引导学生观察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发现少数民族人大代表们穿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服装及其意涵；即便人口很少的民族，也有 1 名本民族的全国人大代表，从而引导学生理解我国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以及各民族平等政策。此外，播放视听资料是提升情境化教学质效的有效方式。来自青少年普法实践的经验显示，法官、检察官在普法活动中，通过播放影视剧、歌曲等视听资料启发学生思考相关宪法法律问题，收获了良好的效果<sup>[33]</sup>。比如，福建省的法官在普法课堂上播放影片《万里归途》的精彩片段，一队举着中国国旗、唱着国歌的长龙通过边境线的画面，瞬间将学生们带入 2011 年利比亚撤侨的情境中，使学生们直观体验到宪法规定的国旗、国歌等国家标志对公民个人的重要意义。“给中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普法，播放一段有意思的小视频，同时结合学生们熟知的故事，讲解里面的法律知识，最后提升到宪法上的规定。学生们很爱听，很积极地与我互动，还会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促使我思考。”（X 市 X 中级人民法院法官，FGG20240118）

## （三）探索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宪法实践教学

法学是一门面向实践的学问，但与法学教育的法治实践面相不同，青少年宪法教育应融入青少年的生活实践。宪法宣教在讲授之外，应探索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并在其中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第一，发展参与性实践活动。组织学生以民主讨论的形式共同制定班规，参与班级民主管理，

便是很好的实践活动。班规可视为班级这个共同体的共识，全班同学对经过民主协商程序共同制定的班规，公正执行、共同遵守，便是对立法、执法和守法最直观的体验。同时，参与行为能使学生直面“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诸多公共选择的难题”，比如如何安排座位便需要“尊重多数人意愿与照顾特殊群体的利益”<sup>[34]</sup>。中小學生可从“做班级的主人”感悟宪法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感受在共同体之中的权利和义务。学校还可引入外部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法治副校长机制也是很好的制度平台，可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法律实务工作者请进校园“现身说法”<sup>[35]</sup>，让学生从生动的司法案例中感受法治。与此同时，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设计的宪法体验馆等，也可成为开展实践教学的载体。“我们会邀请中小學生到我们的实践基地参观，还会参观点看守所等场所，也会指导学生们进行模拟法庭，在这些活动中穿插讲解相关宪法法律知识，孩子们很感兴趣，都比较愿意互动，学校、老师以及孩子们的反馈都很好。”（X市X县检察院检察官，兼任法治副校长，YMI20240117）此外，在民族自治地方用双语普法，也是提升普法实效的有益方式。“在选聘法治副校长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考虑一些精通当地语言，又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干警，用当地语言开展普法宣讲。我们还打造了双语普法队，深入村寨、学校和社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学校都直接跟普法队约课，期待我们的普法课。”（X省X自治州检察院检察官，EL20240119）

第二，开拓创造性实践项目。面向青少年的宪法教育，应在讲授“书本中的法”的同时，引导青少年观察、参与“行动中的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实践助力。法律面向社会生活，回应公共议题。青年学生形成参与立法、关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意识，不仅可行，也是必要的。比如，在法律制定、修改的草案征求意见阶段，青少年尤其大学生可以从专业视角提出立法建议。近年来，一些省的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民族教育促进条例等涉民族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审查批准了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涉及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青少年通过行使受宪法保障的建议权，参与立法草案意见征集，就公共议题进行思辨，不仅有利于他们体会抽象的宪法原则和价值，还有利于其在法律实践中感知法治的力量。此外，模拟立法也是很好的创造性实践教学方式。“我在暑假参加了模拟立法的项目小组，发现立法可是没那么容易。我们除了查阅很多文献资料、书籍论文，还查阅了立法方面的资料和国家政策等。很佩服搞立法工作的，需要平衡，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X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访谈，MKD20231025）此外，学生通过撰写普法文章、录制普法短视频等创造性劳动，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还能收获价值感。“撰写普法文章很有意义，能帮助更多的人，尤其看到评论区有那么多网友留言、互动，让我感到学以致用，用专业知识提升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提升中华民族的法治素养，觉得很有价值，很开心。”（X大学法学院本科生访谈，XAK20231031）

## 五、结语

青少年宪法教育面向青少年普及宪法知识，阐释宪法价值和精神，培养青少年的宪法意识和国家认同。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青少年掌握宪法中有关中华民族的规范内涵，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重要保障。本文发现，综合采用案例教学、

情境化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将中华民族的主题和元素融入宪法教育中，是在青少年宪法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益形式。青少年宪法教育应注重提炼民族主题，聚焦典型案例和事例，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宪法故事，在广大青少年中弘扬宪法精神，助力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参考文献：**

- [1] 周平. 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 [J]. 政治学研究, 2015 (4) : 19-30.
- [2] 习近平. 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40 周年 [N]. 人民日报, 2022-12-20 (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 年 10 月 16 日) [N]. 人民日报, 2022-10-26 (1).
- [4]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李克强主持 栗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 汪洋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8-29 (1).
- [5] 李龙, 刘玄龙. 法理与政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探微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 1-9.
- [6] 刘姗, 叶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人民性意涵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9) : 19-26.
- [7] 康晗, 李乐. 宪法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本演讲、基础逻辑及实践路径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1 (4) : 24-31.
- [8] 邵六益. 宪法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行宪法民族团结条款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 (1) : 88-95.
- [9] 林尚立. 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 [J]. 复旦政治学评论, 2016 (1) : 3-54.
- [10]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叡人,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6.
- [1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8: 300.
- [12] 蔡定剑. 宪法精解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127.
- [13] 翟国强.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问题与方法 [J].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3) : 181-188.
- [14]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 [M]. 孙军悦,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64.
- [15] 喻中. 文明秩序的同心圆结构——中国宪法中的“统一战线”析论 [J]. 法学评论, 2022 (2) : 28-37.
- [16] 李永皇.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路径研究 [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1) : 121-127.
- [17] 姚中秋. 从革命到文明：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大义疏解 [J]. 法学评论, 2015 (2) : 46-56.
- [18]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N]. 人民日报, 2022-03-06 (1).
- [19] 江国华, 肖妮娜. “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 [J]. 河北法学, 2019 (3) : 57-67.
- [20] 韩大元. 宪法思维四讲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40.
- [21] 陈景辉. 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从宪法与部门法的关系出发 [J]. 中外法学, 2021 (2) : 285-304.

杨敬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嵌入青少年宪法教育的法理意涵与实践路径——基于宪法教育和普法实践的访谈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10-121.

- [22] 翟志勇. 宪法中的“中国”——对民族国家与人民共和国意象的解读[J]. 文化纵横, 2010(6): 75-81.
- [23] 焦洪昌. 宪法捍卫国家制度, 坚守中华民族精神[J]. 青少年法治教育, 2023(4): 3-7.
- [24] 徐爽, 黄泰博.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高校课程体系改革[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1): 64-70.
- [25] 朱尉, 汪喆. 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如何“去窄化”?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6): 108-125.
- [26]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4(3): 4-8.
- [27] 裴圣愚, 王莹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认及其教育深化路径[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3(11): 70-78+183-184.
- [28] 蒋清华, 陈昱舟. 宪法宣传教育四十载缩影: 《人民日报》(1982—2022年)的宪法标题文章[J]. 中国法律评论, 2023(2): 174-191.
- [29] 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292.
- [30]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J]. 求是, 2021(5): 4-15.
- [31] 王晨. 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20周年之际[J]. 中国民族, 2020(11): 10-13.
- [32] 沈春耀.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2020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EB/OL]. (2021-01-20)[2023-11-10].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1/t20230113\\_423340.html](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01/t20230113_423340.html).
- [33] 余俊. 让宪法精神浸润童心——从“孩子的视角”开展宪法宣传教育[J]. 青少年法治教育, 2023(2): 36-39.
- [34] 张劲. 让宪法回归生活: 青少年宪法教育的一个路向[J]. 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20(3): 11-21.
- [35] 本刊编辑部. 让法治副校长更好护航成长[J]. 中国民族教育, 2022(3): 1.

责任编辑: 刘伊菡



#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 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钟厚涛

(国际关系学院 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91)

**摘要:** 民进党籍候选人赖清德以 40%左右得票率赢得台湾地区 2024 年“大选”，折射出台湾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偏离了“多数人共识决策”的良性轨道，正面临着代表性不足和“少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困境。在台湾地区不断异化的政治生态中，选举作为落实民主的载体，反而有可能成为限制民主的工具。在“选举机器化”驱动下，岛内蓝绿白三方势力将塑造非对称化竞争的景观，民进党全力扩大绿营基本盘，国民党则试图在泛蓝阵营外拉拢中间力量，民众党在蓝绿夹杀情势下短期可扮演关键少数角色，但中长期则会逐渐式微，岛内政治版图将由传统的蓝绿对决走向“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博弈。在政治极化、民粹蔓延等多种思潮叠加影响下，台湾政治生态遭遇权力失衡、民主失灵、治理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自我纠错和修复机制同步退化，逐渐沦为“劣质民主”典范。在“台独”意识形态驱动下，赖清德或将诉诸激进手段，在两岸政策上冒险冲撞，台海和平可能面临重大隐患。

**关键词:** 2024 年“大选”；岛内政局；“台独”；民进党；代表性断裂；两岸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75.8;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122-13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10

**作者简介:** 钟厚涛，国际关系学院对台战略预置和重点问题创新研究团队负责人，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项目“美国对台湾当局海洋政策的影响研究”（22FZZB009）

**引用格式:**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2024 年 1 月 13 日, 台湾举行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二合一选举”。由于非绿阵营分裂叠加“弃保”效应未能发酵, 导致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坐收渔翁之利, 该党首次迈向第三任期。赖清德被称为“台独金孙”, 长期标榜“台独务实工作者”身份, 被称为“加强版李登辉”“升级版陈水扁”和“冒进版蔡英文”, “暴冲”可能性不容小觑。未来赖清德或将加速“台独”布局, 威胁台海和平, 需要高度警惕。

## 一、“蓝败绿胜”底层逻辑与赖清德对民意非代表性

根据台湾所谓“中选会”估算, 本次选举全台设置 17 795 个投票所, 选务工作人员超过 20 万人, 选举人数约 1 950 万人, 其中“首投族”(首次拥有选举权的选民)约占 102.8 万人, 共投出了 1 394 万票, 投票率约为 71.86%。其中, 民进党“赖萧配”(赖清德、萧美琴)获得 558 万票, 约占 40.05%; 国民党“侯赵配”(侯友谊、赵少康)获得 467 万票, 约占 33.49%, 落后民进党 91 万票; 民众党“柯吴配”(柯文哲、吴欣盈)为 369 万票, 约占 26.46%。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 国民党取得 52 席, 虽重返第一大党地位, 但未能过半, 只是脆弱的第一大党; 民进党获得 51 席, 失去对立法机构的掌控权; 民众党 8 席, 成为蓝绿争相拉拢的关键少数<sup>[1]</sup>。整体观察, 民进党虽胜选, 但得票率不足 41%, 这说明“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sup>[2]</sup>, 也暴露了台湾政治体制正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除了学界已经广泛关注的政治极化<sup>[3]</sup>、民主赤字<sup>[4]</sup>以及民粹主义之外<sup>[5]</sup>, 还有严重的代表性断裂的风险。

### (一)“下架民进党”的氛围与民进党的“惨胜”

2024 年“大选”中赖清德仅获得 558 万票, 与 2020 年“大选”时蔡英文的 817 万票相去甚远, 相差 259 万票。背后原因是, 2016 年民进党上台后, 治理无能, 导致民怨四起, “民进党不倒, 台湾不会好”“新潮流不散, 台湾毁一半”“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等声音不绝于耳。2024 年“大选”前, 岛内 60%左右的受访者都期待“换党做做看”。最终的投票结果也与这一民调高度契合, 即 60%左右的民众都拒绝把票投给赖清德和民进党。在这种情势下, 为何赖清德依然可以胜选? 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民进党当政优势。民进党集行政与“立法”权于一体, 将公权力变现私用, 通过直接撒钱、开“空头支票”等方式收买人心、冲高选票。民进党政策买票, 债留子孙, 债务高达 5.9488 万亿新台币, 台湾已陷入深度透支型社会, 平均每位岛内民众(包括新出生婴儿)负债 28.7 万新台币。民进党此种操作虽不利于台湾长期发展, 但有利于民进党短期选举。

二是美国力挺民进党。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升级情势下, 美国评估民进党当政更有利于美国对中国大陆打“台湾牌”。在台选举期间, 美国故意通过拉高对赖接待层级、与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切割等方式, 为民进党提供策应。而在民进党胜选后, 美国国务院第一时间就发去“贺电”, 声称“期待与赖清德合作”<sup>[6]</sup>。

三是在野大联盟破局。国民党与民众党“蓝白合”虽符合民意期许, 双方也谋划已久, 但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未能形成“在野大联盟”, 导致民进党坐收渔翁之利。在岛内民意基础“绿大蓝小”格局下, 叠加其他多种因素, 国民党无力终结“台独”势力当政状况。

四是民众的分裂投票。2022 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胜，在全台 22 个县市中，一举取得 15 个县市的“执政权”。民众为了防止国民党独大，在 2024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倾向于票投民进党，但为防止民进党一党独大，又在立法机构选举中，支持国民党，以国民党来制衡民进党<sup>[7]</sup>。台湾政治格局出现民进党掌控“高层”、国民党在地方占优，民进党手握行政主导权、国民党在立法机构占优的制衡格局。

### （二）选举结果对民意的偏离与民进党的信任危机

2020 年台湾“大选”时，蔡英文获得 817 万票，得票率为 57.13%。时隔 4 年后，赖清德仅获得 558 万票，得票率为 40.05%。降幅如此之大，让外界惊诧不已。2024 年“大选”，台湾民众共投出 1 394 万票，但合计有 800 多万票投给了侯友宜和柯文哲，而没有投给赖清德。这意味着，赖清德还未上台，政治代表与民众之间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裂隙与信任危机。

一是固守绿营的基本盘。经过民进党多年操弄，特别是陈水扁、蔡英文时期的“文化台独”“教育台独”布局，岛内民意绿化严重，民进党不断扩大自己的基本盘，控制台湾选民结构的 35%到 40%左右。在历次重要选举中，民进党都会以巩固基本盘作为首要职责。从最终投票结果来看，赖清德 40%左右的得票率与绿营在台湾政治生态中的力量分布基本吻合。2008 年民进党最低谷时，时任民进党籍候选人谢长廷的得票率为 41.55%。这显示，赖清德的得票率已经创造了民进党发展史上的新低，只能依靠绿营基本盘“保命续命”，在此之外无法开拓出新的票源。

二是失去中间选民支持。民进党 2016 年重新上台后，治理荒腔走板，民怨沸腾不已。从台湾年度汉字评选结果中，可以窥斑见豹。从 2016 年的“苦”、2017 年的“茫”、2018 年的“翻”、2019 年的“乱”、2020 年的“疫”、2021 年的“宅”、2022 年的“涨”以及 2023 年的“缺”，每个字都精准浓缩了岛内社会意向与民怨。民进党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也引发了台湾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的高度不满。而赖清德本人的表现，也让很多中间选民彻底看清了其顽固偏执的人格。2023 年 12 月开始，有关赖清德老家违章建筑的消息持续发酵，“赖皮寮”一词瞬间在台湾岛内“火出圈”，更有网友调侃“万物皆可‘赖皮’”。这一系列流行语的背后，折射了赖清德与主流民意的渐行渐远。

三是无法延续青年力挺。2016 年台湾“大选”前，民进党曾向年轻人画下美好“大饼”，许下空洞“承诺”。但时隔八年之后，台湾青年彻底看清了民进党的真面目。由于民进党治理无方，台湾除了“缺水”“缺电”“缺地”“缺工”“缺人才”，近些年又添上了“缺蛋”“缺药”和“缺安宁”。在此过程中，台湾年轻人自然也深受其害。目前，全台湾平均失业率为 4%左右，但青年群体的失业率则高达 12%左右。此外，对青年群体的低薪问题，民进党也消极以待，无力解决。与此相伴相随的是年轻人不婚不育导致的出生率下降，2015 年马英九在位时期，台湾新增人口为 21.4 万人，但到 2023 年新增人口仅为 13.9 万。当认识到被民进党欺骗之后，在 2024 年“大选”中，很多台湾青年根本不愿意出来投票，即使投票，也只是把票投给柯文哲，而非投给赖清德和民进党。

### （三）民主政治的衰退与民进党威权专制的形成

一是“多数人被迫被少数人绑架”。赖清德能侥幸获胜，并非因为自己“优秀”，而是因为“非绿”阵营分裂。从投票结果来看，赖清德只得到 40%左右的票源，这意味着 60%的投票者都没有把票投给赖清德。在得票不过半、未能获得多数人支持情况下，赖清德和民进党却能胜选，这属于典型的民主胁迫，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台湾的前途被少数人给绑架，而多数人只能默默接

受, 无力更改木已成舟的结果。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内生性阻力。在三党都不过半的情况下, 理论上讲, 台湾应该进入第二轮选举, 由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重新选举。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土耳其等, 都采用这种模式。台湾之所以未能开展制度改革, 主要是因为民进党作为既得利益者, 已经不愿意进行相关改制改革。在 2000 年“大选”时, 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 39%左右的得票胜选, 尝到只有首轮选举的甜头。此后, 民进党既是“球员”又是“裁判”, 不愿意对既有体制“自我革命”。久而久之, 这就会导致台湾的选举制度问题丛生。

三是劣币驱良币的逆淘汰机制。2024 年“大选”中, 民进党得票数减少了 258 万, 得票占比较 2020 年“大选”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赖清德虽侥幸过关, 但已成台湾地区“少数领导人”。代议民主政治的本意是借由政党之间的自由竞争, 产生比较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民意代表<sup>[8]</sup>。“非绿”阵营六成左右得票却无法“下架民进党”, 这反映出目前台湾选举制度已经背离了“选贤与能”的初衷。这必然会滋生逆淘汰的政治生态, 而台湾民众则是最大的输家。

#### (四) 维护和平的主流民意与民进党的政策选项

赖清德虽然胜选, 但岛内的主流民意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近年来, 虽然饱受新冠疫情和民进党当局阻挠等多种因素干扰, 但两岸交流依然稳中有进。例如, 在经贸方面, “两岸经贸合作动能由要素驱动加快向创新驱动转换, 大陆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为两岸产业合作提供强力支撑”, 这也为岛内民众带来了积极的获得感<sup>[9]</sup>。目前, 岛内主流民意是要和平不要战争, 要发展不要动荡, 要过好日子不要过苦日子, 两岸要交流而非交恶, 两岸要对话而非对抗。从岛内多项民调来看,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人数都在 80%以上。例如, 2024 年 2 月, 民进党当局突然叫停来大陆的旅游团, 被岛内民众痛批朝令夕改, “不顾业者死活”<sup>[10]</sup>。未来赖清德和民进党应该放下身段、倾听民意, 如果与主流民意背道而驰, 最终必然被民意所吞噬。

## 二、多数不支持却胜选的悖论与台湾政治的生态困境

2024 年台湾“大选”表面看来蓝绿白“三赢”, 即民进党继续当政, 国民党跃升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 民众党成为关键少数。这样的选举结果和政党格局表面更有利于权力制衡, 但选举过程却与选举本意相去甚远。本次选举人数约 1 950 万人, 投票人数为 1 394 万, 赖清德得票数为 558 万票, 这意味着至少有 836 万票不支持赖清德, 但赖清德依然可以胜选。这说明台湾正面临着“选举超载”、“民主赤字”<sup>[11]</sup>、“以民主之名的独裁”、“戕害自由的权力游戏”等多种弊病<sup>[12]</sup>。

#### (一) 民主运行的失灵: 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分离

目前, 台湾政治逐渐由普遍性转向个体性, 由强调主流强势转向强调边缘、弱势, 由注重经济身份转向注重文化身份。这必然会导致族群认同碎片化态势, 强调“个人的即政治的”, 传统秩序、共同体权威不断流失、社会共识不断消解, 个人至上主义、极端利己主义野蛮扩散, 党争出现“部落化”格局。此前“建基于同一性之上的代表性”受到广泛质疑<sup>[13]</sup>, 而基于个体性和差异性的代表性却大行其道, 但因为各种诉求纷繁复杂, 多为个性问题而非共性问题最终变得“不可代表”或“无法被代表”。整体性的缺失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湾政党的部落化趋势, 蓝绿白基本盘各自为政、互不

妥协，完全将共识和协商搁置一旁。

一是“架空的民主”。从程序上看，台湾民主制度用几年一次的票选剥夺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权利，民众除了投票以外，并无真正参与政治的机会与途径。选举之后，公权力被少数寡头集团绑架，当政者往往背弃对选民的“遵命”承诺，转而支持自己胜选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民众的福祉只是其考虑的次要因素。由此可见，选民只是台湾地区政党精英“竞选游戏”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群众演员”或者“道具”。这意味着，在投票之前和投票之后，所谓的民主与民众基本绝缘。台湾民主对于民众来说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是统治精英的民主。

二是“一秒钟民主”。台湾民众只有在数年一次的选举投票时才享有民主，才有存在感。投票一旦结束，选民即被弃之不用、视而不见，民众进入休眠期，待到下一次选举时，又被重新激活。按照卢梭的说法，即是“选民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是自由的；选举一旦结束，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sup>[14]</sup>。由此，台湾的政治体制也就陷入了“反向集权主义”<sup>[15]</sup>，即民众在选举结束之后就在政治上被“去动员化”，只剩下当政者也即民进党当局的威权。传统的集权主义是在缺乏选举的“弱民主”语境下产生的，而“反向集权主义”则是在选举泛滥的“强民主”样态下形成的。

三是“装饰性民主”。台湾实行的多党制和普选制会放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民进党为争取特定群体的选票，就会启用承认政治的选举策略。例如，为了赢得女性群体的支持，就故意挑选萧美琴担任赖清德的副手。几个具有特定身份人士（如台湾少数民族人士）在民进党权力体系中作为“点缀”和“花瓶”出镜，并不意味着台湾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地位就得到了提高。但这种操作方法无疑会导致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的身份差异不断被放大和固化。事实上，台湾少数民族群体对于民进党的操弄颇为反感，倾向于以拒绝投票的方式来加以抵制。2024 年“大选”中，台湾少数民族选举人数共有 438 200 人，投票人数为 269 093 人，投票率为 61.4%，远低于全台平均投票率 71.86%。

## （二）身份政治的极化：民粹式民主加剧社会撕裂

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台湾的兴起和泛滥，解构了台湾社会团结和政治包容，台湾民众呈现群体碎片化和阵营化态势，蓝绿对抗成为当代台湾身份政治的特征，这也为台湾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兴盛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导致台湾很多选民陷入民主困境，即只讲立场，不讲是非；只有颜色，没有对错<sup>[16]</sup>。

一是身份政治操弄与虚假认知误导。台湾政治的许多乱象必须透过身份政治这个“棱镜”才能看到其背后的实质和本质。在民进党操弄下，岛内民粹情绪暗流涌动，统“独”议题在岛内不但未被淡化，反而进一步凸显。很多民众在统“独”二元对立叙事话语中，只能被迫站队。在碎片化的身份认同和空洞的自我表演中，台湾民众将治理权拱手转让他人。霍布斯鲍姆认为：“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身份政治，不论终极目标为何，其悲剧性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表面上假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sup>[17]</sup>福山也承认身份政治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基于身份建立的组织可能加剧自由民主政治体系的功能失调和两极分化”<sup>[18]</sup>。事实上，所谓统“独”议题只是武断的人为构造，是典型的二分法思维，不但无助于化解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问题，加剧台湾政治体制衰败。

二是社会原子化与想象共同体瓦解。身份政治主导台湾整个政治生态，无论是每次选举，或是所谓“公投”，蓝绿基本盘最后往往都会各自归队。但身份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充满争议与对抗，它在凸显不同群体标签特色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强大的离心力，鼓励人们分裂为更小的身份团体，

导致台湾社会走向原子化, 形成形形色色的亚群体。霍布斯鲍姆曾指出: “身份政治本质上并非为了所有人, 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群体的成员。”<sup>[19]</sup> 民进党当局通过他们所控制的各种社会组织和宣传机器, 鼓噪和推动不同身份民众之间的对立。随着价值歧异的扩散、社会共识的缺乏, 以自我为中心、拒绝接受他者的“不宽容群体”接连涌现。在这种情况下, 岛内主要政党的代表, 无论是“立法委员”还是县市议员, 往往会变得无所适从, 进退失据, 因为民众的差异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民意代表能够整合和回应的有效范围。

三是经济民生牌的失灵与选举异化。从世界范围来看, 选举的焦点已由传统的政治理念、社会政策逐渐发展成为候选人的人格特质、营销策略与媒体呈现<sup>[20]</sup>。在台湾以往的重要选举中, 经济民生牌是各大政党最重要的议题, 而在 2024 年选举中, 无论国民党、民众党还是民进党, 都没有端出实实在在的“牛肉大餐”, 无法提出让民众切实有感政策。这显示, 经济民生牌已呈现边际递减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不再是台湾选民最重要的投票影响因素, 这必然会导致民主的空洞化与治理的失能化。

### (三) 民主代表性赤字: 由政治自主走向政治他主

在台湾的政治体制中, 普遍意义上的民众虽然在形式和话语上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但落实至每一位具体个人却往往在实践中会陷入无助的困境。普通大众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 导致台湾民主代表性不足, 民众就会对选举无感、冷感甚至以拒绝投票或投废票等方式进行消极抵制。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中, 虽然投票人数较 2000 年增加了 23.74 万人, 但投票率却下降 3.04%, 两相对比就可部分折射出台湾民众对既有选举体制的不满。

一是民进党对民主意涵的偷换与篡改。民进党认为, 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 某些人通过选举取得民众的选票进而获得作决定的权力, 而民众也将自我的权力让渡给胜选者。于是, 民主就变成了“民众选举管理者”, 由“民选管理者对台湾实行管理”, “民众管理”被偷换成“人民(民众)选举”, “民众”蜕变为“选民”<sup>[21]</sup>。“大众民主”被私下改造为“精英统治+人民同意”, 普选权被等同为“大众性”。公民权斗争的多种诉求被逐渐简化为选举权的平等, “人民的同意”越来越被虚化为投票的瞬间, “大众民主”政治也就被转化为通过多数人的选举来确定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来源的程序。这种内嵌型的数字决定论, 必然会结构性地导致政治自主异化为政治他主。

二是民进党垄断政治的压抑与破坏。民进党的民主化操弄, 其实已经成为不平等分配和新的垄断形式合法化的工具。民进党“技术赋能威权”, 利用强大的政党机器、资本金钱、媒体掌控等, 构建了对于其他政党具有抑制性的庞大的垄断集体, 而且将这种压抑关系合法化。这必然会导致台湾的政党体制走向寡头化, 进而带来巨大的平等灾难。在机会主义驱动下, 民进党无所不用其极地操纵族群与身份认同等话题, 并将之与代议制民主相关联。这势必会进一步加剧台湾民主政治的异化, 破坏台湾向高质量民主转型的可能, 使其只能成为劣质民主与廉价民主。

三是代表性断裂的社会失序与混乱。随着 2024 年选举的落幕与利益的重组, 台湾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持续的分化。在纵向上, 民进党与台湾民众的断裂, 导致其不但无法成为台湾多数民众的“代表”, 反而成为利用少数力量裹挟多数力量的“先锋”。这就出现了亨廷顿所说的“非代表性民主”, 即当局决策与民意诉求日渐脱离<sup>[22]</sup>。在横向上, 民进党与其他政党的对峙, 不但无法推动社会的和解, 反而会加剧社会内耗与空转。在这种劣质民主的驱动下, 政治极化与寡头化结伴而行, 导致台

湾民主由最初的代表民众逐渐蜕变为排斥性的抑制民众。当自身正当利益无法“被代表”时，普通民众往往选择抛弃“代议制民主”，转而诉求“直接民主”甚至各种“街头政治”。

### 三、对岛内政局的深层影响与蓝绿白势力的政治走向

民进党胜选，打破了 2000 年以来蓝绿轮流坐庄、八年一轮替的惯例。岛内政党呈现“一大一中多小”格局，台湾政坛出现“朝小野大”、蓝加白大于绿的政治格局。在“选举机器化”驱动下<sup>[23]</sup>，未来岛内政治板块将发生新的位移，蓝绿两党将呈现非对称极化的景观重塑，即民进党越来越加强绿营基本盘乃至迎合激进的深绿群体，而国民党则尝试在传统的泛蓝阵营之外去开拓中间地带。岛内政治版图或将由传统的蓝绿对决逐渐走向“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博弈<sup>[24]</sup>。

#### （一）民进党长期当政的布局与台湾政党的寡头化

一是民进党图谋“一党独大”格局。民进党连任后，将会因为内部政治分赃不均等因素出现一段时间的颠簸期，但整体来看，该党将朝向日本自民党化方向发展，谋求长期在位，企图塑造“民进党一党独大、新潮流一派独大、赖清德一人独大”模式。未来若民进党实现了长期在位，台湾民主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正义性等都将遭遇严重考验。

二是民进党对其他政治势力的磁吸。在“西瓜偎大边”效应驱动下，岛内地方派系将主动向民进党靠拢，捞取更多政经利益，甘愿被民进党收编。同时，民进党还会加快培植新生代，利用在位优势加速“政治资本代际传递”（如苏贞昌交棒给其女儿苏巧慧）<sup>[25]</sup>，为未来选举提前布局。而其他政党则缺乏舞台，年轻力量无法崭露头角，即使是“政二代”也很难脱颖而出。

三是治理能力退化和分配正义缺失。民进党上台后，抛弃了国民党时期形成的亚洲最高效、精英化的官僚体系，行政当局频繁倒台，而新上任的治理者往往经验不足，只能依托“网红政治”来粉饰太平<sup>[26]</sup>。无论是陈水扁当局的产业规划还是蔡英文时期的福利政策，多以失败告终。台湾科技和产业地位边缘化，民进党甚至将“护台神山”台积电对美国拱手相送。民进党虽然以平权、反黑金、反腐败为口号崛起，但民进党当政下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黑金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腐败问题也更加猖獗<sup>[27]</sup>。

#### （二）国民党的“天花板”困境与两岸政策的徘徊

2024 年选举中，国民党虽然未能赢得行政主导权，却在立法机构占据多数，韩国瑜成功当选立法机构负责人，进一步强化了对于民进党当政的监督权和问责权，有效打破了民进党此前的“完全当政”局面。此外，在台立法机构中，40 岁以下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有 9 人，而民进党只有 3 人<sup>[28]</sup>。这也标志着国民党正在加速世代交替，年轻世代逐渐走向权力中心，这对于推动国民党改革、打破“老旧面孔”具有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但 2024 年选战过程也透露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正往保守化方向蜕变。随着国民党本土化转型，岛内蓝绿白三方都会强化“爱台湾”的本土话语论述，甚至往合流方向发展，这会对岛内民众的家国认同和两岸统一之后的台湾社会治理埋下重要隐患。

一是国民党基本盘继续萎缩。2022 年底，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取得大胜，但这“不完全是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任投票，更多是对民进党‘一党独大’威权政治的否定”<sup>[29]</sup>。从发展态势来看，国民党支持群体进一步松动。2020 年台湾“大选”中，国民党获得 552 万票，约占投票总数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的 38.6%；而到 2024 年“大选”，国民党仅获得 467 万票，约占投票总数的 33.5%，较 4 年前明显下滑。更重要的是，“北蓝南绿”的结构被进一步固化，台湾南部更绿，国民党在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全军覆没”，未能赢得一席区域民意代表资格；台湾北部高度绿化，在传统的国民党大票仓也是国民党候选人侯友谊主政的新北市，国民党仅获得 86.4 万票，得票率为 35.17%，远低于民进党的 94.9 万票，后者得票率为 38.6%。

二是国民党或将遭遇更大选举压力。表面看来，过往八年中岛内政局形成了波浪线型的周期性新格局。例如，2016 年“大选”中民进党胜出，2018 年“九合一”选举中国国民党胜选，2020 年“大选”中民进党连任，2022 年“九合一”选举中国国民党继续保持优势，2024 年“大选”中民进党继续当政。民进党与国民党此起彼伏的波动，折射了岛内政党变局进入“快车道”，平均每两年都会发生一次变化。但我们并不能将此视为“历史的惯性”，认为 2026 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依然可以延续优势。事实上，岛内民意基础已然“绿大蓝小”，再加上民进党当政优势，未来国民党的压力将与日俱增。此外，2024 年选举过程还揭示了国民党面临的两难困境，即一方面需要联合非绿势力才有可能挑战民进党，但另一方面若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其他政党上，则必然会受制于人。未来如何在这二者之间维持相对平衡，既保持国民党的主体性，又能最大限度维持与其他政党合作，将成为国民党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三是国民党“和中”趋向“远中”。从理论上讲，作为立法机构第一大党，国民党应该掌控议程设置，在两岸政策等重大议题上启动问责机制，扮演好对赖清德和民进党的“暂停键”和“刹车片”角色，成为“忠诚的反对党”。但从客观走向来看，国民党接连三次败选，失败主义弥漫，团结罩门难解，内部将更加四分五裂。国民党内主张与大陆互动的“交流派”日益被边缘化，本土派趁势崛起。在此情势下，国民党有可能在两岸政策上犹豫摇摆，故意与大陆保持距离，避免被“抹红”或被打上“中共同路人”标签，对两岸交流中很多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上往往会保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民进党将借机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岛内蓝绿相互制衡的机制或将坍塌，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或将更加裹步不前。

### （三）蓝绿夹杀的版图重塑与第三势力空间的萎缩

在 2024 年选举中，民众党获得 369 万票，风头强劲，享受“高光”时刻，但前行之路充满坎坷。

一是政治极化的结构性限制。在台湾单一选区两票制以及马太效应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岛内政党格局两极分化，“大党更大、小党更小”。新党、台联党、亲民党等都曾昙花一现，但终归平淡，被称为“来去匆匆”<sup>[30]</sup>。2014 年台湾“太阳花学运”发生后，“时代力量”粉墨登场，一度成为台湾第三大党，但最终却被民进党收编，成为民进党的附庸和从属。未来民众党如何跳脱“第三大党陷阱”，将成为柯文哲的重要考验。

二是个人型政党的先天缺陷。民众党走向与柯文哲的政治前途息息相关。柯文哲在岛内被称为“政治变色龙”，立场摇摆不定，早期标榜自己是“比深绿更绿的墨绿”，在 2014 年台北市市长选举中与民进党联手，但后来又标榜“中间路线”，谋求与国民党合作。这种两面骑墙的政治态度，较难赢得稳定的支持者。此外，随着柯文哲不再担任台北市市长，也不再是“大选”候选人，其将缺乏政治舞台，在舆论场将被边缘化。民众党也将被泡沫化，无力挑战蓝绿两大政党。未来岛内政局将由目前的蓝绿白“三足鼎立”回归蓝绿“楚汉相争”。

三是政党领袖的低视野格局。岛内很多政治人物都只顾一己私利，罔顾主流民意。在 2024 年“大选”前，岛内民众普遍呼吁“换党做做看”。面对主流民意，岛内两大主要在野党理应携手并进，终结“台独”势力当政状况，共同为台湾民众福祉和台湾前途打拼。民众党和国民党理念相近，都反对民进党贪污滥权，主张与大陆沟通对话。但柯文哲等政治势力为了一党之私，宁可自己选不上，也不能让同路人选上，这种狭隘心理只能让民进党“躺着选”“笑着赢”。

#### （四）台湾的政治极化与“朝小野大”的治理内耗

2024 年“大选”结束后，此前民进党“一党独大”、同步掌控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使台湾政治板块发生新的移动，使台湾恢复政治生态平衡。但从客观现实来看，赖清德还未上任就已深陷信任危机，未来岛内政治厮杀与政治极化将更趋激烈。

一是“否决政治”的死循环。赖清德上台后，民进党虽然掌控了行政机构，却无法掌控立法机构，出现“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台湾立法机构将陷入“为否决而否决”的“否决政治”，很多民意代表在投票时，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党派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选区利益之上，议事过程中争论不休、久议不决，导致选举的问责功能失灵。不同政党之间的政策分野与摩擦掣肘，致使当局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妥协精神被侵蚀。其终极结果将是政治瘫痪，温和政治走向激进政治，甚至会出现“拉布”现象，各政党与政治人物均在其合法掩护下拼命争权夺利和扩张利益，而制度自身将逐渐失去其原有的自我修复能力。

二是泛政治化的廉价动员。目前，台湾地区正走向“泛政治化”泥潭。最为典型的现象之一，即台湾地区频繁诉诸全民公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公投都被视为民粹异端而被严加防范。例如，英国 300 多年宪政民主史上仅仅发生过 3 次公投，美国更是没有进行过一次全民公投，而民进党在 2004 年至 2021 年的 17 年间就发动了 5 次公投。此外，台湾每次地区领导人选举、县市长选举等也都被过分动员，在政治精英的操弄下，民意表达过于廉价化和情绪化。在此情势下，民众耐性逐渐被消耗殆尽，台湾社会韧性快速下降。

三是社会撕裂的政治衰败。台湾自开启所谓民选政治以来，“蓝绿对立”“统独对决”不断加剧台湾的社会撕裂，给台湾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戕害。民进党则是社会撕裂的直接受益者，在食髓知味之后，把“抗中牌”视作选举“灵丹妙药”，频频煽动内部族群对立，甚至还强行制造出所谓“原住民”“闽南人”和“客家人”等不同议题，夸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越了传统上统“独”之分的意识形态光谱。社会无限内耗必然催生社会衰败，即治理体系失灵。1990 年台湾地区人均 GDP 相当于新加坡的 68%，而 2022 年已经不足 44%。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观察，既要分析其形式与结构，也要衡量其政治效能。如果其已经成为台湾发展的枷锁和绊脚石，那么这种民主政治本身就值得深入检讨。

### 四、民进党的“台独”布局与两岸关系的风险与隐患

2024 年“大选”结束后，赖清德声称，其上台后将开创两岸关系“新局”，但他所谓“新局”将是台海风高浪急的危局。赖清德主动标榜自己是台湾地区唯一敢为自己贴上“台独”标签的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性格偏执死硬，被柯文哲讥讽为“‘台独’恐怖分子”。赖清德、萧美琴当选后，



被称为“独上加独”。两岸关系更趋严峻复杂, 各种变数丛生, 台海和平遭遇空前挑战, 这有可能会导致台海地区危机四伏甚至出现兵凶战危。

### (一) “台独”意识形态的驱动与民进党当局的挑衅

赖清德反复标榜所谓“台独务实工作者”形象, 在竞选期间就毫不忌讳, 公开声称“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2024 年 2 月, 在赖清德深度介入下, 民进党当局打破此前承诺, 突然禁止旅游团来大陆参访。赖清德还未上任就抛出如此“起手式”, 预设着其走马上任后在两岸政策上或更趋强硬。未来, 赖“台独”行径或将愈演愈烈, 其两岸政策或将比蔡英文更加倒退, 走对立对抗的老路和谋“独”挑衅的邪路, 让台湾离和平与繁荣越来越远, 离冲突与衰退越来越近。

一是去“中华民国”化。蔡英文声称依照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规来处理两岸事务。赖比蔡严重倒退, 在“台独”意识形态的驱动下, 声称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是“台湾的灾难”, 对“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从未提及, 更不会遵守。赖清德不但不会冻结“台独”党纲, 反而会冻结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 将之冷处理。蔡英文是借壳上市, 在“中华民国”掩护下包装“台独”, 而赖清德是“破壳上市”, 扔掉“中华民国”空壳, 直接诉诸所谓“台湾是独立主权国家”。

二是落实激进“台独”。陈水扁是“投机型台独分子”, 主要把“台独”作为选举的工具。而赖清德是“理念型台独分子”, 从不掩饰自己的“台独”底色, 甚至以此为傲。蔡英文在“台独”布局方面只做不说, 大搞以“文化台独”为代表的“柔性台独”和“隐性台独”; 而赖将采取强硬政策, 既做又说, 肆无忌惮, 强硬推行“显性台独”, 鼓吹所谓“住民自决论”和“台湾民族自决论”<sup>[31]</sup>, 公开叫嚣“台独神话”。他甚至有可能炮制李登辉的所谓“特殊两国论”或陈水扁的所谓“一边一国论”, 成为比陈水扁更为激进的“麻烦制造者”。

三是直接挑衅大陆底线。赖清德被称为“台独金孙”, 岛内深绿势力对其充满“期望”。如果赖清德的“台独”政策扭扭捏捏, 深绿势力势必会向赖清德发起反扑。此外, 赖清德虽然胜选, 但仅有 40%左右的得票率, 民进党也已失去对立法机构的掌控。这意味着, 赖清德还未上台, 就已经提前“跛脚”。在对外活动空间方面, 赖清德刚一胜选, 瑙鲁就宣布与台“断交”, 这是对赖清德的当头一棒。在内外交困情势下, 赖清德可能会主动向绿营基本盘逢迎示好, 进行“台独”作秀, 防止民意支持度崩盘。在深绿势力裹挟下, 赖有可能成为“失速列车”, 效仿李登辉炮制“两国论”, 或发动所谓“制宪公投”与“统独公投”等, 与中国大陆正面对撞。

### (二) 民进党的操弄与岛内“趋独远统”的氛围恶化

台湾政治实践正在往民粹方向恶化, 并产生了一系列后果, 这也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定的连带和辐射效应。在台湾民主发展进程中, 两岸因素表面只是外部因素, 但因为岛内的统“独”议题等持续发酵, 两岸因素事实上已经内化为台湾政治的内部因素。而当岛内政治生态和民意结构发生变化后, 自然也会对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变数。

一是压制“疑独世代”。受李登辉和民进党当政 20 余年“台独”教育等影响, 岛内民意全面绿化, “绿涨蓝消”态势明显。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台湾民众对“中国人”而非“台湾人”身份认同持续下跌, 已经不足 5%。目前, 台湾统“独”对立与族裔冲突仍处于“未完成态”。蔡英文曾以所谓“天然独”来为台湾青年打上标签, 但随着台海地区的紧张态势不断升级, 岛内青

年越来越认识到和平的重要性，进而发现所谓“天然独”只是民进党的“人造独”，于是“疑独世代”开始登场。赖清德上台后，势必全力反扑，压缩“疑独世代”舆论空间。例如，赖清德或将继续利用教科书等毒化青年群体，以所谓“天然台”的名义扭曲台湾青年的世界观和家国认同。

二是炮制所谓“台湾共同体”。民进党连续当政，进一步掌控了“政治资本”和“社会权力关系”<sup>[32]</sup>，将所谓“台式民主”鼓吹为唯一的民主形态，除此之外的就是“不民主”“专制”“威权”或者“邪恶”，全力塑造所谓“民主台湾”对抗所谓“威权中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不断推波助澜，加大对岛内民众话术洗脑和认知恐吓，企图消解中国大陆“两岸一家亲”话语的感召力，拉高台湾民众对于所谓“台湾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2024 年 2 月 14 日，民进党当局在金门海域非法追赶福建一艘渔船，导致船上 4 人全部落海，其中 2 人死亡，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蔡英文、赖清德等不但未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歉意和慰问，反而鼓动台湾网军在岛内大肆煽动民粹，诋毁和抹黑大陆形象，企图捏造“外部压力”来“凝聚台湾民众共同体意识”。

三是加剧两岸民意对抗。为将岛内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民进党当局全面阻挠干扰各项交流，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和“红色恐慌”，使岛内民众囿于信息茧房，无法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将中国大陆威慑“台独”的举措曲解为打压台湾的“暴行”，煽动“仇中抗中反中恨中”氛围，将其拉向舆论中心地带，甚至妄想推动“台独”意识主流化和板结化。目前，台湾民众对于大陆民众的认知定位，已由“同胞”蜕化为“邻居”，未来可能将由“邻居”蜕化为“敌人”，这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埋雷。台湾民意的绿化也会导致岛内民众的政党认同和政党归属逐渐往非国民党方向靠拢。

### （三）台湾“倚美抗陆”与美国“以台制华”叠加震荡

在中国和美国实力此长彼消情势下，美国对华打“台湾牌”的意愿和动能不断升高。相较于国民党，美利用民进党打“台湾牌”更加得心应手。未来美国将继续操弄台湾议题，赖清德当局也会积极逢迎，美国“以台制华”与民进党当局“倚美抗陆”将呈现叠加震荡效应。

一是拉高政治互动层级。近年来，美国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拉高与台当局的互动层级。例如，2022 年 8 月美国曾指派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窜台。未来美国有可能故技重施，指派高官窜台或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窜美。

二是强化军事武装台湾。支持台湾构建对大陆“不对称战略”，企图将台打造为“刺猬岛”，增加岛内军事弹药密集度，加大美台联演联训，构建美台所谓“互操作性”，助长民进党“以武谋独”幻想。从 2024 年起，美军顾问将常驻金门与澎湖的台湾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台湾防务力量各特战营。金门距离厦门最近处只有 1.8 公里，美国如此操作，势必会加剧地区紧张。

三是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积极拉拢日欧等集体对华打“台湾牌”，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美国还会把台海冲突与俄乌冲突、哈以冲突等并列，引导国际社会误认为“两岸关系是与俄乌关系类似的国际关系”“两岸统一是大陆‘入侵’台湾”。

岛内舆论高度担心赖清德上台后，在内部深绿势力的裹挟和外部美国因素的刺激下，或将在两岸政策上推行激进路线。但无论赖清德如何寻衅滋事，外部势力如何插手，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每次挑衅，都会成为大陆反向化危为机、强化对台海局势主导权和掌控力的重要抓手。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4 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22-134.

## 五、结语

2024 年是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超级大选年”，有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选举，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近 50%经济总量，给世界格局带来变数。台湾地区选举作为 2024 年全球首场重要选举，有可能会引发区域骨牌效应。更重要的是，2024 年台湾地区选举结果代表性的断裂将导致岛内社会分歧加剧，族群冲突升级，社会撕裂对立，政治极化扩张，并冲击台海和平，给两岸关系投下严重阴影。“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台湾同胞利益福祉背道而驰。未来若不终结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格局，根治政治衰败，台湾的前行之路将更加坎坷。只有台海地区和平稳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台湾同胞才能过上和平、安宁、富足的好日子。

### 参考文献：

- [1] 台湾“中选会”. 2024 年“大选”数据 [EB/OL]. (2024-01-13) [2024-01-22]. <https://vote2024.cec.gov.tw/zh-TW/indexP.html>.
- [2] 新华社.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评论台湾地区选举结果 [EB/OL]. (2024-01-13) [2024-01-19]. <http://www.news.cn/tw/20240113/de4b608e529742d6bb428d5993c66c41/c.html>.
- [3] 张晓栋. 政治极化与信息渗透：基于台湾地区社交媒体政治社区的分析 [J]. 台湾研究集刊, 2022 (2): 34-52.
- [4] 洪鑫诚, 张华. 台湾民主是“真民主”吗？——基于民主理论与经验指标的解释 [J]. 理论视野, 2016 (8): 49-54.
- [5] 林红. 民粹主义在台湾：对抗的政治与焦虑的社会 [J]. 台湾研究, 2019 (4): 11-25.
- [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Taiwan's Election [EB/OL]. (2024-01-13) [2024-01-19]. <https://www.state.gov/on-taiwans-election/>.
- [7] 李景华. 2020 台湾选举“分裂投票”评析 [J]. 台海研究, 2021 (2): 53-64.
- [8] 杨光斌. 观念的民主与实践的民主：比较历史视野下的民主与国家治理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5.
- [9] 张冠华. 新时代两岸融合发展的特征、形势与方向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54-64.
- [10] 新华社. 台湾业界痛批民进党当局旅游政策朝令夕改 [EB/OL]. (2024-02-08) [2024-02-11]. <http://www.xinhuanet.com/20240208/794375e45bbb46a29094f0439aad2986/c.html>.
- [11] 林冈. 中国台湾地区实践西方民主的深刻教训 [J]. 学术前沿, 2018 (8): 102-111.
- [12] 摩伊希斯·奈姆. 以民主之名的独裁：民粹、两极分化、后真相，戕害自由的 21 世纪“权力游戏” [M]. 陈于勤, 译. 台北：商周出版, 2022: 1.
- [13] 聂智琪. 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 [J]. 读书, 2016 (8): 129-130.
- [14] 卢梭. 社会契约论 [M]. 何兆武,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121.
- [15] Sheldon S. Wolin. Democracy Incorporated: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 [M].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X.
- [16] 王程. 民粹主义在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机 [J]. 台湾研究, 2022 (1): 68-77.

- [17] Eric Hobsbawm.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M]. London: Abacus, 1995: 429-430.
- [18]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of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15-118.
- [19]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身份政治与左派 [J]. 易晖, 译.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7 (1): 37-43.
- [20] Bernard Crick. Democrac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1.
- [21] 余泓波, 吴心喆. 当民主遭遇民意: 台湾民众的民主观念分析 [J]. 太平洋学报, 2017 (7): 87-95.
- [22] 塞缪尔·亨廷顿. 我们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 [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5: 268-278.
- [23] 王艺桦. 台湾地区关联性选举: 态势、缘由与危害 [J]. 闽台关系研究, 2023 (4): 44-55.
- [24] 陈先才, 林兆龙. 从“九合一”选举看 2024 年“大选”: 台湾政党竞争新态势 [J]. 台湾研究, 2023 (2): 46-54.
- [25] 韩冰. 2022 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观察 [J]. 台海研究, 2023 (3): 97-105.
- [26] 韩冰. 台湾“网红政治”: “民主深化”还是“娱乐至死” [J]. 世界知识, 2019 (7): 65-67.
- [27] 任羽中. 台湾基层民主选举中的“黑金政治” [J]. 太平洋学报, 2005 (2): 83-91.
- [28] 赖颀霓. 新“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平均年龄 52.83 岁, 国民党意外成最年轻党团、民众党最老 [EB/OL]. (2024-01-17) [2024-02-11].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192937](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Type=24&SerialNo=192937).
- [29] 钟厚涛. 台湾地区 2022 年“九合一”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84-93.
- [30] 方锦程, 谢楠. 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与前景 [J]. 台湾研究, 2023 (4): 31-42.
- [31] 薛佳贝. “台湾自决论”发展动向与学理批驳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2): 104-114.
- [32] 布迪厄. 实践理性: 关于行为理论 [M]. 谭立德,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200.

责任编辑: 杨稀琴



#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 及制约因素解析

——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

杨昆福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台湾统派政党作为岛内的爱国统一力量, 参选岛内公职人员是其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民进党于2016年1月在台湾“大选”胜出并于同年5月上台后, 统派政党的政治参与面临新的形势。在新形势之下, 该类型政党参选公职人员呈现新特征与新态势。就参选特征而言, 统派政党从以宣扬理念为主演变为被动参选, 在参选过程中未能与泛蓝大党有机整合, 以及参选人员以“政治素人”居多且各自为战。从选举成效来看, 老牌统派政党当选概率较高, 但当选层级大多集中在县市民意代表以下。在未来参选态势方面, 统派政党主要有三种竞选新模式: 其一, 联合竞选, 共同造势; 其二, 向下扎根, 布局基层; 其三, 点状突破, 链式串联。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政治环境及竞选资源四个层面是制约统派政党参选的结构因素。在当下岛内政治新局面之下, 壮大统派政党力量的相关路径成为反“独”促统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 统派政党; 参选公职; 选举现况; 特征态势; 结构性因素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378 (2024) 02-0135-19

2024年1月, 赖清德在台湾“大选”中因蓝白阵营各自为战渔利, 靠绿营基本盘的支持, 实现

DOI: 10.13946/j.cnki.jcqi.2024.02.011

**作者简介:** 杨昆福,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厦门市陈元光学术研究会秘书长, 厦门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引用格式:** 杨昆福.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35-153.

“少数当选”。岛内统派政党的发展及反“独”促统面临新的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反对‘台独’分裂行径，推进祖国完全统一。”<sup>[1]</sup>台湾统派政党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该类型政党之间存在政治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对两岸统一方式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但反对“台独”和支持两岸统一，成为该类型政党的共同之处及区别于其他岛内小党的鲜明特征。在两岸关系倒退恶化的当下，统派政党在岛内以各种形式宣扬统一理念，通过多种渠道反制“台独”分裂势力，对于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能够产生正面效用。

对台湾统派力量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具有长远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但目前学界对统派力量展开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文献不多，不管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均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现有文献的研究主题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侧重对统派概念及主张的厘清与界定。林伟和胡时梳理了台湾统派的内涵，并厘清其整体思想主张及其不同流派的理念差异<sup>[2]</sup>。吴陈舒分析了台湾统派的概念演变，阐述了台湾统派概念被接受的历程及统派力量从“拥统派”到“新统派”的政治演变等相关特征<sup>[3]</sup>。这些分析有一定的新意，较好地诠释了统派力量的内涵与外延。其二，分析统派的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明庭权分析了统派力量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并对其影响因素开展研究<sup>[4]</sup>。任冬梅同样阐述了统派力量的发展现状和困境<sup>[5]</sup>。两位学者的观点各有侧重，对了解统派力量发展现状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三，探讨壮大统派力量的对策。刘晓楠和苏昌强主要聚焦于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sup>[6]</sup>。邵俭福和宫捷从政治合作的视角切入，探讨大陆和台湾统派力量开展政治合作的可行性与策略选择<sup>[7]</sup>。郭艳聚焦于马英九主政时期，台湾统派依旧处于边缘地位并未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进而凸显“和平统一”论述及“中国认同”重塑的重要性<sup>[8]</sup>。林伟、胡时及吴陈舒等学者在界定统派概念的同时，探析了对台湾统派团体开展工作的思路 and 策略。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主要针对统派力量的基本概念、发展状况、未来趋势及如何做统派工作等层面展开论述，倾向于对总体情况的描述及背后原因的探讨。相关研究对作为统派力量主要组成部分的统派政党，特别是其参选公职人员情况的系统性分析鲜有涉及。投入“体制内竞争”参选岛内公职人员，是统派政党扩大政治参与、提升影响力乃至发展壮大的重要路径之一。对此类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是在民进党霸据台湾当局主导权的形势下，对统派政党投入岛内公职选举的现状特征、发展态势及制约因素进行深度剖析，是新形势下探索发展壮大统派政党力量的现实需求。本文的论述主要基于 2016 年“大选”以来统派政党参选历次公职的情况。

## 一、统派政党参与台湾地区重要选举的现状

从 2016 年 1 月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获胜以来，台湾共经历了三次“二合一”选举、两次“九合一”选举，分别是 2016 年、2020 年和 2024 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选举，以及 2018 年和 2022 年的“九合一”选举。受制于政党实力、影响力及地区正副领导人“选罢法”的相关规定，统派政党除了亲民党外，大多未投入地区领导人选举，但一般不缺席其他层级公职的角逐。

### （一）统派政党参与台湾“大选”情况

在台湾“大选”层级，统派政党较少加入战局，亲民党是个例外。亲民党被认为是泛统派政党，

尤其是该党主席宋楚瑜曾明确表态, 亲民党坚持“两岸一中”<sup>[9]</sup>, 该党近年来所属的政治光谱越发鲜明。亲民党一度成为台湾的“第三大党”, 其成员曾广泛投入岛内各层级的公职选举。最具指标性的是该党主席宋楚瑜共五次投入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宋楚瑜除了 2004 年担任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的竞选副手外, 其余皆为独立参选。2016 年以来, 宋楚瑜参与了两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他在 2016 年“大选”中的得票率高达 12.83%, 获得了 157 万票, 在 2020 年“大选”中的得票率与得票数大幅下滑, 仅分别为 4.26% 和近 61 万票 (见表 1)。在 2016 年“大选”中, 宋楚瑜之所以能够冲高票数, 主要在于吸收了对国民党不满的票源。在 2020 年“大选”中, 民进党利用香港“修例风波”操弄“抗中保台”, 骗取了大量年轻群体的支持, 冲高了得票率与得票数; 国民党则凝聚了基本盘的票源, 致使亲民党再次陷入边缘化状态。宋楚瑜的几次参选虽在客观上分散了泛蓝阵营的票源, 却为亲民党维持政党运作提供了一定的补助款。

表 1 宋楚瑜参选 2020 年及 2016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情况

2020 年第 15 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结果			
候选人	推荐政党	得票数 (票)	得票率 (%)
宋楚瑜 余湘	亲民党	608 590	4.26
韩国瑜 张善政	中国国民党	5 522 119	38.61
蔡英文 赖清德	民主进步党	8 170 231	57.13
2016 年第 14 任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选举结果			
候选人	推荐政党	得票数 (票)	得票率 (%)
宋楚瑜 徐欣莹	亲民党	1 576 861	12.83
朱立伦 王如玄	中国国民党	3 813 365	31.04
蔡英文 陈建仁	民主进步党	6 894 744	56.12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President>, 访问时间: 2024-02-25。

## (二) 统派政党参与民意代表及“九合一”选举情况

2016 年以来, 统派政党继续参与全台性的民意代表选举及地方性的“九合一”选举, 但选战结果均较为不理想, 主要表现在提名人数和参选区域都较少, 得票数和得票率均较低。并且, 未见指标性的统派政治人物通过参选公职的方式, 加入岛内权力运作体系, 进而发挥影响力。

### 1. 统派政党参与民意代表选举情况

在 2024 年 1 月举行的民意代表选举中, 不少统派政党参选人投入竞选, 但均无人当选。其中, 特定统派成员为提高得票率, 以无党籍的身份投入“区域民意代表”选战。

在“区域民意代表”及“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方面, 有 10 个左右的统派政党参与角逐。其中, 中华统一促进党和司法改革党提名席次最多。中华统一促进党在 8 个县市推出 10 名候选人,

司法改革党则在 7 个县市同样提名 10 人参选。新党和司法改革党还分别提名人选参与平地和山地台湾少数民族选区民意代表选举（见表 2）。总体而言，统派政党的得票数和得票率均处于低位，在各自选区均未能彰显政党主体性及发挥影响力，也未能冲击蓝绿既定的政党格局。台北第 1 选区则例外，新党成员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在 8 名参选人中位列第 3，斩获 14.64% 的得票率，仅次于国民党和民进党候选人。但该名统派人士的参选也让民进党籍候选人渔利，导致国民党籍候选人以微弱差距败选<sup>[10]</sup>。在“不分区民意代表”及“侨选民意代表”选举方面，共有 4 个统派政党投入竞选，占投入参选政党总数的比重达 25%，这显示统派政党参选的积极性不低。其中，亲民党、司法改革党和新党分别提名 10 席、9 席和 8 席，中华统一促进党则提名 4 席（见表 3）。此次亲民党提名候选人参选“不分区民意代表”，但缺席了“区域民意代表”的竞选。

表 2 台湾第 11 届（2024 年）“区域民意代表”及“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总得票数	总得票率 (%)	选区
中华统一促进党	10	13 203	0.10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彰化县、云林县、屏东县
劳动党	1	6 453	0.05	高雄市、南投县
中华妇女党	1	1 029	0.01	新北市
中华联合党	1	4 139	0.03	屏东县
兴中同盟会	1	136	0.00	台北市
中华爱国同心党	1	310	0.00	台北市
经济党	1	472	0.00	台北市
司法改革党	10	38 334	0.27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竹市
新党	1	8 280	0.06	桃园市
无党籍（新党）	1	28 510	0.20	台北市
新党	1	863	0.72	平地台湾少数民族选区
司法改革党	1	351	0.24	山地台湾少数民族选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3 台湾第 11 届（2024 年）“不分区民意代表”及“侨选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得票数	得票率 (%)
新党	8	40 429	0.29
中华统一促进党	4	18 425	0.13
亲民党	10	69 817	0.51
司法改革党	9	37 755	0.2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在2016年及2020年的民意代表选举中，老牌统派政党在“不分区民意代表”选战方面成绩不俗。新党、亲民党及中华统一促进党均投入2016年及2020年的“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见表4、表5），亲民党和中华统一促进党还同时投入相应年份的“区域民意代表”选举。其中，新党和亲民党在这两届“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的表现可圈可点。亲民党在2016年1月的“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政党票得票率为6.5203%，分得了3席“不分区民意代表”席次。新党的政党票得票率也冲到了4.1843%，即便未能跨过5%的不分区席次分配资格门槛，但由于政党票得票率超过了3.5%（2017年11月调整为3%）<sup>[11]</sup>，不但可以取得每票每年50元新台币的政党补助金，而且可获得连续3届的民意代表选举直接提名“不分区民意代表”的资格。得益于在2016年“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的得票率，新党可连续4年，每年获得2550.37万元新台币的政党补助金，而亲民党每年可取得3974.19万元新台币补助金<sup>[12]</sup>。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党和亲民党运作资金短缺的问题。在2020年1月的“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中，亲民党和新党分别获得3.6647%和1.0408%的选票。亲民党继续获得政党补助资格。新党虽未能获得政党补助金，但因得票率超过1%，在接受政治献金时，捐献人或单位可列举所得税扣除额，可提升后者对新党捐献政治献金的动力<sup>[13]</sup>。这对统派小党的发展产生了正面效益。

表4 台湾第9届（2016年）“不分区民意代表”及“侨选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得票数（票）	得票率（%）
新党	10	510 074	4.184 3
中华统一促进党	10	56 347	0.462 2
亲民党	16	794 838	6.520 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5 台湾第10届（2020年）“不分区民意代表”及“侨选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得票数（票）	得票率（%）
新党	10	147 373	1.040 8
中华统一促进党	7	32 966	0.232 8
亲民党	22	518 921	3.664 7
劳动党	2	19 941	0.140 8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在“区域民意代表”及“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方面，有5个统派政党投入2016年1月的选举（见表6），在2020年1月的选举中多达14个（见表7）。其中在“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部分，亲民党及“中国生产党”于2016年分别加入平地及山地选区的角逐，而在2020年则无统派政党参选。

表 6 台湾第 9 届（2016 年）“区域民意代表”及“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总得票数（票）	总得票率（%）	选区
新党	2	75 372	0.631 2	台北市、金门县
亲民党	6	150 021	1.256 3	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
台湾工党	5	6 098	0.051 1	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澎湖县、金门县
中华统一促进党	14	18 812	0.157 5	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新竹县、屏东县、连江县
亲民党	1	6 191	6.54	平地台湾少数民族选举区
“中国生产党”	1	568	0.50	山地台湾少数民族选举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7 台湾第 10 届（2020 年）“区域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席次	总得票数（票）	总得票率（%）	选区
劳动党	10	13 694	0.098 6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苗栗县、彰化县、宜兰县
亲民党	10	60 614	0.436 5	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台湾工党	3	2 041	0.014 7	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
中华统一促进党	10	8 790	0.063 3	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苗栗县、嘉义县、屏东县、花莲县、金门县
中华妇女党	1	3 507	0.025 3	台北市
中华联合党	1	306	0.002 2	台南市
中华新住民党	1	428	0.003 1	金门县
“中国生产党”	1	112	0.000 8	金门县
兴中同盟会	1	155	0.001 1	高雄市
中华文化复兴在理党	1	1 296	0.009 3	桃园市
“中国和平统一党”	1	570	0.004 1	新北市
中华爱国同心党	1	134	0.001 0	台北市
台湾前进党	2	1 356	0.009 8	台中市、花莲县
中华照生党	1	1 999	0.014 4	新北市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Legislator>，访问时间：2024-02-25。

## 2. 统派政党参与“九合一”选举情况

在县市长选举层级，统派政党的参与度一般较低。2018 年无统派政党提名参选人，在 2022 年则有共和党和龙党分别提名参选人参选台北市长和金门县长（见表 8）。在县市民意代表选举层级，共有 8 个统派政党参与 2018 年的县市民意代表选举（见表 9），10 个政党参与 2022 年县市民意代表

杨昆福.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35-153.

选举（表10）。其中，有少数统派政党同时在“六都”及非“六都”提名参选人。例如，投入2018年县市民意代表选举的亲民党与中华民族致公党，以及参与2022年县市民意代表选举的亲民党和劳动党。在这两次县市民意代表选举提名中，2018年统派政党提名人选数量总体上超过了2022年。2018年共有49人经由统派政党提名投入参选，且提名超过10人的政党有3个。在2022年仅仅有25人投入参选，提名超过10人的统派政党仅有1个，大多数统派政党在该年仅象征性地推荐1名参选人投入选举。可见，提名参选的数量和积极性呈现下滑态势。

表8 2022年台湾县市长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候选人	选区	得票数（票）	得票率（%）
共和党	唐新民	台北市	316	0.02
龙党	朱纪玮	金门县	174	0.37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Mayor>,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tyMay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9 2018年台湾县市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六都”民意代表选举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新党	10	台北市（7） 新北市（3）	2	台北市（2）
亲民党	14	台北市（4） 桃园市（3） 台中市（3） 台南市（1） 高雄市（3）	4	台北市（2） 台中市（1） 高雄市（1）
中华民族致公党	2	台北市（2）	0	--
“中国民主进步党”	1	台北市（1）	0	--
台湾人民共产党	1	台南市（1）	0	--
非“六都”民意代表选举				
亲民党	12	宜兰县（1） 台东县（2） 基隆市（6） 新竹市（1） 金门县（2）	4	宜兰县（1） 台东县（1） 基隆市（2）
中华民族致公党	1	金门县（1）	1	金门县（1）
中华统一促进党	5	苗栗县（2） 彰化县（1） 屏东县（2）	0	--
新华劳动党	1	南投县（1）	0	--
劳动党	2	新竹县（2）	2	新竹县（2）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Mayor>,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tyMay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10 2022 年台湾县市民意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六都”民意代表选举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新党	10	台北市 (6) 新北市 (3) 桃园市 (1)	1	台北市 (1)
亲民党	1	桃园市 (1)	0	--
共和党	1	台北市 (1)	0	--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	1	台北市 (1)	0	--
台湾人民共产党	1	台北市 (1)	0	--
“中国和平统一党”	1	新北市 (1)	0	--
劳动党	1	新北市 (1)	0	--
前进党	1	台中市 (1)	0	--
非“六都”民意代表选举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亲民党	4	宜兰县 (1) 基隆市 (3)	2	基隆市 (2)
中华统一促进党	1	澎湖县 (1)	0	--
台湾新住民党	1	南投县 (1)	0	--
劳动党	2	新竹县 (2)	1	新竹县 (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cilMember>,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tyCouncilMember>, 访问时间：2024-02-25。

在基层选举中，统派政党的参选公职存在一定的当选概率。在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方面，统派政党缺席了 2018 年的乡（镇、市）长选举，仅有 4 个统派政党提名参选同年的乡（镇、市）民代表选举（见表 11）。在 2022 年，劳动党和台湾工党各自提名 1 人参选乡（镇、市）长（见表 12），3 个政党提名参选乡（镇、市）民代表（见表 13）。中华民族致公党于 2018 年在金门县提名 4 名参选人投入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有 2 人成功当选。在村（里）长选举层级，在 2018 年及 2022 年，统派政党分别有 6 个和 13 个投入选举。其中，亲民党、中华民族致公党及中华统一促进党三个统派政党在 2018 年分别有 1 名提名人成功当选（见表 14），在 2022 年中华统一促进党及统一联盟党等政党共有 4 名提名人成功当选（见表 15）。

表 11 2018 年乡（镇、市）民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亲民党	1	新竹县 (1)	0	--

杨昆福.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35-153.

中华民族致公党	4	金门县(4)	2	金门县(2)
“华裔和合党”	1	彰化县(1)	0	--
劳动党	1	新竹县(1)	0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ityRepresentatives>，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12 2022 年乡（镇、市）长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劳动党	1	新竹县(1)	0	--
台湾工党	1	屏东县(1)	0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ityMayor>，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13 2022 年乡（镇、市）民代表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劳动党	1	新竹县(1)	1	新竹县(1)
台湾工党	1	屏东县(1)	0	--
共和党	1	苗栗县(1)	0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ityRepresentatives>，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14 2018 年村（里）长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亲民党	2	新竹县(1) 台东县(1)	1	台东县(1)
中华民族致公党	4	台北市(3) 桃园市(1)	1	桃园市(1)
中华统一促进党	6	新北市(4) 彰化县(1) 屏东县(1)	1	新北市(1)
“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	1	台北市(1)	0	--
经济党	1	新北市(1)	0	--
“华裔和合党”	1	桃园市(1)	0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VillageChief>，访问时间：2024-02-25。

表 15 2022 年村（里）长选举统派政党参选情况

政党	提名总数	参选区域及人数	当选总数	当选区域及人数
“中国民众党”	1	台北市(1)	0	--

亲民党	1	基隆市 (1)	0	--
中华民族致公党	1	台北市 (1)	0	--
中华统一促进党	4	新北市 (1) 桃园市 (1) 新竹县 (1) 苗栗县 (1)	2	新北市 (1) 花莲县 (1)
新华劳动党	1	新北市 (1)	0	--
台湾进步党	1	台北市 (1)	0	--
新生党	1	高雄市 (1)	0	--
经济党	1	台北市 (1)	0	--
“全国人民党”	1	花莲县 (1)	1	花莲县 (1)
中华文化复兴在理党	1	台北市 (1)	0	--
统一联盟党	3	新北市 (1) 桃园市 (1) 台中市 (1)	1	桃园市 (1)
夏潮联合会	1	新北市 (1)	0	--
前进党	1	花莲县 (1)	0	--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VillageChief>，访问时间：2024-02-25。

## 二、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新特征与发展态势

自台湾解除“党禁”以来，统派力量以各种方式进行政治参与。从 2016 年 5 月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统派政党面临了新的政治形势，参选公职人员呈现有别于以往的新特征及新态势。

### （一）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新特征

由于政治环境的变换，包括统派政党在内的统派力量，参选公职的目的、方式、样态及效果具有区别于其他岛内政党的群体性特征。这些特征的生成与呈现背后有着深层的内在动因。

#### 1. 从宣扬理念为主到被动参选公职

在统派政党之外，台湾一度存在不少宣扬两岸统一、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统派政治团体。但是，民进党当局利用 2017 年 12 月 6 日公布实施的“政党法”，要求岛内政治团体在限期之内修正章程转型为政党，否则废止立案<sup>[14]</sup>。此前根据“人民团体法”立案的统派政治团体不少被废止立案，部分则登记为政党（见表 16）。按照“政党法”第 27 条第 2 项规定，政党若连续四年未按规定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将会被废止备案。此项规定强制要求各个政党必须投入选举，无形中让群体边界较为鲜明，以宣扬政治理念、表达政治诉求为主的统派政治团体面临组织架构调整、政治献金吸收、选举布局动员等各个层面的政党运作实务问题。几个转型为政党的统派政治团体如统一联盟党、夏潮联合会及“中华爱国同心党”被动投入了选举。其中，统一联盟党和夏潮联合会主要参与了 2022 年的基层村（里）长选举，前者提名的 1 名候选人成功当选了桃园市辖区的村（里）长。由“中华爱国同心会”转型而来的“中华爱国同心党”则参与民意代表层级的选举。该党分别于 2020

年及 2024 年各自提名 1 名候选人参与选举，但得票率均较不理想。

表 16 部分统派政治团体转型为政党名单

政治团体名称	政党名称	负责人	法人登记日期
“中国统一联盟”	统一联盟党	戚嘉林	2019 年 11 月 14 日（设立） 2023 年 8 月 15 日（变更）
夏潮联合会	夏潮联合会	曾舜旺	2021 年 2 月 4 日
商工统一促进会	商工统一促进会	曾建祥	2020 年 3 月 6 日
中华爱国同心会	中华爱国同心党	顾希君	2019 年 11 月 20 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内务主管部门政党资讯网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party.moi.gov.tw/>，访问时间：2024-02-25。

除了统派政治团体被迫转型为政党并参选公职人员外，大量统派政党也因“政党法”的实施被动参与选举。此前，“人民团体法”虽规定政党及全台性政治团体须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但并未明确规定未参与选举的相应惩罚性措施。换言之，政党不一定得参选公职。“政党法”实施后，不少此前未投入公职人员选举的统派政党被迫参加竞选活动。从 2018 年“九合一”选举以来，统派政党提名候选人参与各个层级选举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长。但不少统派政党“志不在当选”，除了受制于政党实力或基于宣扬政党理念考量外，更多的是进行象征性提名，以符合“政党法”的相关规定。

## 2. 未能与泛蓝大党整合，稀释票源渔利绿营

统派政党参选岛内各层级的公职人员，虽难以撼动既定的政党竞争格局，但在特定的选战中，不排除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特定的情况之下，统派政党可能会因转移深蓝群体的支持而分流并稀释泛蓝阵营主要政党的票源。例如，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多次投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尽管未能撼动既定的蓝绿架构，但客观上造成了泛蓝阵营票源的稀释。2016 年以来，宋楚瑜曾连续两次投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得票数分别是 2016 年的 1 576 861 票及 2020 年的 608 590 票。宋楚瑜的参选分流了国民党票源，也削弱了国民党反制民进党的战力。

在选情呈现胶着拉锯的情形之下，在特定选区的知名度较高、影响力较大的统派人士，若未能与泛蓝阵营的候选人有效整合且独立参选，可能会对泛蓝整体选情产生不利的影 响。例如，在 2024 年 1 月的民意代表选举中，新党籍的侯汉廷以无党籍身份投入台北市第 1 选区选举，由于其与国民党籍候选人张斯纲整合失败，即便张斯纲获得新党副主席李胜峯的加持，但依旧未能最大限度集中票源。张侯二人各自为战造成泛蓝分裂，最终导致民进党籍候选人吴思瑶渔利胜选（见表 17）。

表 17 台北市第 1 选举区“区域民意代表”选举候选人得票数

号次	姓名	性别	得票数	得票率 (%)	推荐政党
1	吴思瑶	女	91 958	47.22	民主进步党
2	张斯纲	男	71 837	36.89	中国国民党
3	赖宗育	男	836	0.43	人民民主党

4	侯汉廷	男	28 510	14.64	无
5	张台胜	男	161	0.08	人民最大党
6	胡金城	男	255	0.13	人民最大党
7	许盛锋	男	231	0.12	无
8	陈执中	男	950	0.49	台湾双语无法党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第 16 任地区正副领导人及第 11 届民意代表选举网站的资料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vote2024.cec.gov.tw/zh-TW/indexP.html>，访问时间：2024-02-25。

### 3. “政治素人”居多，各自为战弱化战力

纵观代表统派政党投入公职选举的候选人，大多数为“政治素人”，缺乏政坛历练，不少为第一次或第二次参选。除了极少数平时较为活跃外，绝大多数统派政党候选人的知名度、影响力及号召力十分不足。以 2024 年 1 月的台湾“区域民意代表”及“台湾少数民族民意代表”选举为例，除了新党的侯汉廷及游智彬的知名度较高外，其余参选人的政坛影响力较低，难以有效凝聚票源。加上各统派政党对推进两岸统一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各自政治立场与诉求不尽相同，他们在选战过程中没能形成一股团结整合的力量，也未能协同作战和相互拉抬选情。这一现象对选举结果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 4. 老牌政党当选率较高，当选层级在县市民意代表以下

统派政党提名候选人参选岛内各级公职人员，当选层级均在县市民意代表以下，并且当选人员以老牌统派政党成员居多。由于受岛内特殊的政治生态影响，加上缺乏选举资源与政治影响力，统派政党提名人选成功当选县市长、民意代表及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概率较低。即便有不少统派政党提名候选人参与“区域民意代表”或“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但大多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若有统派政党人员当选公职，也主要集中在县市民意代表、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层级。例如，在县市民意代表选举层级，2018 年共有 13 人当选，提名政党为新党、亲民党、劳动党及中华民族致公党。而 2022 年仅有 4 人当选，由新党、亲民党和劳动党提名。在乡（镇、市）民代表选举层级，2018 年仅有中华民族致公党提名的 2 人当选，而在 2022 年则是劳动党提名的 1 人当选。在村（里）长选举层级，2018 年当选的 3 人分别来自亲民党、中华民族致公党及中华统一促进党。在 2022 年有 4 人当选，其中 2 人由中华统一促进党提名，另 2 人分别由统一联盟党及“全国人民党”推荐。除了“全国人民党”是 2016 年 1 月才成立的，其他几个老牌统派政党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尽管统一联盟党于 2019 年 4 月成立，但其前身“中国统一联盟”成立时间早至 1988 年 4 月。

## （二）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新发展态势

在新的政治形势之下，统派政党参选公职人员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受制于不友善及不利的政治因素，统派政党为了能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谋求生存及发展空间，有必要探索各种形式及路径的参选公职新模式。

### 1. 联合竞选，共同造势

统派政党在政治光谱上属于泛蓝阵营，同时也是蓝绿两大党之外的小党。在参选公职人员方面，统派政党和其他类型的台湾小党类似，均难以大幅度赢取政治认同与支持，也不能有效开拓票源。



此外, 统派政党的整体政治理念, 对台湾前途及两岸关系的定位与民进党当局形成鲜明对立, 时常遭遇后者的政治打压与司法迫害。这类政党提名候选人参选岛内公职面临更大的压力与阻力。在新形势之下, 统派政党候选人广泛串联并协同合作, 进行联合竞选, 发表共同政见, 壮大舆论声势, 维护共同政治利益, 成为他们提升政治参与效能的可行路径选择。例如, 在2020年1月的民意代表选举之前, 中华照生党副主席徐金菊登记参选新北市第5选区民意代表, 获得40个小党的共同推荐。其中, 联名推荐的政党大多数是政治立场鲜明的统派政党。如此运作的主要目的是规避若4年内未提名候选人参选公职会被废止立案的风险。尽管这个做法最终被主管部门裁定违反1名候选人只能被1个政党推荐的规则<sup>[15]</sup>, 但此种采取多党共同提名的方式在台湾尚属首例, 可视为统派政党采取联合竞选的有益尝试。2023年7月, 统派色彩鲜明的台湾工党主席晏扬清与台湾小党公民党主席钱汉清宣布搭档参与2024年“大选”, 并号召台湾小党团结合作改变“恶质政治”。未来, 统派政党若欲在激烈的选举竞争中凸显角色存在, 与其他理念类似的政党或阵营协同作战、共同竞选, 将成为一个操作性较强的方式。

## 2. 向下扎根, 布局基层

在2024年1月的两项选举中, 标榜“超越蓝绿”的柯文哲及其旗下的台湾民众党再次异军突起, 阶段性地打破了原本蓝绿二元对立的旧式政治架构。号称“第三势力”的“白色力量”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扮演“关键少数”的角色, 形成了“两大一小”的政党竞争格局。相较之下, 统派政党受制于结构性因素, 很难在“大选”、民意代表及县市长选举层级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过, 在县市民意代表及以下层级存在一定的作为空间。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 岛内政治环境对统派政党的发展变得更加不友善, 但依旧有部分统派政党在县市民意代表及以下层级的选举中成功获得公职。如果说统派政党参选台湾两项选举及县市长选举意在宣扬统派理念, 同时满足“政党法”4年内须参选公职的硬性规定, 那么投入县市民意代表及以下层级的选举, 尤其是最为基层的村(里)长选举, 将对统派政党向下扎根、培养在地人才, 进而实现稳步发展、开拓基层政治版图产生正面助益。县市民意代表及以下层级也将成为台湾统派政党未来在岛内竞选中着力的重要场域。

## 3. 点状突破, 链式串联

台湾统派政党推荐候选人参选岛内公职人员, 并非如同蓝绿大党那般采取地毯式的提名方式, 而是依据各自实际情况采取在部分或个别县市投入竞选。例如, 统派老牌政党劳动党多次在新竹县提名县市民意代表、乡(镇、市)长及乡(镇、市)民代表候选人(见表18)。在2018年和2022年, 该党在新竹县分别提名2席, 2018年2席均当选, 2022年则有1席当选。而在乡(镇、市)民代表层级, 该党在2018年选举中提名1席未能当选, 在4年后则当选1席。从统派政党实力的角度来看, 劳动党在新竹县参选公职人员的战绩颇佳, 与该党在当地的长期经营与布局有着密切关联。劳动党发源于岛内劳工运动, 倡导社会改革, 主张分配正义, 以维护劳工利益为依归, 较为契合劳工大县新竹县选民的需求。劳动党也积极布局“区域民意代表”选举, 先后投入了2020年和2024年的选战。在2020年“区域民意代表”选举中, 劳动党提名的候选人遍布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及高雄市等7个县市。

有些统派政党则以其法人主事务所所在的县市为主要竞选区域, 提名候选人投入公职人员选举。例如, 在2020年“区域民意代表”选举中, 中华照生党、兴中同盟会、中华新住民党、中华联合党

及中华妇女党等政党分别提名 1 名参选人，参与各自政党的法人主事务所所在的新北市、高雄市、金门县、台南市及台北市的民意代表选举。在 2022 年村（里）长选举中，经济党、中华文化复兴在理党及台湾进步党均分别提名 1 名候选人，投入这三个政党法人主事务所所在的台北市村（里）长选举。龙党同样以其法人主事务所所在的金门县为竞选区域，参与 2022 年金门县长选举的角逐。这些统派政党采取点状突破的策略，并以此为根基在后续的选战中展开进一步的布局。这种选战布局方式成为统派政党竞选公职人员的一大特色。

表 18 劳动党参选新竹县市民意代表层级以下公职情况

提名年份	参选层级	提名区域及席次	当选区域及席次
2018 年	县市民意代表	新竹县（2）	新竹县（2）
2022 年		新北市（1） 新竹县（2）	新北市（0） 新竹县（1）
2018 年	乡（镇、市）民代表	新竹县（1）	新竹县（0）
2022 年		新竹县（1）	新竹县（1）
	乡（镇、市）长	新竹县（1）	新竹县（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选举与“公投”资料库网站的数据整理和制表。

网址：<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cilMember>，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ountyCouncilMember>，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ityRepresentatives>，  
<https://db.cec.gov.tw/ElecTable/Election?type=CityMayor>，访问时间：2024-02-25。

### 三、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制约因素剖析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人员在表面上可通过政党竞争的方式，力争赢得岛内民众的认同与支持，进入岛内权力运作体系，参与权力资源的分配，进而进一步提升媒体能见度、舆论引导力及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却受制于结构性与复合性因素，陷入边缘化及泡沫化的困境。

#### （一）偏绿的政治生态

台湾在历经李登辉、陈水扁及蔡英文主政时期近 30 年的“去中国化”教育及其政治社会化进程之后，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认同意识及向心力不断被稀释和弱化。在民进党当政时期，该党肆意动用公权力资源，全面绿化岛内舆论环境，灌输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及绿营版的“政治正确”，致使“台湾人认同”被高度泛政治化。在统“独”立场方面，主张“永远维持现状”和“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泛维持现状”倾向成为岛内的民意主流。而“偏向独立”与“尽快独立”的比率总和则较大幅度领先“偏向统一”与“尽快统一”的比率加总。从本质来看，台湾的“统独”意识和认同问题在于，“台独”势力把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内涵从国家认同剥离，并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窄化为“大陆认同”，制造美化的“台湾认同”与丑化的“大陆认同”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对立<sup>[16]</sup>。由于受到“台独”思想毒害，一些台湾同胞对两岸关系性质和国家认同问题的认识出现偏差，对祖国统一心存疑惧<sup>[17]</sup>。在绿营长期的政治操弄之下，台湾社会总体上呈现偏向绿营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此种政治生态对于统派力量的发展壮大十分不友善，也对统派政党参选岛内公职人员形成了不利的政治环境

与社会氛围。

## (二) 不利的选举制度

2005年, 国民党和民进党联手修改了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 对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制度进行重大改革。除了将席次减半, 由原有的225席调整为113席外, 民意代表产生方式也修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在开展民意代表选举时, 选民需投两票: 一票选“区域民意代表”; 另一票为“政党票”, 投给支持的政党, 票选“不分区民意代表”。其中, “区域民意代表”选举采取“相对多数决制”, “不分区民意代表”选举则采用“比例代表制”。台湾有学者认为, “单一选区制”主要的问题在于“赢者全拿”, 造成立法机构席次分配不公, 使大党代表过多, 小党代表过少, 不能精确地反映民意及政党实力, 让小党不太容易生存<sup>[18]</sup>。选举游戏规则的变更极大地限缩了包括统派政党在内的台湾小党的支持基础及拓票空间, 这类型政党的发展空间被限制在了县市民意代表选举层级以下, 陷入了当选空间被压缩的发展困境。

从参选门槛来看, 各类型政党推荐候选人参选岛内各层级公职人员, 须缴纳相应的保证金(见表19)。参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须缴纳的保证金高达1500万元新台币, 若其得票率未能超过选举人总数的5%, 巨额保证金将被没收。政党提名“不分区民意代表”, 须按登记人数缴纳相应的保证金, 若候选人未当选, 不得退还。在“区域民意代表”方面, 假若候选人的得票未达应选出名额除该选举区选举人总数所得商数百分之十, 则会被没收保证金<sup>[19]</sup>。其他层级的公职人员选举, 同样被设置了类似的保证金退还门槛。尽管参选保证金及退还门槛设置的初衷旨在规范选举秩序、规避无序参选, 但在实际运作中却沦为“有钱党的游戏”, 大多数小党尤其是统派政党参选的层级及规模受到较大程度的限缩。

表19 台湾各级选举候选人登记应缴纳保证金数额及退还门槛

参选层级	保证金(单位: 万元新台币)	退还门槛
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	1500	选举人总数5%
不分区民意代表	20	当选
区域民意代表	20	选区选举人总数/应选出名额×10%
“直辖市”	150	
“直辖市民意代表”	20	
县(市)长	20	
县(市)民意代表	12	
乡(镇、市)长	12	
“直辖市”山地台湾少数民族区长	12	
乡(镇、市)民代表	5	
“直辖市”山地台湾少数民族区民代表	5	
村(里)长候选人	5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台湾选务机构资料及台湾“法规资料库”整理和制表。

网址: <https://web.cec.gov.tw/central/cms/111news/3668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kw=%e9%81%b8%e8%88%89%e7%bd%b7%e5%85%8d%e6%b3%95>, 访问时间: 2024-02-25。

### （三）恶劣的政治环境

民进党当局上台后，推行“绿色话语霸权”，建构“新型威权体制”，实行“绿色恐怖”。同时，民进党当局和外部反华势力勾连，大肆破坏两岸关系，阻扰两岸融合发展。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中，扮演积极正面角色的岛内统派力量，成为民进党当局极力打压的对象。

一方面，民进党当局主导并通过了“政党法”，压缩统派力量的政治生存和发展空间，迫使以宣传政治理念为主的政治团体转型为选举型政党，同时废止了不少统派政治团体及统派政党的立案和备案。台湾“政党法”实施后，此前依“人民团体法”立案的政治团体共有 56 个，其中仅 10 个转型为政党，4 个申请解散。而其余 42 个未修正章程转型为政党的政治团体，除妇联会后续申诉成功外，均被废止立案。其中，绝大多数为统派政治团体，称谓以“中华”为前缀的多达 21 个。即使称谓没有冠以“中华”等字眼的“政治团体”，也多是统派团体，如著名的“新同盟会”“全球孙中山同盟总会”“蓝天行动联盟”和“泛蓝联盟”等<sup>[20]</sup>。

民进党当局还对不少统派政治团体的转型设置了障碍。例如，“中国统一联盟”原本准备转型为“中国统一联盟党”，但在民进党当局内务部门的刁难之下，最终被迫去掉了“中国”两字。“蓝天行动联盟”原本准备转型为“蓝天行动党”，但按“政党法”规定须向台湾地区监察机构陈报财务，并开设政治献金专户接受监督，该政治团体负责人武之璋质疑民进党当局借台湾地区监察机构之名行“东厂”之实，借机打压政治异己，因此作罢遂将“蓝天行动联盟”重新申请为一般的人民团体<sup>[21]</sup>。此外，一些被废止或解散的统派政治团体，诸如“中华黄埔四海同心会”，准备申请成立一般人民团体，但被台湾地区内务部门要求不得沿用过去的名字<sup>[22]</sup>。

台湾“政党法”被嘲讽是“整党法”，其相关规定被认为意在钳制政党生存、整肃政党。该“法”对政党采取“高密度管理”，从人事、财务到组织、参选，包括政党应有多少党员、开会方式和跨党合作无一不管，可谓无孔不入，堪称“民进党版的‘党禁’”<sup>[23]</sup>。在“政党法”出台后，台湾地区内务部门要求此前依据“人民团体法”备案的政党，其组织、章程及相关事项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进行补正。该部门在 2020 年 4 月 28 日当天一举废止了 171 个政党备案。截至 2024 年 3 月 15 日，被废止备案的政党已达 215 个，自行解散的有 81 个，撤销备案的有 2 个，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统派政党。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通过高压政策整肃统派力量，“抹红”统派政党，压制其参选行为。民进党当局于 2019 年强行修订所谓“国安五法”，并于 2020 年制定所谓“反渗透法”，借此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破坏两岸关系，阻碍两岸民间交流。统派力量成为民进党当局强力打压的对象。尤其在选举期间，民进党当局罗织罪名，不断以“恶法”侦办统派力量，炒作“大陆介选”假议题。在 2022 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期间，共和党兼 333 政党联盟党主席周克琦被指控涉嫌接受大陆资助，并被台湾检调单位首度依所谓“反渗透法”查办贿选案。在 2024 年“大选”前，台湾人民共产党主席林德旺、副主席郑建圻，于 2023 年 10 月被控所谓“收受大陆官员资助财物、新冠试剂”及“企图影响台湾选举、宣扬共产理念”，被依所谓“反渗透法”起诉<sup>[24]</sup>。统一联盟党也未能幸免，该党屏东分会的两名骨干被指控所谓“涉嫌帮大陆招揽民众赴大陆旅游并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台湾检方以所谓违反“选罢法”和“反渗透法”理由，羁押了他们。老牌统派政党劳

动党同样成为被打压的对象, 该党原本于 2023 年 9 月征召副秘书长、副发言人王正参选台北市第 2 选区民意代表<sup>[25]</sup>。然而在同年年底, 新北地检署指控曾于 2022 年“九合一”选举时, 代表劳动党参选新北市民意代表的王正“以其姊名义接受大陆金援”, 所谓“中间人”被以涉违反所谓“反渗透法”遭法院收押禁见<sup>[26]</sup>。据台湾地区检察机关统计, 在 2024 年两项选举中, 涉及所谓“境外势力介选”的“反渗透法”案件有 117 件、涉案 287 人。可见, 民进党当局为打压统派力量, 炒作“大陆介选”假议题, 无所不用其极。这将导致统派政党的参选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 (四) 匮乏的竞选资源

在台湾既定政治生态及政治框架之下, 大多数统派政党处于泡沫化及边缘化状态。该类型政党参选岛内公职人员陷入了结构性困境, 竞选资源的严重匮乏成为制约其在岛内政党竞争及选举市场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因素。其一, 缺乏必要的财力及基本的竞选资金, 难以支撑选举运作所需的庞大经费。其二, 没有强而有力的竞选团队, 也缺乏选举绑桩固票的基本资源。同时, 他们往往未能制定较为周密的选战计划及有效的竞选策略, 也不能开展大型的选举造势进而形成舆论声势。其三, 人员结构严重老化, 后备新生力量不足。多数统派政党成员以年长者居多, 年轻党员较少。如此一来, 统派政党既难以有效凝聚支持力量, 拉抬选举行情, 也难以吸引年轻票源, 政党发展呈现颓势。

##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我们坚持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坚定反‘独’促统。伟大祖国永远是所有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sup>[27]</sup>台湾统派政党是反“独”促统和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的重要力量。受制于岛内既定的政治生态及民进党当局利用庞大公权力资源的打压, 统派政党陷入了生存和发展困境。其中, 作为壮大舆论声势、提升影响力的政治参与, 尤其是投入岛内公职人员的竞选, 同样面临着结构性的困局。在民进党肆意破坏并恶化两岸关系, 以所谓“国安五法”及“反渗透法”为工具, 不断挤压统派力量生存空间的当下, 探索壮大统派力量的有效路径及方式, 对民进党当局采取强有力的反制措施, 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台湾地区统派政党增强自身能力有如下路径。其一, 强化论述, 形塑话语。在民进党当局不断建构“绿色话语霸权”、绿化岛内舆论环境的当下, 统派政党应思考有效提升政治话语论述能力的方式, 凸显支持并推动两岸统一符合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其二, 布局基层, 夯实根基。统派政党可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 加大对台湾基层的经营力度, 尤其在村(里)长选举层面展开绵密的布局, 进而稳步夯实根基, 拓展基层辐射范围。其三, 加强整合, 形成合力。统派政党可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之下, 在竞选活动中切实展开协同合作, 探索联合竞选模式, 进而拉抬影响力及舆论声势。同时, 统派政党可考虑增加在泛蓝内部与国民党研议合作的可能性, 尤其是加强与意识形态较为接近的“深蓝群体”的互动, 提升在蓝营内部的感染力。其四, 优化结构, 培养新世代。统派政党应不断优化成员结构, 培养年轻中坚力量, 以确保政党发展的传承性与延续性。同时, 应鼓励统派青年积极投

入岛内公职人员选举，让其在得到历练的同时，增加媒体曝光度，提升知名度与美誉度。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4-7.
- [2] 林伟, 胡时. 台湾统派的内涵及其团体的统一主张探析 [J].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4): 54-59.
- [3] 吴陈舒. 台湾统派的概念演变及其对祖国统一的启示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7 (1): 78-82.
- [4] 明庭权. 台湾岛内统派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解析 [J]. 社会主义研究, 2018 (3): 78-87.
- [5] 任冬梅. 浅析台湾统派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J]. 台湾研究, 2018 (1): 40-47.
- [6] 刘晓楠, 苏昌强. 当前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J]. 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2): 63-69.
- [7] 邵俭福, 宫捷. 当前大陆与台湾统派政治合作的可行性与策略选择 [J]. 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 (4): 29-34.
- [8] 郭艳. 从台湾“统派”现状看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 (5): 59-61.
- [9] 新华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共同的理想——专访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EB/OL]. (2019-04-29) [2024-02-01]. [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9/c\\_1124434728.htm](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9/c_1124434728.htm).
- [10] 北市多个选区蓝绿分裂渔翁得利 [N]. 联合报, 2024-01-20 (2).
- [11] 台湾法规资料库. “政党法”第 22 条 [EB/OL]. (2017-12-06) [2024-03-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78&kw=%e6%94%bf%e9%bb%a8%e6%b3%95>.
- [12] 五政党冲破补助门槛 [N]. 真晨报, 2016-01-18 (2).
- [13] 台湾法规资料库. “政治献金法”第 19 条 [EB/OL]. (2018-06-20) [2024-02-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49>.
- [14] 台湾法规资料库. “政党法”第 43 条第 2 项 [EB/OL]. (2017-12-06) [2024-03-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78&kw=%e6%94%bf%e9%bb%a8%e6%b3%95>.
- [15] 陆配参选 李问抛马祖宜居岛屿 [N]. 联合报, 2019-11-20 (2).
- [16] 李捷. 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价值与制度视角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 (6): 66-74.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办公室.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2022 年 8 月)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9.
- [18] 陈春辉. “‘立法委员’单一选区两票制”之制度探讨 [J]. 育达科大学报, 2015 (41): 221-244.
- [19] 台湾法规资料库.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 32 条 [EB/OL]. (2023-06-09) [2024-02-2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kw=%e5%85%ac%e8%81%b7%e4%ba%ba%e5%93%a1%e9%81%b8%e8%88%89%e7%bd%b7%e5%85%8d%e6%b3%95>.
- [20] 政治团体走入坟墓 统派团体也“陪葬” [N]. 新华澳报, 2020-04-29 (4).
- [21] 中评社. 20 余个统派团体遭废止 武之璋轰打压异己 [EB/OL]. (2020-04-28) [2024-02-18]. <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jsp?coluid=199&kindid=8936&docid=105751626>.

杨昆福. 台湾统派政党参选公职的现状、新态势及制约因素解析——基于2016年“大选”以来的选举分析[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2): 135-153.

[22] 挺柱“蓝天联盟”重新申请人民团体[N]. 联合报, 2020-04-28(7).

[23] 民进党版的“党禁”来了[N]. 联合报, 2020-09-01(2).

[24] 台共产党主席助中北渗透遭诉[N]. 台湾时报, 2023-10-04(10).

[25] 中评社. 劳动党王正选“立委” 诉求两岸和平五大政见[EB/OL]. (2023-09-05)[2024-02-20]. <http://bj.crntt.com/doc/1067/5/7/6/106757647.html?coluid=395&kindid=21096&docid=106757647&mdate=0911161542>.

[26] 涉收境外政治献金 1收押1交保[N]. 中华日报, 2023-12-31(5).

[27]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 2022-10-16(1).

责任编辑: 杨稀琴



#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 美国干涉新疆事务 80 年（1943—2023 年）

李捷 杨喻博

（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对美国而言，操弄和挑拨中国境内的分裂主义是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行为。自 1943 年到 2023 年，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已有 80 年。美国对新疆的政策选择从属于国际格局及对华战略。在二战后到冷战发端时期，新疆迅速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乃至冷战对抗的前沿。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剧变，美国甚至图谋把新疆打造为“区域反共政权”的阵地。在冷战结束前后，经过 40 余年的蛰伏，美国以人权框架和理论框架重拾和重构了涉疆问题，并将其作为对华牵制打压的棋子。自 2017 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的。纵观美国 80 年来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美国始终将操弄新疆分裂主义及干涉新疆事务，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二是美国的涉疆政策始终以意识形态为透镜，带有鲜明的“反共”色彩。

**关键词：**中美关系；美国；干涉；反分裂；反干涉；涉疆政策；对华战略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154-21

自 1943 年美国在迪化（1954 年迪化改称乌鲁木齐）设立领事馆，将新疆作为与苏联进行地缘政

---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12

**作者简介：**李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喻博，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美国国会上世纪 40 年代涉疆档案的美国涉疆政策起始研究”（22&ZD235）

**引用格式：**李捷，杨喻博.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 80 年（1943—2023 年）[J]. 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2）：154-174.



治争夺的前沿阵地到 2023 年, 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已有 80 年。美国的涉疆政策选择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对华战略, 梳理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历史脉络并把握其政策内涵与路径, 对把握当前美国涉疆政策的目标、实质并研判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2023 年 8 月 2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回到国内, 在乌鲁木齐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后指出: 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局。既要抓实当下, 解决好当前发展稳定面临的突出问题, 又要有长远谋划, 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积极解决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sup>[1]</sup>。实现新疆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的总目标需要内外并重, 在做好国内各项工作的同时坚决反对外部的介入和干涉。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 新疆分裂主义肆虐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在此过程中, 美国、苏联等外部势力深度介入其中, 严重干涉破坏了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直至当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再次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力度, 图谋推行“以疆制华”策略。可以说, 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干涉是新疆分裂主义 (由此在国际关系中成为“涉疆问题”) 产生及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此, 本文作者和杨恕教授在理论上对分裂主义的国际化进程作了相关研究<sup>[2]</sup>。在实践上, 许建英研究员对美国介入“新疆问题”作了历史维度的梳理<sup>[3]</sup>, 顾国良等则从对华政策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脉络<sup>[4]</sup>。但由于条件、时限等方面的原因, 既有研究或是未能在重要史实档案方面实现突破, 或是未涉及近年来美国涉疆反华的最新攻势。当然, 学界围绕民国时期外部势力特别是苏联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以及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sup>①</sup>, 为本文尝试以历史性和战略性视角审视美国涉疆政策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参考。可以说, 美国一直是干涉新疆事务最为重要的外部势力之一, 严重影响了新疆的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因此, 对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历史、现状、战略考量和具体政策的研究, 不仅是阐释新疆历史真相的需要, 更事关涉疆理论话语权的建构。

本文试图从国际格局及美国对华战略两个宏观维度分析 80 年来美国涉疆政策的演变。从二战结束到冷战发端、从冷战对峙到苏东剧变、从冷战终结至今, 国际格局在此三个阶段经历了剧变。受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 美国对华战略也在调适。在此过程中, 涉疆问题成为美国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和抓手。简言之, 美国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深受国际格局及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自 1943 年通过驻迪化领事馆的设立而进入新疆后, 美国开始了干涉新疆事务的历程。80 年来, 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及中美关系的变迁, 涉疆问题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不断嬗变。在二战后到冷战发端时期, 新疆迅速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乃至冷战对抗的前沿。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剧变, 美国甚

---

① 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 [M]. 台湾兰溪出版社, 1980; Andrew D.W.Forbes. Warlords and Muslims in Chinese Central Asia: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В.А.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А.А. Москале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Китае 1911—1949 [M]. Наука, 1984; 王柯. 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1930 年代至 1940 年代 [M].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5; 沈志华. 俄国解密档案: 新疆问题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3;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 New York:M.E. Sharpe, 1990; David D.Wang. Under the Soviet Shadow:The Yining Incident [M].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ustin M.Jacobs. Xinjia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M]. Washington DC: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 贾米里·哈桑雷. 苏联政策中的新疆: 斯大林与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运动 (1931—1949) [M]. 杨恕, 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

至图谋把新疆打造为“区域反共政权”的阵地。在冷战结束前后，经过 40 余年的蛰伏，美国以人权框架和理论框架重构了涉疆问题，并将其作为对华牵制打压的棋子。自 2017 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标。

## 一、冷战发端初期：美国涉疆政策的起始（20 世纪 40 年代）

随着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兴起，新疆在经历多年的风雨飘摇后，随即又进入到新一轮的动荡时期。作为干涉新疆事务的后来者，二战中已崛起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自 1943 年进入新疆后，不仅通过“雅尔塔密约”与苏联就中国新疆和东北的利益达成了交易，而且在冷战的萌发阶段利用国民党在新疆与苏联展开了暗中的争夺和博弈。自 1948 年起，随着国共内战进程的迅速演变，美国为了满足对抗中国共产党的需要，逐步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而图谋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省区为基地，建立“区域反共政权”。

### （一）1943—1947 年：新疆作为冷战前沿

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很快兴起，两国在欧洲、亚太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争夺。此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决定了其对华战略的底色，总体上即为“扶蒋反共”政策，以《援华法案》支持国民党政府。由此，美国的涉疆政策导向是巩固在新疆的立足并扩大对当地乃至中亚地区的影响和渗透，把新疆作为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前沿。

#### 1. 二战至 1947 年美国的对华战略

二战结束前后，随着美国全球争霸战略的逐步确立，美国的对华战略也逐步明晰。此时，面对国共之间可能爆发的内战，美国基于美苏竞争、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于 1945 年 4、5 月间，最终确立了“扶蒋反共”政策，即企图通过加强蒋介石政权的力量来迫使共产党就范。这一战略随着美苏关系的不断恶化而不断强化。特别是 1947 年 3 月，“杜鲁门主义”正式出笼，美国以援助希腊、土耳其为契机，开始了在全球干预的战略，实质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

与此同时，国共内战的形势自 1947 年起逐步发生变化，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开始由战略防御进入到战略进攻阶段。由于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已大体确立，国共内战形势的转变将可能从整体上改变美苏在亚太地区的权力对比。所以，中国成为“杜鲁门主义”出台后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面对中国局势的迅速演变，美国国务院自 1947 年 10 月下旬起开始“重新审定对华政策”。在此阶段，美国认定国民党没有美援就要垮台，决心支撑它维持下去，也就是坚持“扶蒋反共”政策。

1948 年 4 月 2 日，美国众参两院举行联席会议，通过《援华法案》，作为《1948 年援外法》的一部分。该法提供的援助为期 12 个月，总数为 4.63 亿美元，其中 1.25 亿美元为“特别赠款”，由“中国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虽然《援华法案》最终于 1948 年出台，但是其却在 1947 年已开始酝酿，是美国加大“扶蒋反共”力度的重要体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1947 年的两个决策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是“杜鲁门主义”正式出笼，确立了对苏遏制的冷战战略；二是重新审定对华政策，企图通过军事援助加大“扶蒋反共”力度。由此，美国在全球战略和对华战略中反苏反共的框架最终建立，这也体现在对新疆政策中。

## 2. 二战后至 1947 年间美国的涉疆政策

在冷战的发端过程中, 新疆成为美苏争夺与对峙的前沿。除了美苏在欧洲的对峙外, 亚洲的冷战争夺——自土耳其到伊朗和中国新疆地区, 经由蒙古到东北亚<sup>[5]</sup>——出现得更早, 也更为激烈。有研究指出, 冷战的一些最早和最强烈的表现, 包括核竞争和间谍活动, 都在新疆得到了体现。在本质上, 苏美在中国新疆的动作已经是对抗, 是包含冷战所有因素的对抗<sup>[6]</sup>。在美国看来, 如果想要遏制苏联的全球扩张, 特别是在自土耳其、伊朗到蒙古、东北一线免于被动, 新疆就应该成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之一。所以, 在战后美国构建的对苏全球战略防御与遏制体系中, 新疆逐步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在此背景下, 美国涉疆政策的目标由“看住苏联”迅速转变为利用国民党“遏制苏联”。借由与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关系, 美国的势力迅速向新疆的政治、军事、社会等各个层面渗透。二战结束后, 美国在新疆的活动反映了美苏关系走向冷战的整体趋势, 其中有两个重要事件。

一是北塔山事件。1947 年 6 月初, 蒙古国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 在新疆奇台县以北、中蒙交界的北塔山地区对中国驻军发动猛烈进攻, 是为“北塔山事件”。北塔山事件后, 美国逐渐明晰了苏联在新疆的战略意图。美国驻迪化领事包懋勋在报告中更明确表达了他对苏联势力在新疆影响的担忧, 认为苏联对新疆事务的介入, 若非想获取对新疆的主权, 至少也是要保证新疆地方政权的亲苏立场及自身利益(贸易、资源), 因而苏联的目的是在新疆地区建立一个可以防范未来来自中国中央政权介入的缓冲区<sup>[7]</sup>。利用国民政府拉美制苏并极力扩大事件影响的机会, 北塔山事件成为美国正式介入新疆事务并与苏联展开暗中对峙的借口。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sup>①</sup>亲自前往中蒙边界并与乌斯满会面。面对苏联方面的攻势, 美国决定通过驻迪化领事馆暗中给予乌斯满部队以武器援助<sup>[8]</sup>。美苏之间在北塔山事件后的暗中争斗, 实质上已带有代理人战争的性质。

二是围绕苏联原子弹的原料与情报争夺。就二战后的全球战略布局来说, 美国当时最紧要的任务之一, 在于阻止或推迟苏联取得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与原料<sup>[9]</sup>。1944 年后, 苏联人开始在北疆大规模开采矿产, 同时勘探铀矿。马克南与乌斯满密会后精确地标注了相关矿山的坐标, 并得到了相关矿物标本。马克南与包懋勋都坚信, 苏联在阿山地区所急于开采的矿物, 极有可能就是当时制造原子弹所不可或缺的铀矿<sup>[10]</sup>。马克南甚至试图鼓动乌斯满袭击苏联在阿山的地质队。同时, 为了监测苏联原子弹的研制进展, 美国军方即决定以驻迪化领事馆为掩护, 在该地设立侦测苏联原子弹试爆活动的观察站。1948—1949 年, 美国军方按照预定计划, 在中国西北的驻迪化领事馆设立了第一座超声波原子弹侦测器。1949 年 8 月 29 日, 美军方设在迪化的原子弹侦测器侦测到苏联在中亚的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成功试爆了首枚原子弹。

### (二) 1948—1949 年: 美国将新疆作为反共阵地

自 1948 年起, 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急剧扭转, 美国的涉疆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鉴于国民党

---

① 美国中央情报局 2014 年 9 月 10 日解密的一份研究档案中披露了关于马克南的部分情报: 作为一名前美国陆军气象官员和无线电专家, 马克南于 1946 年加入中情局。在美国国务院的掩护下, 马克南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工作, 他将苏联在该地区的活动(包括铀矿开采)以及那里复杂的民族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的情报发回。马克南与新疆各族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关于中情局利用马克南对乌斯满提供支持的细节, 此关键情报仍未解密。具体可见: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5543224.pdf](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5543224.pdf)。关于马克南在新疆的活动, 可详见: CF China IA 893. 00/6-2147, Subject: From Nanki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20, 1947; CF China IA 893. 00/7-647, Subject: From Nanki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6, 1947.

大势已去，美国试图在西部边疆地区扶植非蒋力量，部署和建立新的反共前沿，新疆也成为美国弃蒋反共的对抗阵地。

### 1. 对华战略调整与弃蒋反共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美国援蒋反共政策日益捉襟见肘。眼看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不得不重新审查政策，谋求出路。1949 年 3 月 3 日，在就如何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共识之后，杜鲁门政府最终同意了国安会关于中国的三份文件：一项针对共产主义中国（NSC34），一项针对非共产主义大陆（NSC-41），一项针对台湾（NSC-37/5）。三项文件的基调都是对共产党采取强硬立场：继续承认国民党；向大陆亲西方团体提供秘密援助计划；未来可能公开支持某些反共势力，以对抗共产党；继续向国民党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实行将台湾与大陆割裂开来的政策<sup>[11]</sup>。在很大意义上，以上三个文件确定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题和基调。所以，从 1948 年 9 月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正式提出“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NSC34/1）到 1949 年 12 月完全“脱身”，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实质上在全力阻止中国共产党取胜。

就美国亚洲战略的整体规划而言，中国内战形势的迅速演变已使得美国通过“雅尔塔密约”规划的战略均衡被打破，即美国默认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北部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以“中美结盟”来构筑东亚安全体系，遏制苏联在东亚的扩张。鉴于国民党在内地的溃败，美国外交和情报部门认为，与其单方面遵守与苏联之间的默契而听任其扩张，不如设法为中国的“残局”善后，以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谋划替代方案，应对国民党现行军政统治体系的溃散及中国共产党的全面解放<sup>[12]</sup>。

1949 年 4 月 22 日，在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就中国内战形势特别是西北地区的局势发展及苏联在新疆开采铀矿等议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美国高层在此次会议上达成的重要共识是，今后在中国西北地区所采取的任何必要行动，都将绕过中华民国政府，在最机密的情况下单独进行<sup>[13]</sup>。该决议立刻以最高机密的方式转递至驻迪化领事馆<sup>[14]</sup>。此后，抛弃国民党并单独援助中国境内的反共武装，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秘密内涵。美国方面的绝密档案显示：“关于中国的政策决定之一是，在必要时寻求其他友好政府的有效合作，以执行美国的政策。”<sup>[15]</sup>与此同时，美国开始酝酿《共同防御援助法案》。该法案授权为“军事援助计划”提供资金并对其进行全面整合。该法案包含了一项特殊授权，即在“大中国地区”，总统可酌情使用 7 500 万美元的援助资金，重点支持当地非国民党力量的反共武装<sup>①</sup>。

### 2. 美国在新疆的秘密反共阴谋

在弃蒋反共的背景下，美国的涉疆政策重心迅速从与苏联在新疆进行争夺转变为阻止中国共产党对西部地区的解放进程，全力挑拨和利用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试图通过秘密援助西北少数民族武装建立“区域反共政权”<sup>②</sup>的方式，抵御中国共产党自东向西解放全国的进程并建立反共基地<sup>[16]</sup>。

其一，支持地方反共武装。基于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西进的目标，美国将反共武

① 这一保密款项实质上是违反了 NSC34/2 中所谓不支持其他反共武装的承诺。

② 按照台湾学者林孝庭的研究，这些“区域反共政权”的图谋包括内蒙、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反共政权，后延伸至台湾、西藏等地，其中的重点在中国西北部地区。详见林孝庭：《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九州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26 页。

装的战线布局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区。其中, 西北“马家军”——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以及新疆的马呈祥等成为美国重点拉拢扶植的对象, 因为“马家军”是一个实力很强、反共很坚决的地方军事集团, 是影响中国西北局势的重要势力。美使馆在 1948 年 10 月拍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里, 直接点名指出美国现在可以对宁夏的马鸿逵, 以及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河西走廊的马继援, 当时驻扎新疆的骑一师师长马呈祥等具有“反共意识形态”的军政头目, 进行具体且秘密的援助行动<sup>[17]</sup>。其后, 美国逐步把重点放在此时担任西北军政长官的马步芳身上。

根据美方档案, 1949 年 2 月至 3 月, 美国秘密向马步芳提供了 2 000 多支卡宾枪、300 多箱各式军火。这批军火由美军方出资, 利用“国际物资供应公司”的名义购买, 最终由陈纳德领导的“民航空运大队”由上海运送到兰州<sup>[18]</sup>。1949 年 4 月初, 陈纳德以美国军方私人代表的身份, 赴西宁密会马步芳, 商讨扩大美国军援事宜。在陈纳德的大力游说下,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 为阻止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西北部地区的控制, 美国国防部需要审查和估计对非共产主义中国进一步军事援助的可行性和有效性<sup>[19]</sup>。随即, 美国军方与美国国务院高层紧急决定, 把挂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计划名目下的军事与民生物资, 由陈纳德负责全数交付于马步芳<sup>①</sup>。

其二, 对新疆反共分裂势力的刺激和利用。随着内战形势风起云涌, 疆内的各类势力也蠢蠢欲动。在此过程中, 支持和利用新疆分裂主义就成为实现美国在新疆利益的工具。1949 年 3 月 1 日, 包懋勋密会艾沙, 后者向其提供了新疆分裂主义秘密组织“自治党”的情况。该组织已经和马呈祥取得联系, 谋求第五骑兵团留在新疆并获得马步芳的支持; 声称如有必要, 马呈祥计划在和田附近建立反苏基地<sup>[20]</sup>。8 月, 在马呈祥的支持下, 艾沙组织了一个“新疆各族人民向马长官致敬献礼团”, 乘马呈祥的专车前往兰州<sup>[21]</sup>。艾沙向马步芳赠送了黄金 5 000 两、现洋 10 万元、战马 500 匹, 还声称要为马步芳在维吾尔族青年中征兵 10 万, 并请马步芳向蒋介石提出允许他们在西北建立一个所谓“伊斯兰独立国”。此后, 马呈祥帮助伊敏组织了一个所谓“维吾尔青年训练班”, 番号为“骑一师工兵连”, 在迪化郊区头屯河地区进行秘密训练<sup>[22]</sup>。1949 年 6 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时, 斯大林告诉刘少奇, 根据可靠资料, 美英帝国主义者正试图鼓励西北“五马”将其部队撤往新疆, 并在那里建立一个所谓“穆斯林国家”<sup>[23]</sup>。中共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 高度警惕新疆分裂主义的重大威胁。为此, 中共中央决定将解放新疆的日程从 1950 年提前到 1949 年底。在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河西走廊重镇张掖后, “马家军”部队的撤退路线被切断直至被完全歼灭。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新疆泛突厥主义者被完全孤立, 他们联合“两马”部队建立一个所谓“独立的伊斯兰国”的计划流产。

新疆和平解放前, 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在军事上一一直倚重其长期经营的乌斯满势力<sup>②</sup>。1949 年 1 月,

---

① FRUS, Executive Secretariat Files, Subject: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Webb)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August 24, 1949. 但由于马步芳的溃败, 美国空运给马步芳的战略物资, 被人民解放军悉数接收。详见 FRUS, Subject: The Vice Consul at Tihwa (Maekiem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ihwa, August 31, 1949.

② 总部位于兰州的“国际物资供应公司”, 此时开始为马步芳空运武器。由于 ISC 在迪化也有一个代理人, 它很可能也通过马克南向哈萨克人提供武器。证据是, 在马克南离开迪化时, ISC 的特工还留在迪化。详见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 p. 112.

马克南赴三台密会乌斯满商讨下一步计划。乌斯满计划在短期内转移至巴里坤地区，下一步转移到青海西部的柴达木地区，与马步芳达成协议联合反共<sup>①</sup>。当年 3 月，包懋勋也来到三台，指示乌斯满与艾沙、伊敏、尧乐博斯、麦斯武德、贾尼木汗等密切联系<sup>[24]</sup>。1949 年 9 月 27 日，马克南离开迪化<sup>②</sup>，潜至新疆东部的镇西（今巴里坤），给乌斯满部送去金银、武器、弹药，承诺将继续给其大量援助，并密谋在各地暴动，阻挠新疆解放<sup>[25]</sup>。

1945—1949 年间新疆复杂的内外环境和激烈的博弈乃至对抗，使得民国时期美国的涉疆政策最终酝酿、调适并出台，从而成为干涉新疆事务的历史起点。总体而言，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的逐步恶化使得新疆的地缘政治价值急剧提升，新疆也成为美苏走向冷战对抗的重要场域。以北塔山事件为转折点，美苏在新疆不仅发动了局部代理人战争，而且围绕新疆的铀矿之争拉开了冷战核竞赛的序幕。随着冷战的升级和国共内战的转折，美国直接以新疆和西部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为基础，秘密援助反共武装甚至图谋建立“区域反共政权”。美国的相关做法奠定了干涉新疆、利用新疆民族宗教因素进行反共的基调，间接鼓动和刺激了新疆分裂主义在日后的发展。

## 二、过渡时期：重拾与重构涉疆问题（1989—2017 年）

冷战时期（1950—1988 年），美国势力被全面排挤出中亚和新疆地区，未能实现对新疆事务的直接干涉。同时，鉴于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对涉疆问题的炒作。但是，在美国的庇护和支持下，新疆分裂主义的海外活动网络得以组建并持续扩展。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前驻迪化领事包懋勋曾帮助一些叛乱分子出逃，试图将他们打造为未来的“反共力量”。同时，美国资助艾沙、伊敏等分裂势力头目从克什米尔地区转移至土耳其。20 世纪 60 年代，在土耳其的庇护和美国的默许下，新疆分裂势力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同盟”等组织并大肆活动。20 世纪 70 年代，艾沙曾多次致信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窜美同美国国会议员见面，寻求美国对新疆分裂势力的支持。同时，美国也暗中支持境外分裂势力以所谓“难民”转移为载体，从土耳其向欧洲和北美地区扩散。这都为日后美国重新干涉新疆问题埋下了伏笔。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重拾和重构了涉疆问题并使之再度成为制衡中国的一张牌。

### （一）冷战结束至 2017 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演变

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主要以与苏联的大国战略竞争为核心，以“威胁和遏制”为手段。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入了“间歇期”和“调整期”<sup>[26]</sup>。同时，自 1972 年中美关系“破冰”以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中的中美关系经历了 1972—1989 年、1989—2017 年以及 2017 年之后三个阶段<sup>[27]</sup>。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进入“调整期”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演进进入第二

---

① CF China IA 893. 00/2-449, Subject: From Tihwa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4, 1949.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南与乌斯满密会的重要细节，即双方合谋的具体行动，该微缩文件的第二页已被破坏，无法显示。这应该是刻意为之。

② 对于马克南为何最后撤离迪化，CIA 解密的文件披露，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空军希望马克南留在迪化。中情局给了马克南选择权，而他选择留守并试图建立一支反共抵抗力量。详见中央情报局，2014 年 9 月 10 日，[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5543224.pdf](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5543224.pdf)。

个阶段, 美国对华关系的战略逻辑也在不断调整变化。

### 1.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认知变化

1990 年 3 月, 老布什政府推出了冷战后美国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 中美关系的范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 即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倚重降低, 美对华战略逻辑转变为在避免全面对立的前提下, 企图以制裁促使中国作出意识形态转变<sup>[28]</sup>。在 1989 年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及东西方格局发生剧变的背景下, 老布什政府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对华关系, 一定程度上带有“和平演变”的色彩。这种逻辑也体现在 1991 年和 1993 年的美国国安报告中。1991 年的美国国安报告声称: “与苏联一样, 中国在向不可避免的体系性变化前进的过程中, (对美国的安全环境) 构成了复杂的挑战。”<sup>[29]</sup> 1993 年的美国国安报告将鼓励中国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民主改革”作为美国面临的挑战之一<sup>[30]</sup>。

1994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克林顿执政后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进一步营造有利于美国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国际环境, 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参与-扩展”战略, 将经济安全、军事实力和促进“民主”作为新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基本支柱。在对华战略认知上, 克林顿政府声称“即使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仍是一个专制政权”<sup>[31]</sup>。1997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战略预期转向塑造策略。该报告认为: “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开放和安定的中国的出现符合美国的利益。”<sup>[32]</sup> 需要看到的是,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参与-扩展”战略, 其落脚点是扩展西式民主在全球的渗透和影响, 其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倾向于以美国的模式和利益塑造中国的行为。因此, 频繁的对外人道主义军事干涉使得克林顿政府成为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对外使用武力最频繁的一届政府, 而且中美之间由于所谓人权问题导致的摩擦和纷争开始逐步增多。

小布什政府时期, 其实质上将推进“民主”、改造“失败国家”与打击恐怖主义、保障美国国家安全联系起来。2002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 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sup>[33]</sup>。2006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体延续了 2002 年对华相对积极友善的基调, 但也多了一些疑虑, 认为中国必须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声称“如果中国能遵守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承诺, 美国将欢迎一个和平、繁荣并与我们一起合作处理共同挑战的中国的出现”<sup>[34]</sup>。

奥巴马任内, 美国面临着走出反恐泥潭、克服全球经济危机、应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等诸多战略任务, 他把安全、经济繁荣、“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界定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重返亚太则是奥巴马政府第二任内应对权力转移的重要战略, 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和担忧明显上升。2015 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 “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我们需要有更强势的姿态, 坚持要求中国在海安全、贸易及人权等方面遵守国际规则。我们将密切监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在亚洲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力量。”<sup>[35]</sup>

### 2. 美国自由主义霸权下的中美关系

在后冷战时代, 由于苏联解体后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已经丧失<sup>[36]</sup>, 美国不再需要“联中抗苏”, 因而, 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不再像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政府时期那样在有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克制”。与此相反, 中美之间固有的社会制度差异使美国一度将中国视为所谓“民主改造”

的对象，这使中美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了很大的冲击<sup>[37]</sup>。在反恐战争期间，虽然美国与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建立了相对充分的战略互信及合作，但是美国以所谓“正义”与“邪恶”价值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埋下了中美因制度、价值差异而走向分歧的隐患。在奥巴马时期，反恐战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与大国权力转移之间的落差，成为其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并制衡中国崛起的重要背景。

由此，后冷战时期人权问题服从于战略安全的需要不复存在。克林顿政府开始把人权问题和贸易方面的最惠国待遇相挂钩，公众舆论和美国国会亦极力鼓噪中国人权议题，以对中国施加压力。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人权、国内治理乃至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对华攻击不断。这反映出美国对外关系上新干涉主义的盛行——美国利用国际道德标准推动干涉决策逻辑从传统的现实可行性向后现代的道德必要性转变，旨在强化其规范性霸权以应对物质层面的国际权势转移。美国对自由主义霸权的追求既然要以自身的形象重塑国际体系，必然要求实施一种高度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sup>[38]</sup>。在此过程中，涉疆问题成为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输出、对华实施人权监控并进而对中国主权进行干涉的重要着力点。

## （二）过渡时期美国的涉疆政策

在从冷战结束后到后冷战时代的过渡阶段，随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定位和策略的转变，中美关系也在不断调整 and 变化。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个常态化因素，人权问题在两国关系中不断凸显出来。在此过程中，新疆由于固有的民族、宗教议题的敏感性，就成为美国对华人权施压的主要议题。如果放在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历史进程中来看，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美国以人权问题重新框定了涉疆问题，标志着美国干涉政策的回归。

### 1. 炒作涉疆人权问题

自 1989 年起，人权问题成为冷战终结前后美国对华政治施压的主要议题。美国“把人权问题带到中美关系的中心，并把它变成冲突的主题”<sup>[36] 565</sup>。从 1990 年起，美国开始在每年发布的所谓《人权报告》中把中国作为重点批评对象。随着美国对所谓涉疆人权问题的介入力度加大，涉疆问题逐步和涉藏问题一起被美国纳入中美人权对话的议程。1998 年，所谓“涉疆人权问题”首次被列入美国国务院当年发布的《中国人权报告》中。

与此同时，苏东剧变不仅使新疆一度面临意识形态的真空时期，而且苏联的解体特别是中亚国家的独立极大地刺激了新疆分裂主义。在此背景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境内外的新疆分裂势力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在疆内，新疆分裂势力频频以骚乱、恐怖主义的方式发动袭击；在境外，各类势力则以“民主”“人权”“自决”等为旗号，极力骗取外部的同情和支持。新疆分裂主义在境内外的高度活跃，使得涉疆问题重新成为美国可资利用的工具。

1993 年 10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秘密接见了境外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头目艾尔肯·阿布泰金，声称今后将像对待涉藏问题一样充分重视所谓“东突厥斯坦独立问题”。这次会见成为境外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和美国政界接触的标志性开端<sup>[39]</sup>。1999 年 6 月 4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敏感的时间节点接见了所谓“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玉素甫，听取他的所谓“涉疆人权问题”报告。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公开对所谓“涉疆人权问题”表示关切，多次举行涉疆问题听证会，为新疆分裂势力提供政治活动场所。1999 年，“大赦国际”美国分部也开始污蔑新疆打击宗教



极端势力的举措为所谓“镇压宗教”和“破坏人权公约”。在此政治氛围下, 美国逐步取代土耳其和欧洲 (主要是德国), 成为新疆分裂分子的主要组织聚集和活动的主要国家。2002 年 12 月 19 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卡纳率团访问新疆, 并在新疆大学的演讲中妄称“打击恐怖主义也不能成为忽视人权的合理理由”, “美国不会容忍以政府反恐措施为幌子压制和平表达政治或宗教观点的行为”<sup>[40]</sup>。

## 2. 实施所谓“新疆工程”研究

美国学术界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对涉疆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 以所谓“新疆工程”<sup>①</sup>为代表和开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 随着美国对涉疆问题介入和干涉程度的不断加深, 迫切需要建立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理论主导权。同时, 对于我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与治理合理性, 美国企图在理论上进行解构和对冲, 为自身的干涉行为辩护。

1998—2001 年,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与高加索研究所等机构全面开展了所谓“新疆工程”的研究, 2003 年公开发布最终成果, 即《新疆: 中国的穆斯林边陲》。该书是一本论文集, 由 16 位学者撰写的 15 篇文章组成。该书的主题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对新疆的历史定位提出“质疑”; 二是抨击中国政府所谓“使维吾尔族边缘化的移民政策”; 三是批评中国政府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所谓“歧视”政策, 妄称“压缩甚至剥夺了维吾尔族人的就业机会”; 四是渲染中国政府对暴乱活动的所谓“镇压”。同时, 该项目发布了名为《新疆问题》的研究报告, 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策报告。整体而言, 所谓“新疆工程”的核心思想充满了矛盾性, 它一方面承认新疆“独立”不具可能性, 另一方面又同情和宣扬新疆分裂分子的错误观点, 质疑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

以此为起点, 美国和西方学界重点对新疆的历史、民族关系、发展与稳定现状、反分裂反恐斗争等持续发表了数十部研究成果, 试图解构我国在新疆的主权合法性与治理合理性, 为境外分裂势力的活动提供支持。同时, 随着美国国会的涉华提案增多, 涉及新疆的提案和听证会也有所增加, 斯塔尔、米华健、德鲁·格拉德尼、鲍文德等知名涉疆研究学者频繁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 为美国政府介入和干涉新疆事务提供依据。

## 3. 打造热比娅: 以人权框架整合“东突”势力

在重拾和重构涉疆问题的过程中, 美国迫切需要打造一个代理人, 企图使之成为“东突”头目, 改变境外“东突”势力一盘散沙、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此过程中, 热比娅·卡德尔成为美国的重要人选。

1999 年, 热比娅因向美国泄露国家情报被捕入狱。2000 年 7 月, 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了第 81 号共同决议, 公然要求中国释放热比娅和她的儿子及秘书, 并为其前往美国开启绿色通道<sup>[41]</sup>。此共同决议虽然不具法律效力, 但是成为美国国会在冷战后开始深度介入新疆事务的标志。截至 2009 年 7 月 10 日, 在美国国会提出的 8 个有关涉疆问题的议案中, 7 个涉及热比娅及其家人的问题。2004 年, 美国出面运作使得尚在监狱服刑的热比亚获得了 2004 年度“挪威拉夫托人权奖”, 以此向我国政府施压。2005 年, 热比娅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 并在美国外交官陪同下直接前往美国。在抵达美国一年内, 热比娅数十次受邀参加美国国会听证会或向美国国会提供所谓报告。此后, 美国迅速推动了以热比娅为核心的境外“东突”势力的整合及组织建设。2006 年, 美国帮助热比娅成立所谓“国

① 从严格意义上说, 应翻译为“新疆计划”, 本文遵从习惯, 仍将其称作“新疆工程”。

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并使之先后担任所谓“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和“世维会”主席，甚至为其提名诺贝尔和平奖<sup>[3]</sup>。2007 年 6 月 5 日，小布什总统在捷克布拉格会见了热比娅，妄称她是他们民族“最伟大的资源”。2008 年 8 月，小布什在赴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前于白宫接见热比娅的行为，也一再被各类反华势力作为将热比娅定性为所谓“人权斗士”的合法性来源进行渲染。

后冷战时代，从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再到奥巴马政府，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虽然美国对华战略倚重或期待的层次不一，但是美国并未放弃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它在新疆事务上的介入和干涉层次和力度不断加大。从美国国会持续热炒涉疆人权问题再到美国政府高层多次接见“东突”分子，美国在冷战后完成了以人权框架对涉疆问题的框构。同时，通过以所谓“新疆工程”为起点的美国学术界对涉疆问题展开的系统理论和政策研究，美国实现了对新疆主权和治权合法性的逐步解构，在西方社会建立了涉疆问题的理论话语权。再有就是通过对热比娅的炒作，美国将其打造为所谓“人权斗士”并整合境外“东突”势力，树立涉疆问题的代理人。另一方面，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策略与其对华战略之间又有一定的背离性。即使在克林顿政府推行“参与-扩展”战略、小布什政府实施全球反恐战略的时期，虽然美国对华的战略期待和倚重较高，但美国在涉疆问题上的干涉力度并未减弱。这说明，无论是极力扩展美式价值观和制度在全球的影响，还是以意识形态或“文明”为标准划分反恐的敌我阵营，美国对外政策的推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从反共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涉疆问题，就成为美国涉疆立场及政策的基本点。

总体而言，在 1989 年至 2017 年这个阶段，美国以人权问题完成了对涉疆问题的框架建构，从理论上初步实现了对新疆主权及治权的合法性解构，这为日后美国在涉疆问题上全面发力甚至实施“以疆制华”策略作了充分的准备。

### 三、大国战略竞争时期：“以疆制华”策略（2017 年至今）

自 2017 年以来，中美关系在激烈的交锋中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的基础在于，随着中美两国实力的消长和美国对华认知的不断负面化，美国开始对华实施实质性的遏制战略。在对华进行关税制裁、高科技产业扼杀的同时，美国在事关我国领土主权完整与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问题上进行粗暴的干涉，重点推行“以疆制华”策略。

#### （一）对华遏制战略

由于中美力量消长导致的霸权焦虑，美国的全球战略必然以中国为聚焦点。近年美国对华战略的谋划主要分为两步：一是对华战略认知问题，涉及关于中国的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的威胁研判。在此问题上，美国的立法、行政等朝野政界以及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声称“中国已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二是对华战略选择问题，即如何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

#### 1. 对华战略认知

中美建交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的战略考量基于一个基本的、曾经长期起作用的逻辑判断：“开放的中国不仅不具有挑战性，而且日益融入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关者”。但近年来，美国朝野开始更加倾向认为：“与西

方主流社会渐行渐远、具有威权体制、意识形态再度迅速发展的中国, 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构成了最危险的挑战。”<sup>[42]</sup>中美关系出现“范式变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中国心态和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和定义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sup>[43]</sup>。

首先是在双边层面, 随着权力格局尤其是中美权力的消长, 美国对华的认知逻辑进一步负面化。在守成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模式下, 美国在拒绝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倡议的同时, 始终陷于“修昔底德陷阱”或“金德尔伯格陷阱”而难以自拔<sup>[44]</sup>。2017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颠覆了自尼克松总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共识, 该报告以冷战眼光看待中国、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在“美国优先”的战略导向下, 美国的战略思维转向大国战略竞争, 对华定位转为“战略竞争对手”。2022 年 10 月, 拜登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声称美国“正处于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中”, “中国有意向, 而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为此, 美国认为需要在地缘政治和关键技术、关键产业领域确保对中国的领先优势, 以此保证美国塑造国际秩序的绝对能力优势。此战略报告是冷战后美国首次将一国定位为“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重点强调了所谓的中国地缘政治威胁并显著升级了对华“竞争”的战略意愿, 其冷战意味不言而喻。

其次是在体系层面,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成为美国渲染和炮制“中国威胁”论调的主题。美国试图将中国描绘成所谓“规则的破坏者”和“秩序的颠覆者”, 从而为自身的对华打压及遏制政策寻求合法性<sup>[45]</sup>。美国对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这种定性, 在 2017 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 2018 年初的《美国国防战略》中达到高潮。这两份文件都将中国称为所谓“修正主义”国家, 污蔑中国试图破坏和取代国际秩序。实质上, 美国坚持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与我国的主张 (传统上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形成鲜明对比, 它代表了美国当前的战略, 即企图迫使中国遵守由美国领导的大国联盟强加的霸权政治经济秩序, 以锁定当前的帝国权力关系<sup>[46]</sup>。

## 2. 对华战略选择

自 2017 年以来, 美国对华战略虽然以“大国战略竞争”为名, 但是已把这种竞争上升到意识形态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全球秩序之争, 并在实质上带有冷战的色彩。尽管这些话语攻击不是像旧冷战那样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形式表达, 但却通过“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叙事定义了新冷战。

2020 年 5 月, 特朗普政府发布所谓“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斗争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 声称中美之争的本质是“两国制度的竞争”; 妄称对华政策要实现两大目标——“提升美国的制度、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应变能力, 以期在面临中国的挑战时占据优势”, “迫使北京停止或减少从事损害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之重大国家利益的行动”, 全面应对中国构成的经济、价值观和安全挑战<sup>[47]</sup>。相对于特朗普时期较为明显的单边主义倾向, 拜登政府进一步渲染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分歧以拉拢盟友, 推进对华孤立和遏制战略。拜登政府频繁强调要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划线, 同时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霸权作用, 试图推动大国竞争向集团对抗的阵营化、对立化方向发展。

可以说,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开展和实施是全方位的, 其中以“印太战略”为蓝图的地缘政治遏制、以关键产业和供应链为对象的经济遏制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两个重要

抓手。2022 年 2 月 11 日，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声称，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通过加强与盟友关系产生的“综合遏制力”，将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基础。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经济层面的对华遏制态势已公开化：一是遏制中国在关键产业的能力发展；二是遏制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地位提升，以区域联盟为基础建构排华型供应链<sup>[48]</sup>。

## （二）对华遏制战略下的“以疆制华”策略

在对华遏制战略的出台和实施过程中，涉疆问题迅速成为美国对华污名与打压的重要工具。以相关议程设置为基础，美国在国际舆论中加大了对我国治疆工作的污蔑，同时推进单边制裁、涉疆立法及在联合国层面的对华攻击。

### 1. 议程设置

近年来，美国涉疆议程的生成过程其实很清晰，由所谓学者、研究机构等炮制报告，经传统媒体报道，由社交媒体进行煽动和情感动员，政府予以关注表态，然后立法机构推进法案对中国进行制裁，数个步骤或独立或交叉，循环往复。在此过程中，学者、媒体和政治相互依存、相互重复，由反华的共同价值联系在一起。他们所指证的基本文件很少，多为不可验证或匿名，但却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所谓“真相”在媒体、学术界和政治中迅速振动，以此对中国进行污名和攻击。

其一，造谣新疆教育培训中心。2017 年 8 月 1 日，“世维会”最先开始使用“拘留营”一词描绘教培中心。2017 年 9 月，反华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报告，用“数以千计”来形容教培中心的学员数量。2018 年 3 月，日本反华学者水谷尚子在日本《新闻周刊》上发文妄称，基于 Istiqlal TV（在土耳其的维吾尔语媒体平台）的信息披露，20%~40%（89 万以上）的维吾尔族人口被“关押”在新疆的“再教育营中”。该媒体宣称数据是“从可靠的当地公安来源获得的”<sup>[49]</sup>。需要指出的是，水谷尚子此前因公开支持热比娅而被我国政府拒绝入境。很快，嗅到苗头的郑国恩于 2018 年 5 月发文，引述水谷尚子的观点称，教培中心学员超过百万。2018 年 8 月，反华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同时发布耸人听闻的报告称，“估计约有 100 万维吾尔族人被送进了‘再教育拘留营’，约 200 万人被迫参加在新疆的‘再教育’项目”<sup>[50]</sup>。它得出这一组数据仅基于对 8 名维吾尔族人的所谓“采访”。在当月举行的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会议上，该委员会唯一的美国籍委员麦克杜格尔直接援引了这一数据。此后，这一数据逐步成为美西方在涉疆问题上对我国进行攻击的所谓“证据”。

其二，捏造新疆产业中的所谓“强迫劳动”谎言。所谓“强迫劳动”论调最初源于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于 2018 年 12 月下旬几乎同一时间发表的两篇报道：《新疆穆斯林拘禁营被指存在强迫劳动》<sup>[51]</sup>、《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产品出口到美国》<sup>[52]</sup>。这两篇文章通过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及新疆和田泰达服装公司的“跟踪调查”，声称大批出口到美国的新疆服装是所谓“强迫劳动”的产物。以此为延伸，郑国恩以新疆棉花产业为攻击点，妄言新疆棉花生产中政府的扶贫和劳动力转移工作中存在所谓“强迫劳动”。随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迅速跟进了对这一议题的炒作。2019 年 3 月，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下称 BCI，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国际开发署）炒作新疆所谓“强迫劳动”问题，对其在新疆的 10 余家合作企业进行自审。2020 年 8 月，BCI 以新疆棉企有“强迫劳动”的问题为由，公开声明要撤销全部新疆棉企无限期担保认证。同时，美西方舆论逐步将所谓“强迫劳动”议题扩展到新疆光伏、番茄产业直至新疆所有产品。

其三，炮制所谓“种族灭绝”谬论。2019 年 7 月，郑国恩在《政治风险杂志》上发表所谓《断

根: 中国在新疆开展亲子分离运动的证据》报告, 开始炒作“亲子分离”议题。2020 年 6 月, 郑国恩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发表所谓《绝育、宫内节育器和强制生育控制: 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压制维吾尔族生育率的运动》报告, 开始了所谓“强制节育”话题的炒作, 并使之成为“种族灭绝”谬论的重要一环。2021 年 3 月 8 日, 新行战略研究所发布所谓《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中国违反 1948 年〈种族灭绝公约〉的情况考察》报告, 对我国发动疯狂的污蔑和攻击。2021 年 6 月和 9 月, 非法机构“维吾尔特别法庭”两次在英国举行“听证会”, 并于 12 月做出所谓涉疆“判决”。这份所谓“判决”是废纸一张, 没有丝毫法律效力。

## 2. 涉疆立法、制裁与国际攻击

2020 年 6 月 17 日, 美国《2020 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经特朗普总统正式签署生效, 这标志着美国的涉疆政策正式形成, 并且为美国系统性地介入新疆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2021 年 12 月 23 日, 美方正式出台《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将新疆生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迫劳动”产品, 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关的产品。由此, 美国所制裁的涉疆产业涉及棉花、番茄、服装和太阳能多晶硅产业、电子科技产业等, 涉疆单边制裁几乎渗透到了新疆的各个产业, 美国开始由点及面地全方位多领域地打击涉疆产业。至今已有 30 家中国实体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相关企业产品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2020 年 10 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撤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为恐怖主义组织的认定, 理由竟然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该组织继续存在 (事实上, 该组织近年来一直在进行公开宣传和活动)。蓬佩奥在 2021 年 1 月辞职前的最后一次行径冒天下之大不韪, 污蔑“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这一行径随即被拜登政府继承, 加拿大、荷兰、英国、比利时和立陶宛议会也做出了相关认定。这种认定是公然的污蔑和攻击, 没有任何依据。

在推进涉疆问题国际化方面, 欧洲盟友、G7、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高专办等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大肆污蔑和攻击的重要场域。在美国的极力鼓动下, 欧盟在 2021 年 3 月就所谓涉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 由此导致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全面冻结。在联合国层面, 自 2019 年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 频繁发起涉疆问题辩论或决议以对中国进行攻击。2022 年 8 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离任前发布的《涉疆人权报告》, 完全是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策划的闹剧, 完全是一份罔顾事实的政治化文件, 充分暴露了美西方国家和反华势力将人权作为政治工具的图谋<sup>[53]</sup>。2022 年 10 月 6 日, 由美西方国家牵头提交的涉疆问题决定草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51 届会议上进行表决, 结果为 19 票反对、17 票支持和 11 票弃权。这是我国再一次挫败美西方将涉疆问题国际化的图谋。

### (三) 美国“以疆制华”的政治化框架与实质

美国“以疆制华”策略的实施具有明确的政治化框架, 即通过人权问题、治理问题政治化的逻辑, 确定对中国政府的责难框架。以此为基础, 美国试图解构我国在新疆的治权和主权合法性, 制造治理、经济和主权危机, 从而对我国的发展实施全面遏制。

#### 1. 政治化框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制造自身介入和干涉新疆事务的“合法性”, 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框定并将这一议题政治化。一般来说, 政治化的过程有“命名”“指责”和“主张”三个阶段<sup>[54]</sup>。

“命名”是指将一个私人或公共状况定义为不公平的，值得被政治解决的行动，因为它产生了个人或集体的损害或伤害。它的实质是将一个特定的“问题”带入政治领域，使其政治代理人赢得合法性。新疆的发展与稳定，包括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工作本质上是我国的内政，但是在美西方将其炮制为各类“问题”之后，美西方大大推进了它的国际化进程。这一“命名”，不是承认新疆治理、发展与稳定、反对“三股势力”的实质性问题，而是以所谓“侵犯人权”“种族灭绝”等西式框架进行框定。

“指责”是指将一个或多个社会或政治行为者确定为对特定问题负责的行动。它实质上是确定责任的归属。在涉疆问题上，西方智库及政府在将相关“罪责”确定后，将责任方确定在我国中央政府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政府之上。无论是在人权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美西方无一不是把责难指向了中国中央政府及新疆地区各级政府。这种指责的过程，本质上是对我国新疆治理合法性的否认。

“主张”是指提出对抗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在涉疆问题上，美西方对我国治疆政策进行指责的最后，在政策层面一般包括三个要素：在道德、道义层面对我国进行污名和贬损，在政治层面对我国进行攻击和孤立，在经济层面对我国进行制裁。可以说，美西方在涉疆问题上对我国的污名和指责包括各种施压、制裁手段，完全脱离了新疆的历史和现实，也脱离了新疆的发展与稳定，成为西方“以疆制华”的工具。

## 2. “以疆制华”与危机政治

美国“以疆制华”的策略主要表现在，通过议程设置进行全方位的干涉，企图制造中国在新疆的治理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及主权危机，以此作为遏制中国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战略缘起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时期则在意识形态、国际联盟等方面更为强化。

其一，以人权为旗号制造治理合法性危机。美国对涉疆人权议题的负面化、污名化解读和指责，既源于机械和形而上的人权观念和傲慢，更有着深层次的阴谋。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以人权为旗号制造中国对新疆治理的合法性危机：通过制造涉疆人权与新疆社会稳定及长治久安总目标之间的对立，否定中国政府治疆工作的价值合法性；通过全面颠覆新疆教培中心的功能及意义，否定新疆各族人民的发展权，解构中国政府治疆的绩效合法性。这种以人权为旗号的污名化，通过美国及西方媒体、智库的恶意炒作和传播，特别是相关国家政府对中国的责难，已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其二，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制造经济危机。在以人权为名建构中国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非法性”后，美国开始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新疆内外各类主体实施制裁。这种制裁直指事关新疆发展与稳定的基础产业及行业，以重创新疆经济为目的，具有典型的霸凌色彩。其目的在于彻底斩断新疆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毛细血管，扼杀新疆重点行业发展的空间，企图以危机制造的方式阻挡新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其三，以炮制“种族灭绝”谬论制造主权危机。美西方对涉疆问题最严重的污蔑和指控在于以“强制节育”等为名，建构针对中国在新疆所谓“实施种族灭绝”的责难框架。其意图在于，以所谓“种族灭绝”导向“保护责任”，制造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危机。可以说，美国一方面通过在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进行污名和贬损，另一方面试图以所谓“种族灭绝”为名在法理上对中国

的领土主权完整进行颠覆和解构, 最终实现“以疆制华”的目标。

#### 四、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脉络与实质

新疆分裂主义是我国存在时间最长、涉及领土面积最大、对社会安全危害最严重、外部势力介入最早的分裂主义。自 1943 年美国在迪化 (乌鲁木齐) 设立领事馆、将新疆作为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争夺的前沿阵地以来, 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至 2023 年已有 80 年。本文通过详尽的历史和战略分析, 梳理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历史脉络、工具手段及逻辑主线。

##### (一) 历史脉络

从 1943 年进入新疆到新中国成立后被彻底驱逐出去, 该时期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虽仅有 6 年多, 但是它却成为美国涉疆政策的历史起点。这一阶段的负面影响是异常深远的。其一, 美国利用二战的机会进入新疆后, 随即将新疆作为冷战发端期间与苏联进行战略争夺与对抗的前沿, 即美国开始从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来定位涉疆问题, 此为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战略起点。其二, 美国确立了对新疆分裂主义的认知及对中国在新疆主权合法性的解构。美国不惜抛弃二战中的盟友国民政府, 全面支持和策动新疆分裂, 此为美国利用新疆分裂主义的工具性起点。其三, 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关头, 美国试图以新疆分裂主义作为“反共、反苏”的工具, 把新疆地区作为“反共、反苏”的基地, 严重践踏国际法及中国主权, 此为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意识形态性起点。

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 中美关系的范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对华战略安全倚重降低的同时, 单极体系之下美国采取了自由主义霸权的外交政策, 涉疆问题成为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输出、对华实施人权监控与制衡的重要抓手。在 1989 年至 2017 年这个阶段, 美国在对华关系中重拾并重构了涉疆问题。其一, 美国通过持续炒作所谓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不平等遭遇, 完成了以人权议题对涉疆问题的框定。其二, 美国通过以所谓“新疆工程”为起点的理论政策研究, 实现了对新疆主权和治权合法性的逐步解构, 在西方社会建立了涉疆问题的理论话语权。其三, 美国通过对热比娅的炒作, 将其打造为所谓“人权斗士”并整合境外“东突”势力, 确立美国干涉新疆事务的代理人。

自 2017 年以来, 美国对华战略表现出意识形态化和全方位遏制的特征, 不仅通过“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叙事定义了新冷战, 而且在地缘政治、关键产业和供应链、中国核心利益层面对华全面打压和遏制。通过美西方智库-媒体-政界联合操弄的议程设置, 美国大肆炒作新疆所谓“强制拘禁”“强迫劳动”乃至“种族灭绝”的谎言。通过将所谓“涉疆人权问题”政治化的逻辑, 美国以危机制造路径试图在我国新疆制造治理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合法性危机。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中, 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挑战者”, 所谓“涉疆人权问题”“种族灭绝问题”成为美国的主要论据。然而, 中美之间所谓“秩序之争”, 实质是美国主导的基于霸权规则的国际秩序与中国所极力维护的国家主权完整与平等的国际秩序之间的根本分歧。美国正试图利用国际贸易秩序 (制裁)、政治发展秩序 (人权) 来颠覆中国的基本秩序 (主权), 这就是美国“以疆制华”的战略逻辑与本质。

表 1 美国干涉新疆事务 80 年的历史脉络

阶段	内涵	方式	领域	标志
起始时期： 20 世纪 40 年代	干涉新疆事务的起点	秘密操作	军事	军事援助计划法案
过渡时期： 1989—2017 年	重拾和重构涉疆问题	半公开化	政治外交	“新疆工程” 炒作热比娅
战略竞争时期： 2017 年至今	推行“以疆制华”策略	公开化	全方位	“维吾尔人权法案”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

来源：作者自制

## （二）工具手段

在 19 世纪以门户开放政策打开中国的国门后，美国势力正式进入中国并极力谋取在华的商业特权及政治影响。二战成为美国参与亚洲地缘政治重绘的分水岭。美国不仅在与苏联的博弈中制造了朝鲜和越南的分裂，而且也在美苏争夺中通过炒作和挑拨中国的民族问题介入中国领土主权的核心领域。然而，在民族问题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却施行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在欧洲，美国通过鼓吹“民族自决权”的方式使自身在欧洲民族政治中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在亚洲，美国从未考虑过以“规范”的方式协调民族纷争。作为大国竞争的舞台，美国介入亚洲国家的民族事务只遵从权力的原则。

随着冷战大幕的逐渐揭开，美国从权力政治的逻辑出发，将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与美苏之间的冷战争夺密切关联起来，即“领土”（事关中国版图之形状）和“政治”（事关中国制度之颜色）的交织<sup>[55]</sup>。美国为了争夺中国“政治的颜色”，置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于不顾。对于美国来说，对抗苏联的“集团间”的斗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而对中国“国家间”的外交、对国共“两党间”的干预、在维汉“民族间”的游移，都不过是其达到目标的手段<sup>①</sup>。在冷战对抗加剧、国共内战形势剧变的背景下，分裂与反共的思想与行动同时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在新疆爆发。其中，反共成为美国援助西北“马家军”、阴谋建立“区域反共政权”的主要目的，而相关势力也在国民党溃败的过程中打着反共的旗号寻求美方支持；而实现“新疆分裂”或西部省份的“武装割据”，则是麦斯武德、艾沙、伊敏及马步芳等人的长期图谋。20 世纪美国涉疆政策的主题由反苏转向反苏反共并重、由支持国民党维护新疆主权到支持新疆分裂主义，其背后都取决于美国的全球和地区利益。在美国的利益格局中，中国的主权和治权成为“可以被忽视的对象”，分裂主义也仅是美国实现反共目标的工具。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权力格局的焦点由美苏关系转移到中美关系。在被迫退出新疆 40 余年后，通过重拾和重构涉疆问题，美国重新把它作为制衡中国的工具和手段。然而，美国所极力打造和扶植的热比娅及“世维会”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境外分裂主义势力难以全面挑战我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所以，随着 2017 年来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期，美国开始直接“下场”，通过全方位的议程设置、单边制裁、国内立法和国际攻击等方式，以对华污名、危机制造等途径实现“以疆制华”的战略目标。当前美国的涉疆政策以所谓“侵犯人权”“种族灭绝”的责难框架挑战和解构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治权与主权合法性，但推动“新疆分裂”并非其核心目标，而是以此来遏制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

① 相关论述参见：刘晓原，“蒙古问题”与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 [J]. 历史研究，2003（3）：41-57+190.



并维护自身的霸权。在这个意义上, 利用分裂主义遏制中国, 对美国来说是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一种手段。

在工具层面煽动和利用分裂主义, 美国在涉藏、涉港和涉台问题上与涉疆问题的方式及手法如出一辙。自冷战格局成型到新中国成立前后, 美国试图在新疆、内蒙古、西藏等中国西部地区及台湾地区建立“区域反共政权”, 将其作为对抗社会主义中国的工具, 在法理和事实上支持分裂主义。美国对相关反叛武装提供支持, 实质上是侵犯和割裂中国的主权; 其“反共”的目标掩盖了分裂势力“反华”的分裂意图。当前, 美国一再炒作涉台问题, 在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 鼓动并利用“台独”势力破坏台海和平, 甚至极力推动台湾的武装化。其背后“以台制华”的阴谋已昭然若揭。在涉及他国内部分裂主义问题上, 美国实质上坚持的也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念, 即把分裂主义作为制衡、削弱东道国的工具, 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在历史上制造德克萨斯“孤星共和国”并对其进行吞并、因巴拿马运河策动巴拿马从哥伦比亚分裂, 在冷战结束后支持科索沃独立并打击南联盟等均是如此。基于霸权护持的目标, 美国对一个统一和崛起的中国始终持排斥态度, 这决定了它对“台独”“藏独”“港独”等分裂主义的利用将是长期的, 也是战略性的。

### (三) 逻辑主线

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又注入了一个新的内容, 那就是反共主义。战后美国的反共主义既是目标, 又是手段。第一, 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作为目标。第二, 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中, 美国以苏联为主要对手, 把反苏与反共结合起来。第三, 美苏都不准备直接开战, 实际争夺是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于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着最彻底的反帝纲领的、并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中国革命, 就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上述对外政策的攻击对象<sup>[56]</sup>。

从根本上来看, 美国涉疆政策的演变服务于反共的意识形态需要。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仇视成为其涉疆立场的基本点和透镜。从冷战发端初期试图建立“新疆反共政权”, 到后冷战时代炒作涉疆人权议题, 再到近年以反华意识形态推动“以疆制华”策略, 美国一直将涉疆问题特别是新疆分裂主义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手段。这表明, 美国涉疆政策的实质是在价值层面的掩盖下实现对新疆分裂主义的工具性利用, 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将目标指向中国共产党——以涉疆议题制造对中国共产党的妖魔化、敌对化认知, 削弱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治理绩效及合法性, 企图最终以解构中国共产党威望和领导力的方式破坏中国统一与崛起。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关系中国国家统一等核心利益的问题, 在美国对华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将不断明确和凸显。这种地位正被赋予越来越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美国看来, 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介入和干涉并非可以随意交换或妥协的, 它已成为彰显美国“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的工具。在中美权力消长的背景下, 美国更需要刻意凸显自身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层面对华所谓“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 从 1943 年到 2023 年, 美国介入和干涉新疆问题已有 80 年, 但是当前美国涉疆政策似乎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 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这里面存在变与不变的两点因素: 一是国际权力格局发生了变化。冷战发端初期, 美国为推动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而将新疆视作反苏、反共的前沿。后冷战时期, 美国为了实现对中国的打压, 再一次把涉疆问题作为战略工具, 试图实施“以疆制华”策略。二是反共的本质不变。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 其权力政治背后的驱动因素

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敌视。这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对苏、在后冷战时期对华的战略原点。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政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汇报时强调 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N]. 人民日报, 2023-08-27 (1).
- [2] 李捷, 杨恕. 分裂主义及其国际化研究 [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3.
- [3] 许建英. 美国介入“新疆问题”的考察与分析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8 (5): 78-83.
- [4] 顾国良, 刘卫东, 李玥.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涉疆问题 [M].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
- [5] Jamil Hasanli. Stalin's Early Cold War Foreign Policy Southern Neighbours in the Shadow of Moscow 1945—1947 [M].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 [6] 贾米里·哈桑雷. 苏联政策中的新疆: 斯大林与东突厥斯坦的穆斯林运动 (1931—1949) [M]. 杨恕, 译.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 298.
- [7] FRUS. The Consul at Tihwa (Pax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Z]. 893. 00/11-1047, November 10, 1947.
- [8] FO. Re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Z]. 371/69631 F3506/2538/10, enclosed in British Embassy in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 February 27, 1948.
- [9] Craig Campbell, Sergey Radchenko. The Atomic Bomb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0]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U. S. Consulate (Tihw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Z]. Record Group (RG) 59, 893. 6359/8-2947, August 29, 1947.
- [11] Blum, Robert, 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M]. New York: Norton, 1982.
- [12] 吴启纳. 新疆: 民族认同、国际竞争与中国革命 (1944—1962) [D]. 台北: 台湾大学, 2006.
- [13] NARA. Minute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Truehear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Mr. Arneson, Under-Secretary's Special Assistant, and Mr. Sprous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Z]. RG 59, 893. 6359/4-2249, April 22, 1949.
- [14] NARA. Under-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W.W. Butterworth) to Mackiernan [Z]. RG 59, 893. 6359/4-2249, top secret, April 22, 1949.
- [15] FRUS.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Butler) [Z].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49 (I), May 31, 1949.
- [16] CF China IA. Stuart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Z]. 893.00/3-448, March 4, 1948.
- [17] NARA. Stuart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Z]. FG 59, 893.00/10-1648, October 16, 1948.
- [18] NARA. Memorandum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Z]. RG 319, Records of Army Staff, Army Intelligence Document, File No. 548364, March 1949.
- [19] FRUS. Memorandum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Webb)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Z]. Executive Secretariat Files, August 24, 1949.

李捷, 杨喻博.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 美国干涉新疆事务 80 年 (1943—2023 年)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54-174.

- [20] FRUS. The Consul at Tihwa (Paxt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Z]. 661.9331/3-149, March 1, 1949.
- [21] CF China IA. From Tihwa to Secretary of State [Z]. 893.00/7-1549, July 17, 1949.
- [22]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新疆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史话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64.
- [23] 邓力群. 新疆和平解放前后 [J]. 近代史研究, 1989 (5): 143-150.
- [24] CF China IA. Comments by Lt. Ma Hsiang-hsien in Regard to Tungkan Opposition to Communism [Z]. 893.00/4-1149, April 11, 1949.
- [25] 包尔汉. 新疆五十年: 包尔汉回忆录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350-351.
- [26] 朱启超, 龙坤. 试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基于对特朗普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分析 [J]. 美国研究, 2018 (3): 78-98.
- [27] 达巍, 蔡泓宇.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 50 年 [J]. 国际安全研究, 2022 (2): 3-46.
- [2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QL]. (1990-03-01) [2023-11-01].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0/>.
- [2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QL]. (1991-08-01) [2023-11-01].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1/>.
- [3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QL]. (1993-01-01) [2023-11-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3/>.
- [31]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R/QL]. (1994-07-01) [2023-11-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4/>.
- [32]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R/QL]. (1997-05-01) [2023-11-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997/>.
- [33]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QL]. (2002-09-17) [2023-11-02].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
- [34]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QL]. (2006-03-16) [2023-11-04].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6/>.
- [35] The White Hou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QL]. (2015-02-06) [2023-11-04].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15/>.
- [36]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 第 3 卷 [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35.
- [37] 韩召颖, 黄钊龙. 对冷战后美国大战略的考察: 目标设置、威胁界定与战略实践 [J]. 当代亚太, 2019 (5): 30-67.
- [38] 约翰·米尔斯海默. 大幻想: 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 [M]. 李泽,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前言.
- [39] 潘志平, 王鸣野, 石岚. “东突”的历史与现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183.
- [40] 新浪网. 美国助理国务卿访新疆引人注目: 中美合力打击东突 [EB/OL]. (2002-12-25) [2023-11-04]. <http://news.sina.com.cn/c/2002-12-25/1446852883.shtwl>.
- [41] U. S. congress. H6724, CONGRESSIONALRECORD—HOUSE, S. CON. RES. 81 [EB/OL]. (2000-07-24) [2023-11-04]. <https://www.congress.gov/106/crec/2000/07/24/CREC-2000-07-24-pt1-PgH6724.pdf>.

- [42] 郑羽. 中美战略关系新面貌 [EB/OL]. (2019-11-06) [2023-11-08]. <http://cn.chinausfocus.com/m/41603.html>.
- [43] 朱锋. 贸易战、科技战与中美关系的“范式变化” [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19 (4): 1-14.
- [44] 格雷厄姆·艾利森. 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M]. 陈定定, 傅强,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45] 蔡从燕. 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1): 24-43.
- [46]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0.
- [47]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QL]. (2020-05-16) [2023-11-0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 [48] 赵明昊. 美国构建亚太“小多边”机制的进展、特征与影响 [J]. 当代世界, 2023 (3): 39-45.
- [49] 水谷尚子. 水谷尚子, ウイグル絶望収容所の収監者数は 89 万人以 [EB/OL]. (2018-03-13) [2023-11-08]. [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18/03/89-3\\_1.php](https://www.newsweekjapan.jp/stories/world/2018/03/89-3_1.php).
- [50] Ajit Singh, Max Blumenthal. China detaining millions of Uyghurs? Serious problems with claims by US-backed NGO and far-right researcher 'led by God' against Beijing [EB/OL]. (2019-12-21) [2023-11-08]. <https://thegrayzone.com/2019/12/21/china-detaining-millions-uyghurs-problems-claims-us-ngo-researcher/>.
- [51] Chris Buckley, Austin Ramzy. China's Detention Camps for Muslims Turn to Forced Labor [EB/OL]. (2018-12-16) [2023-11-04].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6/world/asia/xinjiang-china-forced-labor-camps-uighurs.html>.
- [52] Dake Kang, Martha Mendoza, Yanan Wang. US sportswear traced to factory in China's internment camps [EB/OL]. (2018-12-19) [2023-11-08]. <https://apnews.com/article/nc-state-wire-north-america-us-news-ap-top-news-international-news-99016849cddb4b99a048b863b52c28cb>.
- [53]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布所谓涉疆“评估”发表谈话 [EB/OL]. (2022-09-01) [2023-11-10]. [http://geneva.china-mission.gov.cn/ryrbt/202209/t20220901\\_10758767.htm](http://geneva.china-mission.gov.cn/ryrbt/202209/t20220901_10758767.htm).
- [54] 李捷.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23: 152-159.
- [55] Xiaoyuan Liu. Recast All Under Heaven: Revolution, War, Diplomacy, and Frontier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M]. London: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 182.
- [56] 资中筠. 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945—1950) [M]. 北京: 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7: 273.

责任编辑: 杨稀琴



#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

## ——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陈静<sup>1</sup> 周文星<sup>2</sup>

(1. 澳门科技大学 社会和文化研究所, 澳门 999078;

2. 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最高立法机构, 国会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框架的确立及其对华政策重构的推进, 国会在对华强硬问题上日益与行政当局达成共识, 并通过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 强化中美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进一步介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国际环境、美国社会、议员个人等三个主要层次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 该委员会快速整合国会两党既有优势力量, 聚焦于经贸、核心科技、台湾问题、军事安全等议题, 以提出涉华立法提案、举办涉华政策听证会、发起涉华调查案以及发布研究报告等跨党派合作方式, 炒作中美战略竞争。该委员会的相关涉华作为, 阻碍了中美人文交流, 推动对华经贸科技“脱钩断链”, 负面冲击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对两国关系未来走向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其相关动向还产生了极具危害的外溢效应, 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冲突与对立, 增加地区与全球治理的成本。但鉴于该委员会在美国国内遭遇的反对、内部存在的分歧及其缺陷, 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 这一国会特设机构在美国对华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展望未来, 中方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

DOI: 10.13946/j.cnki.jcqis.2024.02.013

**作者简介:** 陈静, 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研究生; 周文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美国国会立法干涉台湾问题的规律、风险与对策研究(1973—2021)” (21CGJ047)

**引用格式:** 陈静, 周文星.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75-192.

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国智库专家对话、与美方在全球战略议题上开展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关键词：**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对华政策；中美关系；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8；D8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4）02-0175-18

2023 年 12 月 12 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文简称美中竞争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 53 页的报告，提出进一步对华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的三大支柱，包括重新设立美中经济关系条款、阻止美国资本和技术流入中国、加强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并携手盟友提高集体经济韧性<sup>[1]</sup>。此外，报告还建议拜登当局与美国盟友制定计划，在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或美国其他盟友与伙伴进行所谓军事攻击时，运用外交和经济手段对前者予以制裁。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副主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姆尔提在联合声明中指出，这份报告“明确了美国需要与中国重构经济关系的事实，这有利于服务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sup>[2]</sup>。他们甚至直言不讳地声称，这份报告将成为 2024 年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行动“指南”<sup>[3]</sup>。在拜登当局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由民主、共和两党组成的美中竞争委员会及其推出的上述报告，无疑反映出美国国会、两党在对华强硬方面已然达成高度共识，即希冀通过整合美国内外优势资源，重构中美在政治、外交、经济、科技等层面的关系，进而实现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的。

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推进，美国国会正以空前激进的姿态介入政府对华政策过程，对我国国家利益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害。为此，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美国国会政策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些学者以国会某一特定时期的涉华立法提案为样本，分析国会立法介入中国问题的行为模式<sup>[4]</sup>；有的聚焦于涉港、涉疆、涉台、人权、经济、政治等某个具体议题，探究国会参与对华政策的特点和规律<sup>[5]</sup>；也有学者关注国会议员个人在对华政策形成中的角色，考察参众两院议员窜台的动机和影响<sup>[6]</sup>。上述相关研究运用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国会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国会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角色与影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尽管少数学者对国会某些委员会展开了个案研究<sup>[7]</sup>，但这些研究要么发表于特朗普执政时期（2017 年至 2021 年），要么聚焦于某个单一议题委员会（如情报委员会），无法反映美国对华采取“全政府”方式下国会激进干涉中美关系的最新动向与整体面貌。2023 年年初以压倒性票数（365 票对 65 票）表决通过并成立的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密集出台一系列反华遏华举措，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重构朝向不利于我国国家利益的方向迈进。毋庸置疑，国会在美国政府重构对华政策过程中扮演愈加关键的角色，其采取的强硬对华举措势必对中美关系、地区稳定乃至全球治理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探讨美国国会在美方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负面角色、最新动向及其多重影响，并提出几点中方应对思考。

## 一、美国国会介入外交政策的动因与途径

在美国立法、行政、司法等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构之下，国会不仅在内政议题上拥有至高无上的

立法权, 而且在外交事务上也具有监督和制衡总统的责任与权力。除了制度性因素, 国会介入政府外交政策的动因, 还与外部安全环境的宏观因素和议员个人的微观因素密不可分。国会具有多种介入外交政策的途径, 主要包括立法、否决、问询等。

### (一) 国会介入外交政策的动因

首先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性因素。自建国以来, 美国总统所领衔的行政当局与参众两院构成的国会就在诸多事务上相互牵制、纷争不断, 在外交事务上尤其如此。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 即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分支既相互独立又彼此牵制, 通过限制任何权力部门——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权力过大, 从而维持美国国家利益的总体平衡。尽管美国宪法将行政权划归总统所有, 但同时也赋予参众两院一定的外交权限, 导致总统一国会关系 (又称行政—立法关系) 长期存在着张力。例如, 美国宪法第一条规定: 国会有权宣布战争、召集军队、管理与国外的贸易协定、批准协议和任命大使、负责军事和外交措施的拨款等事务, 但第二条又规定: 总统是军队和对外条约谈判的总指挥, 拥有提名大使和任命使领馆官员的权力<sup>[8]</sup>。可见, 宪法文本赋予了国会和总统特定的外交权力, 使两者似乎各有分工但又彼此制约。从行政—立法关系因素观之, 不同政府形态对总统与国会互动存在显著影响。当执政党同时控制参众两院 (即一致政府形态) 时, 总统的对外政策较少受到国会的干预; 而当反对党同时掌控国会两院 (强分立政府形态) 或某一院 (弱分立政府形态) 时, 国会则更倾向于干预总统的对外政策, 挑战后者的外交事务主导权<sup>[9]</sup>。总之, 不论是美国建国先贤们有意为之, 还是立法者们制宪时遗留的法律漏洞, 总统与国会围绕外交事务的持久博弈, 已成为观察美国政治与外交战略的重要窗口。

其次是外部安全环境与国际政治变迁的现实政治因素。在现实操作层面, 为了维持国会在政府外交政策中的话语权、防止出现权力极大的“帝国总统”, 国会在特定时期和相关议题上不遗余力地介入外交政策过程。当国际安全形势严峻且总统在外交决策方面广受好评时, 国会更可能在外交事务上配合总统; 反之, 则会挑战总统的权威<sup>[10]</sup>。例如, 为赢得冷战的胜利, 国会自 1955 年开始在外交问题上对总统处于依从状态, 尤以 1964 年参众两院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的一项决议案为标志, 该决议案允许总统在国外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击退针对美国的任何侵略行为<sup>[11]</sup>。但随着美国在越战中接连失利并逐渐处于被动境地, 国会对总统的态度也由默许转为质疑<sup>[12]</sup>。为此, 国会在 20 世纪 70 年代相继出台了《战争权力决议案》等旨在限制总统外交权力的提案。

最后是议员个人的政策倾向、党派归属、意识形态偏好等微观因素。国会是一个由 535 位立法者 (包括 100 名参议员和 435 名众议员) 构成的庞大决策群体, 议员们在价值观、意识形态、教育背景、情感倾向、所代表的群体等诸多方面差异极大, 这导致总有议员出于某些个人因素而不同程度介入政府外交政策。例如, 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 尤其是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地区之后, 美国国会长期存在一批亲台反共议员, 他们对台湾当局的顽固支持和所谓同情, 一度构成了支撑美国对台政策的主要动力和干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sup>[13]</sup>。此外, 出于选举需要, 议员往往会考虑其选民在外交问题上的态度。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共和党选民在对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民主党选民更为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而共和党选民则更为谨慎。选民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将很有可能影响国会的立场<sup>[14]</sup>。

### (二) 国会介入外交政策的途径

立法、否决、拨款、问询等权力, 是联邦立法者们参与外交政策过程的主要途径。首先, 就特定

问题提出立法提案（具体分为简单决议案、联合决议案、共同决议案、法案以及修正案），是国会介入外交事务、限制总统外交权力的首要途径。在国会制订的诸多涉华法律中，1979 年生效并沿用至今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对中国国家利益伤害最甚，该法赋予了国会干涉美国对台政策的所谓“法理权力”，为国会持续介入政府对台政策、干涉我国台海事务埋下祸根。其次，动用否决权是两院议员表达国会意见、掣肘行政当局某项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之一。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国会先后于 1919 年和 1920 年连续两次否决了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多边协定，阻止美国加入威尔逊首倡成立的新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象征着国会所主张的孤立主义外交的胜利。再次，国会可动用人事否决权，干预总统对国务院、国防部、情报界等涉外政策的部长级官员以及驻外大使的提名。在美国历史上，参议院共否决了 9 次总统人事任命案，包括老布什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约翰·托尔<sup>[15]</sup>。最后，独占“钱袋权”的国会也可通过延迟或拒绝拨款，要求总统在特定外交政策上考虑或纳入国会关切，以此影响外交政策。此外，两院常设的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情报委员会等涉外委员会，可在其认为必要时传唤行政当局官员，表达对行政部门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合理性的质疑。

近年来，尤其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美国行政部门极力推动对华政策重构，持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以往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理性务实角色的总统及其领衔的行政部门，如今与国会已成为推动对华政策重构的“双引擎”，联手推动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sup>[16]</sup>。这一新的政策背景无疑给予国会更多空间，使之可以空前的力度与广度参与对华政策制定。国会于 2018 年主导制定并完成立法程序的“2019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提出了遏制中国的所谓“全政府战略”这一全新概念，可谓是近 20 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涉华立法之一。根据相关统计，国会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共发起约 400 项涉华法案和决议案，导致美国媒体和公共舆论的对华负面认知达到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sup>[17]</sup>。在美国两党政治精英看来，对华政策已成为国会两党立法者优先关切的议题。在此情况下，国会各委员会也成为两党辩论和参与对华政策的主要平台。2023 年 2 月至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议院能源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等先后举办“评估战略竞争时代美中政策”“研究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中国对美国国土构成的威胁”等听证会，就美国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甚至在 2023 年 5 月公开表示，该院民主党人正动员几乎所有委员会成员，致力于出台一项大规模的立法动议，以对抗中国不断提升的影响力并维持美国的全球竞争力<sup>[18]</sup>。总之，美国国会已然成为反华遏华“急先锋”，须密切关注其相关涉华动向。

## 二、美国国会成立美中竞争委员会的动因

成立临时或特别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介入政府外交事务的重要途径。例如，国会在 2000 年成立的“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和“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全面地监督总统主导制定的对华政策。如果说，奉行对华接触政策是上述两个委员会成立的时代背景，那么，推行对华战略竞争、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则是美中竞争委员会得以成立的主要动因<sup>[19]</sup>。此外，美中竞争委员会的设立还是诸多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的国际因素

在国际体系层面，美国日益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够挑战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所谓“对手”，而国



会认为成立美中竞争委员会是应对中国挑战的必要举措。无论是从美国战略文件还是从政府高官相关言论来看, 中国在多个实力层面的持续攀升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 是美国政府极力重构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因素和首要动因。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声称, 国家实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寻求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取代美国……并重新安排对其有利的地区秩序”, 正式宣布中美进入战略竞争时代<sup>[20]</sup>。拜登政府在 2022 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进一步声称, 中国是“有意图且愈发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sup>[21]</sup>。美国国防部在 2023 年出台的涉华军力年度报告也妄称, 中国的国家战略旨在通过提高国力以“改变国际秩序”<sup>[22]</sup>。美国情报界连续三年 (2021—2023 年) 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也将中国视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声称中国在多个领域对美国构成挑战并寻求改变世界秩序<sup>[23]</sup>。不少美国高官也在多个场合老调重弹, 重申中国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者”。例如, 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曾多次公开指责, “中国是唯一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 也愈发具备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sup>[24]</sup>。美国现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也在其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声称, 中国的大战略是“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sup>[25]</sup>。总之, 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快速发展加剧了美国对其地位快速衰落的焦虑感, 并重塑政治精英的对华政策认知。其结果是, 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不仅冲击了中美关系, 而且正推动所谓战略竞争转变为支配性的全球范式, 影响了地区稳定与全球发展<sup>[26]</sup>。

## (二) 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的美国国内因素

在社会层面, 美国政策研究界、商界、媒体和大众等群体的对华认知日趋消极, 为美中竞争委员会的成立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社会基础。自特朗普上台以来, 美国主流智库专家开始全面反思和检讨对华接触战略, 越来越多人士呼吁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政策进行强有力的回击<sup>[27]</sup>。早在 2019 年, 美国自由派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副总裁兼外交政策主任布鲁斯·琼斯召集塔伦·查布拉、杜如松、何瑞恩、米拉·瑞普-霍伯等年轻学者就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展开辩论, 多数与会者声称战略竞争将是审视未来中美关系的重要视角, 美国需要采取外交、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多领域的协同努力来应对两国竞争<sup>[28]</sup>。知名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和中间派智库国会研究处发表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中也炒作美中关系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呼吁美国在先进科技、南海和东海地区与中国展开激烈的战略竞争<sup>[29]</sup>。总之, 以各大主流智库为代表的美国政策研究界已普遍接受美国政府界定的对华战略竞争框架, 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抱持日益消极的政策认知。

美国商界、媒体和大众对中国的消极认知也出现罕见的历史峰值。美国知名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在 2022 年针对美国制造业、技术和金融等行业的一份调查中发现, 大部分被访者基本认同特朗普政府于 2017 年至 2020 年期间推行的对华强硬政策<sup>[30]</sup>。美国商会在 2023 年 9 月对 300 多家会员企业进行的调研则发现, 仅 52% 的企业对其未来五年的在华业务持乐观态度, 这是自 1999 年以来的最低值<sup>[31]</sup>。受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影响, 美国新闻媒体的对华叙事也日趋负面, 这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尤为明显<sup>[32]</sup>。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也急速下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相关民调显示, 自 2020 年以来, 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受访者对中国持有消极认知, 而持积极认知的受访者自 2017 年的 47% 下降至 2022 年的 16%<sup>[33]</sup>。美国国内各界对华消极认知的持续增加, 为国会成立美中竞争委员会提供了关键的舆论动力和社会基础。

### （三）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的议员个人因素

对国会立法者而言，在当前反华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正确的氛围下，联手成立并利用美中竞争委员会这个涉华专门平台炒作中国议题，不仅可以让自己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而且有望在仕途上博取本党甚至反对党强硬派的支持。从后文分析可知，加拉格尔是美中竞争委员会所有成员中发起涉华立法提案最多者，这大幅增加了他被美国各大主流媒体报道的概率，甚至因此被广泛视为共和党的新一代国会领袖<sup>[34]</sup>。事实上，保守色彩浓厚且长期热衷于操弄涉华议题，是加拉格尔被任命为美中竞争委员会主席的主要原因之一。担任该委员会主席之后的“积极表现”，也为他赢得了来自共和党内同僚和保守派人士的“好评”<sup>[35]</sup>。不仅如此，加拉格尔也成为美国其他各界的“座上宾”，多次被邀请到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等知名智库，就国会对外政策发表主旨演讲<sup>[36]</sup>。

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也可借助外界对该委员会的广泛关注，以及该委员会不断增加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他们在其他国会常设委员会的话语权。美中竞争委员会 24 名成员来自不同的选区、具有多元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倾向，且分属众议院不同的常设委员会，包括情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拨款委员会、金融委员会等重要委员会。原本属于不同常设委员会的成员加入美中竞争委员会后，无异于拓宽他们发表涉华观点、参与决策的渠道。例如，共和党议员、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伯·维特曼就利用美中竞争委员会这个平台，多次发表有关通过改善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加强与台湾方面的防务合作，以期实现威慑中国大陆海上军力目的的政策立场<sup>[37]</sup>。

表 1 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信息一览

序号	姓名	党派	所属地区	其他国会常设委员会主要任职情况
1	麦克·加拉格尔	共和党	威斯康星州	军事委员会网络、信息技术和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情报委员会成员
2	罗伯·维特曼	共和党	弗吉尼亚州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事委员会战术空军和陆军小组委员会主席，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
3	布莱因·卢克迈尔	共和党	密苏里州	金融服务委员会国家安全、非法融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小组委员会主席，小企业委员会成员
4	安迪·巴尔	共和党	肯塔基州	金融委员会金融机构和货币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金融委员会国家安全、非法融资和国际金融机构小组委员会成员，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委员会成员
5	丹·纽豪斯	共和党	华盛顿州	拨款委员会成员，西部连线主席
6	约翰·穆罗尔	共和党	密歇根州	拨款委员会成员，化学连线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席
7	达林·拉胡德	共和党	伊利诺伊州	情报委员会国家安全和网络小组委员会主席，筹款委员会工作和福利小组委员会主席，美中工作组联合主席
8	尼尔·邓恩	共和党	佛罗里达州	能源和商业委员会成员
9	吉姆·班克斯	共和党	印第安纳州	军事委员会成员，教育和劳工委员会成员
10	达斯蒂·约翰逊	共和党	南达科他州	农业委员会成员，交通和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
11	米歇尔·史蒂尔	共和党	加利福尼亚州	筹款委员会成员，教育与劳工委员会成员，国会一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成员，台湾连线成员
12	阿什利·辛森	共和党	艾奥瓦州	拨款委员会成员
13	卡洛斯·希门尼斯	共和党	佛罗里达州	国土安全委员会交通与海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台湾连线成员

陈静, 周文星.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75-192.

序号	姓名	党派	所属地区	其他国会常设委员会主要任职情况
14	拉贾·克里希纳姆尔提	民主党	伊利诺伊州	情报委员会成员, 监督和问责委员会成员
15	凯西·卡斯托	民主党	佛罗里达州	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 气候危机特别委员会主席
16	安德烈·卡森	民主党	印第安纳州	情报委员会成员, 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
17	塞斯·穆尔顿	民主党	马萨诸塞州	军事委员会战略队部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 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
18	罗·康纳	民主党	加利福尼亚州	军事委员会网络、创新科技及资讯系统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 监督委员会成员
19	金安迪	民主党	新泽西州	军事委员会军事人员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 外交委员会成员
20	米基·谢里尔	民主党	新泽西州	军事委员会成员
21	哈利·史蒂文斯	民主党	密歇根州	科技、太空和技术委员会研发和科技小组委员会资深成员, 教育与劳工委员会成员
22	杰克·奥金克洛斯	民主党	马萨诸塞州	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
23	里奇·托雷斯	民主党	纽约州	金融服务委员会成员
24	香特尔·布朗	民主党	俄亥俄州	农业委员会成员, 监督和问责委员会成员

数据来源: 根据美国众议院官方网站 (<https://clerk.house.gov/>) 相关信息整理。

### 三、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以来的主要涉华动向

自成立以来, 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加速推进涉华立法, 并以发布报告、举行听证、展开调查等方式, 在经贸、核心科技、台湾问题、军事安全等问题上进一步加剧对华战略竞争的烈度, 恶化美国公众对华积极认知, 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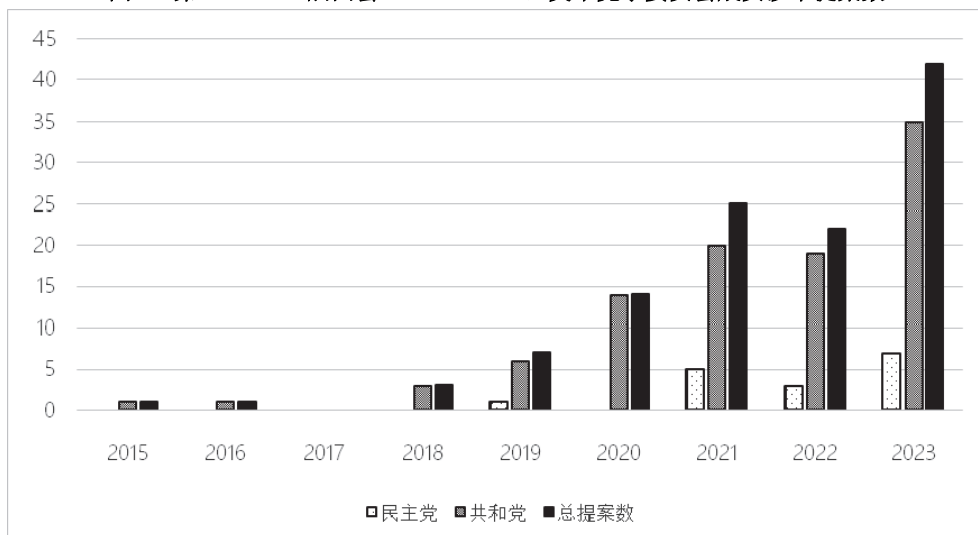
#### (一) 介入涉华政策过程的主要途径

一是以立法途径加速涉华立法制订进程。与其他大多数特别委员会一样, 美中竞争委员会本身并不具备立法权, 但委员会却可以通过其组织影响力以及委员会成员个人享有的立法权, 协助推动出台与中国相关的立法提案和制订涉华法律。正如加拉格尔 2023 年 1 月在对外介绍美中竞争委员会时所宣称的, 加快启动该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 对于协助通过新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极为必要<sup>[38]</sup>。根据笔者统计, 美中竞争委员会 24 名成员自 2015 年至今发起的涉华提案数量快速增长, 且以共和党成员提出的立法提案占绝对多数, 这一发展趋势在共和党议员、时任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于 2021 年酝酿成立特别委员会之后更为明显 (见图 1)。总体而言, 委员会成员发起的相关立法提案呈现极为负面的对华态度, 引起较大反响的议题包括“禁止美国金融业与中国央行的合作”“加大对中国企业投资的限制”“对抗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等。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为例: 通过统计国会官网立法提案数据, 笔者发现加拉格尔在第 115 届 (2017 年 1 月 3 日—2019 年 1 月 3 日) 至 118 届国会 (2023 年 1 月 3 日—2025 年 1 月 3 日, 数据截至 2023 年 11 月) 期间一共主导发起了 51 项涉华提案, 而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就提出 29 项提案, 占其近 6 年来发起涉华立法提案总数的 57%。鉴于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时间晚, 且国会立法程序繁琐、周期长, 委员会成员 2023 年以来发起的涉华提案尚未成为正式法律。有关国会立法的实证研究表明, 国会各委员会成员发起的

相关提案往往可以通过媒体报道去间接影响舆论，进而加速相关立法工作、影响政府决策走向<sup>[39]</sup>。

二是运用调查权介入和影响对华政策过程。在立法过程中，美国国会可依据实际需要对相关议题展开深度的调查工作。设立于被共和党所掌控的众议院之下的美中竞争委员会，更倾向于对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议题发起更密集的调查。在 2023 年发起的一系列调查案中，较具代表性的包括：2 月份对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赵富年在香港特区政府宣传片中露面一事展开调查<sup>[40]</sup>；5 月对中国快时尚品牌希音、特姆存在所谓“强迫劳动”、逃避美国进口关税等行为进行调查<sup>[41]</sup>；7 月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清华大学开展的所谓受中国政府资助的军民两用技术科研项目展开调查<sup>[42]</sup>；8 月对美国黑石集团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为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公司提供便利而展开调查<sup>[43]</sup>。美中竞争委员会发起的这些涉华调查，其目的无非是通过炒作、渲染“中国威胁论”，迫使拜登当局出台更具对抗性的对华政策举措。

图 1 第 114—118 届国会（2015—2023）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涉华提案数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国会官网（www.congress.gov）数据整理制作（截至 2023 年 11 月）。

作为国会调查权的具体实践方式之一，听证会是国会初步研拟立法政策时收集、分析各界意见的正式方法。围绕涉华议题举行听证会，已成为美中竞争委员会施压行政当局改采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的主要抓手。例如，委员会在 2023 年 7 月举办了一场名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的听证会，邀请了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商务部出口管理事务助理部长西娅·肯德勒等拜登当局高官出席，委员会成员在听证会上尖锐抨击拜登政府当前“不温不火”的对华政策，批评行政部门效率低下的跨部门合作影响部分对华政策的有效实施，主张拜登当局对华采取更全面的对抗性政策<sup>[44]</sup>。

三是诉诸舆论提升中国“挑战”的紧迫感、凸显对华展开战略激烈竞争的必要性。一般而言，成立特别委员会往往是因为现有常设委员会无法集中精力全面应对某项议题，或者认为某项特殊议题值得展开更深入的调查<sup>[45]</sup>。自 2021 年初入主白宫以来，拜登当局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华战略竞争

框架,并在关税、核心科技、涉台博弈等议题上采取强硬的政策举措。但在一些国会强硬派议员看来,拜登当局的对华政策仍过于“软弱”。加拉格尔在2023年年初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成立美中竞争委员会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集中并动员国会各委员会的优势资源和力量,大幅提升各界对中国“挑战”的紧迫感,凸显对华战略竞争的必要性并制定相关应对之策<sup>[46]</sup>。为实现这一目的,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以来,通过发起密集的涉华议题调查、举行一系列听证会和新闻发布会以及发布专题报告等方式,结合运用有关视频网站和推特社交平台直播以及转发委员会的相关涉华动态,提升美国各界对美中竞争议题的关注度,强化应对中国“挑战”的紧迫程度,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内极为负面的涉华舆论环境。

## (二) 介入涉华政策过程的主要特点

一是整合国会两党优势力量,与行政当局协调一致强硬对华。作为美国国内政治的“替罪羔羊”,中国议题长期以来遭受包括国会领袖在内的美国政客的无端攻击。但在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之前,国会议员对中国议题的关注较为分散,对涉华立法议题的推动力度不强、渠道也较为单一,因此介入对华政策过程的效果不彰。但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推进,国会两党多数议员在对华强硬问题上已达成高度共识,这为美中竞争委员会的成立注入了新的动力。正如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民主党议员里克·拉森曾指出的,“过去,美国国会内部有三种对华鹰派:国家安全鹰派、贸易鹰派和人权鹰派。只要他们之间相互不交谈,彼此就不会意识到各自对华强硬的立场。但在过去几年里,这三个派别在中国问题上合作日益紧密,并在国会中达成共识”<sup>[47]</sup>。这种共识认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美中竞争委员会,而且成为维持该委员会成立后有效运转的动力源。各类国会鹰派人士将该委员会视为新的跨党派工作平台,通过协调一致的方式发力,协助并监督国会和行政当局制定更为连贯的对华政策,维护美国国家利益<sup>[48]</sup>。例如,美中竞争委员会在2023年5月推出了有关所谓“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十条建议,其中多条建议与2024年参众两院推出的国防授权法案内容重叠,包括向台湾地区提供旨在提升其所谓“非对称防御能力”的武器、为台湾防务力量提供网络安全训练等<sup>①</sup>。可见,为了更有效地介入对华政策、实现反华遏华目的,美中竞争委员会不仅侧重于整合两院两党议员的优势资源,而且更加注重与行政当局携手合作制定对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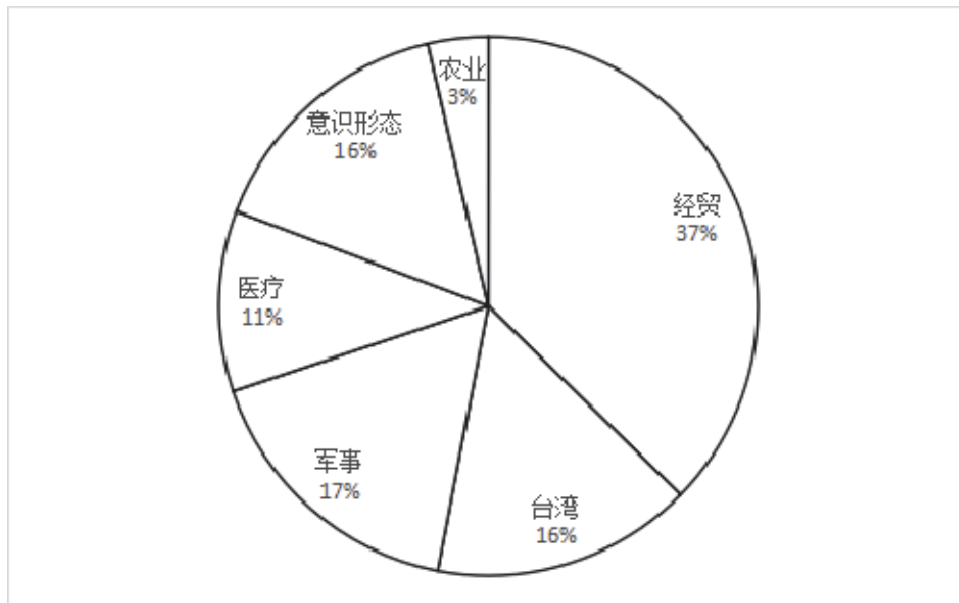
二是关注议题广泛,但侧重于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领域。2023年11月,克里希纳姆尔提在接受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采访时表示,美中竞争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评估中美竞争相关的经济、技术、军事和国家安全风险<sup>[49]</sup>。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至今一年多时间里,已就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所谓国家安全“威胁”、涉疆人权、经济贸易等广泛议题举办了一系列听证会,邀请了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麦克马斯特、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等多名前政府对华鹰派高官出席作证。从笔者整理的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近三年涉华提案来看,委员会成员关注的涉华议题虽然广泛,但主要聚焦于经贸问题(见图2)。在经贸问题上,委员会成员的核心

---

<sup>①</sup> 2023年5月24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布有关台湾问题的十条建议,参见: Ten for Taiwa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eser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olicy-recommendations/ten-taiwan-policy-recommendations-preserve-peace-and-stability-taiwan>。截至2023年11月,参议院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S. 2226)已在参议院通过,而众议院(H. R. 2670)版本已在两院通过。参见: <https://www.congress.gov/>。

主张包括：加大对中国在美投资的监管、禁止中国购买美国农田、遏制中国在国际性金融组织的影响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等。在关注度次之的军事问题上，委员会成员要求美国加大对军力的投入，尤其是提升对中国军方进行技术封锁的能力建设，并防止后者获取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关注度同样较高的台湾问题上，委员会成员呼吁美国政府协助台湾地区提高其“自我防御能力”、推动同台湾当局在医疗与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台湾提供军事贷款和租借防务设备等。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委员会成员进一步干涉我国涉疆涉港事务，以人权之名行干涉我国内政事务之实。

图 2 美中竞争委员会成员近三年（2021—2023）涉华提案议题分布



数据来源：根据美国国会官网公布的数据整理制作（截至 2023 年 11 月）。

#### 四、美中竞争委员会涉华动向的多重影响与局限

为了赢得对华战略竞争，美中竞争委员会致力于以立法、听证、调查等途径介入对华政策过程，其对抗性的政策姿态与举措不可避免地对中美关系、亚太区域稳定乃至全球治理造成一系列危害后果。但由于该委员会本身存在的不足以及美国不得不对华开展必要的对话与合作等主客观事实，众议院这一特别委员会在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注定是有限的。

##### （一）美中竞争委员会对中美关系及区域稳定、全球治理的多重影响

一是恶化在美华人华侨的生存环境，阻碍中美人文交流。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以及对新冠疫情的政治操弄，导致美国国内针对包括华人在内的亚裔的敌意和攻击激增。这一不利局面并没有随着拜登的当选而明显改善。根据美国相关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2021 年美国国内针对亚裔仇恨犯罪率比上年同比增长了 339%<sup>[50]</sup>。美中竞争委员会在中国问题上充满敌意的政策倡议，无疑进一步鼓励了美国国内空前高涨的仇恨亚裔运动，恶化了在美华人华侨的生存、生活环境<sup>[51]</sup>。如前文分析，美中竞争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持反华立场，发表的涉华言论正在

美国战略界、舆论界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 致使美国部分民众更加仇视中国。美国华裔精英团体“百人会”地区主席朱柏章 2023 年 5 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这一困境: “人们都想为自身的处境寻找‘替罪羊’, 两党都说中国是敌人, 而那些身处苦难的人都将我们(华人)视为敌人”。<sup>[52]</sup> 这种充满敌意的环境必然急剧降低中国民众赴美旅游、求学和生活的意愿, 进而阻碍中美人文交流, 这又进一步削弱中美关系发展的民间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初, 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毫无根据的反共言论和不实指控, 对美国各界精英人士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如今, 美中竞争委员会发起的一系列涉华调查已经在美国部分人士和群体中制造了恐惧感, 大有重蹈“麦卡锡主义”覆辙的意味<sup>[53]</sup>。

二是阻挠中美正常经贸往来, 加速推动两国经贸“脱钩断链”。凯文·麦卡锡在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之前的表决会上宣称, 该委员会将使美国经贸和供应链摆脱过度依赖中国的局面, 并增加美国国内就业、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农田<sup>[54]</sup>。委员会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动作, 谋求推动美国经贸科技企业减少对华依赖度。例如, 在美中竞争委员会 2023 年 7 月召开的“风险生意: 美国在华企业面临的风险日趋严重”听证会上, 加拉格尔夸大对华投资的风险, 呼吁“美国公司高管摘下‘金色眼罩’, 用清晰的眼睛审视在华业务中与日俱增的危险”<sup>[55]</sup>。换言之, 美中竞争委员会的目标之一, 就是通过鼓吹“中国威胁论”, 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科技经贸领域的“脱钩断链”。随着美中竞争委员会展开相关调查和质询力度的增强, 美国商界被迫开始关注相关动向, 甚至一些原本与中国保持正常商业往来的跨国公司和团体, 由于美国政府施压不得不痛下疏远和撤离中国市场的决定。

三是为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注入更多不确定因素, 增加全球治理的难度。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深化, 美国国会涉华立法议题比以往更为广泛, 正从“低政治”转向“高政治”领域<sup>[56]</sup>。台湾问题已成为美中竞争委员会热衷于干涉的几个主要“高政治”议题之一。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后, 加拉格尔等成员相继窜访台湾地区并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返回美国之后, 美中竞争委员会动用调查和质询权要求美国国防部提供机密简报, 讨论“美国协助台湾地区”增加威慑力的相关提案, 扬言美国“需要迅速重建一个可以武装台湾的威慑武器库, 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任何冲突中都能获胜”<sup>[57]</sup>。美中竞争委员会对台湾问题的粗暴干涉, 势必招致中国政府的坚决回应与反制, 影响地区局势的稳定前景。美中竞争委员会还致力于塑造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安全战略环境, 以便在与中国的竞争过程中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与价值观<sup>[58]</sup>。美国日趋竞争性和对抗性的对华政策, 不仅为亚太地区安全局势注入不确定性因素, 而且可能增加其地区盟友和伙伴国家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 压缩亚太国家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空间, 进而增加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成本。

## (二) 美中竞争委员会的前景与局限

随着美中竞争委员会涉华活动不断扩大, 其产生的影响必将更加广泛、危害更加恶劣。但美国国内理性人士的反对、委员会内部的分歧与缺陷, 以及中美关系大局的结构性约束, 将掣肘该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作用。

首先, 美中竞争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运作招致了美国国内理性人士与群体的反对。美中竞争委员会成立不久, 就有 23 名众议员发表联合声明, 认为该委员会将煽动美国国内的种族仇恨、刺激反亚裔情绪, 甚至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sup>[59]</sup>。众议院国会进步党团主席普拉米亚·贾亚帕尔、外交委员会

资深议员格雷戈里·米克斯、亚裔领袖赵美心等资深民主党领导人，因担忧该委员会可能导致中美陷入无休止的冲突甚至开启一场“新冷战”而投票反对这一组织的成立<sup>[60]</sup>。美中竞争委员会推动的相关涉华政治议程也遭到了反对。例如，在美中竞争委员会 2023 年 2 月举行的首场涉华政策听证会上，美国非政府组织“粉色代码”成员在现场发起抗议，指责这个新成立的组织推行的相关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利于美国各族群之间的和平相处和社会的稳定发展<sup>[61]</sup>。尽管当前美国国内反华势头正猛，但美国仍有不少主张对华采取务实、温和政策的理性人士，美中竞争委员会不仅会持续遭受一些国会议员的掣肘，而且可能面临更多来自普通民众和相关社会组织的质疑与反对。

其次，美中竞争委员会内部成员对于该组织的运作模式、具体对华政策举措以及参与决策的策略也存在明显分歧。美中竞争委员会自诩为一致对华的跨党派团体，但从图 1 可知，共和党成员提出的涉华立法数量要明显高于民主党成员，党派色彩浓厚。在美中竞争委员会具体的对华政策措施方面，成员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认知。以加拉格尔为主的共和党人将中美关系描述成“战略脱钩”与“生存斗争”，并极力主张将对台军售列为美中竞争委员会的最优先事项；而以克里希纳姆尔提为代表的民主党人，则保留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相关战略议题上进行对话甚至合作的空间，并且更注重美国国内政策和投资，认为美中竞争委员会应将参政重点放在“加大对未来科技投资、改善劳动力以及解决国内经济弱点”等议题<sup>[62]</sup>。美中竞争委员会举办的相关活动接连暴露出两党成员对各自优先政策的不同解读。不同于民主党议员在气候变化、能源议题上寻求与中国对话合作的态度，加拉格尔倾向于在所有议题上对华采取完全敌视和对抗的姿态<sup>[63]</sup>。正因如此，部分民主党人质疑美中竞争委员会的两党性，批判该委员会只是共和党单方面应对中国问题的工具<sup>[64]</sup>。美中竞争委员会的结构性缺陷，即委员会本身不具备立法权，也将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其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特别委员会理论上是为了特殊的目的而设立的临时委员会，一旦实现其目的即可解散<sup>[65]</sup>。

最后，中美关系大局这一结构性因素将在根本上约束美中竞争委员会的未来发展。纵观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轨迹，不论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敌视与对抗，还是七八十年代的缓与与合作，抑或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合作与竞争交织并存，美国对华政策不仅直接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而且为美国国会参与对华政策提供了空间。正如既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中美关系是决定美国国会在多大程度可以参与政府对华政策的关键性变量<sup>[10]</sup>。国会两院涉华立法提案数量的多寡变动，往往与中美关系的高低起伏密切相关。国会领袖窜访台湾地区的强烈意愿，往往也都以中美关系发展陷入暂时性的挫折为政策背景。同理，美中竞争委员会之所以在 2023 年能够得以成立并快速运作，同样与当前处于所谓“战略竞争”甚至“局部对抗”的中美关系密不可分。从长远来看，中美关系仍将回到沟通、对话与合作的发展轨道上，届时必将约束美中竞争委员会的发展空间。

## 五、中方几点应对思考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正趁势以空前激进的姿态介入对华政策过程。以美中竞争委员会为代表的国会特设组织，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加大力度推动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对华政策议程。对此，中方应保持战略定力，并在加强美国国会研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两



国间智库专家对话、加强与美在全球重要战略议题合作等方面多管齐下, 为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正轨奠定理论与政策基础。

一是加强美国国会研究。如前文分析,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美中竞争委员会等国会专门涉华特设委员会则可以在相关议题上对美国对华政策起到极为恶劣的破坏作用。可以说, 美国国会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尤其是对美工作方面的“老大难”问题。但现阶段我国学界对于美国国会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明显不足, 无法满足我国外交实务工作需要。对此, 相关部门可鼓励更多学者投入到对美国国会的研究之中, 包括在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探讨国会介入美国对华政策过程的方式、规律、影响等, 为中方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应对之策做好理论准备工作。

二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据统计, 自 1979 年中美建交以来, 中国赴美留学人数不断增加, 连续多年突破 30 万大关; 美国累计在华留学人数也超过 30 万。与此同时, 中美两国地方交流和友好城市往来富有成效, 中美双方已经建立 284 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 覆盖了美国 90% 以上州市, 共同推动双边众多合作项目落地<sup>[66]</sup>。2023 年 11 月 15 日,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宣布, 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交流, 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年来华交流学习。这些旨在推动中美人文交流的类似举措, 有利于加深美国新世代民众对中国的了解, 改变美中竞争委员会等美国国内组织所传递的对华负面印象。

除了加深中美普通大众之间的接触与交流, 还应大力鼓励中美智库专家间的交流对话。作为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机构, 智库被誉为架起学术界和决策界之间联系的桥梁, 而智库专家之间的对话对于科学制定政策与知情决策极为关键。近期, 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实证研究报告, 高度肯定了由中美学者、专家以及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参加的二轨对话对于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两国共存的建设性作用, 包括为稳定竞争提供有益的观念、为双方政府内外有影响力的行为者建立个人关系、传递两国政府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的积极信号<sup>[67]</sup>。中美主流智库专家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有效沟通, 尤其是现任政府官员或者对现政府仍有影响的前任政府官员的参与, 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向对方表达己方关切, 有助于降低甚至排除国会等消极行为体对两国关系发展造成的杂音, 为寻求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找寻出路。

最后, 中方加大在政府工作层面的力度, 持续与美方展开必要的交流、对话甚至合作。美国各界不乏在对华政策上持理性、务实认知和立场的人士与群体, 他们都期待构建稳定、健康、可预期的中美关系, 这是中美展开政府间交流与合作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更重要的是, 美国要维持其所谓全球优势地位或霸权声誉, 就必须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如确保全球能源与粮食安全、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然而, 美国政府也深知, 凭美方及其盟友之力不可能有效应对和解决这些具有重大战略性的全球问题, 必须寻求中国的政策协调与合作。中方可保持与美方进行交流与沟通的渠道, 甚至在必要问题上展开合作。这不仅有助于维持中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有助于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 进而为地区的和平稳定乃至世界秩序走向贡献中国智慧。

## 六、结语

中美关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两国关系的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国际秩序的未来演进。然而, 美国政府近年来却错误地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甚至“对手”,

并将中美关系的本质界定为“战略竞争”，同时实质性地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军事安全等领域推动对华竞争和部分对抗，对中美两国关系、地区稳定与发展，以及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演进都造成了负面后果。中方须密切关注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代表的美国国会涉华动向与规律，并基于对美国国会相关涉华风险的准确分析和及时研判，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应对举措。本研究认为，中方可进一步鼓励研究者们强化对美国国会的学理与政策研究，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鼓励中美智库对话，并持续进行与美国政府的对话甚至合作，为充斥着竞争和不确定的美国对华政策嵌入合作与确定性因素，发挥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中国拥有足够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力与政治智慧，应对和处理当前充斥着战略竞争与对抗的中美关系。中方的积极塑造与作为将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可预测的发展轨道之上。

**参考文献：**

- [1] 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B/OL]. (2023-12-12) [2023-12-16].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 [2] Select Committee Adopts Proposal to Reset Econom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2023-12-12) [2023-12-16].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ress-releases/select-committee-adopts-proposal-reset-economic-relationship-peoples-republic>.
- [3] Michael Martina. US committee offers 2024 legislative “blueprint” for countering China [N/OL]. Reuters. (2023-12-13) [2023-12-1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us-committee-offers-2024-legislative-blueprint-countering-china-2023-12-12/>.
- [4] 王震宇, 栗潇远, 吴纪远. 第 115 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行为模式研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 (4): 62-98.
- [5] 郭永虎, 王禹. 美国国会涉华人权立法活动的历史演进、特征及影响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2 (3): 130-143.
- [6] 刁大明, 邹正航. 为何去台北: 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行为研究 (2001—2022) [J]. 美国研究, 2023 (6): 100-125.
- [7] 刘磊, 邵煜.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 135-143.
- [8]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B/OL]. (1789-09-17) [2023-12-20]. <https://www.senate.gov/about/origins-foundations/senate-and-constitution/constitution.htm#al>.
- [9] 林冈, 周文星. 美国国会涉台立法的规律与发展趋势研究 [J]. 美国研究, 2020 (3): 35-51.
- [10] James M. Lindsay. Deference and Defiance: The Shifting Rhythms of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in Foreign Policy.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2003 (3): 530-546.
- [11] 周琪.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28-29.
- [12] James M. Lindsay. Congress and Foreign Policy: Why the Hill Matters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2 (4): 607-628.
- [13] 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 1972—2000 (第三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61-121.
- [14] 达巍. 中期选举后美国外交的三种延续 [J]. 当代美国评论, 2022 (4): 14-25.

陈静, 周文星.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75-192.

- [15] Cabinet Nominations Rejected, Withdrawn, or No Action Taken [EB/OL]. [2024-01-02]. <https://www.senate.gov/legislative/NominationsRejectedorWithdrawn.htm>.
- [16] Gang Lin, Wenxing Zhou and Weixu Wu. What Shapes Taiwan-related Legislation in U.S. Congres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22 (31): 609-625.
- [17] Robert Sutter. US Congress' Role in Countering the China Challenge [N/OL]. The Diplomat, (2023-09-23) [2023-12-17]. <https://thediplomat.com/2023/09/us-congress-role-in-countering-the-china-challenge/>.
- [18] Lindsey McPherson. Senate Democrats announce sweeping effort to outcompete China [N/OL]. Roll Call, (2023-05-03) [2023-12-18]. <https://rollcall.com/2023/05/03/senate-democrats-announce-sweeping-effort-to-outcompete-china/>.
- [19] About the Committee [EB/OL]. (2023-01-10) [2024-01-09].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about-committee>.
- [2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EB/OL]. (2017-12-18) [2023-11-10]. <https://nssarchive.us/>.
- [21] Biden-Harri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EB/OL]. (2022-10-12) [2023-11-10].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 [22]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3 [EB/OL]. (2023-10-19) [2023-11-10]. <https://media.defense.gov/2023/Oct/19/2003323409/-1/-1/1/2023-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pdf>.
- [23]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EB/OL]. (2021-04-09) [2023-11-10]. <https://www.intelligence.gov/annual-threat-assessment>.
- [24] Quint Forgy and Phelim Kine. Blinken calls China "most serious long-term" threat to world order [N/OL]. Politico, (2022-05-06) [2023-11-09].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2/05/26/blinken-biden-china-policy-speech-00035385>.
- [25] Rush Doshi.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26] Michael J. Mazarr. The Essence of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J]. PRISM, 2020 (1): 2-21.
- [27] 周文星. 美国智库对华政策的认知、根源及其应对 [J]. 情报杂志, 2023 (2): 57-64.
- [28] Tarun Chhabra, Rush Doshi, Ryan Hass, Mira Rapp-Hooper, Bruce Jones and Will Moreland. Rethinking US-China competition: Next generation perspectives [EB/OL]. (2019-06) [2023-11-1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rethinking-us-china-competition-next-generation-perspectives/>.
- [29] Alex Wong. Competition with China: Debating the Endgame [EB/OL]. (2023-10-16) [2023-11-12]. <https://www.hudson.org/competition-china-debating-endgame-alex-wong>.
- [30] Bonny Lin, Howard J. Shatz, Nathan Chandler, Cristina L. Garafola, Eugeniu Han, Andy Law, King Mallory and Zev Winkelman. Bridging the Gap: Assessing U.S. Business Community Support for U.S.-China Competition [EB/OL]. (2022-07-15) [2023-11-13].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417-1.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1417-1.html).
- [31] AmCham Shanghai Release Report on Business Climate in China [EB/OL]. (2023-09-19) [2023-11-12].

- <https://www.amcham-shanghai.org/en/article/amcham-shanghai-releases-report-business-climate-china>.
- [32] Ted Carpenter.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s Volatile Perspectives on China [EB/OL]. (2020 fall) [2023-11-10]. <https://www.cato.org/cato-journal/fall-2020/american-news-medias-volatile-perspectives-china>.
- [33] Laura Silver. Some Americans' views of China turned more negative after 2020, but others became more positive [EB/OL]. (2022-09-28) [2023-11-12].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09/28/some-americans-views-of-china-turned-more-negative-after-2020-but-others-became-more-positive/>.
- [34] Marc Thiessen. Who are the GOP' s future leaders?Let' s start with Mike Gallagher [N/OL]. Washingtonpost, (2022-12-16) [2023-11-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12/16/mike-gallagher-gop-republican-leaders-marc-thiessen/>.
- [35] Ally Mutnick. Republicans press Wisconsin congressman to take on Tammy Baldwin [N/OL]. Politico, (2023-06-02) [2023-11-17].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6/02/republicans-gallagher-baldwin-wisconsin-senate-00099834>.
- [36] 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B/OL]. (2023-09-11) [2023-11-11]. <https://www.cfr.org/event/us-strategic-competition-china>.
- [37] Rob Wittman. What it looks like when competing with China comes last [N/OL]. Defense news, (2022-06-17) [2023-11-10]. <https://www.defensenews.com/opinion/commentary/2022/06/17/what-it-looks-like-when-competing-with-china-comes-last>.
- [38] Briana Reily. Chairman Gallagher outlines China committee' s agenda [EB/OL]. (2023-01-04) [2023-11-05]. <https://rollcall.com/2023/01/24/chairman-gallagher-outlines-china-committees-agenda/>.
- [39] Donald Ritchie. The U. S. Congres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
- [40] Daniel Flatley. Hong Kong promotional video focus of China panel' s first inquiry [N/OL]. The Bloomberg, (2023-02-20) [2023-11-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2-20/hong-kong-promotional-video-focus-of-china-panel-s-first-inquiry#xj4y7vzkg>.
- [41] Fast Fashion and the Uyghur Genocide: Interim Findings [EB/OL]. (2023-6-22) [2023-11-15].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reports/fast-fashion-and-uyghur-genocide-interim-findings>.
- [42] Ana Swanson. House Committee Targets U. C. Berkeley Program for China Ties [N/OL]. New York Times, (2023-07-17) [2023-11-13]. <https://www.nytimes.com/2023/07/17/us/politics/house-committee-berkeley-china.html>.
- [43] BlackRock, MSCI draw scrutiny from U. S. House Committee on China (N/OL). Reuters, (2023-08-02) [2023-11-1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finance/blackrock-msci-face-probe-allegedly-facilitating-china-investments-wsj-2023-08-01/>.
- [44] "We Need Strength" -Select Committee Presses Biden Administration on Lacking China Strategy [EB/OL]. (2023-7-20) [2023-11-30].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media/press->

陈静, 周文星. 美国对华政策重构过程中的国会——以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为个案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4 (2): 175-192.

- releases/icymi-we-need-strength-select-committee-presses-biden-administration-lacking.
- [45] Judy Schneider. The committee system in the US congress [EB/OL]. (2009-10-14) [2023-12-10]. <https://healthpolicy.pharmacy.vcu.edu/media/health-policy-pharmacy/documents/TheCommitteeSystemintheUSCongress2009.pdf>.
- [46] Phelim Kine. New House Select Committee seeks ‘Cold War’ victory over China [N/OL]. Politico, (2023-01-05) [2023-11-1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politico-china-watcher/2023/01/05/new-house-select-committee-seeks-cold-war-victory-over-china-00076465>.
- [47] Bonnie Girard. A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Group Supports Trump’s Tough-on-China Approach [N/OL]. TheDiplomat, (2019-04-05) [2023-11-01].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a-bipartisan-congressional-group-supports-trumps-tough-on-china-approach/>.
- [48] Emily Brooks. McCarthy taps Mike Gallagher to chair planned China Select Committee (N/OL). TheHill, (2022-12-08) [2023-11-12].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3767169-mccarthy-taps-mike-gallagher-to-chair-planned-china-select-committee/>.
- [49] What’s Next for US-China Relations?The View from Congress [EB/OL]. (2023-11-09) [2023-11-12]. <https://www.csis.org/podcasts/pekingology/whats-next-us-china-relations-view-congress>.
- [50] Kimmy Yam. Anti-Asian hate crimes increased 339 percent nationwide last year, report says [N/OL]. NBCNews, (2022-02-01)[2023-11-15].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anti-asian-hate-crimes-increased-339-percent-nationwide-last-year-repo-rcna14282>.
- [51] Jude Blanchette. A Policy Agenda for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EB/OL]. (2023-05-13) [2023-11-3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policy-agenda-strategic-competition-china>.
- [52] Mark Magnier. Asian-Americans Should Prepare For More Hate, Committee Warns [N/O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23-05-07) [2023-12-01].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3219660/asian-americans-should-prepare-more-hate-committee-warns>.
- [53] Anatol Klass. The real risk of the China select committee [EB/OL]. (2023-03-20) [2023-11-30].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20/china-united-states-competition-congress-select-committee-cold-war/>.
- [54] Kevin McCarthy. McCarthy Floor Remarks on Establishing the China Select Committee [EB/OL]. (2023-01-10) [2023-11-13]. <https://www.speaker.gov/29821-2/>.
- [55] House Committee On The CCP Says China Risks Are Rising For American Companies [EB/OL]. (2023-07-19) [2023-11-05]. <https://prosperousamerica.org/house-select-committee-ccp-hearing-china-risks-elevated/>.
- [56] 石培培. 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特点、机制以及走向——以第 115—117 届国会涉华提案为例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23 (1): 130-143.
- [57] Brooke Singman. China Committee Chair Gallagher proposes Taiwan deterrence strategy. demands Pentagon classified briefing[N/OL]. Fox News, (2023-12-18)[2023-12-18]. <https://www.foxnews.com/politics/china-committee-chair-gallagher-proposes-taiwan-deterrence-strategy-demands-pentagon-classified-briefing>.
- [58] Reset, Prevent, Build: A Strategy to Win America’s Economic Competi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B/OL]. (2023-12-12) [2023-12-16]. <http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sites/evo->

- subsites/selectcommitteeontheccp.house.gov/files/evo-media-document/reset-prevent-build-scc-report.pdf.
- [59] House Progressives on Opposition to Republican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EB/OL]. (2023-01-10) [2023-11-15]. <https://jayapal.house.gov/2023/01/10/house-progressives-on-opposition-to-republican-select-committee-on-china/>.
- [60] Marcus Stantley. House Creates Controversial New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 [EB/OL]. (2023-01-11) [2023-11-25].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3/01/11/beware-of-the-new-house-select-committee-on-china/>.
- [61] Jared Gans. Protesters disrupt House China panel's first hearing [N/OL]. The Hill, (2023-02-28) [2023-11-07].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3878446-protesters-disrupt-house-china-panels-first-hearing/>.
- [62] Jared Gans. At House hearing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ipartisan show of concern [N/OL]. Washington post, (2023-03-01) [2023-11-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3/01/select-committee-ccp-china-gallagher/>.
- [63] Andres Picon. House China select committee has energy hang-ups [N/OL]. E&E News, (2023-11-07) [2023-11-20]. <https://www.eenews.net/articles/house-china-select-committee-has-energy-hang-ups/>.
- [64] Mychael Schnell, House easily passes resolution to create bipartisan China select committee [N/OL]. The Hill, (2023-01-10) [2023-12-01]. <https://thehill.com/homenews/house/3807571-house-easily-passes-resolution-to-create-bipartisan-china-select-committee/>.
- [65] Michael Welsh.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US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EB/OL]. (2008-07) [2023-11-30]. <https://www.llsdc.org/assets/sourcebook/cong-cmte-overview.pdf>.
- [66] 崔守军, 李奕昕. 加强人文交流 浇筑中美关系根基 [EB/OL]. (2023-12-11) [2024-01-09]. [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3-12/11/content\\_116870717.shtml](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3-12/11/content_116870717.shtml).
- [67] Amanda Kerrigan, Lydia Grek and Michael J. Maza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Designing a Shared Future [R]. RAND Corporation, 2023: 1.

责任编辑: 杨稀琴

# 本刊文后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细则

根据《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 B/T 1—2006)和《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版)的规定,本刊对稿件的文后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作出如下要求,请向本刊投稿的作者按照本细则著录。

## 一、基本要求

稿件中所有引文和引用观点的文献出处,做到凡引必注,按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次序集中列于正文末尾,序号用带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序号标注。参考文献请注明主要责任者,题名(专著名、文章名),出版地,出版社名或期刊名,出版时间(版别、期数),页码。多次引用同一出处的参考文献时,在正文中标注首次引用的参考文献序号,并在序号的方括号外标注引文页码。

## 二、著录格式

### (一) 专著

适用于普通图书、会议录、汇编、学位论文、报告等。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者(任选). 版本项(任选).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起止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1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 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 [M]. 谢远涛,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贾东琴, 柯文.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 [C]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年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45-52.

[4] 袁洪权. “统一战线”政策下的“整合”——1951年的新中国“文艺界”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5] 吴云芳. 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并列结构研究 [D/OL]. 北京: 北京大学, 2003 [2013-10-14]. <http://thesis.lib.pku.edu.cn/dlib/List.asp?lang=g&type=Reader&DocGroupID=4&DocID=6328>.

### (二) 期刊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期刊名, 年(期): 起止页码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袁训来, 陈哲,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期演化的新窗口 [J]. 科学通报, 2012(34): 3219-3227.

[2]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 [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3] 李炳穆. 韩国图书馆法 [J/OL]. 图书情报工作, 2008(6): 6-12 [2013-10-15]. <http://www.docin.com/p-400265742.html>.

### (三) 报纸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报纸名, 出版日期(版次)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谢希德. 创造学习的新思路 [N]. 人民日报, 1998-12-25(10).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N/OL]. 人民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01/12/nw.D110000renmrb_20130112_5-02.htm).

### (四) 电子资源

凡属电子专著、电子专著中的析出文献、电子连续出版物、电子连续出版物中的析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分别按上述有关规则处理。除此而外的电子资源根据如下规则著录。

[序号] 主要责任者. 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 [R/OL]. (2012-01-16) [2013-03-26].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bg/201201/P020120709345264469680.pdf>.

[2]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 [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archive.ifla.org/IV/ifla64/138-161e.htm>.

## 三、文献类型和文献载体标识代码

### (一) 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普通图书, C——会议录, G——汇编, N——报纸, J——期刊, D——学位论文, R——报告, S——标准, P——专利, Z——其他。

### (二) 以网络为载体的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M/OL——网络图书, J/OL——网络期刊, N/OL——网络报纸, D/OL——学位论文, EB/OL——电子资源(不包括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网络报纸、学位论文)。

# 统一战线学研究<sup>®</sup>

## Journal of United Front Science

2024年第2期 总第44期 第8卷

双月刊 2024年3月20日出版

主管单位：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出版单位：《统一战线学研究》编辑部

主 编：王 鸿

地 址：重庆市南岸区涂山路140号

邮 编：400064

电话/传真：023-62874725

电子信箱：ysyxb@vip.163.com

采编平台：<http://cqsh.cbpt.cnki.net>

发行范围：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局集团重庆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78-128

印刷单位：重庆巍承印务有限公司

封面设计：向海涛

广告许可：渝工商第023053号



微信公众号

ISSN 2096-3378

CN 50-1215/C

定价：20.00 元

统一  
战  
线  
学  
研  
究  
  
二  
〇  
二  
四  
年  
第  
二  
期  
(  
总  
第  
四  
十  
四  
期  
第  
八  
卷  
)